

政治经济学报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第5卷



Vol.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政治经济学报

第5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目 录

CONTENTS

1	本刊特稿
3	以管资本为主的体制如何建立 荣兆梓
19	经济理论
21	围绕再生产图式的争论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66	两种 MELT 及其决定：对莫斯里和“新解释”的批判性评论 孟 捷
75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77	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 克里斯蒂安·帕劳
99	收入不平等、经济租金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 唐纳德·托马斯科维奇－迪维 林庚厚
123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125	置盐《积累论》再考察 中谷武

143	日本市民社会论系谱 ——从意识形态走向社会科学 渡边雅男
155	政治经济学和数理方法
157	结构增长模型及其在 Sraffa 体系上的应用 李 武
174	两大部类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充要条件及其应用 陶为群
187	调研报告
189	三大品牌公司农民工社保调研报告 “新生代” ilabour 课题组
200	玛曲高寒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性考察 杨思远 宋志娇
229	书评
231	行动的力量和一个人的影响 ——评弗雷德里克·李的《非正统经济学史》 张 林
239	《政治经济学报》投稿格式与注释规范

本刊特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以管资本为主的体制如何建立

荣兆梓*

摘要 “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经济顶层体制如何建立，是当前国有经济改革争论的焦点。国有经济公司制改革仅仅实现公司法人财产权制度的独立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国有资本股东代表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全世界发展的潮流是投资者拥有的资本采取信托基金形式，无论它是共同基金还是其他的公益基金，它都是信托制。我们在选择改革目标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这个大潮流。国有经济的分类管理首先要在资本管理的顶层设计上区分三种类型的基金：公益类基金、国家产业基金和营利性社会信托基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必须建立在信托制的产权基础上，按照三类信托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组建；大国资委体制要逐步向承担国有资本监察责任的小国资委体制转型，以实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的市场化改革目标。

关键词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信托制度 国家产业基金 社会信托投资基金 政府监察机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强调“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目标要求，是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向前迈出的重要步骤。但是文件这部分讲目标内容比较充实，谈措施内容比较空泛，反映了有关部门仍然存在较多意见分歧。本文讨论当前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产权模式和经营模式选择，以及通往这个模式存在的若干实际问题，进而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顶层制度设计提供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虽然论文主体部分写于《指导意见》公布前，但对当前的讨论仍然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 公司制改革只走了半程

当前国有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在哪？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公司制改革只走了半程。

我们国企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位为股份公司制度已经有 20 多年了，20 世纪 90 年代

* 荣兆梓，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

初已经明确这个目标，90年代中期这个改革起步，也改了20多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公司制改革只走了半程。笔者认为当前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根源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改革只走了半程，很多应该有的效果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本文先从公司法人产权制度的安排说起。这是一个产权安排。公司制改革首先完成了一个两权分离，即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被称为政企分开。但我们真的政企分开了吗？我们知道国企公司制的核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和国有股份资本所有权分开，这个基本的产权制度安排为我们实行企业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奠定了产权基础。可实际上我们对这个制度构架的复杂性没有充分理解，很多人认为公司法人产权就代表经营权，国有股份资本所有权就代表政府的所有权，那么公司一改制政企就分开了。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先从一个所有权变成两个所有权这样一个基本的产权变更说起。传统的企业制度是一个资本所有权，业主制下面只有一个资本所有权，资本所有者拥有这个企业，同时也经营这个企业。尽管到后期出现了所谓的委托代理，资本家请一些代理人来管理，但是他只是授权经营，没有增加另外一个产权或者所有权。但是，公司制情况不一样，在公司制下面我们看到原来的一个资本所有权裂变为两个资本所有权，也正是因为它裂变为两个资本所有权，出现了一个所谓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因此公司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产权，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可是从法学上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本来只有一个所有权，它怎么会通过一个公司的设立就变成两个所有权了？这多出来的一个所有权从哪来的？20世纪90年代公司制才开始的时候，笔者在《江汉论坛》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是这么解释这个现象的：实际上公司的产权安排在原有的一个所有制——一个主体、一个客体这个前提下，通过法律的形式拟制了一个虚拟的人格——公司法人人格。这个法人是一个虚拟人格，从民法的意义上讲是这样的，他不是现实的自然人，他是法人，是法律拟制的人格。一般讲公司制度的时候，只知道有这样一个法律拟制的人格，多了一个法人出来了，可是我们没有想一想多出一个虚拟法人的同时还多了一个东西，这东西叫虚拟资本。原有的资本所有权现在投到公司里去了，成为企业实际的法人财产、现实资产，但是与此同时，股东拿到了一个股权证书，拥有股票的所有权，这个股票所有权不仅仅让股东在企业里面举举手、投投票，他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现金流——企业资产增值的现金流。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东西是可以资本化的。一个现金流可以资本化为一个虚拟资本。这其实是最初意义上的虚拟资本，就是公司股份资本的所有权。股份资本本来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它本来没有，就是一张股权证书，是一个关于股东的权利证书，它不是资本，不是现实财产。这个东西现在资本化了，可以在资本市场上买卖，它是有价证券，成为一种资

本。这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虚拟资本。公司法人制度设立其实是法律拟制了一个法人人格，同时资本市场又产生了一个虚拟资本，多出了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有趣的是在公司制度里，那个现实的公司财产现在由虚拟的公司法人人格拥有，它的所有者是公司法人，而那些现实的资本所有者——股东们，现在拥有的财产却是虚拟的财产。一个所有权成了两个所有权，就是这么来的。我们现在讲到的整个现代市场经济下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存在，它的基础就是股份公司制度下面的这样一个虚拟所有权，一个所有权裂变为两个所有权，这是它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在这个制度安排里，到底是谁拥有公司财产？是不是公司的那些高层经理人员？不是。法律明确地说，这是由公司法人拥有的。关于公司法人制度有一种误解，说公司董事长就是法人。错！那是法人代表。法人是谁？法人是一个法律拟制的人格，他不是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他作为公司现实资产的所有者，是法律承认的，公司法人可以去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法人财产权总是要有人来操作的，总是要有人来享有的。那么是谁享有呢？它是通过一个公司治理结构去享有，这个治理结构里面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还有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个法人治理结构。这个治理结构是干什么的？就是用来行使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在这个机构里面真实的情况是，权利主体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股东与股东代表，他们活跃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里面；另一部分就是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他们主要通过董事会，通过经理办公会议这样的机构来分享权力（荣兆梓：《企业制度：平等与效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75页）。这是一个制度安排，除了经理办公会是上下级的关系，总经理或者公司总裁有决定权外，其他几个机构都是投票表决的，都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机制，是一种机构治理。公司治理的一个特点就是相互制衡，机构与机构相互制衡，个人与个人相互制衡。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复杂机构？因为要把两部分人合在一起分享公司法人财产权，不是哪一部分人，更不是一个人拥有公司法人财产。认为董事长拥有公司经营权的观点其实是不对的，法人财产权是由两部分人共同分享的。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观点？在公司治理结构里，股东始终要发挥重要作用，离开了股东，法人财产权的行使是不完整的，是不可能规范的，公司法人的行为也不可能是真正合理的。如果把整个法人财产全部交给经营人员，那和传统的业主制企业里的代理人有什么区别？那些业主制企业的老板对代理人都放心，都能把所有权交给代理人吗？不可能。因为它没有这样一个制衡机制。整个公司制度就是为了能够一方面保证公司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另一方面又保证公司的专业经理人不会越权，不会漫无边际地损害资本所有者的权利。所以说，公司制度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创造了资本所

有者和专业经营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强调这点,是为了说明在公司制度里面股东的存在、股东的行为对于公司制改革至关重要。

现在来看看国有资本的出资人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改革在最初的十年里,直到2000年以后的几年,一直没有国资委。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公司法人财产权的行使过程中,股东代表是不到位的,没有出资人代表。这就导致了前20年改革一方面是国有资本的大量退出,规模在逐步缩小;另一方面,这种规模的牺牲没有换来效率的提高,十年期间企业的效率提高非常缓慢,以至于给那些质疑国有制经济合理性、必要性的人提供了口实。

低效率的同时还有国有资产的流失,因为没有股东代表。企业的经理人“当家做主”了,代理人变成“老板”了。很多企业改革由他们制定改革方案,因此出现了所谓的MBO,即“管理层收购”。全世界的MBO都是高于市场价收购的,只有中国的MBO是低于市场价收购的。什么原因呢?中国特色?这里面只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我们没有股东代表。

2003年以后国资委成立了。尽管国资委有各种各样的缺陷,但是国资委成立后的十余年有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在国资委的管理下,国有企业普遍提高了效率。实际上,国有企业在垄断领域的效率始终是跟民营经济不相上下的。即使是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效率虽然低于民营经济的效率,但是在这十年里,这两条曲线在逐步靠拢,差距是收敛的而不是扩散的(见图1)。也就是说,国资委工作有成效。有出资人代表和没有出资人代表大不一样,肯定是这样的。你自己的钱自己不去管,人家当然就要偷偷地拿走了。有人管总是要好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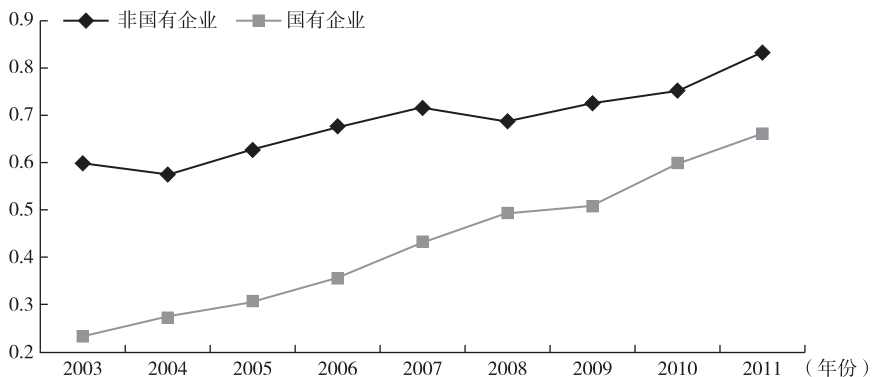


图1 制造业20个竞争性行业国有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比较(2003~2011年)

当然,国资委制度也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关键是,国资委制度仍然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国资委充当出资人的尴尬在于:一方面,政府机构的目标是多重的,政府

目标和作为企业股东代表的目标是有冲突的。股东的目标是什么，投资就是为了挣钱，保值增值是股东的目标。但是政府目标不限于保值增值，它有很多目标：社会安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把所有这些目标都放到一起，结果作为政府机构，国资委在行使股东职能的时候，它的多重目标就产生冲突了。与此同时，国资委虽然说是“管人、管事、管钱”，全管了，事实上作为政府机构里的一个特设机构，不可能独享权力。国有企业的管理仍然是多头的，包括人事部门、组织部门、发改委、经信委，还有其他机构，仍然没有避免多头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国资委加强企业管理，包括企业经理人员的激励都是动力不足的。另一方面，政府的行为能力与市场对它的要求是错配的。从行为能力来说，政府的成员也好，机构也好，更善于行政性的操作，而不善于在不同的产业领域经营资本。政府行为在某些方面还受到限制，比如说，作为股东在企业里表决是用两种手段的，不仅用手表决，而且用脚表决。不行的话，我就卖了股票走人了。但是这个用脚表决的能力，国资委是受限制的。它不能像普通的股东那样，不满意了，就卖股票。国资委一开始不承认自己是政府机构，但是到后来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国务院的特设机构。因为它内部的机构、运行的原则都是和其他的部委一样的，甚至国资委副部级干部的职数比其他任何一个部委都多，它更“官气十足”。所以国资委这个身份本身注定了它和市场的要求、和市场对股东代表的要求不一致。尤其在政资分开方面，它做不到。所以公司制的优势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影响了所有的国有股份制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国资委选派的人员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地位是尴尬的。当前我国国有控股企业中大量存在的经营者败德行为，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行政化的国有股股东代表在公司治理结构中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造成的。

进一步说，国资委的尴尬还体现在当前阶段，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要放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国资委的角色在这个地方显得更加地受限制。国资委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它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实际上还是以管企业为主，而不可能是以管资本为主。国资委的管理是一个行政性的管理办法，至少要在控股企业里面，它的行政意图才能自上而下地贯彻下去。它习惯于这样的一种管理方式，这和基于资本所有权的管理方式不一样。依靠资本所有权来管理，你可以在这个企业里面拥有很多股票，也可以拥有较少的股票、很少的股票。只要参股，作为资本所有者就可以管理自己的股本。行政管理与资本管理、产权管理最基本的区别在于行政权力只能是独占的，不允许分享，而资本所有权不是这样，不管你是控股也好参股也好，都可以管。因此，要在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大背景下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继续发展，只能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方法来推进。国资委一年要搞成多少混合所有制企业，有多少国企

现在要改制，下达目标任务，不是市场主导的发展。我们希望这一轮的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由市场主导，但是靠国资委的行政领导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机制本身不适合。

二 改革模式选择

如何解决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对此有了非常清晰的提示：从以管企业为主到以管资本为主，核心就是国有资本监管体制的改革。怎么改？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史正富教授的观点非常相似。史正富与刘昶前两年合作写了一本书（史正富、刘昶：《看不见的所有者：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8~38页），提出“所有者替身化”与“信托资本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世界潮流，全世界股份公司的股权管理越来越趋向于所有者替身化，用一种信托基金的方式来管理。“二战”以后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者。机构投资者不是直接拥有资本，他是替人理财，所以被称为替身所有者。在机构投资者主导的投资体制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已经从两权分离走向了三权分离，就是企业经营权、资本经营权和资本所有权的三权分离。图2大体上描绘了从1952年到2004年期间，美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由大约10%逐步增长到60%。可以说，现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主导力量，不是股东自己在管理他的股权，而是由各种各样的资本管理机构在管理，包括个人信托基金、私人公司养老基金、投资公司、人寿保险，还有一些公共机构的退休基金等，都是机构在管理，不是资本所有者直接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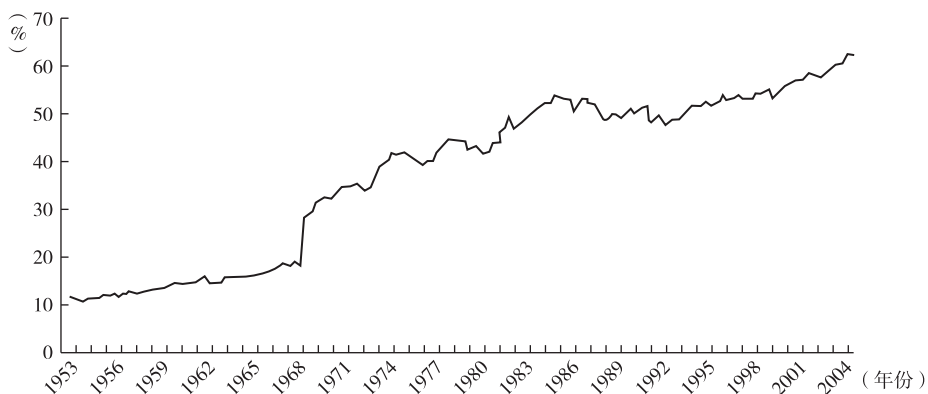


图2 机构投资者在美国公司持股比例（1952~2004年）

资料来源：史正富、刘昶：《看不见的所有者：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32页。

企业产权结构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是传统市场经济当中的业主制资本主义三位一体，资本家同时又是经营者这样一个模式；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美国出现了所谓的经理资本主义，两权分离，资本家自己做股东了，只有经理层在企业里面进行管理；然后再发展到三权分离，现在股东不是终极所有者了，那些资本经营机构、专业的投资机构成为替身所有者。这样资本市场就出现了三个层次、三个主体。当然基本的法律框架还是公司制，但是现在投资者不是直接作为股东代表，而是把股东代表的责任给了资本经营机构。史正富把他叫作替身所有者。我在2000年前后也写过一些文章强调，国有经济公司制改革仅仅实现公司法人财产权制度的独立是不够的，还要解决政府作为股东时这个股东代表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我提出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惯例，股东代表正在越来越多地由这些机构承担，股权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信托资本，由社会交给一些专业机构，通过信托的方式来管理，我把它叫作社会信托投资基金（荣兆梓、杨积勇：《公司制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与解决方案》，《改革》2001年第2期）。这就形成一个很明确的改革方向，就是学习淡马锡。

但是，到现在为止，淡马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还是有争议的。我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学习有益，但是不能完全照搬。淡马锡模式肯定是有借鉴意义的，当然我们不主张全盘照搬。淡马锡模式哪些东西是适合我们的？首先，淡马锡是一个主权投资基金，国家拥有最终所有权，但它是一个独立的信托基金。其次，淡马锡的运作是高度市场化的。淡马锡核心的经验是，尽管淡马锡的董事会里面有政府官员，但是他们基本上不干预企业的经营，也就是把方向而已，具体怎么操作，完全按市场原则。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淡马锡模式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学不到的或者不能学的？我觉得起码有一点我们是与它不一样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跟新加坡的规模不能比。两个国家的国有资本显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中国是很特殊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里正确指出的那样，中国在全部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是一个特例。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资本（包括土地资产、金融资产在内的广义资本）只占全部国民资本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当下中国的公共资本几乎占了国民资本的一半，这在全世界是极罕见的。这样庞大的规模注定了中国国有资本管理有自己的特点。即使是学淡马锡，我们也要坚持多元化、多样化。不能是一个淡马锡，而是许多个淡马锡；这些淡马锡还不能是同一个模式，要根据国有资本的功能等，区分不同类型。因此，改革要防止一刀切。前二十年的改革最大的痛处在于一刀切。国资委就管了那么多的国有资产，用一个基本相同的规则来管理这些形形色色的国有企业，竞争性的国有企业给管死了，可是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没有实实在在被政府规制。一刀切的标准没法把这

两个目标同时实现，分类管理是必然选择。我们在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必须有这样的思考。

总之，公司制我们只走了半程。我们解决了一个企业的独立产权问题，只实现了公司法人产权的独立，初步建立了一个法人治理结构，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国有股权机构的建设问题。我们建立了一个出资人代表机构，但这个机构是政府机构、国务院特设机构，它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符。全世界发展的潮流是，股份资本的管理越来越替身化，越来越通过机构投资者形式来主导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拥有的资本都采取信托基金的形式，无论它是共同基金还是其他的公益基金，都是信托制。我们在选择改革目标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个大潮流。

实际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这个问题也说得很清楚，就是国有资本要通过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形式来管，不能靠政府去管，不能靠政府机构去管，要靠市场主体——一个有自己独立财产权利的机构去管。同时决定里面也说了，要分类管理，不能一刀切，要适应我们国有经济的规模大、功能多，各种不同类型的国有资本、国有企业需要有不同的管理模式这样一个基本特点。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关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的具体方案一直存在争论。

三 三个重要问题的讨论

以下讨论与争论相关的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国有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与国资委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国资委与现在的这些国有企业之间我们再按一个投资公司的层次来解决国有股权的代表问题。现在不是政府代表了，政府到哪去了，政府到他们背后去了。这是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国有股权代表机构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机构，那国资委就不应该成为这些机构上面的另外一个婆婆，它只能是规模更小的一个监察机构。这是争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分类管理问题。大家都承认要分类管理，这已成定论了，但是究竟怎么个分类法，是分两类呢还是三类，甚至更多类型，也没有定论。有媒体透露，说主流意见是分两类。20世纪90年代我写文章谈国有企业分类管理，我也主张分两类，一类是竞争性领域，一类是垄断性领域（荣广宏、荣兆梓：《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建议——“国有官营”与“国有民营”两大管理系统分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6期）。现在的主流观点，据说是分为公益性国有企业和营利性国有企业。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分两类不行。考虑到现实的可操作性，我现在也认为分两类不行。因为在两个极端之间有很多过渡性的东西，分两类不能涵盖，分两类

很难操作，这是争论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管。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国有股的代表来管理国有股权没有问题，但是到底怎么个管法？国有投资公司也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也好，它的产权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它的管理模式应该是怎样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以下对此做更详细的分析。

（一）投资公司的作用和规模问题

我们现在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把它作为一个国有股权管理的顶层机构来设计，而不是作为一个由国资委作为顶层的金字塔结构里面的中间层次来考虑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设立的这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是最高级别的，没有上级；希望能设计出这样一个模式，这些公司上面没有国资委做它们的股东，拥有独立产权。这个独立产权当然不适合用股份公司制的框架来构建。有什么办法？办法是有的，得靠信托制度，用信托基金的法律框架来构建这些国有资本的产权机构。

信托制度在英美法系里最早其实是在遗产管理中发展起来的。信托制度有三个法律主体，一个叫信托人，一个叫受托人，还有一个叫受益人。一般的法律理论都认为信托制度里面真正的所有者就是这个受益人。但是，在资本市场常见的共同基金或私募基金中，这三个法律主体的关系不明显，因为在这里，委托人与受益人是同一个人。这类信托叫作自益信托，我把资产信托给你，你给我管理，完了最后赚的钱是我的，你得到“手续费”。但是还有很多信托是他益的，比如说诺贝尔基金，它就是一个信托财产。在欧洲不叫信托，叫财团法人，其实法律关系是相似的。

在国有资产的管理当中，所谓国有信托基金的法律主体是一个什么关系？其实是国资委作为信托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受托人，而受益人是全国老百姓。可以不再回到政府那里，你把钱管好了，最后应该是全体老百姓受益；把经济发展了，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了，受益人是全体老百姓。这样政府机构就可以逐步淡出资本管理体系。所以我说，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中，需要运用信托制度、信托市场经济。史正富教授用了“信托资本主义”概念，他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充分利用信托制度。在国有资本管理中，信托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解决政资不分问题。在政府职能分工思路下，国有资本肯定得由政府机构管理，而在信托制度里面就未必。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设立一个既没有上级也没有股东的国有资本管理基金。国资委将成为对此类基金管理公司的运营进行监察的政府机构，逐步精简为小国资委，不再是作为出资人代表的国资委，而是作为国有资本监察机构的国资委。

与此同时，改革必须防止国有股权代表机构的“碎片化”。既然是顶层设计，数量上就一定要有控制。你不能搞几百家几千家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那还叫顶层设计吗？中央一级的几万亿的权益资本可以设立十几家最多几十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或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每一家规模都要大，才能体现这样一个顶层设计要求，才能实现政府的监督、公众舆论的监督，真正实现对这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效管理。为此目的，必须防止碎片化。但是改革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碎片化，因为一旦要设立投资公司或者信托公司，所有的这些国有企业每个都争着上，都想做龙头老大，结果口子一放，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变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了。等于啥也没做，换个名词而已，没有实质性意义。

从顶层设计要求看，这些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应当成为国有股权专业管理机构。你不能是混合的管理机构，既管国有股权，自己又做项目、搞实体。那样国有股权是管不好的。这么大规模的基金，集中精力管都不一定管好，如果还要零零散散地去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肯定出问题。所以要防止这类机构混同于普通的实体公司，这类公司的设立不能用普通的公司法，要依特殊法设立。

最后，国资委还不能撤，不能再次造成20世纪90年代那样的国有资本权力真空，国资委必须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转型，把自己改造成一个国有资本运营的监察者，分步有序地将国有股份资本管理的顶层机构让位于市场化的基金管理公司。

（二）分类管理问题

将国有企业分成两类管理的主张，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在企业层面分类还是在资本层面分类？既然要从以管企业为主转到以管资本为主，那么在顶层设计上应当是按资本功能分类而不是按企业职能分类。企业当然有分类，公益性的企业、营利性的企业，或者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型企业。但是国有经济管理的顶层设计不能按企业划定管理范围，说这些企业归你管理，那些企业归他管理。我们正把管理的重心从企业层面移向资本层面。国有资本是能够流动，也必须流动的。按企业标准划定管理范围实践中越来越难以操作，必然带来一系列弊端。管公益性资本的顶层机构和管营利性资本的顶层机构应当是两类机构，在管理体系、管理机制上都要有严格区分。

争论更多的是本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到底是分成两类还是三类？我的观点是现实当中有很大数量的国有企业不在两个极端，它既不在自然垄断领域，不是完全的公益性机构，也不在完全竞争性领域，不是纯粹营利机构。它在哪呢？在寡头垄断领域，有一部分公益性，又有一部分营利性。一方面，这些领域都有一个很强的战略安全意义，比如说能源、交通、金融等。国家的产业政策，甚至国家的发展战略都要在这些领域里得到贯彻。这有很多政策性的因素在里面，让这些领域的资本完全用一种跟竞争性领域的资本同样的方法被管理不合适。另一方面，说它是公益性资本也不对，它是有竞争的，它是要赚钱的，只不过它的竞争是有限竞争，是寡头间的竞争。把这一

部分东西放到两极都不合适。笔者几年前发过一篇文章（《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期），讲国有资本改革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三分法的主张，将国有资本分为三类——公益性国有资本、产业类国有资本和竞争性国有资本，分别组织三种类型的国有资本管理机构进行管理。第一类由隶属于政府部门的国营企业来管理；第二类建立行业性的国家产业投资公司，它要实施某一个特定产业领域的产业政策，要为此产业领域的发展以及这个产业领域大中小企业的协调等负责；第三类就是综合性的资本运营公司，它不限在哪个产业，只有保值增值一个目标，在竞争性领域里灵活运营。这样分三类管理既有可行性，管理效果也会更好。

举例来说，第一类有国家电网。现在的国家电网还不适合完全地成为这样一个公益性的隶属于政府机构的资本管理机构，因为现在的国家电网公司还有配电功能，不仅仅是一个输电网，它把最后这个末端配电功能也放在网里面。我们知道，配电这一块的确是竞争性的，不是完全垄断性的。完全自然垄断性质的是输电网，将来改革应该进一步拆分，然后把国家电网真正建设成为公益性的公法人。还有国家邮政。邮政不能完全放开，要完全放开，完全让市场来调节，那偏远地方就没人送信了。经济效率太低了谁去送？另外还有铁路，跟电网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的铁路总公司把运输业务也放在里面，将来路网和运输业务也一定是要分开的。因为骨干铁路网比如说高铁网这样的东西，应该是公益性的机构；而所有的铁路运输公司，不管是客运公司还是货运公司，都是可以参与竞争的，应该是一个竞争性机构。二者要拆分开来。其他还有一些因为特殊原因，政府要拿在自己手里。比如烟草，因为它的税太高了，当然现在已经逐步少点了，但是仍然很高。还有粮食储备公司，因为粮食安全是国家的命脉所在。这些数量有限的公益性机构应当怎么设立？要专门立法，专门设立国家电网公司法，或者是国家邮政法。因为它不适用于普通公司法，它是政府直接管理的，严格地说它就是国营企业。说改革以后国营企业全部取消，我认为这个话绝对了，在这一小块领域里恐怕还要有国营企业，这样才能更好地提供公益性服务；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公益，不是赚钱。

第二类就是所谓的国家产业资本。在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关注的产业领域里要设立若干家国家产业投资公司来控股产业内的寡头企业，参股产业里若干重要企业，通过这样的股权控制、参与来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这些领域需要有这样一类的资本管理公司。首先是设立国家产业基金——国家能源发展基金、国家交通发展基金等，然后把基金交给投资公司去管理，用它来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来协调整个产业的发展。比如国家金融投资公司——汇金公司大体就是这个角色，但是汇金公司没有完全

按照这一模式去设计。本来汇金公司的资本可以就是国有银行的国有股，这就是它的资本来源，但是汇金公司却反过来用国家的外汇储备作投资，没必要地搞得复杂化；汇金公司甚至也不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主要大股东。可能在金融领域有其特殊性，不能在其他产业领域完全照搬。但是，汇金公司毕竟是中国现有的产业基金当中的第一家，它是在特定的产业领域里的一个国有控股公司，它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国企改革是有用的。不能完全否定汇金公司模式，这与淡马锡模式的经验相似。在讨论国企改革模式的时候，有人说汇金公司模式可以照搬，而更多人认为汇金公司模式一无是处。我们认为汇金公司经验有值得推广的地方，但是肯定不能完全照搬。其他还有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当然能源范围太大，“两个石油”已经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或者可以搞两个能源投资公司。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要用国家产业资本来控制。还有国家交通投资公司、国家电信投资公司等。这些重要领域，应该有这一类国有股权管理机构，国家的产业目标、政策目标和赢利目标在这里交融，两个目标在这里找到平衡点。这是这一领域国有资本管理的难点，但也是必须解决的重点。

第三类信托基金管理的性质比较简单，就是在竞争领域设立若干个综合性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来参与市场竞争，来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信托资本主义”是世界潮流。延伸到中国改革，“信托市场经济”适应世界潮流。在竞争性领域通过社会信托投资基金来管理国有资本，唯一地以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为目的完全可以做得到：管理这些基金的是专业的资本经营者，他们组成一个受托人合伙公司，受托管理一定数量的国有资本，把它在竞争性领域分散布局，哪里有资本增值机会，就往哪里投资。这当然是国有经济，因为它的国有资本增值的受益人不是任何亿万富翁、私人老板，而是全体老百姓。基金赚了钱怎么用？可以留在基金里面继续投资，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法律程序部分上缴国库，来补充财政收入的不足。它的管理模式基本上可以仿效淡马锡模式，不管有没有政府官员进入董事会，政府不干预企业经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三）投资（运营）公司产权模式和经营模式问题

大家都主张搞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现在已经写到文件里面去了。但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到底怎么管？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应该是信托基金制度。首先是因为信托基金制度的法律框架适合政资分开的目标。我们知道，在股份公司制度下尽管可以两权分开，有股份资本所有权，有公司法人财产权，可是无论如何，政府不能从终极所有者的身份退出，甚至也不能从公司法人财产权的“共同行使”中退出。所以在讨论公司制度怎么才能实现政企分开目标的时候，很多专家就给了一个模糊的解释，说只要不断增加母子公司层次，不断淡化政府作用，政企分开终究能实

现。这话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层次再多最上面一层还是它。现在大型国有企业的母子公司链条已经足够长了，并没解决问题啊！关键是，最终的国有股东代表机构到底能不能靠公司法人制度来解决。它解决不了！弄来弄去还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母子公司体制。只有信托基金制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信托制度中，信托人可以与受益人的身份分开，形成一个他益信托，这样它就不再是最终的所有者。信托制度可以恢复国有经济的本来面目，信托受益人即最终所有者是全国老百姓。政府不需要夹在中间做代表机构，而可以代表公共利益做个监督者，就像我们现在的审计署对各个政府机构进行审计一样，将来政府的小国资委对基金管理公司就起这样的作用。这个法律的框架不需要股东，信托基金不需要有股东，他益信托是没有股东的，诺贝尔基金的股东是谁？肯定不是诺贝尔。这样，政府、管理公司、公众关系就可以理得更顺些。

其次，原本意义上的信托制度是基于信任的委托，绝对是最要好的朋友最信任的人才能把遗产交给它去管理。我们今天的国有信托基金，也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我们也需要这个信任，没有信任就没有信托制度。但是，现代信托制度的信任，是建立在有关基金管理对象和管理模式的一系列有效制度安排基础上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本财产，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动辄就是几千亿，甚至上万亿。这么大的资本规模，再加上无孔不入的资本利益，怎么能够信任少数人？关键是今天我们讲的信托基金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它的产权边界非常清晰，就是一个基金，它是有边界的；二是它的管理模式比较透明，钱不放在基金公司，而是放在第三方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里面，然后基金公司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发指令，你给我买什么卖什么，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本身之间有隔离层。这是世界通行的办法，对基金管理者的监督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如果我们再增加一个限制条件，这些管理巨大规模国有资本的基金公司，其经营被限定在虚拟资本的范围内，禁止投资实体经济，也就是它只能买卖股票，或者其他金融资产，但不能自己去办工厂，自己办实业，用这样的办法使公司成为纯粹的资本管理公司，而不是混合型资本管理公司，这样就进一步减少了资本管理的漏洞。依靠这些制度安排，政府监察机构的监察以及公众舆论的监督，就是可行、可信的，国有资本的信托制度就可以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这里国资委的作用是很明确的，国资委应当逐步演变成为监察机构，而不用直接去管理这些机构投资者。

最后，就是公司运行机制问题。管理者的动力从何而来，如何使得替身所有者能够有效地成功地去管理这些资本？必须要有一个激励机制，按规则分享资本增值。到底怎么分享，具体的制度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替身所有者必须在资本市场上竞争，这不是由政府当保姆的国有企业，而必须是在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去赢得自己发展空间的真正公司。关于这个公司的成本和收益，基本的原则就两条：整个公司的

运营主要是靠收取管理费，不管多大规模的企业、多大规模的资本，都要按几个点来收，这是公司日常管理最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这是一条；另一条就是公司经营者要有长期激励，比如五年一清算，到底这个基金增值了多少，给经营者相应的可观的利润分享，用这样的方法来调动国有资本经营者的内在动力。它不是天使，它是经济人，你给它适当的激励，再加上一个制度的约束，它就可以有合理的行为。这事并不难，市场经济已经把信托基金的运行规则、具体形式都逐一实验过了，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四 改革目标与利益集团

无论争论再多，放到桌面上的讨论毕竟都还是冠冕堂皇的。推进当前国有经济改革向纵深化发展的真正障碍在哪里？三十年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利益集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改革起步时比现在困难更大、阻力更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利益集团，只不过是大家思想僵化没有跟上形势，利益集团的力量并不强大。打点小算盘是有的，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一改革就牵扯到拥有上百亿、上千亿利益的集团。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是改革推进的大困难，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这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要按照顶层设计的规范来推进改革，防止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改革目标的扭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改革决策的每一步都必须有他们参与，因为他们是当事人，但利益集团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扭曲改革目标。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设计了一个顶层改革目标，改革实践能不能走向这个目标？我们知道，改革不可能是完全建构式的，不可能全部推倒重来，肯定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往前推进。这个过程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很大。

要防止利益集团扭曲改革目标的任性行为。当然，关键是我们的改革目标明确。只要目标明确，我们是制止利益集团的扭曲行为的。怕就怕我们自己的目标模模糊糊，给别人这样一说那样一说，就糊涂了。比如说，以“职工持股”为名将大量的国有资本转换为高层经理人员股份，这是一种扭曲。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最高决策层表态明确：就是不同意，你别想靠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发财。问题就解决了，利益集团就影响不了改革方向。再如，大型集团公司争相做国有股权代表机构。如果大家都争，管理部门一律照准，反正是改革嘛，大家都可以试一试，恐怕会出现国有股权管理碎片化的情况。碎片化最终会使顶层设计落空，几千个上万个国有股权代表机构就等于没有了。碎片化是一种扭曲。

诸如此类的扭曲还会有很多，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列举。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大家还会看到更多。

参考文献

- [1] 荣广宏、荣兆梓：《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建议——“国有官营”与“国有民营”两大管理系统分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6期。
- [2] 周小明：《信托：国有资产经营机制的另一种选择》，《经济导刊》1997年第3期。
- [3] 陈小洪：《建立国有资本管理新体制》，《管理世界》1998年第1期。
- [4] 荣兆梓、杨积勇：《公司制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与解决方案》，《改革》2001年第2期。
- [5] 金碚：《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工业经济》2000年第3期。
- [6] 刘丹冰：《论国有资产信托及法律调整》，《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
- [7] 陈清泰：《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管理世界》2003年第6期。
- [8] 刘纪鹏：《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4期。
- [9] 宁向东：《国有资产管理与公司治理》，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
- [10] 张春霖：《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阶段：调整改革思路 and 政策的若干建议》，载《比较》第8辑，中信出版社，2003。
- [11] 董蕙江、严城：《企业国有资产信托及其法律制度构建》，《求是学刊》2006年第2期。
- [12] 荣兆梓：《国有资本管理“去政府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10期。
- [13] 田田、王玉红：《我国信托财产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东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 [14] 符琪：《国有资产信托基本法律问题探究》，《中州学刊》2007年第2期。
- [15] 郑海航：《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三十年的理论与实践》，《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年第11期。
- [16] 胡改蓉：《构建本土化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法学》2008年第6期。
- [17] 黄速建、金书娟：《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30年》，《经济管理》2009年第1期。
- [18] 郑海航、戚聿东、吴冬梅：《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国有控股公司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 [19] 史正富、刘昶：《看不见的所有者：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20] 荣兆梓：《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期。
- [21] 陈雪萍：《国有股权有效行使的信托路径及其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
- [22] 黄淑和：《积极完善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国企党建》2014年第2期。
- [23] 邵宁：《国有企业将实施分类改革》，《中国证券报》2014年3月3日。

经济理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围绕再生产图式的争论*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樊纲译 左大培译校***

编者按 本文系罗斯多尔斯基的名著《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的第7篇第30章。罗斯多尔斯基的这部著作多年前曾在国内正式出版过一个中译本，但不知何故，该中译本遗漏了该书第7篇的全部内容。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朱绍文教授，曾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翻译罗斯多尔斯基的这部著作的全文，这是该书的第二个中译本。但令人扼腕的是，朱绍文先生已于数年前仙逝，译稿却一直未获出版。参加朱先生主持的这个译本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的，有顾海良、樊纲、左大培等人。蒙左大培先生推荐，本刊得以首次发布该书第30章的译文，以飨广大读者。

本书前边的主要目的具有方法论的性质。我们的前提是，以往的研究都过分集中于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内容，而对他的独特的研究方法缺乏兴趣，^① 因此我们力图表明《草稿》在方法论问题上具有多么大的教益。而如果我们的看法是对的，那么前面研究所获得的方法论上的洞察力也将有助于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那些早就引起争议的问题，特别是人们反复讨论的《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问题和所谓的实现问题。

第1节 导言

1. 关于《资本论》第二卷中再生产图式的形式问题

为了便于后面对问题的阐述，我们先简单地考察一下《资本论》第二卷中再生产图式的形式，即它的数字形式。

* 本文为罗斯多尔斯基所著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的第30章。该书中文版在1993年曾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当时未收录第30~34章内容。本文根据德文版的英译本翻译。英译本于1977年出版，译者为Pete Burgess。

**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为一位多年参加欧洲工人运动的政治活动家。

*** 樊纲，著名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左大培，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① 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特点。马克思曾批评他们“浅薄地只知道注意内容”，而对于“搞清楚经济关系形式上的区别”缺乏兴趣。

在阐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条件时，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分成两大部类：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生产消费品。每一部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 $c + v + s$ ，也就是在某一生产时期中使用的不变资本、用于支付工资的可变资本和在该时期生产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马克思考察了为使下一期的生产得以进行，各部类产品的各价值组成部分有多少必须相互交换。

第一个问题是简单再生产（即规模不变的再生产）得以进行的条件。马克思构造了下列图式加以说明。

$$\text{I} \quad 4000c + 1000v + 1000s = 6000$$

$$\text{II} \quad 2000c + 500v + 500s = 3000$$

由于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第Ⅰ部类所需要的不变资本与前一生产时期内所消耗的恰恰相等，即 $4000c$ ，因此它能够通过自己的生产来补偿这 $4000c$ ，而不需要与第Ⅱ部类进行交换。

类似的，生产消费品的第Ⅱ部类，可以直接用 $500v$ 和 $500s$ 来满足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而无须与第Ⅰ部类交换。但是，第Ⅱ部类价值相当于它的不变资本的产品部分，以及第Ⅰ部类价值相当于它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的产品部分，则必须在两部类之间进行交换。显然，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平衡的一般公式就是：

$$c \text{ II} = v \text{ I} + s \text{ I}$$

即第Ⅱ部类耗费的不变资本必须等于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

然而以上的公式并不适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就是说不适用于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积累起来，不是被资本家消费而是被用来增加各部类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布哈林的方法，以符号 α 代表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以 β_c 代表用于增加下一生产时期不变资本的剩余价值，以 β_v 代表用于增加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这时，前面的平衡公式就必须加以改变，以符合扩大再生产的条件。

$$c \text{ II} + \beta_c \text{ II} = v \text{ I} + \alpha \text{ I} + \beta_v \text{ I} \text{ ①}$$

事实上，这就是构成《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扩大再生产图式基础的一般公式。

在这一章中，我们可以见到两个图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们分别表示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中的积累过程（马克思，1975：581）。以下是第一个图式（我

① 这个公式见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Bukharin, 1972：158）。

们对马克思图式中的数字略做改动，并用布哈林的符号表示)：

		c		v		s		α		$\beta_c\beta_v$
第一年：	I	4000	+	1000	+	500	+	400	+	100
	II	1500	+	750	+	600	+	100	+	50
第二年：	I	4400	+	1100	+	550	+	440	+	110
	II	1600	+	800	+	560	+	160	+	80
第三年：	I	4840	+	1210	+	605	+	484	+	121
	II	1760	+	880	+	616	+	176	+	88
第四年：	I	5324	+	1331	+	666	+	532	+	133
	II	1936	+	968	+	677	+	194	+	94

第二个图式表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更高阶段的情况，因而假定具有更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而且与第一个图式不同的是，这时两部类的资本构成是相同的（即都是 $5c:1v$ ）。在第二个图式中，再生产按以下方式进行：

		c		v		s		α		$\beta_c\beta_v$
第一年：	I	5000	+	1000	+	500	+	417	+	83
	II	1430	+	285	+	101	+	153	+	31
第二年：	I	5417	+	1083	+	542	+	452	+	90
	II	1583	+	316	+	158	+	132	+	26
第三年：	I	5869	+	1173	+	587	+	489	+	98
	II	1715	+	342	+	171	+	143	+	28
第四年：	I	6385	+	1271	+	636	+	530	+	106
	II	1858	+	370	+	185	+	155	+	30

这两个图式都受到了罗莎·卢森堡的严厉批判。关于第一个图式，她指出，由于该图式中第二部类的积累和消费缺乏任何“看得见的规则”，是以一种“无规则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她认为马克思“为第一部类的积累关系所确定的种种精确的逻辑规则”是以未能“确立任何第二部类积累的规则”为代价的（Luxemburg, 1963: 122）。卢森堡承认在第二个图式中两个部类的积累都有规则地进行以至于“第二部类剩余价值分配的随意变动”不再发生。而且，她认为即使在第二个图式中，下述情况仍然可能发生，即“第二部类的积累完全由第一部类的积累所制约、所决定……第一部类首先采取行动，并在整个积累过程中掌握主动，而第二部类只是被动地跟随”（Luxemburg, 1963: 127）。

关于上面第二方面的批评（其正确性奇怪地从未受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挑战），已

受到琼·罗宾逊的令人信服的反驳。她论证说,“算术并不偏袒任何一个部类”,^①对积累的推动力完全可以来自任何一个部类。

事实上,马克思第一个图式中的积累也并不像卢森堡所认为的,而且至今仍然被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可变的”或“无规则的”。因为,如果不考虑第一年的情况,就可以看到在此图式中,第一部类的积累总是剩余价值的50%,第二部类总是30%。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这两个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必然造成的。我们可以用代数方法表明^②,假定两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同,并且在再生产过程中一直保持不变,那么平衡公式

$$c_{II} + \beta_c II = v_I + \alpha_I + \beta_v I$$

就要求每个部类的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之间具有严格的配合关系。如果按照马克思的图式,假定资本有机构成和积累率在接连的几个生产时期内都不变,我们就会看到,两个部类的积累率【之比】^③,必须与有机构成【之比】成反比。用公式表示就是:

$$\frac{\beta_I}{s_I} : \frac{\beta_{II}}{s_{II}} = \frac{v_{II}}{c_{II} + v_{II}} : \frac{v_I}{c_I + v_I}$$

因此,在马克思的第一个图式中,两部类积累率的关系是(第I部类)50%:(第II部类)30%, $v:c$ 的关系^④,第II部类是 $\frac{1}{3}$,第I部类是 $\frac{1}{5}$ 。由于 $5:3 = \frac{1}{3} : \frac{1}{5}$,再生产所需要的平衡关系是满足的。

然而,这就足以说服罗莎·卢森堡的“数字”错误。她大概是对于马克思的数字例证的形式感到迷惑,这种数字例证显得难以把握,容易引起混淆。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两个图式中初始年的积累,都没有服从以后各年所遵循的规则。我们只好猜想,马克思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种表达形式,不过因为这是他初步的探索,还没来得及修改。

而奇怪的是,马克思图式的不恰当形式,也使卢森堡的最严厉的批评者布哈林误入歧途。如上所述,布哈林最先将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关系一般地公式化为 $c_{II} + \beta_c II = v_I + \alpha_I + \beta_v I$,但是他却从这个公式中引出了另外两个错误的公式,即 $c_{II} = v_I + \alpha_I$ 和 $\beta_v I = \beta_c II$ (Bukharin, 1972: 158)。事实上,对于马克思第一图式的初始年来说,

① 琼·罗宾逊为卢森堡《资本积累论》英文版所写的序言 (Luxemburg, 1963: 19)。

② 这里要感谢我的朋友,底特律的统计学家H·查斯特,是他对这种关系作了数学证明。

③ 方括号中的字为中文译者所加,下同。

④ 原文如此。严格地说,此处应为“ $v:(c+v)$ ”的关系。

确实存在 $c II = v I + \alpha I$ 和 $\beta_v I = \beta_c II$ 。但是，这仅仅是由马克思无法直接确定 $c I$ 和 $c II$ 的正确比例造成的情况。而在第一图式以后各年和第二图式各年中， $c II$ 都必然小于 $v I + \alpha I$ ， $\beta_c II$ 则必然地大于 $\beta_v I$ 。换句话说，布哈林完全忽视了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不仅必然导致 c 和 v 的增大，而且必然导致 α 即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增大。然而，这个基本的错误将近 20 年未被发现^①（Bukharin, 1972）。布哈林则一直由于反驳了卢森堡的攻击捍卫了马克思这个首屈一指的行家给我们留下的作为其天才的完整产品的理论分析，而被普遍视为马克思正统学说最权威的捍卫者。不过布哈林的平衡公式还是很有用的，尽管他也像大多数卢森堡的批评者那样，往往将阐发问题的公式错当成问题的解决。

2. 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如何“接近现实”

关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形式，我们就谈以上这些。而当我们进而考察这一图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搞清马克思是否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想用这些图式来描述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过程。

奇怪的是，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搞清这个问题。例如，如果有谁参加围绕卢森堡的著作进行的对再生产图式的讨论，他就会立刻遇到一个奇怪的悖论。反对卢森堡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即考茨基、鲍威尔、埃克什坦、希法亭及其他一些人），当然十分清楚马克思图式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而舍象了资本主义现实的一些根本性特征，例如，非资产阶级的存在，世界上各种经济区域的存在，外贸、平均利润率作为价值转型的生产价格的存在，等等。然而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者还是在这些图式中寻找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无限生命力的具体证明。

我们先来看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卡尔·考茨基的论述。在他的杰出著作中，他强烈地批评了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因经济的原因而崩溃的“假设”。他指出，“卢森堡使自己成了马克思的反对者，因为后者在《资本论》第二卷即在再生产图式中证明的是相反的观点”（Kautsky, 1927）。

考茨基事实上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得出了这个结论，而他的学派的其他成员则早得多地提出了这一观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鲁道夫·希法亭 1909 年在他的《金融资本》中解释马克思图式的时候就说，根据这些图式，在各生产部门之间保持正确比例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无限地扩大……而不会导致商品的生产

① 如果我们记得卢森堡几年前成了法西斯杀人犯的牺牲品，我们就会感到布哈林的咄咄逼人和经常显得有些轻佻的语调是令人不愉快的。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布哈林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而不是学术的考虑。他认为他的任务是打破德国共产党（KPD）内仍然十分强大的“卢森堡主义”的影响，为此似乎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用的。

过剩”。^① 在1926年社会政策协会维也纳大会上，希法亭提醒他的学术听众说，他反对“崩溃理论”。他声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完全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而崩溃理论总是被错误地归咎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断地扩大规模的生产是可能的。”然后他还开玩笑地说：“我常想，读过第二卷的人非常之少，这真是件好事，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它会被当成赞美资本主义的颂歌。”（Grossmann, 1967: 57–58）

我们可以看到，希法亭也想从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中直接得出反驳“崩溃理论”的论据，他也混淆了数字阐述与理论论证，而最主要的是，他混淆了“抽象”的领域与“具体”的领域！奥托·鲍威尔的思路也是一样的。虽然他承认卢森堡所说的“《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为表达再生产过程所用的数字都是任意选择的，避免出现矛盾”，但他说：“然而，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有缺陷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论证方式本身就是错误的。”由此出发，鲍威尔构造了他的“非任意的”再生产图式，并且继续声称他构造的数字“表达”或“证明”了他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理解，都可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无限地扩张自己。（Bauer, 1913: 836、866）

埃克什坦对卢森堡的批评最轻，他甚至设法将两种不同的看法——纯理论的和经验的——塞进了同一句话。因此我们看到在他们论述开始时说：“如果谁想研究危机问题^②，他就必须首先研究资本积累的现实性与仅仅表明平衡可能性的马克思平衡图式的相互关系。”但是，接着在下一页他又写道：“马克思的图式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要想保持平衡，就必须怎样运行——它们在事实上表明了对于各种产品的社会需要的规模。”接下一页他又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对利润的追求支配。因此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图式是否表明了资本家的利润是如何实现的。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图式则恰恰表明了由谁来购买产品。”^③

以上的一些例子足以说明我们的论点。它们表明，亨利克·格劳斯曼的下述论述是如何正确：“和谐论者盛赞平衡图式，并非由于这些图式是特别优越的分析工具，而是由于他们混淆了分析方法与所分析的现象，从而以为他们在这些图式中真的发现了资本主义内部平衡的趋势。”（Grossmann, 1967: 95）

怎么解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错误呢？他们怎么会犯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呢？

“愿望是思考之父”，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完全沉浸于改良主义的运动之

① 参阅本文第四节（Roman Rosdolsky, 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Pluto Press Limited, p. 483）。

② 我们可以看到，埃克什坦混淆了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和危机问题。

③ 埃克什坦的这些评论见卢森堡著作《资本积累》的附录（1923: 487）。

中，本能地抗拒现行社会秩序在经济上崩溃的观念（同样地，他们也不能理解奥匈帝国以及轴心国的崩溃的历史必然性），这太容易了。这种下意识的动机自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错误，也要归因于他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缺乏理解。

如果这种方法论被当作一种实证主义方法论（也就是说抽取它的辩证法的特征），显然就很难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与“经院理论”的概念程式区别开来。“经院理论”总是先撇开经济现象的个别的和特殊的特征（即所谓“抽象”的方法），为的是在以后的各阶段中再将这些特征引入（“逐步具体化”或“逼近”的方法）。然而，由于这些个别的和特殊的特征仅仅是“从外部”被撇开和重新引入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辩证的中介，由此很容易产生似乎在“抽象”与“具体”之间没有任何质的“桥梁”的幻觉。^①人们很可能认为理论模型事实上包含了具体研究对象的所有基本因素（虽然是在简化的形式上）……就像地形图上，虽然仅仅能看出山脉、森林与大江大河，但已显示了景物的基本要素那样。那就必然要忽视“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马克思，1974a：91），从而就会产生一种幻觉，以为抽象的图画是对具体情况的简单反映，而不存在任何“中介”形式。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卢森堡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犯错误的方法论原因。就是说，他们忘记了，《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抽象公式所代表的仅仅是“分析的一个阶段”，^②因而不能不需要大量的“中间环节”就直接应用于资本主义的具体实际，换言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们错误地混淆了马克思的两个不同的分析阶段，必然地走上辩证法的错误的道路。他们无视马克思的辩证法，结果最终受到了辩证法的惩罚。

3. 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基本前提条件

在第三章我们已经指出，使用价值范畴也存在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之中。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再生产过程的开头部分就说：“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这始终只是举例而已，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同样可以作为例证。……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

① “知性的、有限的认识在那里是这样进行的，即它在抽象地产生那个普遍的东西时从具体物所扔掉的东西，现在又同样外在地捡起来。相反地，绝对的方法不是像外在反思那样对待自身，而是从它的对象本身去采取规定的东西，因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黑格尔，1976：536-537）

② 参见托洛茨基的观点（Roman Rosdolsky, 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Pluto Press Limited, p. 428）。

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马克思，1972a：437-438）

以上引文直到《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一个版本也未做任何进一步的发挥^①。而我们之所以在此大段引用，是由于我们认为它能指引我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马克思在这里所考虑的显然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相互对立，这种对立在本书中已多次提到，不仅在分析价值与货币的时候遇到，而且事实上贯穿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整个体系。可以说，马克思对个别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考察，给人的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而现在，当研究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我们发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遇到了前面的分析所没有考察的障碍，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马克思，1972b：716）。为了再生产出资本，“社会”，即“总资本家”，不仅必须有一笔供其支配的价值基金，而且必须使各价值部分采取特殊的有用形式——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以供使用，而它们之间的比例则由生产的技术要求所决定。总之，即使不考虑那些寻找买主的商品产品是否必然能卖掉，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是在技术上受“社会物质变换”的制约的。

但是是否这就在实际上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终是以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需要为目的的呢？完全不是。这个经济制度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并且仍然是对不断增长的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因而，只有当“物品”同时也是价值的时候才被生产出来，人类的物质需要，也只能被满足到对于增加剩余价值来说必不可少的程度。因此，例如，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即工人，具有巨大的（而且十分幸运，是不断增长的）需要，然而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力作为市场上可出售的商品，并且只有当他们证明了自己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因而得以将劳动力商品售出的时候，他们的这种需要才会被满足。这同样也适用于所谓的“客观因素”：即使是最完美的机器或最完美的生产技术，也只有当它们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的时候才会被采用。最后，即使是“总资本家”本身的舒适和享受，也受到不断积累的必要的限制。因而，即使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价值范畴受使用价值范畴的制约，社会再生产过程本身也仍然要服从于价值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创造。在讨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时，我们要时刻记住的是，

^① 在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中，这是《手稿Ⅱ》中的一节，接下去的是《手稿Ⅷ》中的一节。

马克思所分析的这种相互矛盾的目的之间的对立冲突，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两个必须相互适应的范畴之间永恒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品的部类，并使这两个部类互相服务。这个图式所提出的，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简单的模型，而解决前面所说的那个矛盾冲突的基本可能性，却无疑只能由这样一个模型来加以表示。为了使生产过程重复进行，每个部类都必须设法使自己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得到补偿，而它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又在适当的物质形式上从另一部类取得这些生产要素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每个部类要想拥有他们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又都必须通过等价物的交换从另一部类换取。这种“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相互依存，在再生产图式中得到了清楚的说明。而这种相互依存之所以得到说明，则是由于图式严格地区分了两个部类，并将它们的相互关系仅仅局限于等价物的相互交换。因此，所谓图式基本前提假设的“刚性”，恰恰是与它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相适应的。如果众多的理论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奥托·鲍威尔和其他人等）企图通过引入较为宽松的条件来“改进”马克思的图式使之更加现实，那不过证明了他们对于这些图式的机构和含义懂得非常之少。

社会再生产过程所揭示的是解决使用价值与价值这对矛盾的可能性，而在资本主义实践中亿万次发生的事实却表明，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商品价格根据社会需求的调整，通过私人企业的倒闭才能获得解决。这自然会使得人们对于表明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能性的理论的意义产生疑问。无可否认，资本主义现实告诉我们的是经济危机的现象，这一现象恰恰“十分明显地揭示出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与对抗”（马克思，1974b：570），所表明的正是解决这种矛盾的周期性的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这个问题的考察，当然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资本论》第二卷生产图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

4. 再生产图式与实现问题

我们已经讨论了《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图式的基本前提假定，社会生产的两个主要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无论从价值的观点看还是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都必须相互适应，才能保持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平衡条件。我们必须强调再生产图式的这种必要条件，因为不幸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这一点经常被忽视。

当然，研究再生产图式并非仅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构造再生产图式的任务也绝非仅仅如此！他的主要目标——追随魁奈的榜样——是要设计一个新的经济表，将资产阶级社会表明的“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

运动,”即“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马克思,1972a:398)。因此马克思对魁奈经济表的这些评论,同样也适用于《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这些图式的目的同样也是将“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这时流通仅仅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形式);同时不仅将“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而且将“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以及“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流通”,包含在这个再生产过程当中。(马克思,1975c:366)区别仅仅在于,马克思的科学任务,要比魁奈的更加复杂、困难得多!首先,对于魁奈来说,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完全一致的,^①因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其次,魁奈所考察的仅仅是简单再生产。因此,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就不仅要表明社会年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c+v+s$)是如何相互补偿的,而且要表明已创造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何被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扩大——而这种扩大再生产自然是以价值各组成部分之间正常的相互交换和在市场上的实现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可以被看作所谓实现问题的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对于实现问题,出现过三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方法要追溯到J. 穆勒、D. 李嘉图和J. B. 萨伊。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将资本主义生产等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的办法来解决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可他们又天真地将简单商品生产归于简单的产品交换。他们说,由于任何一个生产行为都创造出它自身的需求,由于分析到最后总会发现与产品相交换的也是产品,因此,在买者与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玄妙的平衡”。因此,只要各种商品的生产量适当,符合正确的比例,到头来全部商品都能在市场上找到归宿。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实现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事实上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比例性的问题。

与古典学派属于同一时代的批评者西斯蒙第的观点则大为不同。西斯蒙第是感觉到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特殊历史性质的第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此,他不是将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仅仅看作“产品”,而是看成资本的产品。他认为,资本的所有者之所以能在生产中获得增加的价值,不是“由于他的企业的产品获得了比生产成本更大的收益,而是由于他没有支付全部生产成本,由于他没有为工人的劳动支付足够的工资”^②(Sismondi, 1970: 92)。而恰恰是这部分增加的价值,这部分“剩余产品”,

① 重农主义者的“表述方式必然决定于他们对价值性质的一般看法,按照他们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态构成的”(马克思,1975c:19)。

② 参见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第68页。但其中这句话完全译错了,整个句子也因此而完全说不通,我们这里是根据英文重译的。——译者注

构成了资本积累的源泉。但是，在生产它的工人们只能买回相当于他们的劳动工资的那一部分产品，资本家自己又不将剩余产品全部消费掉，因为它的一部分要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这些剩余产品又如何能卖掉呢？西斯蒙第将此视为无法克服的困难。他认为，最终的分析表明，剩余产品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它们卖到外国去。

什么是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呢？它可以被看作是对李嘉图理论和西斯蒙第理论的一个独特的综合。马克思毫不否认剩余价值的实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然而，他彻底否定了西斯蒙第对实现可能性的怀疑。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在事实上的确创造出自己的市场，在此意义上，它也就“解决了”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它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将问题完全消除，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即“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马克思，1972a：52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写道：“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马克思，1972c：122）]^① 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在它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不断扩大中，实现问题才能获得辩证的解决。按照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既不是“不可能的”（如西斯蒙第所说），也不能是“无限制的”（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再生产出它的内在矛盾，直至资本主义发展的“螺旋”（借用西斯蒙第的比喻）到达它的尽头为止。

如果我们想要对半个世纪以来关于《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图式的争论所具有的广泛内容和重大意义进行评价，我们就必须记住前面谈到的关于实现问题的辩证法。

第2节 俄国“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讨论

十分奇怪的是，有近20年的时间，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并未注意到《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唯一对此有所涉及的是考茨基，但他也仅仅在1885年对《资本论》第二卷的评论中用了两行文字谈到它们。他写道：“最后，剩余价值的

^① 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278页：“资本主义生产总数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这段话是针对利润率下降和资本贬值而说的。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的“活生生的矛盾”这一概念，其意义正在于此。见《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又见《马克思1865年1月24日致施韦泽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英文版，1975，第142~149页（该信在《论普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6卷，第28~36页）。

积累,生产过程的扩大,引起了更加复杂的情况。”^① 这就是在此20年中关于再生产图式所说的一切。只是到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作的德译本出版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才注意到了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并首先在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09)一书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这种奇怪的情况似乎并不难解释。在当时中欧和西欧的条件下,没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原因促使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去讨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内容,致使这一卷长期湮没无闻。

但在俄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恰逢那里正在开展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的争论,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全力以赴地参加了这个争论。争论的双方都利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分析,试图找到解决这个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的途径——“民粹派”否定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② 于是,马克思的这些分析的重大理论意义最先在俄国显示出来。

1. 恩格斯与丹尼尔逊的辩论

在“民粹派”理论家中,最著名的是《资本论》俄文版的翻译者N. 丹尼尔逊,他在马克思去世后一直同恩格斯保持着通文联系。

在1887年2月3日的信中,丹尼尔逊告诉恩格斯说他想写一本书,“用作者(即马克思)的理论,向读者阐明我们的经济生活及其发展趋势”(Marx K. and Engels, 1947: 106)。恩格斯自然同意丹尼尔逊的计划,并强调指出,“表明如何将作者的理论应用于你们的条件”是十分重要的。(Marx K. and Engels, 1947: 107)丹尼尔逊为写此书工作了4年。而4年之后,当他和恩格斯开始进一步的深入讨论时,二者在理论前提上的差别程度便立即显示出来了。

1891年11月24日,丹尼尔逊写道:“在上封信中,我想向你表明俄国人对于‘为各工业阶级创造国内市场’的看法。我想说明乡村附属商业的解体从而制造业与农业的分离是如何发生的,而这又是为了证明,‘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马克思,1972a: 816)我想请您注意我们的特殊条件。我们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才进入世界市场的。……结果,一方面,我国的农民日益贫穷;另一方面,工业部门虽然日益集中,技术上日益先进,却完全要依赖于国内市场的波

① 根据罗莎·卢森堡的引文。

② 在此我们只能粗略地涉及这场争论;但我们建议读者参考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一书中对此所做的精彩描述。

动，也就是依赖于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程度。”（Marx K. and Engels, 1947: 119 - 120）

可见，这封信已经表明丹尼尔逊对资本主义能在俄国获得充分发展的怀疑。不过他的怀疑主义实际上直到1892年5月24日的信中才第一次明确地暴露出来。他写道：“我们将20% ~ 25%的乡村人口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这些农民现在到处游荡寻找工作……他们能做什么？进工厂？可是谁都知道如今的工业所需要的工人数量不断减少^①……我们的国内市场达到完全饱和的状态又能吸收多少工人呢？‘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马克思，1972a: 351）……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即我们的国内市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扩大它的外部市场来解决作者（即马克思）所指出的矛盾的。但是我们又如何躲避这个矛盾呢？就像一个资本主义工厂的生产不可能全部是为了本厂工人的消费一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外国市场也是不可能的^②。正因如此，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竭尽全力去占领其竞争对手的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资本主义。”但是俄国能获得外部市场吗？“我们进入世界领域的时候，我们的竞争者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已经到了满足于很低的利润率的地步……因而看来我们的宝贝——资本主义，虽然毁掉了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基础，却既无内部市场，也无外部市场，根本没有发展的坚实基础。”（Marx K. and Engels, 1947: 127 - 129）

丹尼尔逊这里的错误是明显的，但是他错误的根源何在呢？他正确地指出了无论个别资本主义工厂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都不能“买回”他们劳动的产品，他们只能购买相当于工资的（不是 $v + s$ ，而只是 v ）的那一部分产品。他也正确地认识到工资总额与工人们创造的价值产品是不成比例的，并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矛盾^③。然而，我们却不能像他那样，用静止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只要积累在进行，只要所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来雇用新增劳动力即工人，则工人花用他们的工资，就会有利于前一生产期间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当然，新被雇用的工人本身也将创造出一定的价值产品，其规模也必然大于他们的工资总额，从而使前面的矛盾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不断地重新产生……然而，对问题所做的这种辩证分析，与俄国“民粹派”的抽象和极端简化的（“直线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而恩格斯是如何回复丹尼尔逊的来信呢？他是否也像“民粹派”的俄国反对者们

① 丹尼尔逊忘记了，马克思所说的是生产就业工人数量的相对减少，而不是绝对减少。

② 丹尼尔逊在后来出版的《大纲》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就像一个工厂主的市场如果仅限于他自己和他工人消费，他作为资本家就一天也活不下去一样，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有国内市场也是不够的。”（Luxemburg, 1963: 286）

③ 马克思也经常强调这一点，正如在本章第65页（原文第487页）上所引的那段话中所能看到的那样。

那样，否定问题本身的存在，并宣称这不过是一个“误解”？完全不是，事实上，他强有力地指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无限的增殖欲望与资本主义社会有限的消费能力的矛盾，主要（而不是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张中，在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得到解决的。但是他在回信中也承认，这是一个矛盾的痛苦的过程，特别对于俄国这样的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较晚，又没有由其控制的重要国外市场的国家，就更是这样。因为，只要“当俄国的工业还局限于国内市场时，它的产品就只能满足国内的消费。而国内消费只能是缓慢地增长……大工业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它在建立本国国内市场的过程中，同时在破坏这一市场。它在建立国内市场时，破坏着农民家庭工业的基础。但是，没有家庭工业，农民就无法‘生存’。他们作为农民在遭受破产。他们的购买力降到最低点，而他们作为无产者在还没有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以前，对新出现的工业企业来说，将是极为匮乏的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满着各种内在矛盾”，“这个趋势——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这是这类矛盾之一。另一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无出路状态，这种状态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要出现得快一些”。（他还补充说：“后边这些国家，似乎可以通过贸易上的剧烈变化和用暴力开辟新市场来寻求出路。”）（Marx K. and Engels, 1947: 137 - 138）^①

在以后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就他与丹尼尔逊的讨论总结道：“其余的我都同意您的意见：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6：551）

2. 布尔加柯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分析的解释

与恩格斯不同，“民粹派”的俄国反对者们锋芒毕露。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揭露“民粹派”的理论错误。在此过程中，他们熟练地利用了马克思对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分析。然而，正如罗莎·卢森堡中肯地指出的那样，他们“走得太远了”：“所讨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一般地说是资本主义，特别地说是俄国资本主义——能否发展。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出肯定回答的同时，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资本主义可以永远生存下去的理论证明。”（Luxemburg, 1963: 325）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541页。——译者注

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种论著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像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所做的那样）仍然将马克思的抽象分析与资本主义现实混淆在一起，由此从马克思的分析中得出了绝不能被证明有理的结论。

甚至最有才华的、最“正统”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也不能例外^①。布尔加柯夫当然认识到了，马克思的图式“既不是考察产业循环，也不是考察周期性重复发生的危机，因此它们不适用于用来描述经济生活的实际过程。不过问题在于它们在理论上阐明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将变成现实”（Bulgakov, 1897: 165）。

然而，尽管如此，布尔加柯夫还是像其他人一样，认为这些图式已经对实现问题做出了最后的和绝对的回答。他写道，“市场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已经由对两部类（第Ⅰ部类与第Ⅱ部类）之间交换的分析解决了”；“这一分析表明了剩余价值的市场在何处，表明了那些代表已耗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和各种资本的商品产品部分是如何周转的；最后，还表明了工资的消费以及那些生产非消费品的企业的剩余价值的消费，如何是可能的”（Bulgakov, 189: 28-29）。

本书中另一段，他又说：“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主要的困难在于说明，尽管第Ⅰ部类仅生产不变资本，第Ⅱ部类仅生产可变资本，但两个部类的扩大生产仍然是可能的。克服这一困难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第Ⅰ部类为它自己和第Ⅱ部类积累不变资本，而第Ⅱ部类则为它自己和第Ⅰ部类积累可变资本。这样，积累过程的困难就归结为两部类之间将各自为对方积累的那些产品部分相互交换的问题。”（Bulgakov, 1897: 28-29）

一切都似乎言之有理。但事实上，布尔加柯夫忽视了，马克思的图式是在相当抽象的层次上对实现问题做出解答的，因而它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解答。除了这一缺陷，他的表述很少有可指摘之处。可是布尔加柯夫对此并不满足，他走得更远。由于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图式中，仅仅两大部类本身相互依存，无须来自其他方面的购买，于是他便勾勒了一幅资本主义绝对地自我满足——不仅在图式的假设范围内，而且在现实当中——的荒诞图画。他说：“资本主义生产仅仅通过自己的增长就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市场扩张的程度，仅仅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Bulgakov, 1897: 246）

但是为什么杜冈是正确的呢？据说仅仅是因为，在马克思的图式中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从第一年起，就形成了对第Ⅱ部类的消费资料的“独立的需求”，第Ⅱ部

^① 我们这里没有提司徒卢威。他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乐观主义态度，在恩格斯写给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中受到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559页）

类也形成了类似的对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需求。“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始阶段，就形成了一种封闭的流通过程，它完全不依赖于国外市场，而是自我满足的，能够通过积累而自动增长的。”（Bulgakov, 1897: 210）

在布尔加柯夫著作结尾部分的一章中，他甚至用了许多话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的唯一市场，就是这个生产本身”，因而“扩大生产的唯一障碍，就在于资本本身和它增长的需要”。（Bulgakov, 1897: 238、259）

我们看到，尽管使用的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布尔加柯夫最终却将与李嘉图、麦克库洛赫和萨伊所阐发的和谐论理解没有本质差别的含义塞进了马克思的图式。但是，他又怎么能将他的这种解释与马克思关于“有限的群众消费能力”是“现实危机的最终原因”的大量论述统一起来呢？或者说，他又怎样解释有限的社会购买力对于一般产品实现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剩余价值实现的影响呢？

布尔加柯夫认为他可以用下边的话对此做出回答。他说：“消费，人类需要的满足，在资本的流通中不过是一种附带的运动。生产是由资本量而不是社会需要的规模决定的。因此，生产的扩大并不必然伴随着消费的增长，二者之间甚至存在着对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力图相对地减少可变资本和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显然，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主要是由于第Ⅰ部类即不变资本生产的扩大，只有较小的一部分是由于第Ⅱ部类即直接消费品生产的扩大。”布尔加柯夫继续说：“充分地表明消费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仅仅这一点，就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存在于何处。”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即使在危机和利润动机的狭小界限内，也能不依赖消费而无限地扩大，哪怕消费不断缩小，也是这样”。他断定：“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为其偏离了它的实际目的而付出的代价。然而，它本身却不依赖于消费。”（Bulgakov, 1897: 161 - 162）

可以看到，布尔加柯夫承认社会消费的意义表现在周期性复发的经济危机。但是他却否认这些问题与实现问题的联系。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别生产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因而只被看作比例失调的危机。他说：“扩大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唯一基本条件，就是产业的不同部门之间具有一定的比例性。如果这个条件具备，生产的水平就仅仅由资本积累的程度决定，由其增长的需要决定。”（Bulgakov, 1897: 158）马克思关于危机所说的一切，都被解释为这样的意思。

在布尔加柯夫的著作中，国外市场问题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必须要有国外市场的荒谬教条”断然地加以否定。正如卢森堡指出的那样，他的主要论点是，从西斯蒙第到“民粹派”的“怀疑论者们”，“显然都把对外贸易看成一个‘无底洞’，国内创造的、无法处置的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一掉进去便可无影无踪。

就布尔加柯夫来说，他成功地指出了，外贸既不是一个洞，当然也不是个无底洞，而是把双刃剑：出口总要伴随着进口，二者必须平衡。因此，把一样东西推出边界，还得买回另一样，只不过是不同使用形式的交换而已。‘我们必须为那些在给定市场范围内作为出口商品等价物的进口商品找到销路。由于不可能事先假定存在着这样的销路，因此求助于外部需求的做法只能引起新的困难。’”（Luxemburg, 1963: 309）初看上去布尔加柯夫的论点很令人信服，他还可以引证《资本论》第二卷的著名的一段，马克思在那里宣称，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中引入对外贸易完全不必要。（马克思，1972a: 528 - 529）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马克思是在“基本形式”（马克思，1972a: 512 - 513）上，就是说，是在相当抽象的层次上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进行研究，在分析的这个阶段上引入对外贸易“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马克思，1972a: 528 - 529）。但是，正如罗莎·卢森堡在反驳布尔加柯夫时所指出的，一旦进入更为发展了的具体的关系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实现的领域内所产生的不可能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图式中得到处理的困难^①，却能够由于对外贸易而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得到缓解。

这样，进口商品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过程之中，因而“使用形式的改变”不过就是出口商品价值的实现（例如，当英国工厂主们出口纺织品而进口棉花作为回报，这在这个范围内同时也就解决了他们的“实现问题”，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将所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扩大其工厂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布尔加柯夫自己也承认，“若剩余能够出口并在国外市场上销售，一两种商品内部的生产过剩就能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外贸是一种安全阀，它可使任一特定国家避免局部的或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Bulgakov, 1897: 200 - 201）（这不过意味着这个国家通过对外贸易找到了实现自己商品剩余的途径）。可见，当我们涉及资本主义具体现实中某一特定国家的个别生产部门的时候，布尔加柯夫前面的论点就完全没有说服力了。

既然否定了实现问题与外贸之间具有任何理论上的联系，布尔加柯夫就必然要构造一种独特的外貌理论，但这一理论正如卢森堡所说，绝“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事实上，“在此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外贸。如果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如果它像小狗追逐自己的尾巴那样，完全地‘自我满足’，为自己创造出无限的市场并能自我刺激不断地扩大，那么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也是封闭的，也都是‘自我满足’的经济整体”（Luxemburg, 1963: 306）。

^① Roman Rosdolsky, 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Pluto Press Limited, p. 332.

按照这种观点,“国外市场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性,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本身,而是根源于这种机制的外部”(Bulgakov, 1897: 160),这样的根源因而仅仅具有“历史的”和“地理的”性质!(Bulgakov, 1897: 183)例如,英国必须弥补其气候和土壤条件造成的某些不足之处。但是,这种理论却无法应用于那些地域广大的大陆国家,如美国和俄国,因为它们能够生产一切或几乎一切,无论是原料还是食物本身(Bulgakov, 1897: 170 - 173)。这就能够说明布尔加柯夫为什么会持有与“民粹派”相反的观点,预言俄国资本主义具有“远大而光明的未来”(Bulgakov, 1897: 225),并对俄国不久就能在市场上击败其竞争对手满怀希望(Bulgakov, 1897: 218)——对一个马克思理论的追随者来说,这真是个奇怪的希望。而布尔加柯夫还并非是唯一沉湎于这种梦想的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民粹派”的另一个反对者,俄国教授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尽管他与布尔加柯夫相比不那么有天赋和创造性,但他在两方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的论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如希法亭和奥托·鲍威尔)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莎·卢森堡曾指出这两位作者在态度上的差异,她写道:“与布尔加柯夫一样,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也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分析出发;这一分析为他在问题的这个令人糊涂的迷宫中找到他的所在提供了钥匙。但是区别在于,布尔加柯夫是马克思理论热情的应用者,他只想忠实地追随马克思,并将自己的结论都归于马克思;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却认为马克思不知道如何充分利用他的关于再生产过程的精彩论述。”而在另一段中她说:“布尔加柯夫真诚地试图将马克思的图式应用于实际的、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他竭力要克服由此产生的种种困难……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却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明,他不大动脑筋。对他来说,既然得出的算术比例令人满意并能够无限地继续下去,那么这就证明了,只要上面所说的比例能够保证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就能毫无阻碍地进行下去。”(Luxemburg, 1963: 311、315)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还喜欢把自己的论点推向极端,并沉迷于一些丝毫没有给他的分析增添科学价值的奇谈怪论。但是,他的第一本书的结论与布尔加柯夫基本上并无二致^①(Tugan - Baranovsky, 1901)。像布尔加柯夫一样,杜冈也宣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自我满足,并断言它不依赖于社会消费,也像布尔加柯夫那样,他否认争取国外市场的动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最后,他也将经济危机仅仅归因于各产业部分之间的比例失调。在所有这些方面,这两位作者都可视

^① 笔者没有见到1894年在俄国出版的《资本积累》。罗莎·卢森堡所用也是德译版,德译版肯定在许多地方与第一版不同,因为这期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已经变为公开的修正主义者。

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新和谐主义”倾向的先驱。如果我们能发现二者在观点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一定更多的是由于强调的是不同的方面——不是由于杜冈说了什么，而是由于他说的方式不同。

他书中的几段话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说，“所引的图式”（杜冈此处指的是被他修正过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图式）“必然表明在它之中存在的简单公理，即资本主义生产为其自身创造市场。只要社会生产能够扩大，只要生产力能够满足这种要求，并且，只要社会生产能按比例地进行分工，则需求也必然会相应地扩大。因为，在这些条件下，每件新生产出的商品都代表着用于获取其他商品的新出现的购买力”（Tugan - Baranovsky, 1901: 25）。而“只要生产的扩大没有实际的限制，则我们就必须假定市场的扩大也是没有限制的，因为如果社会生产的结构是合乎比例的，那么除了社会所能支配的生产力以外，就不存在市场扩大的任何其他障碍”（Tugan - Baranovsky, 1901: 231）。

这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按照萨伊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的图式。但这还不是杜冈想从图式中引申出来的全部东西。他认为还可得出那个“十分重要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需求，在一定意义上是不依赖于社会消费总量的。因为，无论按‘常识’看来多么荒谬，在社会交易下降的同时，对商品的社会总需求却可以增长。社会资本的积累导致了消费资料社会需求的减少，但同时使社会商品总需求增加”（Tugan - Baranovsky, 1901: 25）。

这无疑与马克思的图式恰恰相反，因为马克思的图式中积累的增进伴随着社会消费的稳定增长。为了论证自己的假设，杜冈不得不求助于一个在《资本论》第二卷图式中没有加以考虑的因素，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他说：“技术的进步表现为这样的事实，就是劳动资料等相对于活劳动、工人本身的重要性不断增长……与机器相比，工人退居一种陪衬的地位，同时由工人的消费所导致的需求，与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性消费所引起的需求相比，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活动呈现自为地存在的机制的特征，人类的消费在此机制中不过表现为资本流通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环节。”（Tugan - Baranovsky, 1901: 27）

杜冈由所有这些又得出了什么结论呢？那不过就是“机器取代活劳动，生产资料取代消费资料成为商品的市场”。这样，“国民收入会减少而同时国民需求却会增加，国民财富的增长可以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减少，尽管这听起来可能自相矛盾”（Tugan - Baranovsky, 1901: 193）。

我们看到，杜冈就是这样成功地使生产和社会消费完全分离开来。难怪后来（Tugan - Baranovsky, 1905）他的这种幻觉使他为资本主义社会描绘出这样一幅图景：整

个工人阶级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工人，他服务于众多的机器，而这些机器又生产出新的机器——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导致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的不一致。（W. Alexander, 1932）

关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热昏的马克思主义”，以上这些就够了。它与布尔加柯夫说法的不同，仅在于它表述方式的极端性，而不在于其基础。^①不过，杜冈和布尔加柯夫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在对萨伊定律的评价上。布尔加柯夫按照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萨伊持批判态度；而杜冈则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萨伊的定理。他写道：“至于我，我并不认为这一理论在任一细节上都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它的主要观点，即只要社会生产的分工合乎比例，商品的供给就必然与需求相适应，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无可争辩的。在我看来，任何对此持反对态度的人都对它缺乏理解！”^②（Tugan－Baranovsky, 1901: 27）

然而，必须承认，杜冈在这个问题上只不过是比布尔加柯夫更加始终如一罢了。因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所做的“和谐主义”的解释，从根本上说不过就是古典学派的“乐观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外观下的一种复活。而这确实表明了，孤立地、断章取义地利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会产生些什么意想不到的结果。

第3节 列宁的实现理论^③

我们把布尔加柯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视为后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新和谐主义倾向的先驱。但是这种看法是否会让我们在理论上陷入困境呢？众所周知，这两位作者在同“民粹派”的争论中，曾与年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结成同盟，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观点与他们是相同的。这是否也意味着列宁也必须对用和谐主义解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负责任？布尔加柯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几年之后都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并成为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然而，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由这一理论拥护者的政治生涯所判定。布尔加柯夫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后来的思想发展

① 希法亭写道：“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仅仅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经济形式，而没有看到那些无论其历史形式多么不同，对所有生产都适用的自然条件，因此形成了他的奇怪的观念，即一种生产形式的存在只是为了生产本身，而消费则成了累赘的附属物。如果说这是‘热昏’的理论，那也是由于他使用了一种‘方法’，并且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因为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历史特殊性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特殊之处。它是‘热昏’的马克思主义，但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点使得杜冈的理论显得既古怪又令人感兴趣。”（Hilferding, 1968: 355）

② 从布尔加柯夫对杜冈第一本著作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在那本书中杜冈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③ 我们对列宁关于实现问题的论著给予特别的注意，并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具有无可争辩的理论意义，而且是由于它们的大段引用通常被附加在《资本论》的版本中，显然是被当作马克思著作的一种官方注释。这些做法始于1930年，列宁若活着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和列宁后来在这方面的思想发展一样，与此都没什么关系。

因此，前面所说的“困境”，也许并不像初看上去那样严重。我们应该记住，经济理论和社会学的理论都不可能在纯知识以太中存在，而作为一个规则也履行着一定的社会功能。由此看来，列宁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联盟，并不显得那么奇怪。

那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坚决反对“民粹派”的思想意识看成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因为“民粹派”否认俄国工人阶级特殊的历史作用，并想把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拖回俄国特殊的农民社会主义乌托邦道路上去。为了反对这一思想意识，就必须表明它赖以存在的理论假定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当“民粹派”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并用俄国资产阶级缺乏国外市场、社会消费不断缩减和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过剩危机来论证这一点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便力图证明在没有国外市场、消费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的实现也是可能的，因而生产过剩危机的现象并不是来自实现的困难，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无政府状态。而对于“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假设的平衡条件的抽象分析，则被认为能对此论点做出恰当的证明。这样，“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们过分地估计了这种抽象分析适用的范围，并且有时把它解释得与马克思理论的真实意义并不相符，就很难令人吃惊了。

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小册子《我们的分歧》第二版中加进一段中肯评论。他在这本书中既表明了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也表明了他与列宁的区别。他写道：“我绝不赞同那些征服了我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像瘟疫一样在90年代流行的一般的市场理论和特别的危机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再生产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危机只被解释为生产资料的不成比例。这一理论的主要宣传者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维尔纳·桑巴特因此就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看成这一所谓的新理论的创始人。然而这一绝非新的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是J. B. 萨伊，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除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列宁在他的《再论实现问题》（1899）和《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两部著作中也都宣扬了这一理论。”（Kowalik, 1963）

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批评显然是过分的，其尖锐程度则只能归因于当时社会民主党内的宗派斗争。但是这一批评似乎包含着整理的成分，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列宁关于实现问题的最早期著作的话。例如，我们在列宁的第一本著作《论所谓市场问题》中见到了这样的论述：“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因为它也像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列宁，1955a：85）

这是一个本身就适宜于一种类似于古典经济学家们陈述的乐观主义前景的解释。

在列宁的另一重要著作《评经济浪漫主义》中，一些关于危机的断言同样也是成问题的。在那里，他在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与西斯蒙第的争论中赞同李嘉图以至麦克库洛赫。^①

然而，如果我们看到列宁后来的论著，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所引用的那些著作，我们就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列宁与萨伊的观点基本相似的看法。不过，在这些著作中也有一些片面的论点和夸张的表述，对此我们这里要做些讨论。

列宁向“民粹派”指出，他们对剩余价值实现可能性的疑问，可以由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来做出解答。这里列宁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在他的图式中所表明的正是：只要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资本主义社会就不仅能够更新它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且还能通过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化来使它扩大。列宁曾多次要他的“民粹派”论敌去看这些图式，并进一步说道，“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基本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还说：“马克思确立了这些基本原理，全面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列宁，1955b：32、47）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的分析在原则上对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做出了证明，它是否能算作对实现问题的“完整解释”呢？事实上，《资本论》第二卷的分析有意识地撇开了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增长等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决定性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不断地破坏着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从而必然在社会产品的实现过程中设置更大的障碍。

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列宁认为可以用生产资料部门相对较快的增长来回答这一异议。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的实现论对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做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列宁，1955b：33）

在另一场合，列宁还说：“这种不适应现象（正像马克思在他的公式中明确指出的），表现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超过消费品的生产。”（列宁，1955c：142）

但实际上，马克思的图式根本没有表明这一点。因为，在《资本论》第二卷所举的两个例子中，第Ⅱ部类的发展速度与第Ⅰ部类完全一样（这当然没有反映具体实际的情况，但这正是马克思所选数字例子的一个特点）。因此，《资本论》第二卷的图式并不能证明列宁的论点。于是，列宁也像在他之前的杜冈和布尔加柯夫那样，不得不

^①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后来显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见列宁对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书所做的边页评注。

将《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过程分析与第三卷才阐明的资本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联系起来。他不断地指出那一事实：“按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来看，不变资本要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些。……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部类增长得快些。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的消费的增长。”列宁接着又说：“看来，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真正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但这种矛盾并不是教条，而存在于实际生活中。”正是这种特征“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前者是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后者是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列宁，1955b：33 - 35）。

这里引述的这些话似乎已经表明了列宁的实现理论的特点。显然，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在俄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在这一时期，仍然是半封建的俄国的工业化似乎事实上为生产资料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市场。由此而论，对于那些处于产业革命阶段、通常以人民大众非常低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创造现代工业的基础——交通体系和机械化农业——的国家来说，列宁的理论当然是正确的。他强调上述发展过程的必要性和进步性，从而能显示出他的深刻的历史现实感，并证明了他要比他的“民粹派”论敌要高明得多。但是，难道他将这个以特殊历史条件为基础的假说推而广之应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发展阶段也是正确的吗？十分清楚，资本主义在确立自己的工业基础的过程中，必然要建成大量的工厂以及机器、铁路、港口等，而这就会在连续几十年的时间内为生产资料提供一个迅速扩大的市场。然而，或迟或早这个工业化的基础阶段将会完成，已经形成的工业设施则必须生产出供个人使用的物品。那时群众的购买力的问题就要凸显出来并且无法回避，除非你相信“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旋转木马”，^①也就是说，相信他的“机器为自己而生产”的荒谬观点。

总之，列宁力图将资本构成提高的规律塞进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并认为该图式意味着生产资料工业必然较快增长。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再生产图式所假定的实际上是两个部类的平行、等速发展，因而并不允许对它做出那样的解释，现在我们又看到，列宁的论点只能适用于一个有限的时期，即工业化的初期，而不能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

但这不是可以向列宁对再生产图式的解释提出的唯一异议。更使我们产生疑问的还在于，他将《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抽象分析，看成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的最终的和

^① 这是卢森堡用来表示杜冈的资本积累概念的特点的一个用语。

确定的论述，并因此不想承认第三卷对此所做的扩充和校正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这种观点，特别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存在某种错误的“正统”式的理解，他遇到了一些对他来说相当严重的理论难题。

从他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作为一个修正主义者和萨伊的追随者，杜冈无法接受《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许多论述，因为这些论述与他对马克思图式的和谐主义解释是相矛盾的。特别是，他反对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①社会消费力的限制。”（马克思，1972c：272）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段话的解释大致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比例性……本身并不能保证产品具有售出的可能性。即使生产的分配合乎比例，产品也可能找不到市场——我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的意思显然就是这样”。人们都必定同意杜冈的这种解释，因为马克思的表述确实不允许任何别的解释。

然而列宁却否认这一点。他回答说：“不，这几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认为这几句话是对第2卷的实现论的某种修正，那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在这里只是证实他在《资本论》其他几处也曾经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即无限扩大生产的意图和必然的有限消费（由于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状况的结果）的矛盾。自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并没有否认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既然马克思这段话指的是这个矛盾，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再在他的话里寻找什么别的意思。”（列宁，1955c：43-44）

那么问题就在于：所谓“别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社会产品的实现仅仅取决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性。他把这个含义归因于《资本论》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不能得出的“别的意思”是否就是不同于这一含义的意思呢？若是这样，那么列宁的批判便失去了目标。因为这样一条，他就不仅不是在批判杜冈对马克思实现理论的和谐主义解释（即将其仅仅视为一种“比例性理论”），而且似乎是在肯定这种解释，只不过试图在形式上做些“进一步”的修正。因为在他看来，“‘社会消费能力’和‘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决不是什么个别的、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条件。相反地，一定的消费状况乃是比例的要素之一。”（列宁，1955c：44）

就列宁对比例性概念的解释来说，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即生产和消费之间平衡的破坏或迟或早会引起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比例的失调。同时，很清楚，比例

① 下划线是引者加的。

性的概念——再进一步想到由它引出的结论——必然包含着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然而，绝不能因此而认为“比例性”的概念与“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就是不可相互分离的，或者认为它们总是相互等同的。因此，例如，马克思恰恰是从生产部门的比例失调中引出了局部的危机，而并不涉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①（马克思，1974a：595-596）。列宁自己也曾在一篇批判司徒卢威的文章中写道：“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没有复活替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相反地，它却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去反对这种辩护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甚至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理想般匀称的情况下，生产的增长和消费的有限范围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列宁，1955c：71）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所说的杜冈对第三卷的解释就是正确的，而这就又必须承认，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产品的实现就不仅取决于“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社会的消费能力”，并且这样就很难看出列宁的“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比例性”概念能有什么理论的前途。

而且，列宁认为在引用的马克思《资本论》中那些段落仅仅“表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没有更多的论述”这个经常被他重复的论点，更是不那么可信的（列宁，1955d：133-134；1955c：43-45）。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个矛盾起着关键的作用，只不过是尚待我们探讨的方法论上的原因，才没有进入《资本论》第二卷的考察范围。

根据列宁的假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被归属于比例性的概念，这无疑使他的理论令人不舒服地与布尔加柯夫和杜冈的“比例失调危机论”相接近。我们在他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读到：“如果讲到实现的‘困难’，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困难’……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难，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而且也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都会经常发生；不仅在实现消费品时，而且也在实现生产资料时经常发生。”（列宁，1955b：26）

在另一处他说得更清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遭到破坏而有时生产出过剩的产品（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补充说：“一定的消费能力是保持比例的要素之一。”）（列宁，1955c：141）这在本质上构成了比例失调危机

^① 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595~596页：“在整个这一分析中，不言而喻的是：不可否认，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般形式之一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可是我们这里谈的，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就是说，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这种危机是李嘉图等人所承认的。”

论，尽管他做了修改，说生产部门的比例也取决于消费关系。

列宁对马克思实现理论的解释，也说明了为什么他完全不赞同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1912）一书（我们后面要专门讨论此书）。因此，1913年3月，他在给巴黎出版的俄文报纸《社会民主党人》的发行人的信中写道：“罗莎的新著……读过了。胡说八道！歪曲马克思。潘涅库克、埃克什坦和奥·鲍威尔异口同声地谴责这本书，并用我在1899年反对“民粹派”时说过的话来批判它，这使我非常高兴。我准备在《启蒙》杂志第4期上写篇文章谈谈罗莎这本书。”（列宁，1955e：76）

遗憾的是列宁没有写成他计划中的这篇文章。不过，1915年在俄文《格拉纳特百科全书》上发表的他的那篇关于马克思的著名文章中，我们发现了以下的书目说明：“阐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问题的新著作有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1913年柏林版）。对该书中曲解马克思理论的部分进行分析的著作有：奥托·鲍威尔的《资本积累》（《新时代》杂志第31年卷（1913年）第1册第831页和862页）。埃克施泰在《前进报》（1913年）上发表的和潘涅库克在《不莱梅市民报》（1913年）上发表的文章。”（列宁，1955f：71）

列宁的信口气异常尖刻，这大部分是由当时布尔什维克与卢森堡领导的“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SDKPL）之间的派别争论造成的。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评论完全赞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威尔和埃克什坦对卢森堡的批判（荷兰左派潘涅库克的文章没有什么理论分量）。马克思主义的这位最激进的发言人与鲍威尔、埃克什坦之类的社会民主党“新和谐主义”倡导者之间在理论上达到了这种奇妙的一致，其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当然需要做出解释。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若干年中，列宁在政治上与考茨基的“中派”比与卢森堡领导的德国“左派”更为一致。^①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在于政治，而在于列宁对待卢森堡那部著作的态度的理论背景。在上面所引的1913年的那封信中，列宁自己清楚地阐明了这种背景。他之所以采取了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卢森堡时所采取的相同立场，就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他1899年批判“民粹派”时的论点是一致的；并且，他批判卢森堡的著作，不仅是由于此书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做了错误的批判，而且还由于此书在理论上的观念与列宁自己提出过的实现理论的说法大相径庭。显然，他仍然坚持着19世纪90年代他与“合法马克思主

^① 1914年10月27日，列宁在给亚·施略谱尼柯夫的信中写道：“罗莎·卢森堡很早以前写道，考茨基有‘理论家的阿谀奉迎的本领’，简言之，奴颜婢膝——在党的多数派面前，在机会主义面前奴颜婢膝，她写得很对。”（列宁，1955e：151-152）

义者”们站在一起时所捍卫的说法。^①

然而，问题的方法论的一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当年轻的列宁论述实现问题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草稿》，因此他还不具备足够的洞察力来把握马克思经济著作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十分复杂的结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按照马克思的著述结构计划，头两卷所分析的仅仅是“资本一般”，从而，这两卷所获得的结论尽管极其重要，但是必须在以后的分析阶段，即“具体现实中的资本”的分析中进一步加以补充和具体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列宁过分夸大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的理论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度，倾向于把它们看成马克思实现理论的“最后一言”，这并不奇怪。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力图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学究式地将这部分分析的结果与第三卷的很多段落协调起来，第三卷中的那些段落明显地与第二卷相矛盾，因而也是杜冈和“民粹派”非常乐于为了各自的目的加以利用的^②（杜冈利用它，是为了通过将第二卷的“真正的”马克思与第三卷的“错误的”马克思相比较，来对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做出坚定的和谐主义解释；“民粹派”利用它，则是为了能够不顾再生产图式的存在，将西斯蒙第的消费不足危机论强加于马克思）。可是，实际上第三卷的论述与第二卷的论述根本就不是矛盾的（在这一点上列宁肯定是正确的）。不过，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进一步的分析阶段，在此阶段上，问题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正常”运行中的均衡条件问题，而是对这种均衡的必然干扰的原因问题。也就是说，分析危机和资本主义固有的趋于崩溃的趋

① 在此，我们应该指出，列宁从未抨击过布尔加柯夫和杜冈观念的根本基础。相反，他反对他们的批评者而为这些观点辩护，甚至向他的读者们建议：“对没有机会阅读《资本论》第二卷的读者，可向他们推荐上引谢·布尔加柯夫先生书中关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解说。”诚然，列宁时常批评杜冈，但仅仅是由于他对马克思的“偏离”，因为他声称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矛盾。但即便在做出这种批判之后，他仍然为杜冈、布尔加柯夫和他自己辩护，反驳司徒卢威对他们的批判（司徒卢威指责他们都从马克思的图式中引申出了“生产和消费相互和谐”的结论）。他写道：“在我看来，司徒卢威同上述作家进行论战，实质上与其说是由于意见分歧，不如说是由于司徒卢威错误地理解了他们所捍卫的理论的内容。……无论是马克思或者是同司徒卢威发生论战的阐述马克思理论的著作家，都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结论，相反地，他们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能不在资本主义的实现中表现出来。”（列宁，1955c：58-59）

② 另一论据是列宁在批驳丹尼尔逊时所说的一句话。丹尼尔逊曾利用《资本论》第二卷第十六章中由恩格斯插入的一个马克思自己写下的注释（“准备以后加以阐述的注”）（见《资本论》第二卷第351~352页——译者注），作为他的观点的论据。列宁就此写道：“在上面那段话之后，注解中还写到：‘但是所有这些只属于下一篇的范围’，即属于第3篇的范围。而第3篇是讲什么呢？这一篇的内容正是批判亚·斯密的整个社会产品分为两部分的理论……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即分析产品的实现。总之，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解（完全是重复西斯蒙第的），我们的作者所引证的那个注解，‘只是’属于驳斥西斯蒙第‘那一篇’的范围，因为‘那一篇’指出：资本家能够实现额外价值，在分析实现时牵涉到对外贸易是荒谬绝伦的……”（列宁，1955d：134）事实上，如果列宁知道，马克思所说的“下一篇”，指的并不是第二卷的第三篇，而是最初计划所设想的相当于后来的《资本论》第三卷的“竞争部分”，他的全部评论就站不住脚了。

势。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再生产图式和《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分析，本身绝不能为实现问题提供“完满的解释”，而只有同马克思的危机与崩溃理论联系起来才能提供这样的解释。对我们来说，似乎列宁的实现理论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①。

第4节 希法亭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解释

我们看到，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最先帮助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90年代批判“民粹派”的“怀疑主义”，说明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和不可避免性。但是在德国和奥地利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官方理论家们对这一分析所做的解释，是认为它意味着资本主义能够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不会受到由其内在规律所决定的任何崩溃的威胁。

事实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希法亭便曾经试图从《资本论》第二卷的图式中读出任何实践上可能的东西！他不仅认为图式表明了只要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正常进行，两大部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对图式，这是明确的），而且认为，“只要这些比例能够保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便都能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Hilferding, 1968）（就好像比例性是生产不受干扰的唯一条件！）。更有甚者，希法亭继续说道：“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危机的根源必定在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群众消费不足。也不能从图式本身得出结论说，存在着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图式所表明的，正是在生产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所进行的任何一种扩大生产都是可能的。”（Hilferding, 1968）

就最后一点来说，希法亭当然是对的：由图式“本身”当然不能论证存在着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因为图式所考察的事实上仅仅是正常的、不受干扰的再生产过程。然而图式却也并不能证明生产过剩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很难说援引这些图式能达到怎样的目的，很难说从它们之中能引出什么有关资本主义现实的结论。

希法亭自然不会否认生产过剩、群众消费能力不足等经验事实，或者否认这些事实作为危机的要素所起的作用。他对图式“本身”的考察是别有所图的：他最终是要证明，只有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才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他的比例失调危机论，以及他对任何崩溃理论的否定，都是相当首尾一贯地由此而来的。

让我们来较深入地看看希法亭是如何为这一观点提供根据的。在他的著作中论述

^① 作者在写完这一章之后才读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保罗·马蒂克的令人感兴趣的文章《造反派和投降派》，这篇文章已在一定程度上对列宁的实现理论做出了如本文所做的批评。

危机的那一部分开头，他说：“一般的‘商品生产过剩’这种说法，与‘消费不足’这个说法一样没有表达什么东西。严格地理解，人们只能在生理学意义上谈论消费不足，但它在经济学中毫无意义，因为在经济学中消费不足仅仅意味着社会消费得少于它生产了的^①。但是，如果生产是按照正确的比例进行的，人们恐怕就很难看到这种消费不足怎么会是可能的，因为，总产值等于可变资本加上不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 $c + v + s$ ），其中 v 和 s 是必须用于消费的，而耗费的不变资本则必须得到补偿。因此，生产是可以无限扩大的，永远不会导致商品生产过剩也就是说，不会导致所生产的商品（在此处的上下文中，就问题本身而论，就是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物品）多于所能消费的商品的情况。”（Hilferding, 1968）

这实在是一个奇谈怪论。马克思关于危机问题所写的几乎任何东西都力图说明，正是这种周期性发生的生产过剩构成了“危机的基本现象”（马克思，1974b：603），而这种生产过剩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马克思，1972c：548）。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尽管这种理论能够应用于冷酷的现实世界，却不能应用于图式的“自为的世界”，结果是“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说法在政治经济学中也都失去了任何意义……这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这就是因为，那个假设的社会——希法亭“在此处的上下文中”用它来代替现实社会——一般说来是绝不会生产出过多的使用价值和物品的，它有能力通过实行更合比例的生产分工，来消除任何消费品的短缺！“消费不足”的概念对于这样的社会来说当然只有“生理学的意义”。但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生理学，而是经济，并且，不仅是一般的经济，而且是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说，不是“假想”的社会，而是阶级社会，“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广大的生产者仍然或多或少只限于获得‘必需品’，因此，只要财富超出必需品的范围，绝大多数生产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财富的消费之外”（马克思，1974b：603）（这句话所指的，除了生产者“消费不足”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另外，在这个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过去各时代的统治阶级不同），也必须使其消费服从于赢利的动机，也就是履行剩余生产的生产者（马克思，1974c：293）的职能。正因为如此，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在这种社会中是必然要发生的，即使各生产部门之间保持着最完全的比例性，也是如此。把这种危机改称为“比例失调危机”，或者把商品的生产过剩等同于“物品”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取得

① “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概念的不合逻辑，并未妨碍恩格斯得出以下的结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绝起来。”（《1875年11月12日致拉普罗夫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

任何理论成果的。

在我们看来,希法亭的危机理论不过是李嘉图学派对生产过剩危机理论进行的批评的翻版^①,但现在让我们暂且将它放在一边。我们关心的是希法亭的如下命题,即“如图式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无限地扩大”。他是如何论证这一命题的呢?他不过是向我们描述了一番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在此图式中,不仅“耗费的不变资本要素得到补偿”,而且“ v 和 s 都被消费掉了”——也就是说,这时不可能谈什么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也许这是希法亭的一个笔误?也许他实际上要说的是扩大再生产图式,并仅仅是忘记提到 s 的消费不仅包括个人消费,而且包括生产消费?在马克思的图式中, s 的消费肯定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然而,问题在于,所引用的图式中的再生产能够无限地进行下去,并不意味着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就“能够无限地扩大”。希法亭所忽略的事实是,《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是有意没有考虑技术进步,也就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及剩余价值提高等因素,而如果将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引入,就会完全推翻这些图式!这就是以令人信服的证明,将抽象的图式与资本主义现实相混淆,特别是像希法亭那样试图以图式为基础来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观念“绝不是一个合理的观念”,^②必然会导致非常荒谬的结论。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仅仅是一个分析工具,因而是不能用于这样的目的的。现在,作为同希法亭的比例失调危机论的一种比较,让我们来引用一些马克思自己对危机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所考察的正是生产与消费的对立。

因此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马克思在关于危机的一章中反对李嘉图的观

① 马克思批判李嘉图危机理论的时候说道:“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但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李嘉图认为,商品形式对于产品是无关紧要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来源于他的这样一个前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1974b:602)而且,“李嘉图和其他人对生产过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的基础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作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的生产方式,或者看作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象按照计划,根据为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限度和规模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这种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无非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一切领域具有进行并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样的可能性,……如果互相贸易的一切国家具有进行生产(而且是彼此各不相同又互为补充的生产)的同样的能力,也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因此,如果发生生产过剩,那是因为所有这些虔诚的愿望没有实现”(马克思,1974b:604、607-608)。清楚的是希法亭的理论在其基本点上与李嘉图的理论是多么一致。

② 我们这里指的是希法亭著作的最后一章,他在其中讨论了正在临近的金融资本主义政策的崩溃:“那将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崩溃,而不是经济的崩溃。经济的崩溃绝不是一个合理的观念”。(Hilferding, 1968: 47)

点而写道：“李嘉图没有看到，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工人的需求是不够的，因为利润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工人所能提出的需求小于他们的产品的价值，而相对来说，这种需求越小，利润就越大。”长期地看，“资本家彼此提出的需求同样是不够的。……生产过剩的起因恰恰在于：人民群众所消费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大于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数量，因此人民群众的消费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增长”（马克思，1974b：535）。而这是因为，仅仅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着：

“（1）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工人），并不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消费者（买者）；

（2）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即工人，只有在他们生产的产品大于其等价物时，即在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说，剩余产品时，才可能消费这个等价物。他们始终必须是剩余生产者，他们生产的东西必须超过自己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在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范围内成为消费者或买者。”（马克思，1974b：594）

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另一段中我们读到：“整个积累过程首先归结为这样的追加生产，它一方面适应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形成在危机中显露出来的那些现象的内在基础。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扩大自己资本的无限欲望，而决不是消费。消费早就被破坏了，因为，一方面，人口的最大部分，即工人人口，只能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扩大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劳动需求，虽然绝对地说是在增加，但相对地说却在减少。”（马克思，1974b：562）

最后，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同一部分里：“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依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需要的平均水平。”（马克思，1974b：610-611）

在同一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份手稿中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决不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

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马克思，1972a：351-352）

然而，在第三卷的一段中，马克思才最为明确地提出了上面所讨论的矛盾。这一段落我们已经引用过了，这就是：“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结果，“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马克思，1972c：272-273）。在另一处，马克思又说：“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马克思，1972c：285-286）这是因为：“实际情况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它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1972c：547-548）

以上的这些话（我们还可以加上许多）^①至少表明了，虽然马克思本人反对传统的“消费不足论”，但是他赋予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多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的结果。下面的这段引自《资本论》的话则表明了他在另一方面是如何反对所谓比例失调危机论的：“如果说，发生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而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那么，这仅仅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

① 例如，可参阅《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第128页：“在这里李嘉图把‘生产地’和‘有利润地’等同起来，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有‘有利润地’才是‘生产地’，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同绝对生产的区别，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为了‘生产地’进行生产，必须这样生产，即把大批生产者排除在对产品的一部分需求之外；必须在同这样一个阶级对抗中进行生产，这个阶级的消费决不能同它的生产相比——因为资本的利润正是由这个阶级的生产超过它的消费的余额构成的。”另一处还说：“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这一点被例如西尔蒙第粗浅地但又相当正确地看成是为生产的生产同因此而排除了生产率的绝对发展的分配之间的矛盾。”（马克思，1972c：86-87）

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其次，这又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的国家，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如果是生产过剩只是相对地，只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相对地生产方式，它的限制不是绝对的，然而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则是绝对的。否则，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会没有需求呢；为了在国内能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必须到国外、到远方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发生呢？因为只是在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剩余产品才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只有在这种产品对他来说再转化为资本的时候，才能让这种产品由消费去支配。……总之，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它们并不能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因而也不是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的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马克思，1972c：286-287）

关于所谓的比例失调理论，我们就谈这么多。

第5节 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积累理论的批评

1. 历史和方法论背景

我们关于希法亭的讨论表明了德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利用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的。尽管这一理论看上去既是激进的又是“正统的”，但事实上它只能导致放弃崩溃理论，导致把危机仅仅看成比例失调这样一种庸俗经济学的解释。这完全与杜冈以及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相一致！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一书。该书的中心命题——不考虑次要的和从属的内容——正包含了对崩溃论的强调，从而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核的强调，这恰恰是与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新和谐主义解释针锋相对的。

但是为什么这个任务落到了卢森堡而不是列宁的身上？这要由俄国的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来加以解释。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理论问题是与“民粹派”的观点进行斗争，证明还处在幼年的俄国资本主义是有生命力的。而罗莎·卢森堡则生活在和政治上活动在一个资本主义不仅达到了其力量的巅峰，而且已清楚地显示出其未来衰弱的迹象的国家，并且，她的论敌也不是一些乌托邦式的农民社会主义派别，而是一个强大的工人官僚体，它在群众中

有深厚的基础，尽管他们也讲“马克思主义”原则，但却安稳地将自己置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之中，希望能在此范围内使其对社会和政治进步的要求得到满足。因此，本世纪初，在俄国还有必要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和历史进步性的时候，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左派的任务却恰恰相反：他们给予首要地位的观念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必然崩溃。罗莎·卢森堡的著作正是要完成后一项理论任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同意卢森堡的独特的积累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只有借助所谓的“第三者”，即通过与非资本主义环境的交换^①，资本积累才能得到说明，同时我们也不认为她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批评是正确的。相反，令人遗憾的是，卢森堡只能在基本上错误地批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极端形式上捍卫崩溃的概念。不过，在这里再来对这一批评进行重新考察已是不必要的卖弄了：它的错误长期以来就已被公认，它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卢森堡在扩大再生产的分析中，不自觉地还继续从简单再生产的前提出发。我们认为更重要、更有教益的是考察一下导致她犯此错误的原因。我们认为亨利克·格罗斯曼的下述评论似乎不无道理，他写道：“罗莎·卢森堡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于：她自觉地抵制和反对了新和谐主义们歪曲的企图，坚持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并力图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绝对经济界限，来支持这一基本思想。”但是，她却不是“在马克思的整个体系特别是在其资本积累理论的上下联系当中来考察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而是不自觉地受到她想予以反对的那些东西的影响，就是说，她也相信马克思的图式事实上承认了积累‘在反复循环过程中是无限地——正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她认为“无限积累的可能性实际上产生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杜冈、希法亭和后来的奥托·鲍威尔等都是正确地该图式中推导出了这种观点，于是她就摒弃了该图式，以求拯救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形成的崩溃概念”（Grossmann, 1967: 20、280-282）。

在我们看来，格罗斯曼已较深刻地解释了卢森堡的错误。然而对此要补充的是，卢森堡对再生产图式的错误理解，看来还是由于她对马克思著作的方法论没有足够的理解。卢卡奇曾指出，卢森堡是“天才的辩证法家”^②（Lukacs, 1971: 182），这当然是对的，正因如此，研究她的著作可以获得极大的理论上的满足。尽管如此，她却显

① 当然，感谢马克思在对积累过程的抽象分析中没有考虑所谓“第三者”以及其他各种对资本主义来说一般是外在的因素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卢森堡的上述批评是没有道理的。然而，这也不是像许多卢森堡的反对者所十分错误地设想的那样，在以后的分析阶段上这意味着“第三者”也必然总是处于考察范围之外。相反，不考虑这些因素，实际的资本积累过程就很难理解。

② 参阅 L. 巴索的有趣论文《罗莎·卢森堡：辩证方法》（Basso, 1966）。

然低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所谓“黑格尔遗产”^①，并因此而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著作的真实结构。我们已经指出她混淆了个别资本与社会总资本，以及更为重要的“资本一般”和“现实资本”^②，这里不必赘述。我们还知道，她错误地将社会总资本与具体地、历史地存在着的资本混为一谈。在她看来，马克思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仅在研究个别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过程时才是有用的，一旦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特别是一旦涉及社会总资本的积累问题，这一概念就全然没有意义了。

换句话说，罗莎·卢森堡也误解了马克思著作中纯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所起的作用。她不懂得，这是一个启发性的工具，以便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而不受“任何伴随情况的干扰”^③（从这个观点来看，关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历史可能性的无休止争论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这个程序的方法论意图是明显的。如果即使在最严格的假定之下，即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模式之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的积累都是（在一定程度内）可能的，那么在理论上就无须去求助于诸如外贸、第三者的存在或国家干预之类的外部因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模式完全经受得起考验。而由于罗莎·卢森堡忽略了这一事实，她也就没能认识到《资本论》第二卷中再生产分析的结果只具有暂时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们需要以后面的更加具体的分析阶段进行补充。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罗莎·卢森堡的方法论错误出现的同时，她却很接近于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图式背后的方法论假定。她写道：“马克思的积累图式所假定的前提表明的只是积累运动的历史趋势和其最终的理论结果。积累过程到处力求以简单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取代简单商品经济，在所有国家和所有生产部门中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排它的、普遍的统治。”（Luxemburg, 1950: 417）

在罗莎·卢森堡的《反批判》中，她又写道：“马克思本人绝没有梦想他自己的数

① 很可能是由于一时的情绪，由于对她的批评者们的冒牌正统感到恼怒，她在1917年3月8日于狱中写给她的朋友台芬巴赫的信中说道：“这（即表达的简洁性）一般说来合我的口味，正像在艺术和科学中那样，它只尊重那些简单的、平和的和宽宏大量的东西，它说明了，例如，具有黑格尔式烦琐装饰的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现在使我感到厌烦（从党的观点来看，这该被判处五年监禁，剥夺十年权利）。”（Luxemburg, 1950: 85）然而，这个评论也确实表明卢森堡有时忽视了在马克思的“黑格尔风格”背后隐藏的辩证内容。

② Roman Rosdolsky, 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Pluto Press Limited, p. 183.

③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因此，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可以假定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接近这个情况；因为这是过程的基本方向……}，整个商品世界，物质生产即物质财富生产的一切领域，都（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假定表示上述过程的极限，并且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情况的正确表述。按照这个假定，一切从事商品生产的工人都是雇佣工人，而生产资料在所有物质生产领域中，都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马克思，1974c: 442）

学模型当作某种证明，证明一个仅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社会事实上是可能的。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内部机制，确立了作为这一过程的基础的某些经济规律。他大致是这样开头的：如果发生了总资本即整个资本家阶级的积累，则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就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当精确的数量关系。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和同时发生的资本进一步的积累——这是全部目的所在——只有在上述关系得到保持的情况下，从而在两大生产部类得以继续协调运行的情况下，才能无障碍地进行下去。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数字例子，即一个由假设的数字构成的模型，以便清楚而精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用它来表明，如果积累进行下去，那么模型的个别项目（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也必须以某种方式相互适应。”（Luxemburg, 1972: 68-69）

但如果这是正确的，如果马克思的模型仅仅是一个说明在扩大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纯粹形态下平衡条件的工具，那么罗莎·卢森堡关于它表现了一种“内容贫乏的抽象”的观点，就是不能成立的了，这种观点不过证明了她对马克思再生图式的批评在方法论上也是缺乏基础的。

2. 再生产图式与技术进步

然而我们不想仅仅讨论卢森堡批评中存在的缺陷：这一批判也有它的积极方面，这些积极方面的大部分内容迄今还尚未被贬低她的人所提到。

这些积极的方面指的是：她指出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即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并没有涉及所有那些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方式中的变化，即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以及积累率的提高。而一旦引进这些变化，平衡的条件就要受到干扰，也就不再能使用公式 $c \text{ II} + \beta_c \text{ II} = v \text{ I} + \alpha \text{ I} + \beta_v \text{ I}$ 了。

我们来看一下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再生产图式为基础的数字例子，该图式说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text{I} \quad 840c + 420v + 210\alpha + 140\beta_c + 70\beta_v$$

$$\text{II} \quad 600c + 300v + 150\alpha + 100\beta_c + 50\beta_v$$

与此相应的一般平衡公式是：

$$600c \text{ II} + 100\beta_c \text{ II} = 420v \text{ I} + 210\alpha \text{ I} + 70\beta_v \text{ I}$$

而一旦我们将每一部类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由 2 : 1 提高到 3 : 1，结果就变成：

$$\text{I} \quad 840c + 420v + 210\alpha + 157.5\beta_c + 52.5\beta_v$$

$$\text{II} \quad 600c + 300v + 150\alpha + 112.5\beta_c + 37.5\beta_v$$

在此情况下，第II部类生产的商品便出现了剩余：没有一个余项，它就不再能将自己的

$600 + 1125\beta_c = 712.5$ 价值单位与第I部类的 $420v + 210\alpha + 52.5\beta_v = 682.5$ 单位相交换,而是有了数目达30单位的无法处置的商品剩余。这与下述事实相对应: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时,所需要的工人减少,从而社会消费的扩大便不足以吸收第II部类的全部商品产品。

若剩余价值提高,或者新创造的剩余价值中用于积累的份额大于以前的生产时期,也必然会发生类似的干扰。在这些情况下,由技术进步造成的两部类交换关系的不合比例,就必定使它们以前的比例性遭到破坏,这时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再像图示中所设想的那样平稳地进展了。

于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考察这伴随积累的前进所发生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变化,……马克思图式的基本关系就不可能不完全受到破坏。”(Luxemburg, 1963: 339)她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对的。但是,由再生产图式的这种“失效”(如她所认为的),并不能得出积累完全“不可能”的结论,而只能认为,生产力任何社会规模的革命,必须破坏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给定平衡状态,并通过所有各种危机和紊乱导致一种新的暂时的平衡。因此,罗莎·卢森堡的批评不过是对马克思图式有效范围的一种必要的限制——而这些图式却是有意地限于考察在不变的生产条件下扩大再生产的平衡关系,从而也必然不去涉及能够改变这些生产条件的各种因素。但如果人们仍想引入由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的生产方式的种种变化,那不过是将证明正常的再生产过程的各种假定条件,如何“程度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 1972a: 568)。而这是不属于《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任务的。

然而这是否就低估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分析的重要意义呢?完全不是。很清楚,马克思在纯粹资本主义平衡条件下构造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并没有被认为,也不能够被认为就是对具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真实反映。首先,这一模式中不存在支配着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其次,它也没有涉及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不可分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冲突。因此,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发展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只能在不断发生的困难和紊乱当中才能实现。自然,这种平衡必须至少在短时期内实现,否则资本主义制度就根本不能运行。而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就绝不仅仅是一种抽象,而且是经济现实的一部分的反映,尽管这些图式所假定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性仅具有暂时的性质,“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马克思, 1972c: 286)。

3. 对图式的新和谐主义的应用

构成马克思图式基础的扩大再生产平衡公式仅适用于在不变的生产条件下的积累。这个事实导致一些作者进行了辛勤的数学工作,以证明这个公式的“失效”不是来自公式本身,而是由于马克思加于这些图式的假定过于严格,因此,只要对这些假定做

设定的修正,就可以构造出一个扩大再生产的图式,该图式即使考虑到技术进步,也会使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呈现永久的平衡。潜藏在所有这些尝试背后的是一种愿望——尽管它最初的提议者并没有总是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想将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描绘成一种自动和永恒的过程,它不会遇到任何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所产生的障碍,因而不会导致这一生产方式经济上的崩溃。

这种尝试的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奥托·鲍威尔在批评罗莎·卢森堡时所提出的再生产图式(Bauer, 1913),该图式的目的就是证明即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受干扰的积累进展也是可能的。为此,鲍威尔(就像在他之前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样)认为必须放弃马克思图式的一个基本假定,即假定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相互交换它们各自产品的关系。鲍威尔的做法是: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技术变化,从而导致第Ⅱ部类的商品出现一个无法处置的余额的情况下,让第Ⅱ部类每年将一笔相当于这个余额价值的货币“投资”到第Ⅰ部类,于是第Ⅰ部类就扩大其生产,并在第二年购买第Ⅱ部类实际的商品余额。这样,两部类要交换的产品价值就不会产生差异,资本积累的永恒运动不存在停顿的威胁,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都可以实现增长和积累。

这就是鲍威尔方法的要点。很清楚,他的数字例证仅仅在表面上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他未来也可以用下述方式来说明他所要论证的东西:一个工业联合企业建立了一个附属的工农业康采恩,以便给该联合企业的工人和资本家们提供生活必需品。该附属工厂在整个综合体的账目中可以算作“第Ⅱ部类”。该附属厂有规则地将自己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资”于主工厂,并将自己生产的消费品与来自主工厂的机器相“交换”。然而,这样的“投资”和“交换”具有纯粹虚构的性质,很难看出这种计算方式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实际再生产过程能有什么帮助。^①

那么,鲍威尔的再生产图式是否比马克思的图式更为“现实”呢?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一特殊部类生产的剩余的某些部分,是否就真的会不断转移投入其他生产部门呢?我们是否就该因此将鲍威尔的分析程序看成对马克思程序的重大改进呢?

这显然正是波兰政治经济学家奥托·兰格和J. 考瓦里克的观点。考瓦里克说道:“关于某一部类的积累向另一部类转移的问题,历史毫无意义地证明奥托·鲍威尔是正确的,因为在经济实践中,资本是在物质形态和货币形态上进行转移的。”因此,“社会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既可以用作生产资料,又可以用于个人消费的目的”,而这个事实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实,在这些国家中(考瓦里克此处援引了兰格)“积

^① 读者可以记起卢森堡对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批评,她认为在马克思图式中“第Ⅱ部类的积累完全是由第Ⅰ部类的积累规定和决定的”。这种批评对马克思并不适用,但对鲍威尔却是完全合适的,在他的图式中,第Ⅱ部类显得仅仅是第Ⅰ部类的附加物,仅仅为第Ⅰ部类的不断扩大服务。

累最初发生在第Ⅱ部类，积累的主要部分却投入第Ⅰ部类”（Kowalik，1963：208）。

在此我们可以无视考瓦里克天真的经验主义看法，他似乎是相信纯理论问题——可以通过查询“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或者任何一种实践）来加以解决。对其论点本身我们可以说的是：就资本的物质形式交换而言，考瓦里克显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既可以用作生产资料，又可以用作消费资料的产品，从一开始就被马克思的图式排除了。《资本论》第二卷中就这个问题说道：“如果第Ⅱ部类的产品有一部分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第Ⅰ部类，那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这部分产品就会和第Ⅰ部类提供的一部分生产资料互相抵消，如果我们愿意对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进行纯粹的、不受干扰的考察，那么应该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部分从双方都扣除。”（马克思，1972a：589-590）

可见，资本物质形态的变换并不能使我们克服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困难。而构成鲍威尔方法——无论这种方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资本家们的日常实践——基础的资本货币形态的变换，也同样很少有什么补益。因为这种变换从远古就有，与技术变换引起的那些变化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即使扩大再生产公式看上去无法成立，也就是说，即使问题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造成的实现的困难问题，也没有任何理由引入这种变换。马克思之所以不是求助于奥托·鲍威尔所建议的资本变换方式，而是制定了具有两大部类之间如此复杂的数量关系的各种图式，就是因为他想利用这些图式表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律背反，在社会层次上是如何能够被解决并且是如何被解决的。而要表明这些，就必须将生产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各产业都视为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生产部门，它们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各自所需的产品，并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形式上和内容上的社会变换。

这就足以说明奥托·鲍威尔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了。此处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够用他的方法来证明他所想要证明的东西，即资本无限积累的可能性。^①这一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那就是如果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假定下构造扩大再生产的图式，那么或早或迟第Ⅰ部类即生产资料的生产就必定会达到

^① 当然，鲍威尔否认他的图式有这样的目的。他写道：“这一论述不能看成为资本主义辩护，因为尽管辩护士们想证明积累是有限制的——消费者的能力自动地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增长，但我们却相反地揭示了积累的界限。”（Bauer，1913：887）然而，如果寻找一下这一“积累的界限”，就会发现他所说的不过是“积累自我洞察的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他写道：“一国生产资本的增长本身总是受到可利用的劳动人口的增长的限制。因为可变资本绝不可能增长得比人口更快，而不变资本虽然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但快多少却要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决定。”（Bauer，1913：871-872）可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如果在资本的积累只会遇到“可利用的劳动人口”的限制，而这种劳动人口在产业同期中又会经历暂时的繁荣阶段，那么这种积累就能够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鲍威尔对于其理论的辩护性的否认，也就不过只是一种虔诚的希望。

完全不现实的和毫无意义的过度膨胀。奥托·鲍威尔做的正是这个：为了表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他让社会的可变资本每年增长 5%，而让不变资本每年增长 10%。而这种增长率的差别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他的图式中，新积累的资本有机构成要比过去投资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得多（此外，由于鲍威尔假定剩余价值率是不变的，他就必须将剩余价值不断增大的部分用于积累）。

下面就是鲍威尔开头使用的图式。为明白起见，我们用布哈林的符号来表示。

	c		v		s		α		$\beta_c \beta_v$
I	120000	+	50000	+	37500	+	10000	+	2500 = 220000
II	80000	+	50000	+	37500	+	10000	+	2500 = 180000
	200000	+	100000	+	75000	+	20000	+	5000 = 400000

在此图式中，总平衡公式能够成立，因为第 II 部类的 $80000c + 10000\beta_c = 90000$ 价值单位，能够与来自第 I 部类的 $50000v + 37500\alpha + 2500\beta_v = 90000$ 价值单位相交换。

但是，若资本家们想按照上面显示的比例将第一年获得的剩余价值投资到产生这些剩余价值的同样的部类中去，他们就会遇到麻烦，因为这样第二年的各年产品价值便如下：

	c		v		s		α		$\beta_c \beta_v$
I	130000	+	52500	+	39375	+	10500	+	2625 = 235000
II	90000	+	52500	+	39375	+	10500	+	2625 = 195000
	220000	+	105000	+	78750	+	21000	+	5250 = 430000

然而在这里， $90000c + 10500\beta_c$ 等于 100500 价值单位，而第 I 部类仅仅有 $52500v + 39375\alpha + 2625\beta_v = 94500$ 价值单位需要转手。这样，第 II 部类就将有一批无法处置的商品剩余——这种剩余将会逐年增大，并最终将导致产品处理的危机。

然而，这在鲍威尔的图式中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让第 II 部类的资本家们将自己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资于第 I 部类，而不再按照上面图表中的生产过程进行下去。鲍威尔说，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或者通过创办新的工厂生产生产资料，或者通过购买原有工厂的股份。事实上，根据鲍威尔的计算，第 II 部类的资本转移到第 I 部类之后，第二年的生产过程必定是按照下面的价值组合进行的：

	c		v		s		α		$\beta_c \beta_v$
I	134666	+	53667	+	39740	+	11244	+	2683 = 242000
II	85334	+	51333	+	38010	+	10756	+	2567 = 188000
	220000	+	105000	+	77750	+	22000	+	5250 = 430000

若通过资本的转移建立起以上的数量关系，那么总平衡公式便可以再一次得到应用，因为 $85334c_{II} + 10756\beta_{II} = 96090$ ，同时 $53667v_I + 39740\alpha_I + 2683\beta_I = 96090$ 。而由于鲍威尔从这一点向下都允许第 II 部类的资本家们每年将自己多余的剩余价值投入第 I 部类，乍看起来这个数字例子似乎真是能够无限地推算下去的。

然而在现实中，这不过就是杜冈所说的“旋转木马”，即为了生产机器而生产机器。不难预期，在鲍威尔的图式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机器迅速地增长，而消费品的增长得很慢。众所周知，奥托·鲍威尔的图式仅仅持续了 4 年，可是，亨里克·格罗斯曼却不厌其烦地将此图式扩大到 35 年。在第 20 年，结果是两个部类总产品的价值组合如下：

$$1222252c + 252691v + 117832\alpha + 122225\beta_c + 12634\beta_v = 1727634$$

这些数字表明，社会总产品增长到了 1727634，而其中仅仅有 383157 是用于人类消费的，其他的 1322277 则必然都作为不变资本重新投入生产！所有这些，仅仅是为了确保资本家们的商品处置不受干扰，为了使鲍威尔图式运行的过程没有摩擦！

鲍威尔图式必然导致的这种没有社会消费相应增长的生产资料生产的畸形扩大，肯定是与马克思理论的精神不相容的。马克思曾指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马克思，1972c：341）

将这段话与鲍威尔的图式相比较，便足以看到该图式事实上在多大的程度上就相当于与杜冈的“旋转木马”一样的东西。^①

人们自然会反驳说，鲍威尔生产图式中生产资料工业以极快的速度超过消费资料工业，只是由他们假定的第 I 部类 10%、第 II 部类 5% 的不现实的增长率造成的。但是，如果非要构造一个反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尽管如此却又表明资本积累是一个没有摩擦的过程的图式，那么就必须让第 I 部类增长得比第 II 部类快，因此，即使两部类增长率的差距比鲍威尔所假定的小，最终也会得到同样荒谬的结论，尽管所需的时间较长。

事情还不仅如此。从鲍威尔图式所计算的几年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了利润率的递减。在鲍威尔的例子中，利润率在 4 年中已从 33.3% 降到 30.3% $[s : (c + v)]$ 。这样，格罗斯曼就很容易从数学上证明：以鲍威尔的假定为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将必然在第 35 年崩溃，因为剩余价值与所用资本的比率那时将下

① 正如我们从考瓦里克的论文中所发现的，鲍威尔的那篇包含上述图式的文章已在卢森堡著作的苏联版中多次重印——显然是作为一种“解毒药”。例如，在 1934 年版的第 339 ~ 358 页。

降到这样的程度，致使资本家不会再进行积累了！

在此，我们应该记住，鲍威尔的例子并未考虑被认为与有机构成提高相伴随的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但是，利润率的下降能被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抵消吗？从我们对《草稿》的研究所得知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马克思在那里提及的事实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随着技术进步不仅劳动目的有酬部分缩短（它必然缩短），而且总的活劳动与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的比例也会下降。^① 因此，在鲍威尔的图式中，最终必然还是出现利润率的递减，并与此一起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即使他考虑到了剩余价值率的不断提高，结果也是一样。

这在事实上表明了，如果想用一个把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各种因素尽可能多地考虑进去的模型来代替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便马上遇到由资本本身的性质对资本足以生产设置的障碍。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亨利克·格罗斯曼能利用鲍威尔的图式来证明资本主义内在有崩溃的趋势（Grossmann, 1929）。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奥托·鲍威尔再生产图式的特性表示为它无意地对“崩溃理论”做出的贡献。

结 论

我们的考察得出的是怎样的结论呢？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将前面的论述做简短的总结了。

从关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显然是：这些图式绝不应被视为仅仅是一种“半成品”，视为马克思由于时间不够而不能“完成”的理论上的试验。相反，一切证据都表明，马克思本人从未打算突破像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出现的那些再生产图式，因此，期望得到比它们实际上能够完成的更多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多次强调指出，马克思的图式所探讨的，仅仅是不变资本的生产条件下扩大再生产实现均衡的假设条件，因而，尽管它们是抽象的，但仍表现了“经济现实的一部分”。当然，在现实资本主义世界中，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的积累，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而完成的（马克思，1972b：689 - 690），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还有不时发生的相对剩余劳动范围的扩大，即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但是不应忘记，生产方式的这种不断变化，“也经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被“积

^① Roman Rosdolsky, 1977,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Pluto Press Limited, p. 409.

累表现为生产……单纯扩大的那种间歇”所中断^①（马克思，1972b：492-493、690）。

对于这样的“间歇”，《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图式是有效的，表明了通过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相互调整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从而也就表明了剩余价值实现的可能性。然而，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没有必要将技术进步——它表现为资本构成的提高——的因素引入《资本论》第二卷的分析的情况下得出。

那么，马克思是否能够进一步在生产方式不断变化的假定下详尽阐述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呢？我想我们已经表明这是不可能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奥托·鲍威尔的不成功的求解尝试恰恰证明了这一观点。因为，一旦试图把技术进步引入再生产图式，再生产平衡的条件就变成了干扰平衡的条件，而任何想要绕过这一障碍的图式，都必然会变成一种毫无经济意义的“数学练习”。这个结论是不容否认的。为此我们要感谢罗莎·卢森堡。

我们的考察导致的第二个重要结果在于发现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仅代表着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分析的一个阶段（尽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因而它还需要由马克思的危机和崩溃理论来加以补充。由此可知，只有联系马克思理论的全部内容，才能理解这些图式（这里再次证明，整体的概念在方法论上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对再生产平衡的干扰，似乎首先仅仅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程必然一再地导致危机，并因而导致原有的暂时的平衡被一种新的也是暂时的平衡代替。

而在现实中，这种干扰所证明的东西不能更多，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矛盾，恰恰通过这些干扰以及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来，这些干扰加快了利润率的下降，而这些矛盾则会不断在更高的水平上再生产出来，直到资本主义的螺旋式发展最终达到它的尽头。在这方面，关于如何解释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表面上学术型的争论，必须认为是积极的和富于理论成果的，不管这当中出现了哪些错误和不正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 [1] Basso, L. Rosa Luxemburg: The Dialectical Method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Journal, November 1966.
- [2] Bauer,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in Die Neue Zeit, 1913, No. 23.
- [3] Bukharin, N.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Allen Lane the Penguin

^① 《剩余价值理论》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考察再生产时，首先假定生产方式不变，而在生产扩大的时候，生产方式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也是保持不变的。这里生产出来的商品量所以增加，是由于使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由于更有效地使用了资本。”（马克思，1974b：596）

- Press, 1972.
- [4] Bulgakov, S. On the Question of Markets in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Russian), Moscow, 1897.
- [5] Grossmann, H. Die Änderung des ursprünglichen Aufbauplans DesMarxschen Kapital und ihre Ursachen' in Archiv für Die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Grunbergs Archiv), Vol. 1 4, 1929.
- [6] Grossmann, DasAkkumulations –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s, Frankfurt, 1967.
- [7] Hilferding, R. Das Finanzkapital, Frankfurt, 1968.
- [8] Kautsky, K. Karl Marx's Ökonomische Lehren, Stuttgart, 1887.
- [9] Kautsky, K. Die materialistisch_e Geschichtsauffassung, Berlin, 1927.
- [10] Kowalik, T. Rosa Luxemburg's Economic Theory (in Polish, mimeographed) Warsaw, 1963.
- [11] Lukacs, G.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1971.
- [12] Luxemburg, R.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 [13] Luxemburg, R. Briefe an Freunde, Hamburg, 1950.
- [14] Luxemburg, R. The Anti – Critique in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Capital, London, Allen Lane, 1972.
- [15] Marx K. and Engels, Perepiska. (Marx and Engels'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ian Political Figures) (in Russian), Moscow, 1947.
- [16] Sismondi, J. C. L. Political Economy, Clifton NJ, Kelley, 1970.
- [17] Tugan – Baranovsky, M. 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Jena, 1901.
- [18] Tugan – Baranovsky,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Leipzig, 1905.
- [19] W. Alexander, Kampf um Marx, 1932.
- [20]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
- [21] 列宁:《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
- [22]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
- [23] 列宁:《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5。
- [24]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
- [25]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55。
- [26]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
-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2版。
-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
-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 [31]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

- [32]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4。
- [33]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4。
- [34]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
- [3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

两种 MELT 及其决定：对莫斯里和 “新解释”的批判性评论*

孟捷**

袁辉*** 译

摘要 在发表于 2011 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的一篇文章中，莫斯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内，讨论了不可兑换信用货币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在本篇评论中，笔者赞同莫斯里的某些重要观点，同时也批评了他的某些见解。这些批评一方面关注由“新解释”定义的 MELT（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中所谓的循环论证，另一方面考察莫斯里的 MELT 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在莫斯里定义的不可兑换信用货币的 MELT 中，忽略了内嵌于置盐信雄－弗利－科茨工作的理论传统，后者从不同侧面指出了资本积累或新投资的动机和实际规模在决定不可兑换信用货币价值时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MELT） “新解释” 货币价值 资本积累

笔者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莫斯里（Moseley, 2011）发表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上的关于劳动时间货币表现（Monetary Expression of Labor Time, 以下简称 MELT）的决定的文章。尽管笔者赞同莫斯利的某些重要观点，但是仍然有许多关键问题需要澄清和深入讨论。第一个问题关注由“新解释”（the New Interpretation）定义的 MELT 中所谓的循环论证；第二个问题涉及莫斯里的劳动时间货币表现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在不可兑换信用货币的情况下，莫斯里对 MELT 的界定忽略了包含于置盐信雄－弗利－科茨（Okishio－Foley－Kotz, 简称 F-O-K）工作中的理论传统。

考虑与“新解释”MELT 批判性评论有关的第一个问题。“新解释”定义的 MELT 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某一给定时期内存在的工作日数量实际上被假定正好等同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下文的方程（2）是无条件成立的。

α^* 代表与简单平均劳动相对应的劳动的平均复杂程度， α_i 为生产商品 i 所需的劳动复杂程度， $\theta_i = \frac{\alpha_i}{\alpha^*}$ 。 L_i 表示给定时间内生产商品 i 的活劳动，则 $\frac{\alpha_i}{\alpha^*} L_i$ 为生产商品 i 的社

* 译自 Jie Meng, “Two Kinds of MELT and Their Determinations: Critical Notes on Moseley and the New Interpret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June 2015, vol. 47 (2), pp. 309–316.

** 孟捷，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 袁辉，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

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 $\sum \theta_i L_i = \sum \frac{\alpha_i}{\alpha^*} L_i = \sum L_i$ 始终成立，我们有：

$$\alpha^* = \frac{\sum \alpha_i L_i}{\sum L_i} \quad (1)$$

假定方程（1）等于 1，则：

$$\sum \alpha_i L_i = \sum L_i \quad (2)$$

方程（2）意味着经济体中生产的全部自然时间〔方程（2）右边〕是创造价值的经济时间〔方程（2）左边〕的客观基础，前者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并按照特殊的 α_i 转换成后者。方程（1）的困难并不在于确定 α^* ，根据假设其等于 1，而在于确定 α_i 。

如果我们修改 α^* 等于 1 的假设，则方程（2）变为一个不等式，即：

$$\sum \alpha_i L_i < \sum L_i \quad (3)$$

不等式（3）意味着工作日的一部分不能实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方程（2）的假设隐含在“新解释”中，并至少可以追溯至曼德尔（Mandel）在为《资本论》所写的导言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正因为价值和价值生产最终指的是现有从事生产的社会总劳动力的分配和再分配，所以宏观经济总量是一个基本的经济现实，基本的“生活实际”。如果 500 万个工人在一年内从事物质生产 2000 小时，那么全部价值产品就是 100 亿小时，而不管每个个别商品的社会承认的价值是等于、大于或者小于在它的生产中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数。因此，如果一定的商品的价值小于在它的生产中实际消耗的劳动，那么至少必须有另一个商品，它的价值大于其中实际体现的劳动量。对劳动耗费的社会承认与实际劳动耗费之间的差异，只是对个别商品来说才存在，而对商品总量来说是不存在的。（Mandel, 1992: 39）^①

曼德尔的观点，特别是“如果一定的商品的价值小于在它的生产中实际消耗的劳动，那么至少必须有另一个商品，它的价值大于其中实际体现的劳动量”，从理论上来看与他在讨论竞争中的价值转形问题时的看法相关。对曼德尔来说，这一情形不仅发生在不同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产业内部也是如此。他写道：

^① 中文参见孟德尔《资本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 102 ~ 103 页。

马克思指出, 低于平均劳动生产率企业的所得小于平均利润, 归根结底与其浪费社会劳动相对应, 所有这些现象意味着由它们的工人实际创造的部分价值或剩余价值被市场上更有效率的企业占有了。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创造了以包含其中的劳动小时数表示的更少的价值或剩余价值。(Mandel, 1999: 101)

撇开与上述引文相关的现有争论不谈^①, 某一企业中被浪费的部分劳动能够转移到同一部门内的另一企业的观点需要预先假定“社会需要与生产完全一致”(Mandel, 1976: 101)。如果我们转向更为具体层面的分析, 如 MELT, 这一假设是很难接受的。笔者在早期著作 (Meng, 2010, 2013) 中指出, 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着指向不平衡的必然趋势, 如方程 (3) 所示, 它源自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因此, “新解释”的 MELT 仅在下述假设条件下成立, 即抽象掉所有的生产与交换过程——通过它们经济体中给定的工作日数量表现为价值, 同时也抽象掉相对狭义的 (由金融体系与货币政策所决定) 货币价值决定过程 (Fine et al., 2004)。总之, “新解释”的 MELT 最多可以理解为内在不可观察联系的外部可观察效应的表现。

在 2005 年的一篇文章中, 弗利讨论了相似的问题, 并试图将其与斯拉法主义者相区别。弗利指出,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中 (如斯拉法主义者使用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数据进行的研究), 劳动被看成测量的劳动时间, 未调整雇员的劳动小时数。这一做法在应用研究中是可接受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它扭曲了马克思关于货币和抽象社会劳动之间关系的完整论述”。(Foley, 2005: 37) 他随后讨论了马克思对英国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布雷和格雷的批评, 后者赞成用某种形式的劳动券取代货币。在马克思看来, 只有生产中的劳动立即被社会承认时, 劳动券才是可行的。弗利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 并正确地总结如下: “没有脱离由货币媒介的全部商品交换过程来事先衡量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社会必要劳动的一般方法。” (Foley, 2005: 38)

尽管如此, 在同一文章中, 弗利坚持能够找到某种事后估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验方法。为此, 他进一步讨论了衡量劳动时间的某些方法论上的问题, 比如, 在加总时使用技能和工资作为合适的权重等 (Foley, 2005: 40-41)。尽管这些尝试很有意义, 但是弗利回避了最根本的要点, 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单由生产过程决定, 交换过程同样重要。区分由于实现问题多少劳动时间没有被承认是困难的, 如果并非不可能的话, 而弗利没有提供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

在“新解释”那里, 同时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 MELT 定义。第一种是如马克思

① 伊藤诚写道: “我们无须限定拥有更好生产条件的个别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基础是同一产业内剥削的抽象劳动……这一超额利润也有可能源自其他产业剥削的抽象劳动的转移, 就像平均利润的一部分。” 参见 Itoh, M., *The basic theory of 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88), pp. 234-235。

使用的理论概念，即作为“工作日新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Marx, 1990: 435) 第二种则是纯粹的经验比率，即两个可计量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它被解释成前一个理论概念的可观察效应。“新解释”真正主张的是后面的这个经验性定义。让我们通过公式来看看这两种定义的区别。马克思的理论定义可以写为：

$$MELT = \frac{R}{\sum \alpha_i L_i}$$

“新解释”对 MELT 的定义则为

$$MELT = \frac{R}{L} = \frac{\sum \alpha_i L_i}{L} \cdot \frac{R}{\sum \alpha_i L_i}$$

这里的 R 是以货币度量的增加值， L 是一个社会中可度量的活劳动时间量。通过假定 $L = \sum \alpha_i L_i$ ，新解释得以将其定义等同于马克思的理论定义，即有

$$MELT = \frac{R}{L} = \frac{R}{\sum \alpha_i L_i}$$

即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此时等于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新解释”暗中采纳的假定不成立，其定义就将不同于马克思的定义，即被还原为经验定义。

马克思对 MELT 的理论定义包含特定的因果关系。根据《资本论》第 1 卷的假定，价值或抽象劳动的货币表现是 1 单位商品货币价值的倒数。因此，给定黄金的价值，因果关系则表现为 MELT 决定抽象劳动的货币价值。然而，在“新解释”的定义中，也就是 $MELT = \frac{R}{L}$ ， R 表示货币增加值， L 代表可度量的活劳动时间，这里反映了不同的因果关系，即 R 决定 MELT。由于在“新解释”中，MELT 被用来计算其他货币量的劳动价值，如劳动力价值（利用 MELT 把一个经济体中的工资总量转换成劳动力价值），莫斯里（Moseley, 2011: 97–98）批评他们的定义是“循环论证”，不能应用于 MELT 的理论决定。

莫斯里的观点含蓄地指出了“新解释”经验比率与马克思理论概念的区别。尽管如此，莫斯里并没有有意识地解释这一区别。在笔者看来，“新解释”比率中的分子和分母可以看成光谱的两端——使劳动表现为价值的包含生产和交换的复杂过程。“新解释”试图找到劳动和价值之间关系的简单近似值，但是却将整个中间过程搁置一边。相应的，在活劳动与货币增加值之间没有确切的因果关系。这一比率仅仅向我们提供了观察黑箱投入（活劳动）与产出（增加值）的便利，而不能准确知道黑箱内部的情形。因此，莫斯里的指责可能并不十分恰当。

尽管我们对“新解释”做出上述批判性言论，笔者依旧认为 *MELT* 的经验比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只要“新解释”能够恰当地解决衡量抽象劳动的计量难题。笔者对“新解释”的态度与伊藤诚相近，后者认为新解释的 *MELT* “用途有限，它仅仅是一个方便的辅助性概念……应该始终建立在马克思广义的货币理论基础之上，而不是替代它”（Itoh, 2005: 190），并且“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解释年度国民收入账户时，是一个实用的近似值”。（Itoh, 2005: 183）

现在我们转向第二个问题。在文章中，莫斯里试图将马克思在商品货币情形下的 *MELT* 公式扩展至不可兑换信用货币。^① 他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下述基本方程：

$$MELT = \frac{1}{L_g} \quad (4)$$

$$MELT_p = \left[\frac{1}{L_g} \right] \left[\frac{M_p V}{L} \right] \quad (5)$$

方程（4）对应于商品货币情形。 L_g 表示生产一单位黄金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SNLT*）。方程（5）适用于不可兑换法定货币或者不可兑换信用货币的情形，其中 M_p 表示投入流通的纸币或信用货币数量， V 货币流通速度， P 以黄金表示的个别价格的总和， L 经济体中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根据莫斯里的观点，给定时期内经济体中存在一定数量的 L ，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存在着由外部因素或内生因素决定的流通中法币或信用货币的确定数量。这两个总量之间的比率决定了代表一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货币量，即 *MELT*（Moseley, 2011: 101）。

问题是，在马克思那里，第一个方程是抽象层面的表现，只有一般商品生产，资本积累并没有考虑在内。马克思本应该在更为具体的表现层面详细解释与资本积累相关的 *MELT* 的具体决定，就像他在《资本论》第3卷定义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样。遗憾的是，《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马克思并没有这样做。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沿着同一思路尝试提出与资本积累相联系的货币理论的新维度。在他们中间，置盐信雄（Okishio, 1988）、弗利（Foley, 1982, 1986）以及科茨（Kotz, 1991）最为重要。他们贡献的共同点是试图引入信用作为资本积累的必要前提，或者认为信用货币的供给是由克服实现与积累矛盾的必然性内生决定的。

三位作者的阐述存在一定区别。弗利使用了更为复杂的资本循环模型，其中所有

^① 萨罗斯（Saros, 2007）尝试提出了一个相似但较缺乏一般性的方法。莫斯里（2011）将萨罗斯与他进行了比较。

变量对应于资本主义企业的会计程序。与之相比，置盐信雄应用了马克思传统的再生产图式，科茨与他类似，这个方法更为简便，结论更为有力。

这里是置盐信雄（1988：7）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图示发展而来的方程， t 为笔者所加：^①

$$(1 - \alpha) S_i^{t-1} + \Delta C_i^t + \Delta V_i^t, i = 1, 2 \quad (6)$$

C 、 V 、 S 分别表示以劳动价值衡量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α 是剩余价值中用于资本家消费的固定比例。方程左边表示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被资本家有意储蓄的部分，右边则表示资本积累，即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这一方程显示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基本矛盾。一方面，资本家不会在产品实现之前进行投资或积累；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不进行积累，或者不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产品就根本无法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被转化为积累与实现的矛盾（Meng：2013）。由这一矛盾就派生出信用之于积累的绝对必要性。只有当资本家们预期未来利润足够高时，他们才会借助信用而不是已实现利润进行投资。正如置盐信雄所言：

由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差距，没有新的需求（ $\Delta V_1 + \Delta C_1 + \Delta V_2 + \Delta C_2$ ），利润将无法完全实现。而新的投资需求无法借助于由其自身实现的利润融资，因此，至少有部分新投资需要通过减少准备金或信用来融资。（Okishio，1988：15）

在置盐的基础上可以回应马克思的下述问题。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资产阶级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量总是大于其投入流通的货币量，因此，更多的货币量从何而来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对马克思而言，这个问题只是货币供给的来源问题，但在置盐的方程里，这个问题可以转换成由信用货币支持的有效需求问题。信用货币是必需的，已实现利润或资本并不足以为积累融资，是新投资或积累帮助实现了利润，而新投资是靠信用货币实现的。

这样一来，在方程（6）的基础上可以写出：

$$m_i^t = \frac{\Delta C_i^t + \Delta V_i^t}{M_i} \quad (7)$$

$$\gamma_i^t = \frac{\Delta C_i^t + \Delta V_i^t}{(1 - \alpha) S_i^{t-1}} \quad (8)$$

其中 m 表示货币的价值，即由一单位货币代表的抽象劳动， M 表示为新投资或积累融

① 科茨（1991）使用了类似的方程，见科茨（Kotz，1991）的方程（10）。

资而产生的货币需求, γ 是剩余价值实现的比率。方程 (6) 表达的是积累的均衡状态, 而实际上这一均衡是经常被扰乱的, 从而 γ 一般不等于 1。在 (7) 和 (8) 两式中, 分子 $\Delta C_i^t + \Delta V_i^t$ 所对应的是实际可实现的剩余价值。

现在让我们回到 MELT 的定义。韩国学者柳东民 (Rieu, 2008) 认为, 新解释的 MELT 可以被分解成两个变量, 价值的货币表现 (MEV) 和劳动时间的价值表现 (VELT)。在笔者看来, MEV 和 VELT 分别对应于方程 (7) 和 (8), 其中方程 (7) 是 MEV 的倒数。尽管如此, 柳东民并没有意识到他对 MELT 的重新定义实际上是得出了一个理论概念, 与“新解释”的经验定义有很大差别。法因等 (2004) 曾批评“新解释”构建其定义的方式, 认为它抽象了通过具体货币制度使价值表现为货币的过程。笔者则认为“新解释”抽象了劳动表现为价值的过程。

在新解释的定义中, 根本的困难是如何确定 γ 。孟捷 (Meng, 2010) 系统考察了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确定性问题。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生产模型。与自然经济中的劳动过程不同, 这种社会生产过程的手段与目的并不直接彼此相连, 它需要交换作为媒介。由再生产图式概括的社会生产过程是人类与自然展开变换的特定形式, 同时包含社会内部劳动的变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不确定性源自生产手段仅仅在事后与目的相联系。马克思价值概念的两个维度, 即生产及其实现, 正是用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行为的不确定性特征的。不确定性解释了为什么至少在事前估计 MELT 是不可能的。

考虑资本积累的影响, 笔者在理论上把 MELT 的界定如下:

$$MELT_i^{t-1} = \gamma_i^t \times \frac{1}{m_i^t} = \frac{\Delta C_i^t + \Delta V_i^t}{(1-\alpha)S_i^{t-1}} \times \frac{M_i^t}{\Delta C_i^t + \Delta V_i^t} = \frac{M_i^t}{(1-\alpha)S_i^{t-1}} \quad (9)$$

这一定义的重要性在于以下几点。

(1) 不像“新解释”所言, MELT 等于货币价值 m 的倒数, 由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 $(1-\alpha)S_i^{t-1}$ 并不需要等于 $\Delta C_i^t + \Delta V_i^t$ 。 $(1-\alpha)S_i^{t-1}$ 与 $\Delta C_i^t + \Delta V_i^t$ 的不相等揭示了并不是一定数量的劳动被表现为货币, 如莫斯里在他的定义中理解的那样, 而是资本家的货币支出实现了生产出来的价值, 并在社会范围内重新配置了劳动。

(2) 由于中介 γ 的存在, “新解释”引入的 MELT 概念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在最后的方程 (9) 中, 中介过程即剩余产品的实现省略了。事实上, 分子 $M_{\Delta c}^t + M_{\Delta v}^t$ 应该与 $\Delta C_i^t + \Delta V_i^t$ 相对应, 而不是 $(1-\alpha)S_i^{t-1}$ 。也就是说, 价值的货币表现概念较之具体劳动的货币表现在理论上更为精准。

(3) 除了剩余价值的货币表现 $\frac{M_{\Delta c}^t + M_{\Delta v}^t}{\Delta C_i^t + \Delta V_i^t}$ 之外, 我们还可以设想另一种货币表现,

即货币总量与相应的 C 、 V 和 S_k 价值量的比率，它们分别表示不变资本的补偿，以及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这两种货币表现很明显是不同的，并且不一定相等。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为新投资融资的货币正好被用来购买新产品，而为补偿不变资本而融资的货币被用来购买老产品，那么这两种货币表现的差别可以解释经常被观察到但是并未很好认识的现象：在技术革命飞速发展的时期，总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价值的货币，其一与旧经济相关，其二与新经济相连。^①

参考文献

- [1] Fine, B., C. Lapavistas, and A. Saad – Filho. 2004. Transform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Why the “New Interpretation” is a wrong turn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6 (1) .
- [2] Foley, D. 2005. Marx’ s theory of money i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F. Moseley, ed.
- [3] Foley. 1986. *Understanding capit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4] Foley. 1982. Realiz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a Marxian model of the circuit of capital.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8: 300 – 319.
- [5] Itoh, M. 1988. *The basic theory of 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 [6] Itoh. 2005. The New Interpretation and the value of money. In F. Moseley, ed.
- [7] Kotz, D. M. 1991. Accumulation, money, and credit in the circuit of capital. *Rethinking Marxism* 4 (2).
- [8] Mandel, E. 1976. *Introduction to Capital vol. 2*. In Marx (1992) .
- [9] Mandel, E. 1999.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10] Marx, K. 1990.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 [11] Marx, K. . 1992. *Capital*, vol. 2.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 [12] Meng, Jie. 2013. Product innovation and capital innovation: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neo – Schumpeterian insights into Marxian economics.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8, ed. by P. Zarembka, Emerald Publishing Company.
- [13] Meng, Jie. 2010.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uncertainty in capitalist economy.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5 (4) .
- [14] Moseley, F. 2011.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onetary expression of labor time” (“MELT”) in the case of non – commodity mone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3 (1) .
- [15] Moseley, F., ed. 2005. *Marx’ 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 London: Palgrave.
- [16] Okishio, N. 1988. On Marx’ s reproduction scheme. *Kobe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34.
- [17] Perez, C. 2002.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e capital*. Cheltenham, U. K: Edward Elgar.

① 参见 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e capital*, Edward Elgar, 2002, pp. 62, 112.

- [18] Rieu, D. M. 2008. Estimating sectoral rates of surplus value: Methodological issues. *Metroeconomica* 59/ (4) .
- [19] Saros, D. 2007. The price – form as a fractional reflection of the aggregate value of commoditi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9 (3) : 407 – 415.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

克里斯蒂安·帕劳**

王兴华 译 任洲鸿 刘 刚 校***

摘 要 本文是帕劳著作中的一部分章节，由 Judith White 从法文原著中摘录翻译，作为著作 *International Firms and Modern Imperialism* 的第三章，文章题目为这一章的题目，故本文没有摘要和关键字。但是由于本文第一次深刻论述了跨国资本和全球化条件下“生产的碎片化”，并把生产的全球化作为一个资本国际循环的新阶段进行研究，文章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学派”的先驱性文献，是生产全球化和产品内分工等研究领域的名篇。在本文中，帕劳提出了资本形式演进的历史顺序：商品资本循环是国际化的第一个循环，主要表现为世界贸易；货币资本循环是第二个循环，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进入海外风险投资；生产性资本循环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表现为“二战”结束后跨国公司大规模的增长。

“产业资本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①

——卡尔·马克思

一 跨国企业

金融资本的出现时间并不局限于 20 世纪，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一同出现

* Christian Palloix,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Circuits of Social Capital,” in Hugo Radice, eds., *International Firms and Modern Imperialism: Selected Readings* (Penguin Books, 1975) pp. 67–92. 原文摘译自帕劳的法文版原文：Christian Palloix, “Les firmes multinationales et le procès d’internationalization,” trans. by Judith White (Maspéro, 1973) pp. 137–163——译者注

** 克里斯蒂安·帕劳 (Christian Palloix)，经济学家，法国亚眠大学（又名皮卡第儒勒-凡尔纳大学）C. R. I. I. S. E. A. 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ECONOMIE ET INSTITUTIONS* 创办人，研究领域涉及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国际化-全球化、工资制度、工业化、阿尔及利亚经济、银行信贷资金分析等。

*** 王兴华，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任洲鸿，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刚，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感谢清华大学孟捷教授、刘沅和孙小雨同学，以及中央党校袁辉博士和四川大学李亚伟博士为译文最后成稿提供的卓有成效的修改意见，谨表谢忱。

① 《资本论》第二卷第 4 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19）本文关于马克思著作原文的引用，均采用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译本的译文，但为保证内容和逻辑的连贯性，具体公式字符与帕劳原文中相同变量的字符保持一致。例如，帕劳原文中将商品表示为“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相同内容的中文译文中用于表示商品的字符“W”，在本文中改为“C”，以便保持上下文的一致性。——译者注

的；跨国公司也是在19世纪进入第一阶段的发展。（19世纪）胜家、国际收割机公司和西屋电器等企业已经开始在沙皇俄国经营（Palloix, 1972; Wilkins, 1970），（20世纪）吉列、奥的斯、派德药厂和福特已经在其母国之外的地区有工厂。然而跨国公司发展的方式有所变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诸如联合利华、潘娜诺亚、壳牌和美孚等企业的发展以原材料和农产品价值上升为基础，而20世纪的企业则非常依赖于被称作“大量”的商品生产。

例如，L. G. Franko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法国汽车产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才以福特经营T型车的方式进入世界市场，尽管事实上在20世纪初的时候，拥有潘哈德和布加迪等品牌的法国汽车工业在技术上已经非常先进。事实上法国的汽车工业是为精英而生产，这是它没有扩张的原因。而相比之下，福特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大量”市场而生产（Franko, 1972）。福特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重要的不是技术^①，而是产品的“适销”质量，福特已经能够使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淘汰的生产线在发展中国家新建项目。菲亚特已经明白，其汽车在美国市场不能满足“适销”质量，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或者不发达经济体中（如南斯拉夫、西班牙）可以。

跨国企业的发展方式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它们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适销”质量^②，它们的商品特点是否适合大众消费。利用附属公司可以占领那些能够为恢复产品的“适销”质量提供类似条件的市场，并且使之完成从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而那些以其他方式实现这种转化的市场则难以进入（Franko, 1971）。

但是通过商品，资本正在扩张。跨国企业的策略（在此情况下是市场策略），代表着一种资本的自行增殖策略，具体策略包含在资本的国际化中。

二 资本的国际化

产业内不同部门的国际化，显著的是钢铁和机械业，强调“推力”因素在跨国企业形成中的重要性。似乎跨国企业的出现仅仅是部门国际化进程的结果。以这种方式看，把握跨国企业策略的某些因素——市场策略或者商业策略是可能的，但是不能把握全部。讨论资本国际化时必须考虑投资于特定产业分支的“资本”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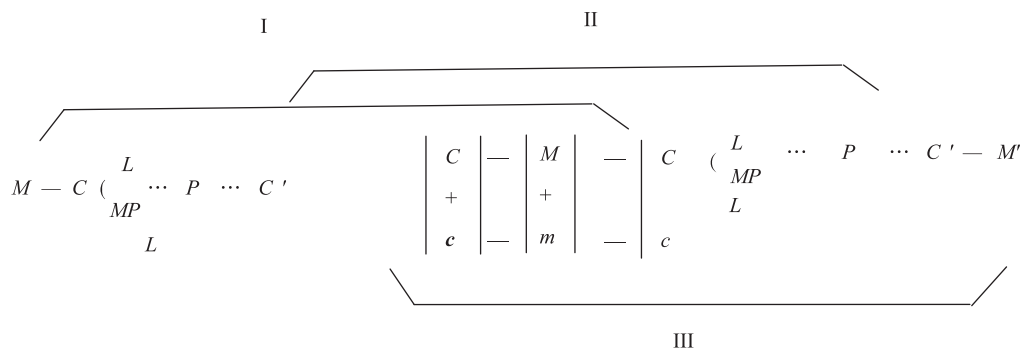
资本的国际化不在于企业的资本股份被不同的国家所持有这一事实，这仅仅是国际化的影响，也不在于资本的国际转移，不管这种转移是狭义上的资本投资（Bertin, 1972a、1972b）还是按Stephen Hymer给出的广义定义（Hymer, 1972: 1）。

① 我不同意L. Karpik（1972a; 1972b）的“大规模技术企业”（great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概念。

② 在某种意义上，这与弗农（R. Vernon）的新产品“国际生命周期”类似。

——资本不同部分的资本扩张策略。这些不同部分之间的分界线跨越国界。同样，在这里，分界线的国际化延伸也不足以定义资本的国际化。

在社会资本循环的扩展公式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 116）^①：



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这些循环的国际延伸是一个新现象。尤其是对于货币资本循环和生产资本循环而言，过去基本处于一个非常有限的区域，通常是在国界以内。只有商品资本循环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运作。

① M = 货币资本; C = 商品; P = 生产过程; c = 商品形式中的剩余价值; m = 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 L = 劳动力; MP = 生产资料; $M' > M$; $C' > C$; $P' > P$ 。

1. 货币资本循环

货币资本循环 ($M—C\cdots P\cdots C'—M'$)，资本自行增殖的循环，从直观上理解就是货币资本以国际投资的形式进行国际扩张。

1960年，美国企业控制的直接投资实际价值达300亿美元。1972年，美国投资的这一价值被评估为超过800亿美元，根据G. Y. Bertin (1972a: 5)，这依然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数据。同一年，非美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总值上升至500亿美元，这也是一个被低估的数字。美国的投资去向主要集中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表1所示。

表1 美国对外投资累计金额

单位：十亿美元

年 份	1960	1965	1970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			
加拿大	11.2	15.2	22.8
欧洲	6.7	14.0	24.5
日本	0.3	0.7	1.5
新西兰与南非	1.2	2.3	4.3
总 计	19.4	32.2	53.1
开发主导型社会经济			
拉美	8.4	10.9	14.7
非洲		1.4	2.6
中东		1.5	1.6
亚太	4.2	1.4	2.5
总 计	12.6	15.2	21.4
其 他		2.0	3.6
全部总额	32.0	49.4	78.1

资料来源：《当代商业纵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71年10月。

美国货币资本的这种扩张需要国际融资。Brooke 和 Remmers (1970) 研究了位于英国的115个外国企业分支机构，其结果清晰地表明本地（指东道国）融资的重要性（见表2），但是由于现金流动本身是在国际范围运转，“本地融资”这一词开始失去意义。J. N. Behrman (1970) 估计美国对外投资中只有25%是通过美国货币的实际出口实现的。

表2 在英国的外国企业分支的融资来源

东道国	美国	欧洲	合计
数量 (个)	90	25	115
国外资金来源			
资本 (%)	4	9	6
借款 (%)	6	20	12
小计 (%)	10	29	18
本地资金来源			
流动资产 (%)	2	2	2
长期借款 (%)	8	6	7
银行信贷 (%)	12	10	12
储备和股份 (%)	68	53	61
小计 (%)	90	71	82
总计 (%)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 Brooke 和 Remmers, 1970。

C. Coux 和 J. F. Landeau 研究表明, 美国在欧洲的投资中通过货币出口进行融资的份额在下降 (见表3)。当然这并不否认货币资本循环日益提高的国际化特征和融资越来越以国际现金流动为基础, 正如美国在欧洲的投资通过欧洲美元市场实现一样 (Michallet, 1972b)。

表3 美国企业在欧洲的融资

单位: %

年 份	1959	1967
利润再投资	15.9	8.9
股份	28.7	28.6
从美国筹集的基金	25.5	16.1
美国之外筹集的基金	29.0	46.6

资料来源: C. Coux 和 J. F. Landeau, 转引自 Mouch (1972: 53)。

初始资本的国际化自行增殖在其资本循环过程中越来越依赖于长期信贷, 而这种信贷的使用也需要国际化。应该立刻注意到, 以货币资本形式的资本扩张区域的国际延展有一个必要前提, 那就是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国际化。现实中, 在货币资本循环起始处的 $M-C$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基本的生产关系, 它被分解为 $M-L$ (购买劳动力) 和 $M-MP$ (购买生产资料)。资本循环区域的国际化, 在这里是指货币资本循环的国际化, 它远远不是资本国际化的核心, 最多只能是体现为 $M-L$ 和 $M-MP$ 形式的 $M-C$ 行为国际化的表现。

2. 生产资本循环

货币资本循环 $M—C\cdots P\cdots C'—M'$ 表述的是资本通过生产过程 P 的自行增殖运作：

“既然它们都代表已经增殖的价值，都代表发挥了资本作用的资本，所以，它们都只是表现生产资本的职能的结果，只有在这种职能中资本价值才能生出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59）

这里也有一个生产资本循环区域的国际化，它的一般形式是：

$$P\cdots C'—M'—C'\cdots P'$$

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自身在越来越国际化的区域内开展，“生产的国际化”一词（Michallet，1972）表明了这个过程的特点。

但是这个词语有一定的歧义：生产过程限定并包含了流通过程。是流通区域（包含在生产过程 $C'—M'—C'$ 中）的国际化，还是生产活动 P 自身的国际化？

$C'—M'—C'$ 的国际化与商品资本循环的国际化有关。生产的国际化实际上表明的是在流通国际化之外生产行为 P 本身的国际化。跨国工业企业内部的子公司之间流通的是产品而不是商品，这是一种表现生产国际化的方式（Michallet，1972）^①。美国的无形收益 2500 亿美元这一数字，是美国货币资本再生产区域国际化的具体象征。J. N. Behrman 估计世界范围的生产国际化金额为 5000 亿美元（Behrman，1972：3）。

透过资本的出口，列宁将生产的国际化进程认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化过程中的新现象。这依然存在歧义，因为生产资本的循环形式—— $P\cdots Tc\cdots P$ ——定义的并不是 P 本身而是 $P\cdots P$ 通过 Tc 的区域，这在跨国企业内部交换中可以看到。“生产的国际化”一词有歧义，因为它指的并不是生产过程 P 本身，而是生产资本再生产的区域：Behrman 得出的 5000 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在 $P\cdots P$ 的流通中通过 5000 亿美元的总流通而实现的生产资本的再生产。

这里一直强调的是，货币资本循环区域的国际化实际上取决于在 $M—L$ 和 $M—MP$ 中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生产国际化一词经常作为一种直观方式用来表明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国际化。但是恰恰困难就是，不可能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揭示生产关系，正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那样^②。

3. 商品资本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是：

$$C'—M'—C'\cdots P\cdots C'$$

① 跨国企业内部的国际流通大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30%。

② 见下文的“（二）”部分。

它的起始处是总流通过程 Tc 。其扩展公式为：

$$\left| \begin{array}{c} C \\ + \\ c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c} M \\ + \\ m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c} C \\ (\\ c \end{array} \right| \begin{array}{c} L \\ MP \end{array} \cdots P \cdots C'$$

与生产资本循环的情况相反，流通活动不是被包括在生产过程内，而是开放式的，情况如下：

“在 $C' \cdots C'$ 中，商品形式的资本是生产的前提；在这个循环中在第二个 C 上，它重新表现为前提。如果这个 C 还没有生产或再生产出来，循环就被阻止；这个 C 必须再生产出来，大部分必须作为另一个产业资本的 C' 再生产出来。在这个循环中， C' 是作为运动的起点、经过点和终点，因此，它总是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09 - 110）

与另外两种形式的循环相比，商品资本循环假定外部存在商品和世界市场。因此商品资本通过国际交换关系第一个实现国际扩展并不奇怪。对外贸易理论完全适用于这个循环，尤其是对于流通过程 Tc 而言。国际贸易的扩张非常惊人，对外贸易在 GNP 构成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部分，但是在这里，流通区域的国际化仍然不足以定义商品资本的国际化。

（二）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国际化

必须记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形式本身的抽象化。 $P \cdots P'$ 形式，是所有增长理论的意识形态公式，它将生产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对象和最终目的：

“运动的一般形式 $P \cdots P$ 是再生产的形式，它与 $M \cdots M'$ 不同，不表示价值增值是过程的目的。因此，这个形式使古典经济学更加容易忽视生产过程的确定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把生产本身说成是过程的目的，好象就是要尽可能多和尽可能便宜地进行生产，要使产品去交换尽可能多样的其他产品，……货币和货币资本的特性都可能被忽视，……同样，在考察商品资本时，利润有时被忘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07 - 108）

不知道有多少经济学家由于增长本身而陷入增长的陷阱，尤其是当他们讨论生产国际化时更是如此。生产资本的循环对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来说理当然是核心形式，这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完全分开。

将商品资本循环独立于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循环，那就转而成为新古典错觉，即一切开始于市场又结束于市场——正如马克思本人指出的那样：

“因此，如果专门注意这个公式，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就好像都是来自商品流通，

只是由商品构成。这种片面的看法忽视了生产过程的那些与商品要素无关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15）

初看之下似乎马克思仅仅是将他的前人们的不同方法，包括重商主义者的货币资本公式 $M \cdots M'$ 、魁奈（Quesnay）的商品资本公式 $C' - C'$ 和传统的生产资本公式 $P \cdots P'$ 进行了集合、深化和公式化^①。但是将马克思仅仅看成一个非凡的合成大师是错误的，因为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循环的统一中，他揭露了社会关系的运动，资本自行增殖之中的阶级关系的运动。

马克思清晰地将资本表述为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完全不可能在单个的生产资本循环中产生的社会关系，正如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尝试去证明的那样（这是每个古典和新古典错觉产生的地方），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对立关系只有在流通中这些关系的连续性中才明显，反之亦然。

“资本关系之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流通过程中，在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的不同的基本经济条件中，在他们的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39）

生产过程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形式的抽象：仅从生产国际化方面看待跨国企业会导致同样的错觉——阶级关系消失了。这是为什么生产过程中，持有股份和参与管理是资本向工人阶级抛出的意识形态策略。

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相被揭露之后，在 $M \cdots M'$ 和 $C' \cdots C'$ 循环中产生生产关系，进而产生资本关系的国际化问题。

$M \cdots M'$ 循环提出了基本的资本主义关系问题，即使用资本购买劳动力的同时也要占用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因此，劳动力和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料）互相对立。

$C' \cdots C'$ 循环表述了剩余价值或者利润流通形式的资本主义关系：和 $M \cdots M'$ 不同，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关系内的资本自行增殖过程问题，而是与资本自行增殖相伴而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表现。在这里， $C' \cdots C'$ 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运动，其形式是资本运动和资本主义利润即剩余价值的运动。如果脱离 $M \cdots M'$ 和 $C' \cdots C'$ 中的资本自行增殖过程而讨论生产关系，那就无法分析生产关系（Rey，1973）^② 甚至不可能提出资本国际化问题。

至于 $M \cdots M'$ 循环，应该记住的是 $M - C$ 行为表现为 $M - L$ 和 $M - MP$ ，借助这一行

① “ $C' \cdots C'$ 是魁奈《经济表》的基础。他选用这个形式，而不选用 $P \cdots P$ 形式，来和 $M \cdots M'$ （重商主义体系孤立地坚持的形式）相对立，这就显示出他的伟大的正确的见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15）

②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终极秘密，是它是包含在生产过程子集中的一个简单的要素”（Ray，1973）

为，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得以实现，在这一行为中生产关系凸显出来：

“在这里，作为 $M - C < (L, MP)$ 行为的基础的，是分配。所谓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处在另一方。

因此，在 $M - MP$ 行为能成为一般社会行为以前，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本的物的部分，就必须已经作为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和工人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40）

“因此， $M - L$ 发展到什么程度， $M - MP$ 也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会按相同的规模，和那种用它们作生产资料的商品的生产相分离，于是生产资料会作为商品，和每一个商品生产者自己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43）

在商品资本循环的过程中，初始关系（ $M - L$ 和 $M - MP$ ），即采取了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这一形式的资本自行增殖过程，在其发展了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形式中表现出来。

“第三种形式和前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只有在这种循环中，表现为价值增值的起点的，是已经增值的资本价值，而不是原来的有待增值的资本价值。在这里， C' 作为资本关系是起点，并且作为这种关系，对整个循环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个循环还在自己的第一阶段就既包含资本价值的循环，也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而剩余价值，即使不是就每一个循环来说，而是就平均来说，必须有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经过 $C - M - C$ 流通，有一部分作为资本积累的要素发挥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08）

在商品—资本的循环中，资本表现为一种阶级关系，即作为 m （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和 M （预付资本价值）的对立，表现出来：

“把 M' 表现为 m 对 M 的关系，表现为资本关系，直接地说，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而是商品资本 C' 的职能；商品资本 C' 本身，作为 c 和 C 的关系，又只是表示生产过程的结果，只是表示资本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自行增殖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90）

在考察实际的生产关系以及严格来说的生产过程时，我先前所谓的“商品流通的统治地位”变得更加清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这里指出，流通过程推动了新的潜能，它们影响资本的作用程度，影响资本的扩张和收缩，而和资本的价值量无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48 - 49）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对流通过程中的任何确保流通与生产过程相统一的事物感到吃惊。正如 P. P. Rey（1973）写道的：

“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流通依赖于生产’，如果与此相伴而来的是流通失去了自主性，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流通地位的下降，反而是对流通作用的强化。”

在社会资本的总循环中，我们可以对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给予方法论定位，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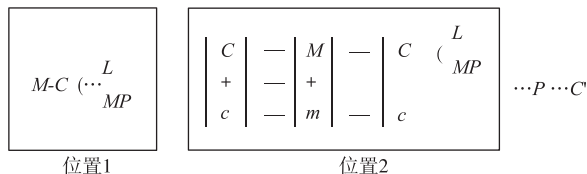


图1 资本的国际化

图1中，位置1表明资本在其自行增殖过程中的国际化，而位置2（它可以依次被分解）给出了经由总流通 Tc 而实现了自行增殖的资本的国际化。

仍然有待解决的是，处于各种关系中的资本的国际化是如何“经历”生产过程并表现这一过程的。

1. 在其自行增殖过程中的资本的国际化： $M-L/M-MP$

（1）当今资本自行增殖过程中的资本国际化的主要特点是，就企业资本而言， $M-L$ 是一种国际行为，正是这一行为使企业成为跨国企业。美国最大的500家企业的资本在美国市场上购买大约1500万名的劳动力，而在国际上购买1200万~1300万名的劳动力。美国这500家最大的企业的 $M-L$ 大概是世界所有企业的30%~50%。通过 $M-L$ 这一行为，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的扩张过程紧密相连。像圣戈班那样的法国企业，总共雇用了大约30万人，他们之中只有18万人在法国。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M-L$ 作为基本的资本主义关系，正越来越国际化。

移民工人问题同样代表了以 $M-C (L/MP)$ 形式体现出来的资本国际化，尽管这是在一国边界内实现的国际化。如果圣戈班在本国范围内的 $M-L$ 不把移民工人计算在内，则该企业 $M-L$ 形式的资本国际化程度上升到50%。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具体测算自行增殖过程中的资本国际化的方法。

“ $M-L$ 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帕劳，1971）^① 这里的阶级关系是马克思借由下述社会行为界定的：

“因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当他们在 $M-L$ （从工人方面看是 $L-M$ ）

^① 本篇文章的主要缺陷是，它没有具体地阐明生产关系的国际化，而仅仅是一种抽象理解。

行为中互相对立时，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作为前提肯定了。这是买和卖，是货币关系，但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买者是资本家，卖者是雇佣工人。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分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38）

各种自行增殖过程国际化背后的原因，在于生产、再生产以及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基本关系即阶级关系的需要。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一经确立，就会在它的发展中不仅使这种分离再生产出来，而且使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扩大，以至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40）

同时，国际自由劳动力的存在，是 $M-C$ 行为即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条件，从而也是资本自行增殖过程的条件。

“……后者（自由雇佣工人）的社会规模的存在，却是 $M-C$ 即货币转化为商品能够表现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41）

我们先前已经看到，在考察商品流通领域，即 $C' \cdots C'$ 领域的国际化时，流通行为如何造就了一支世界规模的自由劳动力。

进而言之，如果货币资本循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高级的资本运动形式，那就容易理解，体现为 $M-L$ 和 $M-MP$ 形式的资本国际化代表着作为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列宁以资本输出定义了这个阶段。通过跨国企业的运营而实现的资本的国际化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最高阶段。

例如，马克思指出，以 $M-L$ 行为为基础的货币资本循环，仅仅表现为社会资本循环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后发展阶段。

“因此，不言而喻，只有在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 $M-C \cdots P \cdots C'-M'$ ，才是资本循环的当然形式，因为它是以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规模的存在作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41）

因此，如果 $M-L$ 行为要实现国际化，作为这一行为的表现，货币资本循环也要国际化，那么，在总流通过程 T_c 中，商品资本循环要素和生产资本循环要素首先必须充斥整个国际舞台，以便使劳动力在世界经济的每个角落都变成自由商品，从而使资本有能力扩张。

以资本输出和瓜分世界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包含资本的国际化，其中货币资本循环发挥了特殊作用，这就是当前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以及银行和金融市场如此重要的原因。过往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太过普遍地囿于列宁的理论和他与卢森堡的争论，

而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资本的国际化，开辟了讨论帝国主义的新的进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它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货币资本循环相对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所发挥的作用。

“……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41）

（2）与 $M-L$ 的国际化相平行，资本自行增殖过程中的国际化也发生在 $M-MP$ 行为中。在这里，通过资本的自行增殖，它发生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44）或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的过程之中，资本自行增殖的第二个阶段得以识别，统治性资本通过和其他资本的彼此交错来维系其自身的再生产。

在现实中， MP 是来自另一个资本扩张过程的商品化的产品，需要确保其从 C' 向 M' 的转化，因此，不同资本在其自行增殖过程中相互交错，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如下公式部分地^①表示出来：

$$\begin{array}{c}
 M'_2 \\
 | \\
 M_1 - C_1 \left\{ \begin{array}{l} L \\ \text{---} MP \dots P_1 \dots C'_1 \text{---} M'_1 \end{array} \right. \\
 | \\
 C'_2 \\
 | \\
 P_2 \\
 | \\
 C_2 \\
 | \\
 M_2
 \end{array}$$

在这个公式中， C'_2 （表现为 MP ）变为资本 M_1 经过生产过程 P_1 时的投入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 M_1 （ M_1 中用于购买 MP 的那部分）转换为 M'_2 ，并由此

^① 这里，“部分地”，表示描述交叉过程的公式中只考虑两个资本扩张过程的相互交错。——译者注

成为 M_2 扩张的条件。在它们的自行增殖过程中，每一个资本的自行增殖都不断地“经历”其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这种情况还会有很多，因为，一旦其他商品出现在 C_2 和 C'_1 处，各种资本再生产的其他交叉点，就会接连出现在上述公式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资本的扩张过程包含了部门内其他资本，以及其他部门相关资本的自行增殖。

因此， $M-MP$ （与 $M-L$ 平行）沿线的资本，其国际化过程意味着资本自行增殖的国际化——其他同样正在扩张的资本与之相交错。假设 M_1 和 M_2 是来源于不同国家的资本，例如，我们假定两者分别为美国资本和欧洲资本。资本国际化本身就意味着任何一国的资本再生产，一直在一个国际化的范围内与其他资本再生产相交错。这里的国际化抑制了国内资本扩张过程中的自主性，但这种抑制永远不会超过 $M-L$ 行为国际化所造成的反应。

如果 M_1 表示美国资本的统治性扩张， M_2 表示法国资本的依赖性扩张，依赖于 M_2 的资本 M_3 （非洲的扩张资本），在其扩张过程中经过 C_2 ，那么必须注意， M_2 将充当 M_1 和 M_3 之间的接力资本：经由另一种资本（即 M_2 ）的传递， M_1 再生产的进行以 M_3 为基础。资本自行增殖中的各种依赖性链条日益明显，国际化过程将其触角伸向不同地区，巴西、土耳其以及象牙海岸^①等——都从属于美国资本的利益。

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 1973）^② 准确地强调了资本再生产的国际统一性，他因此能够与曼德尔（Mandel）以及那些“反对”各种资本（如美国资本、欧洲资本或法国资本）再生产过程相互交错的人争论。但在此之后，他未能“定位”各种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交错点。

我们必须同意尼克斯·普兰查斯的观点，即各种资本自行增殖过程国际化的统一性总是一种不均衡的“统一”：一个给定资本总是愿意致力于同其他资本相“接合”（come into line with）。美国资本“经历”着其他资本的再生产，正如各种欧洲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与美国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相关联一样。^③ 然后我们可能会问，是什么让我们谈论“美国挑战”？

① 指西部非洲。——译者注

② “当然，帝国主义大都市的本国资产阶级和美国资本之间在很多方面都会出现重要矛盾，每个民族国家在面对这些矛盾时，通常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 [这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特点之一]。但是也必须指出，这些矛盾并非当今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当今‘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主要形式，并非‘国家资本’和‘国际资本’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集团）结成‘实体’的情况，层出不穷。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到国内资本绕开本国其他资本，去依赖美国资本的情况，这就是本国资本缺乏内部合作的原因所在。美国资本和本国资本之间的矛盾呈现一种复杂形式——美国资本身处本国资本之中进行再生产。”（普兰查斯，1973：1487）

③ 例如，西屋电气和通用电器与克鲁佐-罗瓦尔、加拿大通用电气、热蒙-施奈德和梅兰日兰等企业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部门国际化过程的基础上，在统治性资本和从属性资本的交错中，各种自行增殖过程在矛盾中运转。在克鲁佐－罗瓦尔、热蒙－施奈德和梅兰日兰等企业^①的资本扩张中，存在多种可能的化解办法。

——主要通过核项目进行资本扩张，这就有必要与统治国际电子工程部门的美国资本（在这个例子中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再生产加强联系^②。

——在资本能够摆脱美国资本的过程中，相对自主地进行资本扩张，例如，运输部门中的资本扩张（克鲁佐－罗瓦尔公司在这个领域相当活跃，这为生产直线发动机的梅兰日兰公司提供了资本扩张的机会）。

目前为止，这些企业之所以选择西屋电气公司，是因为在运输领域国家没有推行促进公司资本扩张的保护政策。因此一个企业的资本自行增殖出现了备选方案：置身不同扩张过程的部门间当然会有矛盾。由此引发了企业管理的变化和董事会成员间的斗争，这些都关乎金融资本的利益，它会支持这种或那种解决方案。从资本的角度，尤其是资本国际化的角度看，企业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完全同质且统一的整体。

现在，一国资本相对于国际资本的自主性程度变得明显——体现为一国资本不断尝试成为占相对统治地位的国际资本——取决于一国在能源政策、住房和运输政策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和国家干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国家对国际化过程的干预是否能做到以下几点。

——在本国或欧洲范围内，仅“扶持”那些貌似本土企业的资本自行增殖——但是，这些反而成为国际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扩张的基础（正如在核项目例子中，在“某些”程度上受国家干预保护的法国资本再生产，反而严格从属于美国资本的自行增殖）。

——在国际范围内，确保推动一个在国际范围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本国）资本的自行增殖，其他过程从属于此。

——在给定的地理范围（如非洲）内，确保（当地）依赖性资本的从属性地位，让它们从属于美国资本、欧洲资本或法国资本的利益。

事实上，对一国自身而言，这三种国家政策似乎“相互矛盾”。可见，与企业资本相比，国家的同质和统一性要更差一些。

① 这些企业均为法国企业。——译者注

② 法国的热蒙－施奈德等企业通过与美国西屋电气合作投资核项目，成功推进国际化，成为当时法国国际化投资的典型案例。——译者注

2. 自行增殖了的资本的国际化： $c—m—c/C—M—C$ ^①

整个行为分解为 $C'—M'$ 和 $M'—C'$ 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中包含了我们之前注意到的发展：在资本自行增殖过程之后，扩张出来的资本开始了其自身的自行增殖。在这里，笔者不会细究资本国际化和 $M—C$ (L/MP) 关系即是阶级关系的国际化。笔者所关心的只是剩余价值和利润形式下总流通过程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具体化，以及相同形式下这些关系的国际化。

C' 以剩余价值（从 C 中扩张出的 c ）中分离出来的资本价值的功能形式出现，同样， M' 是一种利润从资本价值（从 M 中分离出来的 m ）中分离的行为。马克思对这点有非常详细的分析：

“只有在 C' 本身的循环中， C （ $=P$ =资本价值）才能够并且必须和 C' 中的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部分，即包含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分离，而不管这两部分实际上是能够分离，如纱，还是不能够分离，如机器。一旦 C' 转化为 M' ，它们就总是可以分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03）

整个行为如下：

$$\left| \begin{array}{c} C \\ + \\ c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c} M \\ + \\ m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c} C \\ (\\ MP \\ c \end{array} \right| \quad \begin{array}{c} L \\ \\ \end{array}$$

这里指出了将 c 从 C 中分离、 m 从 M 中分离的关系的国际化，它是基于 $c—m—c$ 行为的国际化，即利润流通的国际化，以及作为其对立形式的 $C—M—C$ 行为的国际化。

（1）通过 c/C 和 m/M 在关系上的对立，这个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在理论和实践中显现出来。

在美国资本从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获取的利润中，资本收入或利润的国际化是明显的，日本资本和欧洲资本的国际化运作所获取的利润也是这样。

在理论界，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是伊曼纽尔（A. Emmanuel，1972）“不平等交换”理论的主题（帕劳，1971）。但是伊曼纽尔的理论暴露出与社会资本总

① 流通过程 Tc 永远不能被视为自发的，而总是与生产过程双向连接：一个方向是 $C'—M'$ ，即从生产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转化；另一个方向是 $M'—C'$ ，即从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

注意马克思自己的警告，他强调， $C'—M'$ 不仅是流通过程中的一个形式的转化，而且也是属于生产过程的转化：“这种转化不是属于流通过程的单纯形式换位的结果，而是生产资本各个商品组成部分的使用形式和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现实转化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10）

循环有关的局限性理论立场的所有缺点：他只从孤立的 $c-m-c$ 行为中概括国际化。他的整个不平等交换理论、世界剩余价值的不平等分配理论，都只基于孤立的 $c-m-c$ 行为，而这一行为不过是 $M-C(L/MP)$ 这个基础行为的另一面。他的理论最多只是触及了资本国际化和生产关系国际化整体问题的一部分，其影响有限。伊曼纽尔回避了生产关系国际化问题的核心，尤其是他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性缩减为剩余价值的国际流通。在他的理论中， c/C 和 m/M 的阶级斗争不再出现，也不再以 $M-L$ 和 $M-MP$ 为基础。因此，他沿着穷国与富国斗争的线索得出国际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如果仅关注从生产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剩余价值流通，让 $c-m-c$ 自行其是，就非常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资本主义利润的国际化非常明显，因此无须赘述。众所周知，美国企业的外国附属公司的利润高于美国国内相同企业，日本企业和欧洲企业也是这样。美国对外投资的利润率（与母公司投资总额相关的年度净利润）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12.1% 上升到 70 年代的 13.1%^①。美国对外投资的制造业的利润率，在发达国家是 12%，在发展中国家是 12.3%。事实上必须谨慎看待这些数字，但有趣的是这些利润率都比美国国内投资的利润率高。

(2) 理解以下问题非常重要：基于 c/C 和 m/M 关系国际化的资本自行增殖的国际化与基于 $M-L/M-MP$ 关系国际化的资本自行增殖的国际化并驾齐驱。随着 c/C 和 m/M 的国际化，统治性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得以延伸，一方面因为它在自行增殖过程中分享了其他资本产生的利润（利润率均等化条件下的不平等交换）^②，另一方面因为，依托流通过程 T_c 第一条水平线 $C-M-C$ 上的其他生产方式，通过与依赖性资本生产的商品相交换，统治性资本获得了价值实现的条件。

前文提到的货币资本循环 ($M-M'$) 和生产资本循环 ($P\cdots P'$) 可以在自身循环中得以实现，不存在循环之外的假定前提。^③ 而对于 $C'\cdots C'$ 循环，其始发点是流通过程

① 《当代商务纵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1971 年 10 月。

② 当前，各种关于转形问题和生产价格的错综复杂的讨论，其主要问题在于，它们仅将问题定位在生产过程 $P\cdots P'$ 上，“忘记”把转形问题与社会资本循环尤其是资本自行增殖的整体性相联系。其结果是，绕开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只能根据 $P\cdots P'$ 循环的特征，做单纯的技术性讨论。在这个主题上能够看到马克思关于价值“回转”(revolving)运动的考察（“回转”循环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17——译者注），在这些考察社会资本循环的研究中，提供了指向“转形”问题的唯一的真实路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四章，1970）。这种价值“回转”运动导致了货币资本循环 ($M\cdots M'$)、生产资本循环 ($P\cdots P'$) 和商品资本循环 ($C\cdots C'$) 之间的区别。Delilez 以及像他一样强调货币资本循环的作者们将这一理论总结为不存在利润率均等化，而 R. Borrelly 则为这一理论辩护，认为在生产资本领域存在（利润率）均等化。

③ “撇开终极不说，单个货币资本的循环不是以货币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单个生产资本的循环也不是以生产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在形式 I 中， M 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货币资本，在形式 II 中， P 也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生产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11）

T_c ，商品被两次假定为存在于循环之外：“只有在这个形式Ⅲ中， C 才在循环自身之内表现为 C 的前提，因为起点就是商品形式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12）

“而 $C'\cdots C'$ 却以 $C (=L+MP)$ 是别人所有的、别人手中的商品为前提，这些商品由作为先导的流通过程引入循环，转化为生产资本，然后 C' 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再成为循环的结束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12）

关贸总协定（GATT）最近的一项研究确认，30%的国际贸易采取跨国企业内部交换的形式^①。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这种趋势之强已经导致跨国企业内部的交换能够贯通整个 $C'-M'-C'$ 过程。垄断并不压制竞争，而是能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其制度化并更新其内容。以同样的方式，在国际层面上，或者在跨国企业和那些与跨国企业资本再生产有关的企业之间的层面上，跨国企业也不会压制 $C'-M'-C'$ ，即使没有出现像交叉持有股份那样明显的正式交错。国际贸易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的内部行为，这确实对传统的世界贸易分析产生了影响。

——根据亚当（G. Adám，1972）的研究，美国对外贸易的50%形成于那些追求更大利润的跨国企业的对外经营业务。

——1970年，日本最大的9个商业企业中大部分是巨型跨国企业，如三井、三菱、住友的附属机构，它们的出口占日本出口的46.4%和进口的59.7%，而在1961年，这些数字仅分别为41.4%和52.6%。

迄今为止，当美国（或者在这个例子中是日本）的统治性资本自行增殖“经历”其他不同资本的自行增殖时，通过它们的附属公司的存在实现统治（这就是附属公司的作用），附属公司“抓住”其他资本或其他生产方式的产品并将它们转化为统治性资本 $C'-M'-C'$ 循环中的“商品”。依赖性资本生产过程的产品仅仅成为跨国企业控制的商品束内的一种“商品”。其他依赖性资本的初级产品由跨国企业接收并转化为它控制的经济链内的商品，这种关系沿着诸如住房、能源、交通、包装或其他任何商品束的链条层层传递。

通过控制 $C'-M'-C'$ （在这里是 $C-M-C$ ），跨国企业把其他资本的产品纳入自己的资本流通轨道，就如同在此之前一国或国际商品流通“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其他生产方式的商品一样，从而把它们转化为流通过程 T_c 层面上的商品，正如马克思强调的那样：

“在产业资本或者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过程内，产业资本不论作

^① 这一百分比也显示了利润国际化的重要程度，即30%的 $c-m-c$ 由跨国公司所控制。

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农奴),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从前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也进入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也就是说,进入商品资本的两个流通部门。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执行职能,作为商品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以上就外国商品而言的,也同样适用于外国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1972b:126-127)

然后我们可以说,有两种方式使 $C'-M'-C'$ 在国际层面上得以连接,这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处的历史阶段。

——产业资本,以社会资本的形式,与其他生产方式的产品相连接,并将这些产品转化为 $C'-M'-C'$ 中的商品,是在 $C-M-C$ 还是 $c-m-c$ 的层面上,取决于产品是进入 L 或者 MP (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或者原材料) 项下的生产过程,还是作为享用品进入资本主义消费环节。这种连接基本上属于通常所说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尽管这个术语还面临争议。

——与主导性跨国企业的货币资本相连接的产品,不是简单选定的任意其他生产方式的产品,而是被主导性企业在其不同层次的 $C'-M'-C'$ 流通过程中统治的那些依赖性资本的产品,从而将这些产品转化为指向 $C-M-C$ 商品束的商品,使之进入越来越受欢迎的领域。

这种新型连接刻画出了资本自行增殖中不同的依赖性链条,尤其是对接不发达国家的新型连接。它不再是那种处于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接其他生产方式的连接,而是在各种不同的资本自行增殖过程中,以及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中心和外围的差异中,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内的连接^①。前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之间的连接,被推回至不发达经济社会内部独立的流通 (Azouvi, Kleimann, Paquier, 1972), 它在国际流通中日趋“边缘化”, 因此, 不发达国家出口和商业转移的出现,

① “现在 CMP 的统治架构, 不仅通过依赖关系的再生产从外部实施统治, 而且还在这些从属性和依赖性的架构之中, 建立了直接从内部实施的统治: 大都市的生产方式以特定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 (普兰查斯, 1972: 12) (CMP 即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译者注)

反而被视为外围与中心之间交易关系的新特点。

伊迪斯·潘洛斯 (Edith Penrose, 1972) 意识到跨国企业的这些新举措^①对不发达国家意味着什么, 他建议国际资本和本地资本合资经营, 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国际资本在 $C'-M'-C'$ 中的扩张, 必须以依赖性资本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 跨国企业都乐于推动不发达国家资本的发展, 这当然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跨国企业将很大一部分产品交由不发达国家生产, 但这些产品只能在跨国企业控制的商品束中提高其附加值。当然, 在这个例子中, 他们没有与依赖性资本合资经营。

一旦统治性资本的扩张以不同的从属性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为基础, 使从属性资本的产品并入在中心扩张其价值的商品束之中, 我们就可以接受亚当 (G. Adám, 1972) 的如下陈述:

“企业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目标, 不是在国际范围按最优方案重新配置企业资源, 而是在成本最低地区的集中生产, 并在利润最高地区的集中销售。从这个角度看, 一旦发生生产的国际转移, 过去在一国范围内拥有合理化成本的生产序列, 在世界范围内将不再适用。这表明, 跨国企业正在建立数量越来越多的外国附属公司, 其公开意图不是或者很少是为了在东道国供给产品, 而主要是或者专门是为了出口至第三国或跨国企业的母国。”

这个过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福特将在西班牙建立工厂, 其产品的 90% 定位于出口 (Le Monde, 1972: 19)。更进一步的例证是, 在不发达国家, 发展出口工业正在取代进口替代政策, 类似的变化不胜枚举。

正如 C. A. Michallet (1972a) 继弗农 (R. Vernon) 的新产品国际生命周期理论之后所指出的那样, 上述的现象可能看上去与美国在欧洲的集中化投资相矛盾, 与跨国企业将其工厂坐落于靠近市场的中心地区的政策相矛盾。对 72 个法国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 这些企业的外国附属公司中的 87% 分布在中心地区市场上 (Michallet, 1972a: 648)。

然而, Adám 和 Michallet 讨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前者指的是统治性资本在自行增殖过程中“接收”从属性资本的产品进入自身的商品流通中, 实现与从属性资本的连接, 尽管 Adám 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 后者指的是统治性资本沿着经济路线而非技术路线 (产品) 的自行增殖过程, 这种过程并非是沿着商品的技术路线而是沿着经济路线, 导致商品在中心市场销售。事实上, 这两种理论是互补的, 在跨国企业战略中也并非相互矛盾。

^① 亚当 (G. Adám, 1971) 也曾提到跨国企业的这种新举措。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国际化的辩论，能够从价值实现问题上折射出来，但是这个问题可能同时否定他们两个人。

罗莎·卢森堡至少是在商品—资本循环 $C' \cdots C'$ 基础上提出观点，她强调与其他生产方式并存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形式的产业资本循环行为。但是她几乎没有理解这在实际中是怎样运作的，她坚持认为要实现剩余价值，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存在其他的生产方式，尽管 $C'—M'—C'$ 清晰地显示了一个明显不同类型的工作机理——“接收”其他生产方式的产品并将其转化为商品 C 。由此，包含在 $C' (C + c)$ 中的剩余价值就能够在 C' 的交换行为得以实现。

必须指出，列宁将这一问题定位于与资本的自行增殖相联系的 $C'—M'—C'$ 行为中，但是一方面他简单地将 T_c 封闭于生产资本的循环中（其中根据生产资本循环的定义拿走了“实现”问题），另一方面，他和罗莎·卢森堡一样，没有把 $C'—M'—C'$ 理解为商品资本循环的起点。

因此，跨国企业和资本的国际化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这意味着在资本扩张时，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所包含的关系的国际化。

——在 $M—L/M—MP$ 关系中，以及在 $c—m—c/C—M—C$ 关系中，只有考察社会资本循环的国际化，才能将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界定其国际化，才能在整个循环中理解跨国企业的地位。

3. 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国际化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考虑生产过程内部的生产关系问题，换言之，没有考虑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 $M—L/M—MP$ 和 $c—m—c/C—M—C$ ）如何“经历”生产过程。这里将生产过程内外的生产关系系统定义为：

“根据各自与主要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系统中界定各方生产当事人的地位。这个体系决定了直接生产者和最终的非生产者的地位，只有在相应地位上执行特定的功能（这些功能包括开采自然资源、协调生产过程和分配最终产品等）时，这些地位才有其意义。”

很明显，一方面，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问题与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是资本作为一种“关系”的基础，反之亦然）。另一方面，我已经考察过，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关系问题，不能脱离流通行为（指生产资本以商品资本为中介转化为货币资本）而提出。资本是决定性的——也是被决定的——涉及上述所有生产过程和工作过程时依然是这样。在工作过程中，资本所包含的阶级关系被具体化为生产当事人的地位体系，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表述。笔者还提到体力劳动（其内部也存在各种操作和过程之间的分工）和脑力劳动（其自身也是专业化的）之间的分工，引出了执行和组织等功能。

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国际化,使劳动过程在国际范围内展开,使社会劳动不仅在本地、区域或国家内,而且在国际层面上呈现碎片化。链条的不同组成部分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美国、法国、英国、拉丁美洲和非洲,推动分工达到极限,原子化成为普遍特征。汽车产业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当社会劳动的原子化发生在一个处于国际化进程中的部门时,技术分工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运转,成为通常表现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关系的国内劳动社会分工的新表现。例如,菲亚特的大部分生产线安排在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等地。

但是同时,不仅在外围地区能感受到国际化,而且国际化也使中心地区的社会劳动发生原子化,甚至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更加深化,并强调工作中的重复性特点影响生产速度,导致工人去技能化,等等。

这些关系包含在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之中,而这些过程只有通过审视跨国企业与资本国际化有关的战略才能得以阐明。

参考文献^①

- [1] Ádám. G. , “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Worldwide Sourcing and Domiciling,” *Acta Oeconomica* 7 (304), 1971, p. 349 – 367.
- [2] Ádám. G. , “Les firmes multinationales dans les années70,” *Revue Économique* 23 (3 – 4), 1972.
- [3] Azouvi, et al. , *Industries d’exportations et transferts d’activité*, SEDESParis (draft document for C O R D E S), November, 1972.
- [4] Behrman, J. N. ,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70.
- [5] Behrman, J. 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Paper presented at Renn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NRS, September 1972.
- [6] Bertin, J. Y. , “L’Expansion internationale des grandes entreprises americaines,” *La Documentation francaise*, No. 25, 1972.
- [7] Bertin, J. Y. , “Les causes de la croissance des entreprises à l’étranger,” *Revue économique* 23 (3 – 4), 1972.
- [8] Bettelheim, C. , *Calcul économique et formes de propriété*, Paris: Maspero, 1970.
- [9] Brooke, M. Z. , and Remmers, H. L. , *The Strateg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Longman, 1970.
- [10] Delilez, J. – P. , “L’ Internationalisation de la production,” *Économie et Politique*, ISEA, 1972.
- [11] Emmanuel, A. , *Unequal Exchange*, New York: New Left Books, 1972.
- [12] Franko, L. G. , “European Business Stratagies in theUnited States,” *Busines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① 其中文献30 – 32 为译者所加,关于《资本论》原文的翻译,参考了这些文献。

- Report, September, 1971.
- [13] Franko, L. G. , *Strategic Planning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European Dilemma and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orporate and Strategic Planners, Brussels, 1972.
- [14] Furjot, D. , and Janco, M. , *Informatique at capitalisme*, Maspero. 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apital*, Renn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NRS, mimeo, September, 1972.
- [15] Karpik, L. , “Multinationales et grandes entreprises technologiques”, *Revue économique*, 23 (4), 1972.
- [16] Karpik, L. , “Le capitalisme technologique”, *Sociologie du travail*, 1972 (512), 1972.
- [17] Little, I. et. al, *Industry and Trade in Som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18] Marx, K. , *Capital*,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70.
- [19] Michallet, C. A. , “La Multinationalisation des entreprises francaises,” *Revue économique*, 23 (3-4), 1972.
- [20] Michallet, C. A. , “Le marché des euro - obligations: un marché financier transnational,” Mimeo, 1972.
- [21] Michallet, C. A. , “La politique de financement des firmes multinationales,” *Économies et Sociétés*, ISEA, 1972.
- [22] Moch, P. , *Les Entreprises Multinationales*, report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Paris, 15 November, 1972.
- [23] Palloix, C. , *L'Économie Mondiale Capitaliste*, Paris: Maspero, 1971.
- [24] Palloix, C. , “Note de recherche sur le procès d' internationalisation,” Mimeo, IREP, Grenoble, 1972.
- [25] Penrose, E. ,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ir Changing Rol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ast Africa)*, Paper presented at Rennes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NRS, September, 1972.
- [26] Poulantzas, N. , “Les Classes sociales,” *L'Homme et la société*, 1972.
- [27] Poulantzas, N. , “L'Internationalisation des rapports capitalistes et l'État - Nation,” *Les temps modernes*, 1973 (4), 1973.
- [28] Rey, P. - P. , *Les Alliances de classes*, Paris: Maspero, 1973.
- [29] Wilkins, M. (1970), *The Emergence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72a。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72b。
-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 人民出版社, 1974。

收入不平等、经济租金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

唐纳德·托马斯科维奇-迪维 林庚厚**

刘 沆 译 王生升 校***

摘 要 2008 年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与房地产泡沫和高风险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直接相关，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后果。本文探讨了与金融化相伴出现的制度与收入的动态变化，发展了有关收入向金融部门显著转移的社会学解释。与金融化相关的变化还包括银行业去管制化、金融业集中、机构投资者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股东价值运动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型的主导。因此，我们估计，自 1980 年以来，大约 5.8 万亿到 6.6 万亿美元被转移到了金融部门。我们的结论是，理解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变化需要重点关注市场制度和政治。

“我认为，几年前每个人都陷入这一想法，即市场能够实现自我修正和自律，华尔街能比监管者更好地保护金融系统。我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被这种哲学误导了。”——玛丽·夏皮罗（Mary Shapiro，2010）

我们研究了促进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制度进程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2008 ~ 2010 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金融对全球经济稳定的破坏作用上，而对金融化导致的长期收入再分配则关注较少。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通常被归因于美国投机性房地产泡沫的破灭（Lewis，2009；Fligstein and Goldstein，2010）。这一解释基本合理，但那些推动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历史的、制度的发展，正是这些长期的制度转变才是最近这次投资泡沫不断膨胀的发酵剂，而泡沫的破裂也不太可能因此将这些制度转变简单地擦除。

我们对金融化进行了概括，指出其核心部分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系统。我们借用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租金理论来解释这一再分配体系。为了理解收入租金（Income Rents）的产生过程，我们发展了租金理论，强调了市场制度分析的重要性。为此，我们使用

* 原文 Income Dynamics, Economic Rents,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 S. Economy 出自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 2011, 该研究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赞助 (SES - 0956273)。

** 唐纳德·托马斯科维奇-迪维 (Donald Tomaskovic - Devey) 任职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大学。

*** 刘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研究生。王生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了多方行动者模型来分析与市场相关的政治活动。通过对租金理论的理论与方法扩展,我们勾勒出引发金融化的关键性制度转变。其后,我们检查了金融部门转移性收入的时间进程及其内部分配。

关键词 金融化 市场机制 制度转变 收入分配

一 金融化

金融化关系到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第一,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方面,金融服务部门的公司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Davis, 2009)。第二,非金融机构公司的金融关联活动不断增加 (Krippner, 2011)。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的经济活动已经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转向以金融为导向的投资和管理活动 (Epstein and Jayadev, 2005)。图1显示了金融部门利润占美国利润总额的比重。在1948~1970年,金融部门利润占美国利润总额的比重缓慢增长,上世纪70年代还一度呈现下降趋势,在1980年之后该占比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 (Kripp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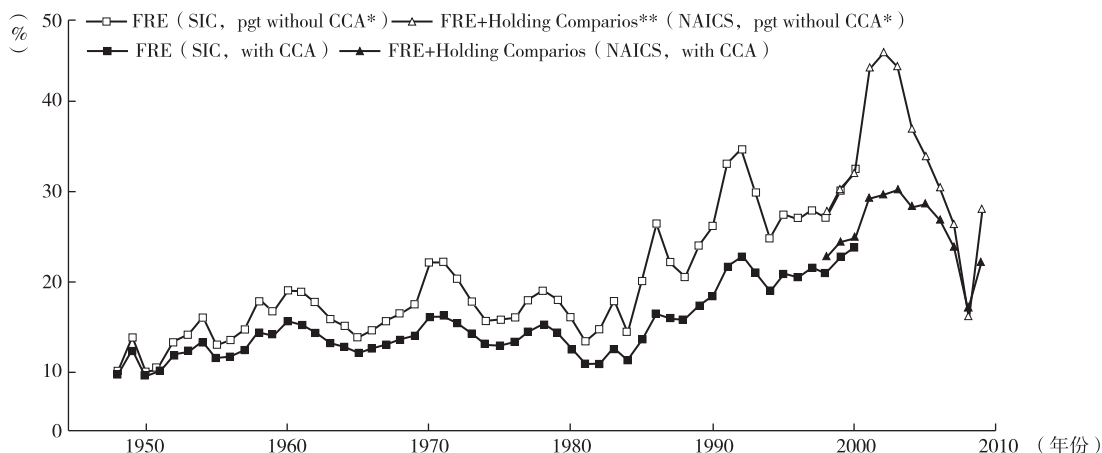


图1 金融部门的税前利润及已实现利润占美国利润总额的百分比

注: * 已实现利润不包括资本消耗补贴, 税前利润包括资本消耗津贴。这里的利润报告是采用了存货估价调整后的企业税前及股息支付前的利润。我们使用已实现利润, 而并不采用现金流形式 (克瑞普纳, 2005), 来概念化税前的和资本消耗补贴前的总利润。现金流常用来表示未分配的总利润 (即利润净股息加上税收) 和资本折旧补贴。已实现利润也可以解释为经过存货估价和资本消耗调整加上固定资本消耗的税前利润。

** 这种分类包括非金融控股公司。

资料来源: 经济分析局, 表 6.17 是企业的税前利润, 表 6.22 代表得到企业资本消耗津贴的行业, 其分类如下: SIC1972, 1948~1987 年, SIC1987, 1988~2000 年; NAICS2002, 1998~2009 年。

2005)。在2000年后,金融公司的“80后”利润分享额(the post-1980s pooling of corporate profits?)加速上涨。以传统会计指标衡量(净收入-资本折旧调整),这一上涨趋势在2002年达到顶峰,私营部门内45%的应税利润被金融部门的公司所吸收。^①

通常,资本折旧在大规模实物资本投资的行业更为显著,如石油和汽车制造部门。考察已实现利润的时间序列变化,可以发现,金融部门所获得的总利润份额一直比较小。但与此同时,金融部门的分享利润也在不断增加,到2002年,美国经济中30%的资本收入被金融业获得。

自1980年以来,金融业的员工收入也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Philippon and Reshet, 2009)。华尔街的雇员们,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银行控股公司以及对冲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和投资管理者,他们在最高收入者中的比重越来越大(Rauh and Kaplan, 2010)。

图2显示了金融部门薪酬(包括工资、奖金和福利)在全国总薪酬中的占比与各部门就业占全国总就业的占比。1980年以前的30年间,金融部门雇员的收入基本上一直稳定在雇员平均收入水平上。在1980年后,金融部门雇员的薪酬开始飙升,到2000年,其平均薪酬已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0%。由于这一估计考察的是整个金融部门,因此这些数据没有显示哪些具体行业和员工收益,这一问题我们会在下面进一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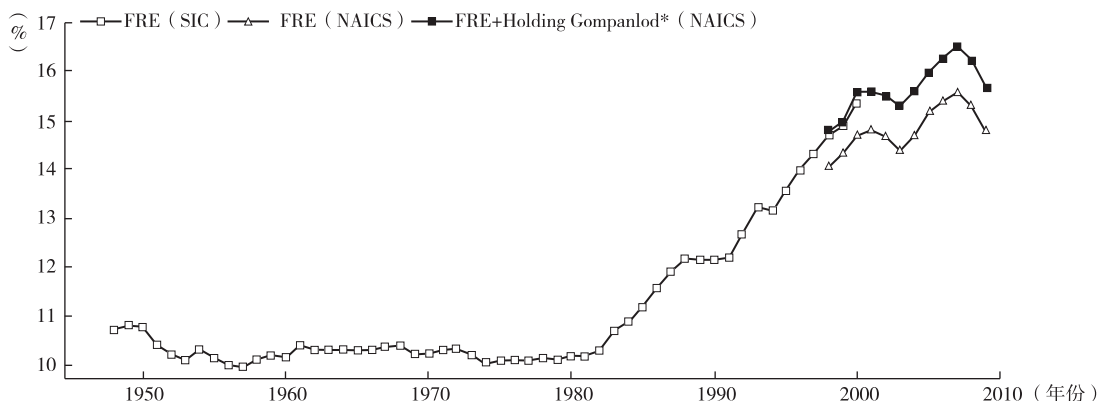


图2 金融部门薪酬占全国总薪酬的比重

注：* 这种分类包括非金融控股公司。

资料来源：经济分析局，表6.2是按行业划分的员工薪酬以及表6.5是按行业划分的全职员工，其分类如下：SIC1972, 1948~1987年；SIC1987, 1988~2000年；NAICS2002, 1998~2009年。

① 自始至终我们都把国民收入比率作为时间序列的表现形式。通过对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周期进行动态控制，来简化时序比较，我们能集中于关注比率情况。这些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税务部门上报的所得税申报表，该表汇总了各行业水平，因此比传统方法更准确。

二 理论工具

为什么1980年后金融行业的收入份额会增加？新古典的解释可能是金融部门在本期生产率的飙升。然而，由于生产率通常是根据市场中的价值实现来循环定义的，因此这种解释不过是一种同义反复。我们将把研究重点转向分层和制度，试图从经济社会学的思路寻找替代答案。

索伦森（Sorensen, 1996, 2000）的收入不平等模型强调市场主体通过制度和政治机制来操控供给与需求，以此创造和维持经济租金或破坏其他参与者的租金。经济租金是指在完全竞争市场所实现的收入之上的超额部分。市场参与者努力创建和维持其在某方面的垄断和市场专营地位，以此来规避完全竞争市场规则。有时候，这些垄断是短暂的，例如，一家企业生产新产品而竞争者尚未进入该市场时。而企业通过国家实施的垄断或凭借规模形成的市场准入壁垒，则能保证它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垄断市场，并获得高于市场收入的经济租金。

租金理论与传统市场解释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对后者前提假设的质疑，即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参与者根据其生产率获得公平报酬。租金理论认为，市场均衡不是中性的或自然的，而是构建出来的，它会受政治的、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租金理论与韦伯学派的机会囤积理论（Parkin, 1979）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理论是一致的（Baron and Sweezy, 1966）。更重要的是，租金理论还与制度学派的市场权力理论相一致（Fligstein, 2001）。租金理论不仅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模型不同，后者把收入分配看成是自然的，而且与人力资本模型也不同，后者假设总收入的分配以个人生产力为基础。

租金理论清晰地陈述了货币租金的来源。经济租金与企业（或行业）所拥有的抑制竞争的权力有关，它是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所形成的超额利润。类似的，雇员租金（高于雇员市场工资的超额部分）可能是下列三种来源的某种组合，即其他部门的雇员收入、资本在收入中的较低份额以及对消费者的劳动成本转嫁。这种市场权力可能与市场供求双方的相对权力有关（Burt, 1983），也可能与生产过程中的权力有关（Kalleberg et. al, 1983），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Tomaskovic - Devey and Skaggs, 1999）。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收入分配过程是一种剥削形式，其中一个行为者的物质条件依赖于其交易伙伴的贡献（Roemer, 1982; Tilly, 1998; Sakamoto and Kim, 2010）。

这些分析方法的一个共同假设是把收入分配视为社会谈判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或最优的。租金的消灭或创造被认为是组织或生产中行为人相对权力的变化，从而改变了收入流的所有权界定。在大多数代理问题中，这种权力变化将遵循一种政治过程，

其中有组织的行为人通过操纵市场管制来保障经济租金。我们猜想，租金也可能是某种意料之外的需求或制度或意识形态变化所引发的功能性结果。由于市场行为人依靠国家来创建或认可市场交换的基本规则，因此国家往往也是创造或毁灭租金的重要观众和行为人（Fligstein, 2001）。

租金模型引导学者们集中关注市场缺位和租金创造中的制度基础，如国家许可（Weeden, 2002）或与需求或监管结构相关的政治操纵（Fligstein, 2001）。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展示两个过程——市场竞争的减少和监管结构的变化，对于解释国民收入向金融部门转移非常重要。我们还发现，需求变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机构投资者的崛起显著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历史过程看，这也显然是金融部门租金出现偶发性增长的源泉。

和以往的租金理论相比，我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经济社会学中引进了关于市场和组织如何变化的制度分析。在以前的应用中，租金变化通常被视为人力资本模型中剩余收益的正变化。我们相信，通过记录行为人约束条件和行为的实际变化，租金理论中的因果推论逻辑得到加强。对于金融部门中市场权力和监管结构的变化，我们提供了一个详细的制度分析。^①这也使我们能对收入机制的历时性变化进行更准确的检查，而这种变化遵循制度变化的要求，是制度变化的结果。我们把金融部门分解成具体的产业，以便观察金融化使哪些行为人在哪些历史时刻提高了收入水平。

我们也注意到，租金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传统存在紧密关联，后者强调资产阶级通过俘获国家来实现其利益。金融化的两个重要应用源于哈维（Harvey, 2010）以及哈克与皮尔逊（Hacker and Pierson, 2010）。哈维将金融化视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型的核心。哈克和皮尔逊将金融化视为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核心。我们同意这两种观点，但我们认为，他们关注的制度变迁中的资产阶级权力至多是一种局部分析。正如分层理论中的租金理论，他们放弃了更严谨的制度分析而更青睐于以分析获利者为基础的“一刀切”式推理。我们认为，在分析经济租金问题时，纯粹的市场分析和纯粹的国家俘获分析都过早地排除了实际上发挥作用的一系列偶然因素 [参见肯沃西（Kenworthy）2010年类似的评论]。

三 金融化的制度根源

在本节中，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金融市场有关的制度变迁进行历史性分析。我们分析的起点是70年代战后经济繁荣的结束，当时美国资本主义被认为处于危

^① 我们并不跟踪记录金融服务行业组织内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经济环境的变迁，但我们注意到相关文献表明该行业有力地改变了其劳动过程和产品（Ho, 2009; Lewis, 2010）。

机阶段。这一时期也被视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失败的阶段，因为它不能提供解释或解决“滞胀”问题的明确方案。我们概述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型的崛起及其控制通货膨胀和刺激金融的方案。最后，我们勾勒了那个时代去管制化的相关发展，而正是这些发展导致美国经济向金融活动的系统性转向。

（一）20 世纪 70 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

上世纪 70 年代，很多人坚信美国资本主义面临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危机。伴随着“二战”后繁荣时代的结束，美国资本主义首次面临危机，一系列威胁事件在此期间接连发生。1973 年油价飙升导致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的增加，这导致收入向生产石油的企业和国家转移。工会力量和消费者权力的增强对劳动过程和市场中的企业自主经营施加了真正的限制。日本和北欧制造业的有力竞争，结束了美国战后的全球制造业霸权。低增长、高通胀的宏观经济状况最终瓦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合法性。所有这些威胁促使大公司部门调整以再造系统，由此它们努力推动放松经济管制、降低税收以及政府职能的弱化（Miller and Tomaskovic - Devey, 1983; Useem, 1983; Vogel, 1986; Harvey, 2005）。

经过这次大转变，1980 年成为一道分水岭，美国联邦政府的一般经济职能和特定的经济管理制职能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这次资本主义大转变导致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型的崛起，该政策支持通过市场而非监管来解决政治问题。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本书不讨论其连贯的政策议程，而是分析国家行为的系列发展变化，这些变化均主张通过市场而不是监管或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除此之外，我们同意哈维的观点（Harvey, 2005），即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是对先前的凯恩斯主义国家职能——强调公众福利——的否定，它支持营造一种亲商业的社会氛围。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型主张以市场来解决经济和政治危机，但它并未否定对特定公司或部门的国家扶持行为。

新政策模型中哪些行为人具有决定性作用，目前对此问题仍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建立是通过资产阶级对抗凯恩斯主义规制和劳工整体来实现的（Harvey, 2005; Vogel 2005）。很明显的是，这些主流观点根源于作为智力和技术专家的新古典经济学家（Davis, 2009; Fourcade - Gourinchas and Babb, 2002）；同样明显的是国家中的政治企业家正在寻找市场导向型政策来应对时代危机（Prasad, 2006）。所有的观点都一致认为，1980 年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可能对新的金融工具以及 1980 年后发展起来的组织形式实施监管。哈维（2005）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典型行动之一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金融机构，但事实上对金融机构的紧急救助恰恰有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教义。

（二）金融市场动力

上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滞胀，即经济增长停滞与高通货膨胀率的并行。缓慢的经济增长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而通货膨胀则瓦解了银行的传统信贷模式——从客户吸收存款并放贷给投资者。滞胀导致银行赢利能力的大幅下降（见图1中70年代末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联邦储备银行迅速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货膨胀（Krippner, 2011, Epstein and Jayadev, 2005）。这种紧缩性货币政策在80年代早期减缓了通胀率提高的速度，同时吸引了大量外资投资于美国的附息债券。

低通胀和高利率共同为银行、保险公司和实体部门的利润增长创造了条件，使其扩大对消费者和非金融企业的信贷规模（Epstein and Jayadev, 2005）。在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坚持反通胀政策，这与里根总统的赤字支出政策形成明显的冲突。大量外资特别是日资的流入，有效解决了上述冲突。这些资金不仅成为美国赤字的资金源，而且也开启了外国资本持续流向美国的潮流，这些资金进而推动了美国消费者、企业和联邦政府的消费债务（Krippner, 2011）。^①

在美国制造业企业投资不断下降的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欧洲各国不断增长的过剩资本转化为美国的银行存款，这两种因素的耦合作用导致美国银行系统的存款不断增加（Tomaskovic-Devey and McKinley, 1981; Harvey, 2010）。机构投资者——包括私人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公共机构投资者（国家对财政盈余的资本操作，如80年代的日本和近期的中国）——的崛起为美国金融化的持续提供了稳定的来源（Orhangazi, 2008）。截至2008年，美国获得了世界上43%的资本输入（Guillén and Suárez, 2010）。

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金融部门的收入水平；而放松管制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基础性的经济结构，从而有利于金融部门收入的急剧增长。在1980年之前，商业银行就迫切要求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要求获得跨州经营与兼并的权利，并实现存贷款利率的自由浮动（Krippner, 2011）。这些要求不仅反映了对监管的反抗，而且表明试图加强市场影响力、拓展业务范围的努力。

（三）金融部门放松管制

对金融部门放松管制的第一个法案出现在1978年，最高法院在有关明尼阿波利斯银行与奥马哈第一服务公司的诉讼案中裁定，信用卡公司可以以不高于其注册所在地的州的法定利率上限的利率提供借贷。南达科他州和特拉华州没有高利贷法，其州法定利率上限较高，因此大部分信用卡公司选择在这两个州注册或重新注册。

^① 1984年以前，美国政府对在美投资的外国人收取30%的所得税。里根政府取消了这一税收，导致利率飙升，外国投资大量流入美国（克瑞普纳，2011）。

第二次放松管制行动的影响最深刻，这就是1980年《放宽存款机构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的出台。自此，美国国会废除了自1933年以来实行的银行业监管法案，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在1929年金融危机后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监管金融部门风险，防止金融部门的行业集中，避免投机引发的大萧条再次上演。1980年的法案允许银行合并，破除了对储蓄账户利息的监管控制，允许信贷联盟、储蓄和贷款机构提供活期存款利息，废除了金融机构在利率方面的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放松利率管制得到了消费者的支持，因为他们试图保全家庭储蓄以对抗通货膨胀。这打破了商业银行与储蓄贷款机构之间长达十年的政治僵局，前者支持放松管制，而后者则反对放松管制（Krippner, 2011）。

这一法案模糊了共同基金、商业银行、储蓄和贷款公司之间的界限，从储户获得存款并放贷给投资者的传统银行机制不断衰落。为了应对传统存贷模式获利机会的下降，银行开始转向金融服务，而收取的相关费用则成为其收入流的主要来源。在此过程中，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崛起以及家庭储蓄从传统储蓄账户向金融市场的转移，大量新的金融工具被创造出来以吸收不断增加的投资流（Davis, 2009）。

1980年，美联储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在多州拥有银行。1994年，《里戈尔-尼尔州际银行和分行法案》（*The 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Act*）废除了有关跨州银行的最后禁令。图3显示1980年后银行业集中所导致的金融机构数量的下降。现在，这些金融机构可以跨州合并和经营，它们控制着经济中增长最为迅速的金融资产。在80年代和90年代，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日益剥离监管者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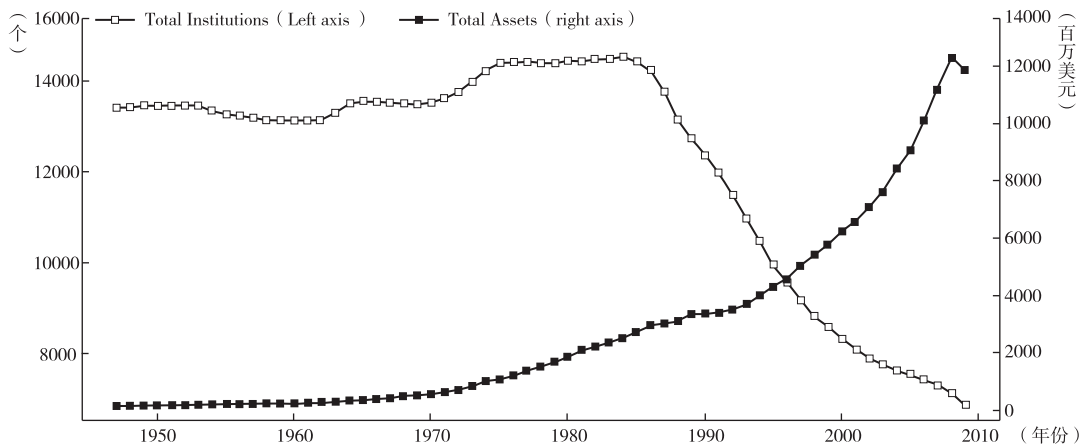


图3 企业总数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会员商业银行的总资产额（1948~2009年）

资料来源：银行统计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转而成为发展各种金融新工具的“啦啦队”，新组织安排繁荣兴起的背后是金融监管的缺位（Fligstein and Goldstein, 2010）。

甚至一些显然违法的跨行业活动，如集中于一家公司的投资、保险和银行业，也被监管机构所容许。最终，作为对早期花旗集团和旅行者保险公司合并问题的回应，美国国会在1999年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The 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该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金融部门行为监管的最后一项规定，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混业经营模式最终合法化。这导致联合的银行控股公司迅速扩张，它们在各类金融市场同时经营，从而造就了一个整合的金融服务产业。在这里，单独一个公司就能提供包括家庭和商业信贷、保险以及投资在内的一整套服务，而这最终引发了系统性（即高度集中的网络化）风险及2007年的金融危机（Guillén and Suárez, 2010）。虽然引起金融化的主要原因是80年代初对金融监管领域的调整，但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加剧了金融业的聚集程度，资源向最大的金融机构集中的程度也因此不断增强（Davis, 2009）。

在9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间，美联储不断努力掩盖其限制工资和就业增长的政治角色——例如，反通胀目标优先于就业和工资增长目标。从90年代开始，它接受了“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华尔街和金融经济学的流行观点，即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最终，银行业希望多种金融服务集于单一公司的请求得到了美联储官员的支持（Krippner, 2011）。

更重要的是，监管系统并未依据新兴金融体系采取大幅度修正，即便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已发展成跨部门的银行控股公司，金融监管仍旧体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分业经营和监管的精神，延续了原有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监管模式。碎片化监管意味着1999年后的金融服务公司可以购买监管者和新型金融工具，如完全不受监管的信用违约互换和场外衍生品交易。对金融系统监管的缺失，反映了金融服务公司内部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Guillén and Suárez, 2010）。哈克和皮尔森（Hacker and Pierson, 2010）将这种不适应金融部门新组织形式和新产品引发的监管缺失称为监管漂移。弗里格斯坦和戈尔茨坦（Fligstein and Goldstein, 2010）把联邦储备银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拒绝监管新型金融活动的行为视为一种监管俘获。

这些制度变化削弱了对现期和远期投资工具的监管，这助推金融投资超过实体资本投资，释放了对金融资产的投机活动。这些政策加大了市场利率和股市的波动程度，因此它也助推了风险获利型金融工具的创新，包括利率可变抵押贷款、信用违约互换、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其他衍生证券（Harvey, 2010; Krippner, 2011）。

（四）企业的金融定义

与此同时，企业被定义为金融单位，即一束可交易资产，而非金融部门在特定市

场上的投资和创新活动则被替代 (Fligstein, 2001; Davis, 2009)。这种转变导致企业管理行为发生根本性变化, 金融导向型管理者开始掌控大公司, 以提高公司股票价值为目标的短期规划成为管理层的首要任务 (Dobbin and Zorn, 2005; Krier, 2005)。目前, 与企业高管薪酬挂钩的不再是市场份额、销售量或生产性利润等长期性指标, 而是股票期权, 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企业概念向股东价值靠拢的程度。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推动企业领导者调整其投资策略, 长期投资被短期投资取代, 生产性投资被金融投资取代。非金融企业金融活动的活跃、股东行为主义的增强以及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 这些变化改变了企业管理的定位, 关注企业成长的长期目标被赢利率这一短期目标取代 (Useem, 1993; Stockhammer, 2004; Davis, 2009)。这种转变导致企业对新生产性投资缺乏兴趣, 而更多地转向金融投资。

根据代理理论的基本观点, 对管理层的激励必须与股东长期利益保持一致。多宾和吉沃克 (Dobbin and Jiwook, 2010) 认为, 企业管理向股东价值靠拢的上述变化, 实际上是对上述观点的滥用^①。机构投资者鼓励公司的高管采用他们更偏好的增加短期股票市场价值的目标, 并将高管薪酬与股价捆绑在一起。代理理论所要求的控制风险问题, 如增加外部董事的影响以及长期性的经理层持股方案, 则没有得到重视。其结果是形成了激励高风险和短期行为的体系。最终, 向股东价值靠拢的经营行为与短期金融激励及产业部门经理层捆绑到一起。他们创建了一个系统, 其中企业经理层的收入来自公司股价的上升, 而当股票或资产负债表发生损失时却无人因此受罚 (Krier, 2005)。

1980 年之前, 股票的平均持股时间为 5 年, 到 2002 年则下降为 1 年 (Crotty, 2005)。因此, 股票市场对企业高管层的奖惩机制从长期发展转为短期绩效。由于这一时期高管们的薪酬与股市绩效联系在一起, 金融部门的崛起促使非金融公司的行为模式也发生类似转变, 即从长期的资本投资转向短期金融操作。

非金融公司越来越多地投资于金融产品, 而不是其核心业务。据戴维斯 (Davis, 2009) 的估算, 1980 年前非金融公司金融投资占总投资的 28%, 到 2000 年这一比例增长至 50%。奥尔汉佳吉 (Orhangazi, 2008) 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表明, 非金融公司的金融性支出如利息、股息红利和股票回购等不断增加, 这对大多数公司的新资本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当越来越多的利润被非金融公司用于金融投资时, 大公司的资本投资将因此遭受额外的负面影响 (Stockhammer, 2004)。可以看出金融化导致资本投资从实际的生产性资产领域中被不断地挤出。

同时, 金融部门吸收的非金融公司的现金流占比在逐步增加。在 1980 年之前, 用于

^① 在金融化时期, 代理理论是一个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该观点可参见詹森和梅克林 (Jensen and Mecklin, 1976) 的早期论述。

支付利息、股息和股票回购的现金流的比重不足 30%，此后增长到高达 78% 的峰值。在 1980~2000 年，大约有 54% 的企业自由现金进入了投资者的腰包，而没有用于企业生产能力的再投资（Davis, 2009）。当企业为追求股东价值而采取诸如并购、裁员和劳动节约型技术等企业策略时，就业量特别是工会工人的就业量将因此减少，当企业赢利能力不会因此提高（Fligstein and Shin, 2007）。随着企业越来越依赖于股票价值和 CEO 的股票期权，它对公司财务进行金融操纵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Prechel and Morris, 2010）。

表 1 总结了金融化的制度解释，尤其强调了金融部门权力增加对整个市场结构的影响。我们引入的寻租机会因素涉及多方行为人，它不仅仅是金融部门自觉的政治影响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金融部门在此期间政治影响力确实在不断增加，但对于放松金融管制及政治经济系统的金融化而言，金融部门与其他行为人之相互影响同样至关重要。

表 1 金融化的制度解释

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		
金融化之前		金融化之后		
引起经济衰退的因素：石油危机，低增长，高通胀，全球经济竞争				
主体	挑战	举措	制度变化	收入变化
国家	企业的滞胀和政策压力	采取去监管化政策	新自由主义共识；国家金融化；监管俘获；废止《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通过监管和政府援助对金融部门收入提供优惠待遇
非金融机构	国内市场限制，国际竞争	要求经济去监管化，低税收，小政府	公司股东价值意识的增强；关注短期金融目标，忽视长期资本投资	金融高管的收入与股票市场表现挂钩，收入转移至金融部门以及高管层
金 融 机构	高通胀威胁传统银行业务的利润；本地市场限制	要求利率去监管化，并购，跨州银行；政府职能限制	发展无监管的金融工具和跨部门活动，并加大产业集中；增加大型银行控股公司；增加金融部门政治权力；系统风险更多地转嫁到集中化和规模化中	金融部门收入整体增长；商业监管费取消；银行利润与银行投资者收益增加
消费者	高通胀破坏私人储蓄	要求利率去监管化	消费信用获取简单化，增加掠夺性贷款，提高投资意识	消费贷款的高利率，储蓄的低利率，银行业务费用
机构投资者	高通胀，低增长破坏传统投资策略	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规模扩大	增加对投机性金融工具的投资，提升稳定或高回报的预期	金融泡沫膨胀
国 外 资本	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追求资本投资盈余	增加对美国金融工具的投资		联邦财政赤字保持低利率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	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	新自由主义政策法制化，倡导自我调节市场；有效市场假设；代理理论		

跨行业金融活动禁令的废除,以及1999年后收入向金融部门的加速转移,表明了金融化在“新千年”的深化。21世纪初股票市场的崩溃很快就被低利率和房价攀升所拉动的房地产泡沫覆盖。通过大力营销次级抵押贷款以弥补其在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方面的赢利,金融部门进一步放大了泡沫的膨胀程度。^① 弗里格斯坦和戈尔茨坦(Flagstein and Goldstein, 2010)对这组事件的深入分析表明,这个市场是一小撮金融机构创建的,在所有方面都能看到他们的参与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将高风险证券评为AAA级投资的三大评级机构与一些坚信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能自我调节的联邦监管机构相互勾结在一起。可以说,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这种特定投资泡沫崩盘的直接结果。但从长期的制度视角来看,这次危机源于金融活动在少数寻租企业的集中,而且这种集中被嵌入一个日益退化和过时的监管结构中。雪上加霜的是,非金融部门管理层激励机制更偏好于短期金融投机而非企业长期发展。

四 金融行业租金的分配

接下来,我们分析这些创造收入机会的制度转变所导致的分配结果。我们将比较3个时期,即1980年以前的监管期,1980~1999年的放松管制期,以及2000年后的金融化加速和银行控股公司整合的时期。我们整理出金融部门各特定行业的资本利润份额的变动趋势。

图4依据具体行业对部门利润进行分解。与我们的制度分析一致,在1980年之前金融部门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或者维持平稳(证券、保险和房地产行业),或者增速较为缓慢(银行业)。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70年代后期,银行利润出现大幅下降,这直接推动了1980年《放宽存款机构的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案》的出台。这部法案以及此后出台的类似法案废止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种种规定,所以,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成为1980年以后的大赢家,其利润实现了最大幅度和最长时期的增长。90年代早期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当时,为了应对银行利润的下降,进一步放松银行业管制的两个法案相继通过,这就是1994年的《里戈尔-尼尔州际银行和分行法案》和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可以看到,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利润占全国利润总额的比重在1999年之后出现了再次上升,其幅度较之前更大(见图4)。

^① 虽然图2表明,在金融部门利润占利润总额的份额在2003年之后有所降低,但这主要是因为其他经济部门的利润在增长。在整个2006年中,金融部门利润飙升,并且该部门占GDP的比例持续攀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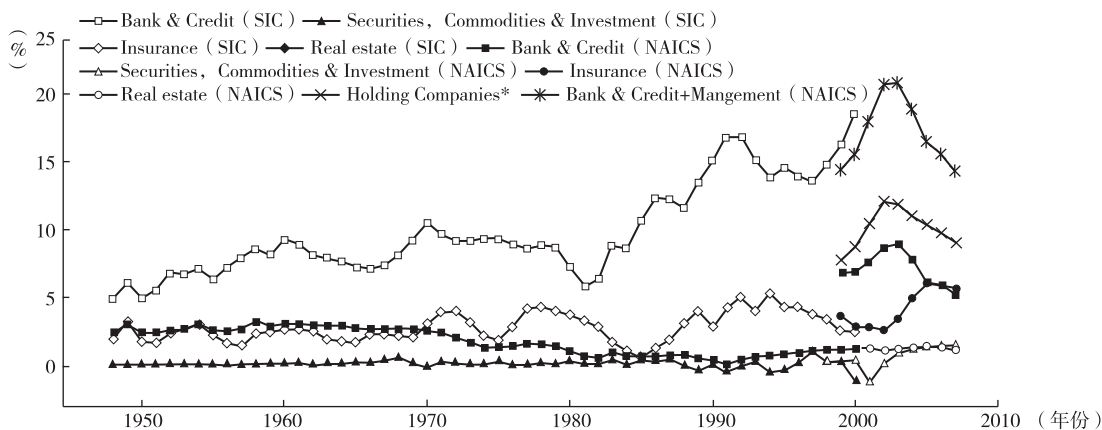


图4 金融部门中各行业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

注：* 这种分类包括了非金融控股公司。

资料来源：经济分析局，表 6.17 是公司税前利润和表 6.22 是公司资本消耗津贴。其分类如下：SIC1972，1948 ~ 1948 年；SIC1987，1988 ~ 2000 年；NAICS2002，1998 ~ 2008 年。

金融部门中的其他行业的利润也出现了增长，但在时间上要更晚，增长幅度也没有银行业和银行控股公司明显。保险业的利润在 80 年代实现了强劲上涨，经历了 90 年代的下落后从 2000 年呈现强劲的上升态势。以 1980 年为基准，银行利润占经济总利润的比重在接下来的 38 年间增长了 300% ~ 400%。而同期保险业的利润增幅只有不到 100%。房地产业利润在 1990 年后也出现了强劲增长，但 2008 年其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却低于 1970 年的水平。证券、大宗商品投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等行业的赢利率呈现较大的年度波动，只是在 2000 年之后其利润占总利润的比重才出现持续上涨。显然，最近这次泡沫有利于该行业的赢利。但最让我们惊讶的是，证券和大宗商品投资的利润在 1994 年之前呈现缓慢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长期趋势。

放松银行管制和经济金融化似乎对银行业的利润膨胀影响最大，对保险业的影响较弱，而对于证券业来说，只是在 1999 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控股公司独自提供多种金融服务后，其利润才出现明显增长。

图 5 对金融部门中不同行业的雇员收入进行了分解。1980 年之前，各行业雇员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非常稳定的。1980 年后，金融部门中 4 个行业的员工收入都出现相对增长。特别是证券和大宗商品投资这两个行业的增幅更为显著，其薪酬水平从人均国民收入的 1.5 倍增长到令人瞩目的 4 倍。2007 年，该行业雇员的国内平均周收入为 6891 美元，而曼哈顿地区雇员的周收入更是高达 16918 美元，而同期国内雇员的平均周收入仅为 884 美元。在金融系统崩溃前的 2006 ~ 2007 年，证券与大宗商品行业 1 季度的国内工资增长率为 16.4%，曼哈顿地区的 1 季度工资增长率则高达 21.5% (Sum et. al,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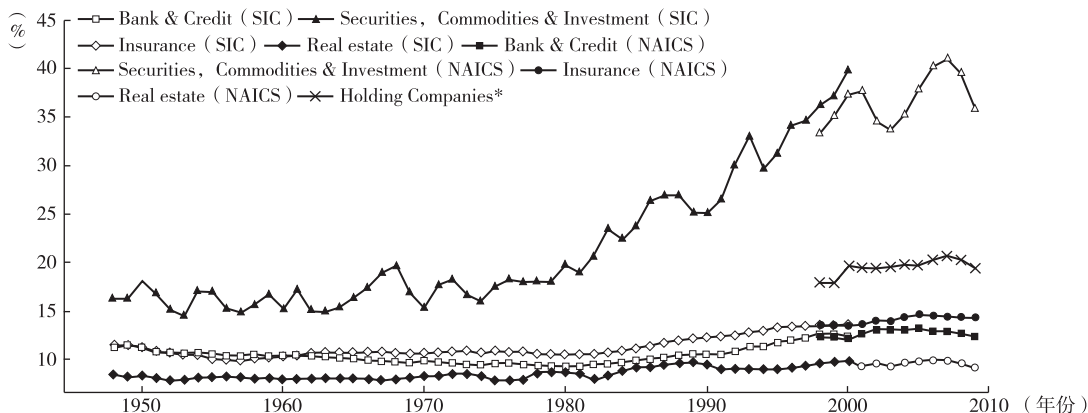


图5 金融部门中各行业薪酬占全国就业收入的比重

注：* 本分类包括了部分非金融控股公司。

资料来源：经济分析局，表6.2是按行业划分的员工薪酬情况以及表6.5是按行业划分的全职员工情况，其分类如下：SIC1972，1948~1987年；SIC1987，1988~2000年；NAICS2002，1998~2009年。

经济金融化还表现在机构投资者的增加，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周转的加快，以及金融活动的普遍化。得益于投资量的膨胀和资金流速的加快，收取佣金的员工成为这一行业中获益最多的人。从图5中可以看到，在1999年以前该行业的利润很低，没有出现增长的迹象，由此可以推论，至少在1999年之前，证券业金融化的主要受益者是公司雇员而非公司所有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业和保险业，1980年后其雇员收入占总薪酬的比重很低，甚至当该行业绝对利润在2000年后加速增长时，其雇员收入趋势依旧无法摆脱水平态势。房地产业平均薪酬变动也呈现水平态势，各年份的雇员薪酬水平平均接近国内平均水平。当然，行业层面较低的收入会掩盖行业内收入的严重不平等。1999年后出现的银行控股公司是一个包括银行、投资和保险业务在内的混业经营主体，它的平均收入水平要远远高于传统银行业。

综合图4和图5可以看出，与金融化相关的收入租金（Income Rents）被不同主体获得，在银行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主要被资本获得，而在证券业则主要被雇员获得。尤其是银行业，似乎已经在放松金融管制中获取了从全社会收取经济租金的能力，这也使它实现了最为持久的赢利。而证券和大宗商品行业向来采取合伙制的组织形式，因此投资活动的膨胀让员工大发“意外之财”。

为进一步分析金融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情况，我们从《当期人口普查》中寻找有关个人的国内典型数据。这些数据来自于自我报告，而且采取了最高薪酬水平基准线（top-coded for salaries）的统计方法。因此，这些数据低于实际的高薪酬水平。对于实际的高薪酬水平，不仅见于劳和卡普兰（Rauh and Kaplan, 2010）的研究报告，而且

在金融危机期间和其后也被媒体广泛报道。^① 图6显示了金融部门各行业雇员年均收入与非金融部门雇员年均收入的变动。^② 可以看到, 银行业、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基本趋势和基本比率与图5基本相同。而证券和大宗商品投资则呈现出差异, 尽管其薪酬增速依然快于非金融部门, 但只是从国内平均水平的1.5倍增长到3倍, 而不是此前的4倍(如图5所示包括全部薪酬)。考虑到取样及统计方式隐藏的部分高收入, 《当期人口普查》的估算数据精度较低, 它不能反映证券和大宗商品投资行业极高收入者获得的工资租金(wage rent)。正如劳和卡普兰(Rauh and Kaplan, 2010)指出的, 就是这批人越来越多地进入全国收入最高的前千分之一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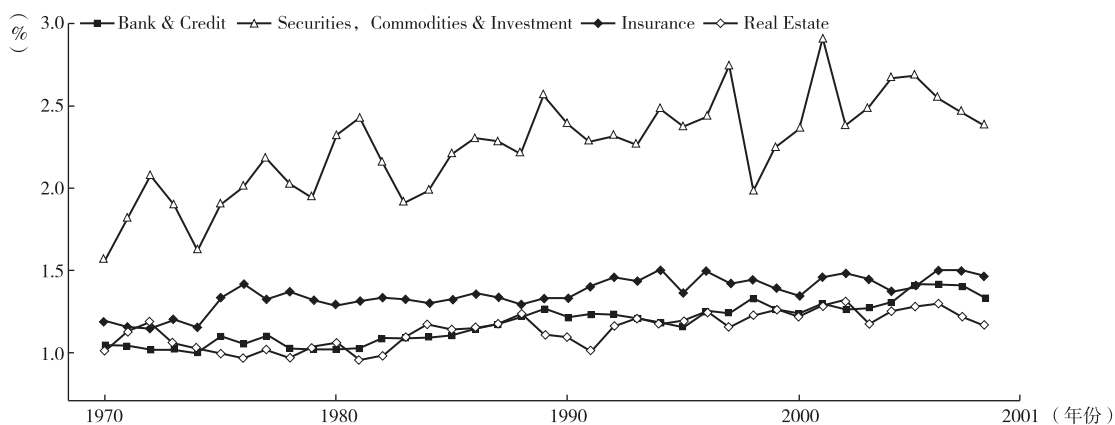


图6 金融部门各行业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年度收益观测值 (CPS 估值)

菲利蓬和谢夫 (Philippon and Reshef, 2009) 认为, 雇员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高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金融部门收入的增加。金融部门雇员平均收入的上升, 到底是源于其技能的加强, 还是源于收入租金的上升, 对此仍未形成一致意见。正如许多主流评论家强调的, 高技能雇员因高收入大量涌入金融部门, 而不是高技能雇员创造了高收入。在补充分析中我们发现, 银行和证券业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的比重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经济部门, 但房地产和保险业没有发生这种变化。类似的, 只有银行业和证券业在此期间发生了职业结构的升级。

在图7中, 我们基于员工的经验(年龄)、教育、性别、种族、工作时间及该时期

① 相比于非金融行业, 银行业和保险行业的保密观察值约为其两倍, 而证券行业的保密观察值是其13倍 (Philippon and Reshef, 2009)。

② 在菲利蓬和谢夫 (Philippon and Reshef, 2009: 37) 的研究之上, 我们利用自1995年以来所有调查年份的保密收入的1.75倍来修正金融部门被低估的相对收益。1995年后, CPS使用保密分类的组平均值来估算保密值。

的职业结构调整建立了回归模型,测算各部门具体年收入的趋势。^①在图7中,每个行业的就业平均收入也呈现相同的上升趋势,尽管其峰值并不显著。在证券业,租金上涨幅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5倍,而在图6中为3倍。金融部门的其他3个行业的租金也同样上升,其中房地产业租金较全国平均水平上升1.17倍,保险和银行业上升1.35倍。控制成分变化对于银行业和保险业收入增长问题几乎没有太多解释力,而对于房地产业的收入增长则更是无法解释。证券业中接受高等教育的雇员比重和高级技能职位都显著增加,但由此并不能从模型中分离出相应的因果次序。我们认为,更有可能存在的是这样一种关系:接受高等教育的雇员比重与高级技能职位的增加是证券业租金收入机会增加的结果,而不是相反。瓦耶(Oyer, 2008)提供的论证符合我们的这种直觉,他发现,投资银行家并不是预先掌握高级技能后赶赴华尔街工作的,相反他们是华尔街批量制造的产物。克罗蒂(Crotty, 2009)和罗斯(Roth, 2004)的研究也表明,投资企业进行选择决策的基础往往不是其技能,而是对其他既存交易商行为的参照和仿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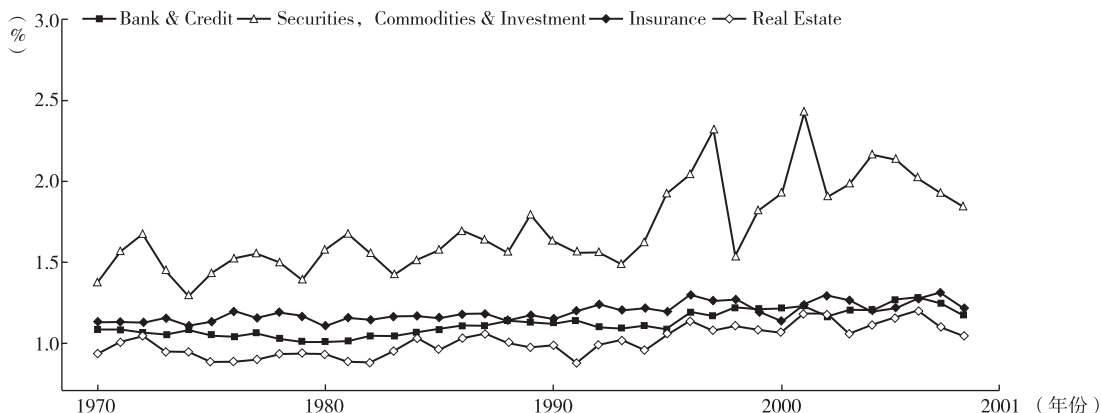


图7 金融部门各行业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预计年收入
(对行业中雇员与职业构成调整后的CPS估值)

为了进一步研究每个行业的收入分配情况,我们将回归模型进行扩展,分别讨论教育、职业、性别和种族对金融部门雇员收入租金的影响趋势。研究发现,金融部门收入租金的实质性上升并非惠及所有雇员。在金融部门的4个行业里,80年代后期不断上升的行业租金基本上流向了管理层、专业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中的高学历者。相比之下,职业级别较低和学历较低的雇员获得的收入租金非常有限甚至为零。在所有4个行业中,

① 利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每年的基本回归值,计算公式如下:年度收益 = $b_0 + b_1$ (教育) + b_2 (年龄) + b_3 (性别) + b_4 (种族) + b_5 (年度工作时间) + b_{6-8} (职业结构) + b_9 (金融行业) + e (误差项)。

男性白人 1980 年后的收入增长超出了其人力资本和职业地位，而少数族裔的男性、女性及女性白人的收入轨迹则呈平缓态势（根据需要可得出该分析结果）。与全国趋势相比（Morgan and McKerrow, 2004），金融部门的不寻常之处在于，男性白人获得的租金收入不断增加，其幅度甚至超出了他们的职业地位特权。显然，与职业化及男性白人的机会囤积（这有利于其收入的增长）相比，我们前面描述的制度转变才是导致金融部门收入增加的更根本和外生的原因。

五 总租金的反事实估计

为了测量金融化期间租金总收入转移到金融部门的规模，我们进行了反事实分析：假如金融部门收入与就业占国内经济的比重维持在 1948 ~ 1980 年的历史平均水平，那么其现期利润与薪酬水平将会是多少？^① 我们以两个简单的反事实情况来进行估算。这两种情况试图追问，如果金融部门没有出现制度变化，如果金融部门集中度没有加强，监管没有放松，有关金融市场理性和自动调节的观念没有被普遍接受的话，事情会变成怎样？为此，假设金融部门的雇员平均薪酬，部门就业占总就业量的比重，以及经济中各部门的利润份额保持在 1980 年之前的水平。第一个反事实为如下假设，即 1980 年后长期平均收入份额继续维持了 1948 ~ 1980 年的平均水平。在第二个反事实分析中，我们对 1948 ~ 1980 年的线性趋势进行估计，并以该趋势预测 1980 年后的预期收入。因为在 1980 年之前薪酬趋势非常稳定，因此这两个估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银行利润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在 1980 年以前已出现上升趋势，因此，对金融化引起的利润向金融部门转移的估算值要比实际规模小。因为对金融部门的不同行业而言，1980 年前后的趋势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将分别逐一进行反事实测算，最后加总获得金融部门的总量估值。^②

表 2 估算了金融部门获得的净额外收入，包括利润和雇员薪酬两部分。我们认为，在 1980 ~ 2008 年，金融化导致 5.8 万亿 ~ 6.6 万亿美元的收入转移到金融部门，其中约 2/3 是利润。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获得了这些收入的大头，约占 65%，并且其中的 90% 是利润。重要的是，与制度变化相一致，大部分收入转移发生于 2000 年之后，其规模大约占总转移额（5.8 万亿 ~ 6.6 万亿美元）的一半。

① 表 1 中的估计收入包括 1998 年后金融部门的控股公司收入。这种从 SIC（国家标准分类）到 NAICS（北美工业分类系统）的对应变化以及两个系统过渡期的收入变化表明大部分收入实际上转移到了金融部门。

② 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范围内收入的影响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我们认为哈维（2010）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指出这种影响取决于他国对美国的依赖度。那些效仿美国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国家（如爱尔兰、西班牙）出现了类似的崩溃，那些依赖于对美国出口或通过全球金融部门进行融资的国家将经历更广泛的经济衰退，那些只受到轻度影响的国家或由于其规则严谨（德国），或由于突发事件（黎巴嫩），几乎没有触及金融危机。

表2 反事实模型对金融部门1981~2008年转移性收入的估算（以2011年的美元为基准）

方 法	1981~2008 年		2000~2008 年	
	平均值	趋势值	平均值	趋势值
净额外利润（美元）	4844904	3484117	2219578	1767677
净额外补偿（美元）	1714435	2335738	961463	1239321
总租金收入（美元）	6559339	5819855	3181041	3006998
利润/总租金（%）	73.90	59.90	69.80	58.80

注：平均值方法：利用金融行业1948~1980年的详细数据，使用年度平均的国家利润/总租金这一比例趋势来预测在1980年之后的预期收入。趋势值方法：利用金融行业1948~1980年的详细数据，使用国家利润/总租金这一比例的线性趋势来预测1980年之后的预期收入。

六 结论

在2008年，金融部门积累了大约近1/4的GDP和超过1/4的利润。金融部门员工的薪酬从之前的经济总体平均水平上升到比其他部门高出约60%的水平。这些变化代表5.8万亿~6.6万亿美元（按2011年美元计算）收入转移到了金融部门，其中大部分是利润。从长期看，6.6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私营部门1980~2008年收入（利润+工资）增长总额的13%，还相当于2010年美国联邦债务累计总额的73%。而从金融崩溃的短期成本看，6.6万亿美元是美国次贷房地产泡沫破灭后IMF估算的全球资产损失额的两倍还多（Lewis，2010）。

当然，金融部门行为者可能会将这笔金额解释为挣得性收入而非转移性收入。而从租金理论的视角看，显然是这些行为者权力的增强使其获得国民收入的更大份额。市场竞争和监管的弱化为收入转移的发生提供了制度权力与市场权力。毫无疑问，如果金融部门行为者没有利用这种权力的话，金融部门的转移性收入就不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是，凭借其可观的游说创新活动，这些行为者“制造”收入增量。从金融企业中的行为者视角看，这种增量似乎是个人和集体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么讲故事的话，那么所有的市场成功都可以被解读为个人才能与奋斗。

金融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上升可能是以经济中其他行为者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新古典模型的可能解释是，由于金融化提高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因此它能够提高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并进而提高所有经济行为者的收入水平。然而，史托克哈默（Stockhammer，2004）和奥尔汉佳吉（Orhangazi，2008）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是金融化削弱了非金融公司在生产性资产方面的资本投资，越来越大比重的现金流以不断增加的利润的方式转移到金融部门。弗里格斯坦和信（Fligstein and Shin，2007）以及科瑞尔（Krier，2005）的研究表明，当非金融公司以追求股东价值为目的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

我们对金融部门的收入增长进行详细的行业分解，分析其在劳动和资本之间以及不同阶层的雇员之间的差异。金融部门中利润增长额的大头流向了银行业，包括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后成立的银行控股公司。正是这些银行控股公司（以及AIG集团、房利美、房地美以及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成为2008~2009年金融体系崩溃中联邦紧急救助方案的直接受益者。无论这种救助方案对维持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多么重要，它挽救的这批公司从1980年以来在整个经济中攫取的经济剩余都越来越多。1990年后，银行持续控制着超过15%的经济总利润，2000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20%以上。在联邦政府救助它们之前，这些企业已经获得了比“二战”后历史常态水平多4.9万亿美元左右的额外利润。

我们希望本文能对租金理论和分层分析产生更广泛的贡献。这些文献倾向于观察收入的动态变化，并推断引起这种变化的过程。通过勾勒制度性变化及其引发的行业租金，我们展示了金融部门中的政治和市场机制，正是这种机制生产和分配了国民收入。当存在针对市场规则的制度实践和政治调整——它们会生产（或破坏）收入租金——时，租金理论的解释就更为合理。在租金理论基础上，引入制度分析非常有助于理解市场和政治权力，因为市场权力的真实基础是不应被假定的，而应被揭示的。

克瑞普纳（Krippner, 2011）对金融化的分析表明，金融化源自于一系列的特别的、看似相互独立的发展过程，而所有这些发展导致了金融市场的信贷泛滥和监管放松。相比之下，租金理论倾向于关注保护或稳定市场租金的政治行动。为了保护市场租金，金融部门当然采取了不遗余力的政治行动。而我们的分析表明，金融化的出现离不开一些偶发事件，甚至金融部门大力支持的放松管制运动，也毫无疑问地首先得益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舆论的广泛兴起。在1980年之后，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基础的金融监管遭到金融部门的持续抵抗。在2010年，金融部门再次发动了激烈的抵抗，这就是限制《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the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适用范围而进行的猛烈游说。

我们的分析还表明，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对扩张金融投资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当市场力量的作用来自产业集中和政治权力，那么废除、限定和躲避监管就显然是很重要的，而对机构投资者金融服务和投机回报的需求也就应运而生。当然，缺少监管的市场结构使得这些投资变得更有吸引力，金融投机和金融创新的兴起创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循环——预期的高回报率导致了对金融资产的更多机构投资甚至家庭投资。对于需求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多说一点。如果不存在反复发作的金融泡沫，那么投资者是有可能转向生产性投资，而不是金融资产投资。

通过这种制度分析,我们发现了对租金理论的一项修正,即将单一权力模型转换为多头行为模型。因为租金理论通常不观察制度变迁进程,因此它能够告诉我们的是单一行为者市场权力变迁的故事,如银行(Crotty, 2009)或商业精英(Hacker and Pierson, 2010)对政府的控制。我们所观察的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即一般的资本主义危机导致放松管制需求的合法化。在70年代的高通胀时期,银行的低利润以及消费者对更高利率的需求,推动放松金融管制运动迈出第一步。对于放松管制的金融部门而言,机构投资者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崛起成为金融创新的动力源,而已经放松管制的金融部门也开始变得更加集中。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金融部门产品联合的最后限制,以及监管机构对市场有效论的采纳,为创建大型多功能银行控股公司提供了便利条件。正是这类公司现在主导着美国 and 全球金融市场的各个方面。进入21世纪后,对利润扩张点的追逐引发了房地产泡沫,大量抵押贷款被创造出来。这些抵押贷款又为不受监管的CD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及其风险的对冲搭档——信用违约互换市场提供了融资来源。显然,租金理论有关市场和政治权力的解释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都得到反映。但与此同时,这些事件也反映出其他行为者的影响:消费者为抵抗通货膨胀而要求更高的利率,机构投资者使用现金进行投资,公司CEO和股东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即时回报,甚至联邦储备银行也试图淡化其制造失业及放缓工资增速的政治作用。因此,在承认权力对于市场租金发挥根本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市场租金的许多特质都带有多方行为者的标记,即他们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努力解决所面临的不同问题。在1980年前后,非金融部门的精英和政府可能是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主导者,此后他们逐步丧失了和金融部门中的主导地位。

我们还整理了金融化产生的行业租金流向部分劳工阶层和资本的过程。1980年之后,这些金融行业的经理、专业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的收入普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证券业雇员的收入不仅增长最快,而且优先于赢利率的增长。在证券业中,优先增长的是拥有市场权力的雇员的薪酬而不是利润,这是金融化阶段的重要特征。投资银行历来就是按合伙制而非公司制组织起来的(Davis, 2009),这可能是我们观察到的雇员获取高额回报的制度前兆。此外,保险和证券业雇员平均工资的增长同样领先于行业赢利率的增长。在这两种情况下,管理层和销售人员的绩效薪酬方案似乎优先于利润增长,而且这种薪酬方案甚至可能有助于创造出与投资 and 房地产泡沫相关的利润激增。克罗蒂(Crotty, 2009)认为,雇员收入的增幅来源于经济租金,在投资界拿高薪酬的“呼风唤雨者”是系统性风险的根源,而后者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系统的崩溃。

从历史维度看,2008年金融部门的崩溃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可能也是该部门租金毁灭的潜在时刻。我们已经知道,整个金融行业的利润在2008年进入负增长状

态，但在2009年和2010年出现了强劲反弹。菲利普和谢夫（Philippon and Reshef, 2009）的研究显示，金融部门租金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和其后经历了巨幅下降。其部分原因是银行系统崩溃形成的冲击，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随后不断加强的金融监管。因此，2008年金融部门的崩溃，以及联邦紧急救助方案引发的金融再膨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上都是令人感兴趣的，它有可能是金融部门租金毁灭的关键时刻。当前，我们对于金融部门崩溃的后果还知之甚少，但租金理论预示着，政治上更有权力的行为者将试图保护现存的市场制度和获取租金的能力。显然，2009年和2010年的美国政治充分展示了这种努力。金融产业雇员获得的高工资和奖金反复成为新闻和政治的热点问题。我们同时注意到，大银行及银行控股公司正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偿还联邦紧急救助款，以便能够合理地向顶级雇员支付高工资。最后，对未来收入分配产生最大影响的是银行业与其他行为者之间有关新的监管采取哪种合理形式才能管理系统性风险并保护消费者免受租金榨取的斗争。这些监管采取何种形式以及如何实施，将很可能决定了金融部门所占有的国民收入的份额。不幸的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计，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不会出现根本性转变，作为经济政策新宗教的金融将会继续维持其统治地位（Davis, 2009）。

我们的分析指出，联邦政府不仅是金融部门放松管制的源头，而且不能胜任对新兴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工具的监管。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摆脱国家监管的政策和学术运动，那么金融化可能就是它最基础的产品，而国家财富向金融部门的转移也就当然是它显著的后果。金融部门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投资者面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联邦支出赤字膨胀到空前的规模，家庭部门也蒙受巨大灾难。既然如此，那么很明显的是，金融部门的经济权力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成为未来收入分配政策的核心问题。

未来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方向。收入向金融部门转移的事实暗示我们，经济中的其他行为者可能已经意识到，危机前其收入损失与国民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可能正是金融化的后果（Hacker and Pierson, 2010）。我们猜测，其他国家的金融化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收入转移问题。同时，我们还猜测，金融占据物质和文化的中心地位有可能已经破坏了生产性工人主张收入权的能力。在目前的工作中，我们正在调查这些变化。

我们应该系统地分析金融化抑制总体经济增长的真实可能性。对此至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化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投资（Stockham, 2004）。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金融化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刺激了外国资本在美国的投资。关于这两个过程的宏观经济关系，至今还并不清晰。

美国金融业的崩溃使得系统性风险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怀疑，嵌入国家和

全球的网络模型是否能取得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美国金融的崩溃立刻引起美国经济的衰退,而且也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不可否认,其中一些可能是相同的系统网络过程引发的结果,但美式金融化的制度扩散对于不同经济体可能已经造成了差异化的风险模式。

当然,总是有人会为租金埋单。在本例中,埋单者似乎是美国经济中金融部门以外的行为者:不仅包括把越来越大的收入份额转移给金融部门的非金融公司,而且包括家庭部门,其工资因雇主们权力的下降而受到抑制,但其支付给金融部门的费用和利息不断增加。这些方式表明,金融部门采取了更精明的手段从其他经济行为者那里攫取收入。当然,由此也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机构投资者热衷于短期的金融投机回报,而忽视长期的生产性资产投资。

参考文献

- [1] Baran, Paul A. & Sweezy, Paul M. 1966.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2] Burt, Ronald S. 1983. *Corporate Profits and Cooptation: Networks of Market Constraints and Directorate Tie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3] Crotty, James. 2009. "The Bonus - Driven 'Rainmaker' Financial Firm: How These Firms Enrich Top Employees, Destroy Shareholder Value and Create Systemic Financial Instabilit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ERI Working Paper* 209.
- [4] Crotty, James. 2005. "The Neoliberal Paradox: The Impact of Destructive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Modern' Financial Markets on Nonfinancial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Neoliberal Era," in Gerald A. Epstein (ed.) *Financ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 [5] Davis, Gerald. 2009. *Managed by the Markets: How Finance Reshaped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Dobbin, Frank and David Zorn. 2005. "Corporate Malfeasance and the Myth of Shareholder Value,"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17.
- [7] Dobbin, Frank and Jiwook Jung. 2010. "The Misapplication of Mr. Michael Jensen: How Agency Theory Brought Down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ight Again," in *Market on Trial: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the U. S. Financial Crisis: Part A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Volume 30B. Emerald.
- [8] Epstein, Gerald A. and Arjun Jayadev. 2005. "The Rise of Rentier Incomes in the OECD Countries: Financialization, Central Bank Solidarity and Labor Solidarity," in Gerald A. Epstein (ed.) *Financ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 [9] Fligstein, Neil. 2001.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0] Fligstein, Neil and Taekjin Shin. 2007. "Shareholder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 U. S. Economy, 1984 – 2000,” *Sociological Forum*.
- [11] Fligstein, Neil and Adam Goldstein. 2010. “The Anatomy of the Mortgage Securitization Crisis,” in *Markets on Trial: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the U. S. Financial Crisis: Part A,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Volume 30A. Emerald.
- [12] Fourcade – Gourinchas, Marion, and Sarah L. Babb. 2002. “The Rebirth of the Liberal Creed: Paths to Neoliberalism in Four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3] Guillén, Mauro F. and Sandra Suárez. 2010. “The Global Crisis of 2007 – 2009: Market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Markets on Trial: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the U. S. Financial Crisis: Part A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Volume 30A. Emerald.
- [14]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5] Harvey, David. 2010.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6] Jensen, Michael C. and William H.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 [17] Krier, Dan. 2005. *Speculative Management: stock market power and corporate change*. NY: SUNY Press.
- [18] Krippner, Greta. 2005.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S Economy,” *Socio – Economic Review*.
- [19] Krippner, Greta. 201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ial Exuberance,” in *Markets on Trial: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the U. S. Financial Crisis: Part A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Volume 30B. Emerald.
- [20] Krippner, Greta. 2011.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1] Lewis, Michael. 2010. *The Big Short: 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 New York: Norton.
- [22] Miller, S. M and Donald Tomaskovic – Devey, 1983. *Recapitalizing America: Alternatives to the Corporate Distortion of National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 [23] Mintz, Beth and Michael Schwartz, 1985. *The Power Structure of American Busin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4] Morgan, Stephen L. and Mark W. McKerrow. 2004. “Social Class, Rent Destruction, and the Earnings of Black and White Men, 1982 – 2000,”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 [25] Orhangazi, Özgür. 2008.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US Economy*.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 [26] Oyer, Paul. 2008. “The Making of an Investment Banker: Stock Market Shocks, Career Choice, and Lifetime Incom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 [27] Philippon, Thomas and Ariell Reshef. 2009.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ial Industry: 1909 – 2006,” *NBER Working Paper*.
- [28] Prasad, Monica. 2006. *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 The Rise of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in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9] Prechel, Harland and Theresa Morris. 2010.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d Political Embeddedness on Financial Malfeasance in the Largest U. S. Corporations: Dependence, Incentives, and Opportuni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30] Rauh, Joshua D. and Stephen N. Kaplan. 2010. "Wall Street and Main Street: What Contributes to the Rise in the Highest Income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 [31] Roemer, John.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32] Roth, Louise Marie. 2004. "Engendering Inequality: Processes of Sex Segregation on Wall Street," *Sociological Forum*.
- [33] Sakamoto, Arthur and ChangHwan Kim. 2010. "Is Rising Earnings Inequality Exploitative?: Evidence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U. S. , 1971 – 1996,"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3: 19 – 43.
- [34] Sorensen, Aage B. 1996.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35] Sorensen, Aage B. 2000. "Toward a Sounder Basis for Class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36] Stockhammer, Engelbert. 2004. "Financialisation and the Slowdown of Accumul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 [37] Sum, Andrew and Paulo Tobar with Joseph McLaughlin and Sheila Palma. "The Great Divergence: Real – Wage Growth of All Workers Versus Finance Workers," *Challenge*.
- [38] Tomaskovic – Devey, Donald and J. B. McKinley. 1981. "Bailing Out the Banks: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Debt," *Social Policy*.
- [39] Tomaskovic – Devey, Donald and Sheryl Skaggs. 1999. "Workplace Gender and Racial Composition and Productivity: An Establishment Level Test of the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Hypothesis," *Work & Occupations*.
- [40] Useem, Michael. 1983.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 S. and U. 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1] Useem, Michael. 1993. *Executive Defense: Shareholder Power and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42] Useem, Michael. 1996. *Investor Capitalism: How Money Managers are Changing the Face of Corporat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43] Vogel, David. 1986. *Fluctuating Fortunes: The Political Power of Busi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44] Weeden, Kim A. 2002. "Why Do Some Occupations Earn More Than Others? Social Closure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置盐《积累论》再考察*

中谷武**

高晨曦*** 译

摘要 置盐信雄的《积累论》(初版)于1967年出版。其后,虽然经济理论自身在经历了日本与世界经济增长率低下,以及形形色色的危机中有了很大改观,现在的近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却并没有改变。与此相对,马克思经济学与后凯恩斯派经济学等批判经济学也呈现出新的动态。本文将从4点出发整理置盐《积累论》的基本内容,①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②不均衡及其积累性,③利润与投资的主导性,④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规律,以评价其在当下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将把最近广为研究的一种批判性经济理论——卡莱茨基等后凯恩斯派作为对象,讨论其贡献和问题。

关键词 置盐《积累论》 后凯恩斯派 卡莱茨基派 中期模型

前言

置盐信雄著作《积累论》出版以来已有47年。正如其名所示,《积累论》的主题正在于揭示经济中积累过程的特征。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采取的一种特殊生产关系,从这一特殊性出发,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现象呈现出来。《积累论》的目标正是试图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角度,说明生产及就业的决定、经济周期与增长、利润率与实际工资率的决定等无论哪个经济学家都会研究的现象。《积累论》出版迄今约有半个世纪,其间,种种新的经济现象产生了,经济理论也发生了变化。在当下再度探讨《积累论》的目的有以下两点。

(1) 在考虑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的基础上,《积累论》提出的主要观点究竟是什么。

(2) 置盐的《积累论》是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严厉批判,然而如何从置盐《积累论》的思想出发,评价现在引人注目的主流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Heterogeneous Economics),特别是卡莱茨基派的模型。

* 本文原文为日文,原文首发于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会刊《季刊经济理论》第50卷第4号,第5~15页,感谢日本经济理论学会以及原文作者中谷武教授对本文中文译文的转载许可。

** 中谷武,曾任神戸大学、流通科学大学教授,现为尾道市立大学校长。

*** 高晨曦(1993~)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会代理书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本科生(gaochenxi@sina.com)。

以下,我希望能针对这些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 置盐《积累论》提出的问题

置盐信雄的《积累论》共有4章,第一章“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构造”,第二章“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大再生产”,第三章“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与危机”,以及第四章“资本主义制度积累的倾向规律”。其主要观点大概可以被总结为以下4个论点:

- (1) 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
- (2) 不均衡及其积累性;
- (3) 利润与投资的主导性;
- (4) 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规律。

1. 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

为了使特定的生产关系能够正常发挥功能,人类的生产力不得不事先具备某种特定的性质和水准。只要人类社会还要存续下去,生产力的发展,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废弃及向新的生产关系的转移就是必然的。置盐的《积累论》也涉足了这一马克思的基本命题,并进一步举出使这一主张成立的下面两个根据:

- (1) 生产力即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的发展,对确实保证人类的存续是绝对必要的;
- (2) 特定的生产关系能够固着于生产力的唯一特定性质、水准下,并发挥功能。

前者认为,无论多高生产力水平对人类的存续而言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主张(生产力的)发展和持续是绝对必要的。从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在空间范围和时间长度上不断扩大的历史来看,这一条件在经验上是妥当的吧。在《积累论》中,置盐并非是从人类本性对利润、便利和快活永无止境的追求中得出这一根据的,而是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自身自然地引起了不可逆的变化这一客观事实。只要在生产活动引起作为对象的自然“不可逆的变化”中,生产活动的效率没有上升,(人类)就无法有效地驾驭自然。若这一理解是正确的,要提高人类的生产力就不是回归到“小则美”这样相称的技术,或是改变“吾唯足知”,而是进一步推进全球的自然变革活动。生产力停留在固定层面就将成为人类存续的威胁。因此,这一主张是否妥当该是极其重要的吧。

后者主张,资本主义经济使生产力超越一定水准,第一次使其能够发挥功能,若生产力超过某一水准并继续提高,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安定和停止的现象,并危及人类的存续。置盐主张的就是,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力已经接近了这一上限(水准),或者说已经跨过了这一水准。这一主张的现实性在本书出版后的半个世纪内进一步增加了,这一点只要看到二氧化碳引起的全球变暖与核事故的严峻性就很明

确了。尤其是,虽然各国固有的生产力水准中,有主要发达国家这样高的(生产力)水准,也有发展中国家这样低的水准,但不管存在怎样的差别,只要某些发达国家的生产力超过了一定阈值,环境问题就将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愈演愈烈,这一事态是很清楚的。尽管这是一个紧急的课题,但国际社会尚未找到解决困境的良策。这里,《积累论》在第四章的4项“资本主义制度改革”的“b. 人类存续的现实方向”中论述了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型的必要性。本书并未具体讨论转型后的社会具有怎样的具体形态。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转型)是可能的吗?有必要进一步地向新的社会转型吗?本书的立场很明确,更具体地展示新社会的基本构造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2. 不均衡及其积累性

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生产的支配性阶级社会。不存在一元地统领社会全体生产的主体,单个的企业在不确实的预测与谋取私利的导引下部分地承担(社会生产的)决定。因此,在各个领域都必然存在不均衡。然而现在的经济学者却从未有人对这一不均衡的发生提出异议。问题在于,是否可以认为这一不均衡能够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顺利地解消。以新古典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虽然将均衡状态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但这并非否定不均衡会发生,他们大概是认为(这一不均衡)是能有市场机制迅速解消的,仅仅是一时的搅乱吧。

不均衡一旦产生,并不会由于市场机制而迅速复归于均衡,而是逐渐增加、扩大。这既是哈罗德强烈主张的命题,也是置盐《积累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学时最重视的基本命题。

这一基本命题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特色,在这层意义上,笔者认为,哈罗德的这一研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凯恩斯的“一般理论”以后取得的少数成果之一。(置盐信雄,1967:200)

尽管哈罗德的著作《走向动态经济学》(*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发表以来现在已经过了65年,这一不安定性命题仍然具有最高级的重要性。在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解中,凯恩斯理论是不景气时期的经济学,而20世纪60年代高速成长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克服了有效需求的问题。据此,如果政府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就能脱离不景气,因此资源能够得到完全利用,这一均衡状态就是新古典派经济学的世界。然而,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这一信念被20世纪70年代以后卷土重来的不景气问题动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克服了不均衡与不安定性的确信,不断遭到现实的否定。美国的“大安定”(Great Moderation)就是典型的例子。21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界广泛确信,格林斯潘的金融政策已经解消了不均衡,使长期的安定

成长达成了。

过去 20 年间经济活动最为显著的特征可以说是宏观经济的不安定性大大减少了。在最近的论文中，Olivier Blanchard 和 John Simon（2001）向我们展示了，实际产出量（通过标准差测量）的四个半期成长率约半数的分散度，以及四个半期通胀率的约 2/3 的分散度得到了减少。有几名论者将这一产出和通胀率变动率的同时显著下降称作“大安定”（The Great Moderation）。我们也能观察到，这一产出和通胀率变动的减少在其他的主要发达国家也是同样的。只是，过去 10 年间遭遇一连特殊的经济困难的日本是一个例外。（Bernanke, 2012: 145）

此外，在 2003 年的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会长演讲中，罗伯特·卢卡斯叙述道：

作为对世界大危机的一个理性反应，1940 年，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明确的学问领域登场了。当时，这一名称意味着不要再重复这样悲惨的经济状态，能够实现这一期待的知识和实践的一大体系。我希望在这次演讲中主张的是，在当初的意义下，宏观经济学已经完全成功了。也就是说，预防不景气的中心问题在实际的目的层面上被解决了，这是真的，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被解决了。（Lucas, 2003, : 1 - 14）

主流经济学的这一乐观的确信，随后就被次贷危机与 2008 年的雷曼破产事件以及世界（各地）同时遭遇的严重不景气证明是一个错误。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能够成功消灭经济周期。

无论怎么否定，只要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下，不均衡的发生及持续就不可避免。这是仅仅从不均衡的消解及均衡化这样的静态层面，来理解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导致的。根据《积累论》的理解，不均衡的扩大有如下 3 个根据：

①资本主义制度是采取商品形态的剥削社会；

②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被剥削，而仅靠他们的消费需求是不能解决（商品价值的）实现问题的；

③虽然对（商品价值的）实现问题的解决而言，资本家进行的积累需求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不得不以私人利润为目的采取无政府行为。

这三个根据中，②和③是由①派生出来的，①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积累论》主张，不均衡的积累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中产生的。

我们已经知道，价格机制是市场调节功能之一。然而，价格机制不会解消不均衡，

也不会使不均衡的积累性消失。所谓价格机制,是指价格迅速变动以反映供给状况,然而即便价格反映了供给的不均衡,也不会消除这一不均衡。不均衡残留了这样的形式,即利润率从正常值的乖离,或者设备开工率从正常值的乖离,从而实际工资率从正常值的乖离^①。供给过剩这种不均衡,无论是在价格调整下利润率下降,还是由于数量调整(低开工率)收益恶化,形态虽然不同但都是不均衡。 t 期的不均衡是否会在 $t+1$ 期倾向于解消,是由 t 期的供给状态如何影响下一次的供给状态决定的。从上述^②^③两个要因出发,积累需求的主导性有进一步扩大不均衡的作用。主流经济学静态地理解市场机制,因而是充分的。

3. 利润与投资的主导性

《积累论》以资本家的积累需要为轴,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因为利润是多数资本家无政府的、私人的决定的目的,积累需求的决定也是以利润率为基准的。这是不均衡得以积累的要因。因此,置盐理论将利润率问题置于中心位置。

(置盐)从以下的两个角度讨论了利润的存在与决定。其一是利润存在的社会条件,这是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精致的数学化工作,它预定将在另稿中得到详述。剩余劳动的存在是利润存在的条件,在其后,为数众多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深化了这一“马克思的基本定理”。其二是利润率是怎样决定的,这种实证理论的利润率,实际上,它表现为卡莱茨基等人的剑桥方程式。以 g 代表资本积累率, h 代表政府财政赤字率, x 代表贸易顺差率,资本家的私人储蓄率为 s_c ,则税后利润 r_n 可以表示为:

$$r_n = \frac{1}{s_c (g + n + x)} \quad (1)$$

将这一等式从右到左,即给定资本家的私人储蓄率,我们能够得出资本积累率、政府财政赤字率、贸易顺差率的大小决定税后利润率。置盐的《积累论》及其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分析的课题》第二章中的“增长的界限”以这一公式为轴,进行了详细的分析^②。

公式(1)是以资本家家计计入储蓄,而劳动者家计全额计入消费为前提的。当然,劳动者也会进行储蓄,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到修正后的公式:

$$s_c r_n + s_w \omega_n = g + h + x \quad (2)$$

在这里, s_w 是劳动者的私人储蓄率, ω_n 为税后劳动分配率^③。帕西涅第(Luigi

① 《积累论》认为利润率的水准影响资本家的生产决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有需要,资本家就不会进行与收益无关的生产。

② 最初将这一问题应用于日本经济的是菊本義治的研究(1981)。

③ 劳动者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译者注

L. Pasinetti) 证明, 如果劳动者和资本家一样受到利润分配的影响, 在满足一定的条件后, 即使考虑到劳动者家计的储蓄部分, 公式 (2) 最终也将回归公式 (1)。在这个“一定的条件中”, 假定资本家和劳动者家计的收益率相等、两者的资产等比例增大是很重要的, 但不得不认为这一假定的成立是困难的。若是这一条件本来就不成立, 或者收益率相等的假定虽然成立但等比例条件不能满足, 出现了这样不均衡的过程的话, 用公式 (2) 代替公式 (1) 进一步推进议论是合理的 (浅田统一郎、间宫阳介, 1984: 209 - 226)。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中, 资本积累的低迷、通过扩大财政赤字促进经济繁荣的界限、通过对外贸易摩擦确保外国市场的界限渐渐明了了。此时被引入的放松监管、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 虽说有再度提高资本积累率的意图, 但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压缩劳动收入份额确保利润率。即使公式 (2) 右边各项持续低迷, 也要通过降低工资收入份额提高利润率。然而 (虽说都是为了提高利润率) 提高公式 (2) 右边各项与降低左边第二项有重大差异。先不论长期、短期内, 右边各项的高积累率、财政政策、出口相关政策都有接受资本、劳动两侧 (要求) 的余地, 即高积累、财政政策、出口增大的直接效果是国内劳资间可能达成双赢关系。然而, 降低左边第二项的劳动收入份额将会明确导致劳资对立。

理解资本主义运动的主要动因在于积累需求, 而决定这一积累需求的要因是利润率。进而, 利润率与设备开工率存在联动。^① 众所周知, 一般而言, 生产技术、利润率和实际工资率是相互依存的。因此, 下一期的资本积累率的决定依存于利润率, 而当期资本积累率决定同期利润率则意味着, 在生产技术一定的条件下, 与资本积累率的运动联动, 实际工资率的动向也会得以决定 (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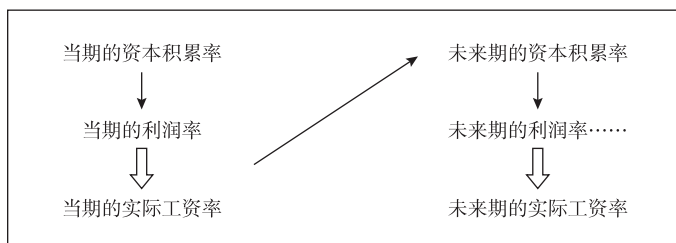


图 1 资本积累率、利润率与实际工资率的联动

只要生产率一定, 就必然出现经济上升周期内资本积累率增大、利润率上升、实际工资率下降, 而在经济衰退周期中资本积累率下降、利润率下降、实际工资率上升。

^① 在《积累论》中, 资本家的开工率决定被假定为利润率的增函数。因此, 设备开工率的状态决定下一期的积累需要, 利润率的水准决定下一期的积累率, 这两者是等价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这一逻辑和置盐晚年论述的竞争和利润率的关系^①。

4. 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法则

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的下降倾向和相对剩余劳动(失业)的积累是资本主义的长期倾向性规律,对此十分重视。这一倾向绝非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即使资本主义成功解决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一避不开的问题仍将存在。在这层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的低下与失业的积累性增大,资本主义的积累正是带有上述困难的结构性问题。众所周知,包括置盐在内,围绕这一长期法则的成立妥当性产生过许多争论,但我们现在不探讨这一点。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长期积累路径,与从劳动时间均衡条件导出的新古典派最佳均衡增长路径,这两种路径完全是不同的。

置盐《积累论》对资本主义长期运动的理解是怎样的呢?置盐在《积累论》第二章和第四章中提示了“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和“均衡积累路径”这两个概念。所谓“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是指,在一定技术与资本存量条件下,每期资本主义经济达成并持续资本设备正常运作及产品市场供需均衡的路径。这一路径上不存在独立的投资需求,为满足上述的均衡条件,投资需求将由内生决定。此外,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这一路径中必要的劳动投入也由内生决定。假定正常产出系数为 σ ,储蓄率为 s ,在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中,生产、资本、投资必然以所有 $s\sigma$ 的比率增大^②。现在假定实际工资率为 R ,就业系数为 ℓ ,工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资本收入完全不用于消费,经济全体的储蓄率为 s ,有 $s=1-R\ell$,存在与实际工资率增大对应的另一条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假定无论哪一条路径都不存在产品销路问题^③,且在资本设备的正常操作上保持一致。这样,路径中利润率 r 为 $r=\sigma(1-R\ell)$,积累需求以 $s\sigma$ 的比率(保障增长率)逐渐增大。

然而,如此大的实际投资需求是无法保证的。如果在保持实际工资率一定的情况下,产生了促进保证增长率^④上升的投资需求,资本的开工率必然上升。此外,如果保持资本的开工率不变,生产品市场的过剩需求导致的价格上升、实际工资率的低下就不可避免。无论如何利润率会上升。结果,下期的投资需求进一步增大。置盐认为,因为资本开工率与利润率间存在一定关系,向上方乖离的过程中,开工率和利润率共同上升,实际工资率逐渐下降。如果积累需求向保证增长率下方乖离,会产生与向上乖离方向相反的积累运动,即产生利润率下降、设备开工率下降、实际工资率增大这

① 有关这一点,请参照置盐信雄(2004),第Ⅲ章。

② 原文直译为生产、资本、投资不得不通过所有的 s 、 σ 率而增大。——译者注

③ 即假设产品的价值实现率为1。——译者注

④ 即资本存量增长率。根据哈罗德,从资本积累率的层面刻画的生长的上限为保证增长率(Warranted Growth Rate);与之对应,从以效率单位测量的劳动力层面刻画的生长的上限为自然增长率,两者一致时,劳动力市场的完全雇佣和资本品市场的供求均同时达成。——译者注

些众所周知的不稳定性。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保证增长路径）正是这一经济变动的轴心，这也是《积累论》第三章“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与危机”中展开的要点。

如果除了产品销售和资本设备正常开工（的假设）以外，资本家还将他们正常考虑下的期待利润率（要求利润率）的实现，添加到“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的条件中，实际工资率就不能过高。如果期待利润率为 r^* ，则实际工资率将成为 $(1 - t^* / \sigma) / \ell$ 。如果固定这一路径上的增长率为 r^* ，期待利润率越高，实际工资率越低，增长率越高，劳动需求也以更大的比率 r^* 逐渐增大^①。

那么，无论从怎样的长期观点来看，这样的“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都不具有持续性。如果给定劳动供给的增长率为 n ，若 $r^* > n$ ，这一路径会撞上劳动供给的天花板，不具备持续性。而在 $r^* < n$ 的情况下则相反，劳动市场上的失业会不断积累。很快，失业率就将超过社会的容忍界限继续上升，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不具备持续性。产品市场的均衡、生产设备的正常运转、期待利润率的实现，满足资本家这3个均衡条件的可持续路径假若被现实的路径（偶然地）达到了，只要 $r^* = n$ 不成立，这一现实路径就不可持续。现实的路径不可能抵达（满足三个条件的）可持续路径，它只能以其为轴，不断进行经济周期的循环，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周期的轴本身是任意的。在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中，还存在与劳动市场不矛盾的路径——均衡积累路径。如果我们考虑技术进步，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率定为 α ，均衡积累率就为 $n + \alpha$ 。这与哈罗德所谓的自然增长率相对应。也就是说，在种种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中，只有与哈罗德自然增长率并存的路径是可持续的。

在此，我们首先应该留意的是，哈罗德的自然增长率，从而置盐的均衡增长率并非完全雇佣路径。现实的路径常常是不均衡的，而不均衡具有（自我）扩大的性质。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之一的均衡增长路径，是以现实的路径为变动基轴的路径。向上乖离的不均衡不会顺利地回归均衡状态，而是导致累积性乖离。资本主义不得不反复循环这一变动，在长期达到均衡积累路径。这种路径与满足每期劳动市场均衡的新古典派最优增长路径是截然不同的。

其次需要留意的地方是，均衡积累路径的存在是否能够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置盐的《积累论》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之一，如果技术进步的形态不能满足特定的条件，均衡积累路径自身就不会存在。对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的两部门经济的分析显示，虽然均衡积累路径可以存在于同步提高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下，但无法存在于生产资料部门的资本集约度低于消费资料

① 置盐在《积累论》的顺利的扩大再生产路径中，并未明确考虑资本家的期待利润率。

部门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虽然置盐《积累论》的主要观点是,技术进步对资本主义经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样的技术进步都是好的,(好的技术进步)必须具有特定的性质。理由之二,生产力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与资本主义制度势不两立。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必须高于某一下限,又不得不低于某一上限。这一点之前已经论述过了。

有一种评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市场机制功能,在长期需要遵循劳动市场的均衡这一制约,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置盐的长期理论同新古典派是相同的。这种评价是不正确的。在置盐《积累论》的动态模型中,对生产和雇佣的有效需求并非只有短期的影响,而且在长期中,这一有效需求的短期影响也在继续。不仅在短期,而且在长期,有效需求也是决定生产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后凯恩斯派主张的这一点对马克思和置盐《积累论》来说都是共同的。不如说这三者与新古典派是不同的。

二 置盐理论与卡莱茨基派模型

在上文中,我们从4个视角整理了置盐《积累论》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后凯恩斯派,他们的中心是最近批判派经济学中备受瞩目的卡莱茨基主义。

后凯恩斯派理论的特征是什么?将有效需求的变化置于决定生产水平和国民收入的基轴,这一点上马克思、凯恩斯、后凯恩斯派和置盐是相同的。除去真实周期论(Real Business Cycle)等一部分特殊的新古典派,有效需求的变化带来短期变动(这一点是公认的)。见解的分歧在于,是否应当认为有效需求会给资本主义长期的生产水平和变动带来恒久影响。对此,拉沃(Marc Lavoie)认为,后凯恩斯派的回答是肯定的,而马克思与新古典派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将之视为马克思派和后凯恩斯派重要的差异。然而,这一主张真的妥当吗?

1. 标准的后凯恩斯派模型

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有效需求都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后凯恩斯派的模型呢?让我们考察经常以标准卡莱茨基模型注目的拉沃的模型吧(Lavoie, 2010: 132-156)。假定利润份额为 m ,资本开工率为 u , (生产能力利用率)资本能力生产比率(正常资本系数)为 v ,则利润率 r 可以写作:

$$r = mu/v \quad (3)$$

这既是利润率的定义式,(同时,)当给定生产能力利用率 u 与资本家得到的利润份额 m 时,它表现了利润率依存并决定于设备开工率。储蓄函数 g^s 和投资函数 g^i 如下式:

$$g^s = s_p r \quad (4)$$

$$g^i = \gamma + \gamma_u u + \gamma_m m \quad (5)$$

在公式(4)中,我们假定利润收入的一定比率 s_p 用于储蓄,而工资收入全额用于消费。投资函数公式(5)虽然具有后凯恩斯派模型的特征,当期的积累需要仍依存于当期设备开工率和成本加成率(Bhaduri and Marglin, 1990; Kurz, 1990; Lavoie, 2010)。在公式(3)~(5)中加入表示产品市场供求均衡式 $g^s = g^i$,我们可以得到下列均衡的设备开工率 u^* 和均衡积累率 g^* :

$$u^* = \frac{\gamma + \gamma_m m}{s_p m / (v - \gamma_u)} \quad (6)$$

$$g^* = s_p \frac{m}{p} \frac{\gamma + \gamma_m m}{s_p m / v - \gamma_u} \quad (7)$$

虽然开工率的调整达成了供求不均衡,但使之安定的条件是公式(6)的分母取正值,即:

$$\gamma_u < s_p m / v \quad (8)$$

2. 与卡莱茨基派模型相关的争论

针对卡莱茨基的这一模型,有如下的批判。

(1) 若假定了经验上合适的参数,对投资函数开工率的反应系数 γ_u 并没有短期凯恩斯安定条件给出的那样小。因此,通常的安定性得不到满足。这种批判的代表人物为达勒瑞(Dallery, 2007)、斯科特(Skott, 2008)。

(2) 在标准卡莱茨基模型的长期均衡中,开工率对正常开工率的偏离、增长率对自然增长率的偏离产生的长期均衡的条件得不到满足。这种批判的代表为库茨(1986)、康米特里(Committeri, 1986、1987)、奥尔巴哈(Auerbach)和斯科特(1988)。

围绕这一批判,异端经济学的论者们的争论还在继续(Setterfield, 2010)。根据拉沃(2010),争论的要点如下。针对第一种批判,(他们认为)同时考察价格调整和产量调整时,就算不满足凯恩斯安定条件,也有可能满足卡莱茨基的安定条件。具体而言,(应该)考虑到开工率和利润份额两方面会受过剩需求影响而变动。

$$\dot{u} = \mu (g^i - g^s) \quad \mu > 0 \quad (9)$$

$$\dot{m} = \psi (g^i - g^s) \quad (10)$$

在这一情况下,安定条件变成:

$$\mu (\gamma_u - s_p m / v) + \psi (\gamma_r - s_p u / v) < 0 \quad (11)$$

这样，即便第一项不满足正的安定条件，只要第二项的负值足够大，将之抵消，卡莱茨基派的模型就是安定的。

针对第二种批判，有几个模型试图做出解释。杜梅尼尔（Dumenil）和列维（1999）是其中之一，他们展示了通过导入金融政策的效果，恢复到正常开工率是可能的。具体而言，将投资函数定义为：

$$g^i = \gamma + \gamma_u u - \gamma_i i \quad (12)$$

假定这一函数除了开工率外，还依存于实际利息率 i 。当实际开工率超过正常开工率的情况下物价将会上升，这被认为将导致实际利息率下降。这种情况下，即便假设单靠开工率的调整无法满足安定性，利息率的安定化作用也可能使体系安定，在均衡状态中开工率与正常开工率一致。

拉沃展示的另一个模型是基于杜特（Dutt, 1990）和卡瑟蒂（Cassetti, 2006）的考察。它假定正常利润率 r_n 与正常开工率 u_n 自身的变动是内生的，具体而言：

$$\dot{r}_n = \phi (u - u_n) \quad \phi > 0 \quad (13)$$

$$\dot{u}_n = \sigma (u - u_n) \quad (14)$$

在这种情况下，安定条件为：

$$\phi' s_p - \sigma' \gamma_u > 0$$

在恒常均衡中，开工率与正常开工率、利润率与正常利润率一致。

这种研究旨在积极地展示有效需求不仅在短期，而且在长期也影响产出量与增长率。同时，该研究也探讨了两种悖论成立的可能性，即储蓄率低下导致资本积累率上升的储蓄悖论（the Paradox of Thrift），边际利润的低下导致利润率上升的成本悖论（the Paradox of Costs）。研究认为是垄断企业的（垄断）加价导致消费的低迷，进一步带来经济停滞，旨在以理论模型积极地提示所谓的施泰因德（J. Steindl）命题。有效需求只在短期（对经济）有影响，在长期支配劳动市场的是均衡状态，这一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先不用说，假定长短期都均衡的极端新古典派模型中，无论储蓄悖论还是成本悖论在长期都不成立。

3. 标准的置盐模型

作为上述标准卡莱茨基派模型的对照，让我们记下置盐的模型吧。虽然《积累论》的理论模型描述的是两部门经济，但是为了与前面（卡莱茨基派）的模型一致，我们将其做如下记述。

利润率与储蓄函数是相同的。

$$r = mu/v \quad (3)$$

$$g^s = s_p r \quad (4)$$

差异在于投资函数与生产决定态度。作为实际开工率对其正常水准偏离的反应,投资函数以前期的资本积累率为基准,决定下一期的资本积累率。

$$g_t^1 + 1 = g_t^i + \beta (u_t - 1) \quad (15)$$

设备开工率是利润率的增函数。

$$u = \varphi(r) \quad \varphi' > 0 \quad (16)$$

这一生产决定意味着,并不是有需要资本家就会进行生产,他们还要求一定的利润。即使在企业不具价格支配力的竞争市场中,产品市场中的过剩需求也会导致价格上升。通过临界条件中经营的企业的扩张,与存量资本对应,产出量(宏观开工率)将上升,由此公式(16)可以成立。内生变量 r, u, m, g^1, g^s 的运动由公式(3)(4)(15)(16)中产品市场的供求均衡和 $g^1 = g^s$ 五个式子决定。通过简单的计算就能知道,因为当期的资本积累率由前期决定,供求均衡的开工率由下式决定:

$$g_t^i = s_p mu_t/v \quad (17)$$

将这一开工率带入公式(15),在均衡条件 $g^i = g^s = g$ 下,我们得到:

$$g_t + 1 = g_t + \beta \left(\frac{v}{s_p m} g_t - 1 \right) \quad (18)$$

存在以均衡积累率为轴的不安定运动。成本加成率 m 由公式(17)决定,实际工资率 R 的运动则由 $m = 1 - R\ell$ 决定。以上是一部门的标准置盐模型,让我们看一看储蓄率变化对动态路径的影响。由公式(3)(4),短期均衡开工率 u^* 为:

$$u^* = \frac{gv}{s_p m} \quad (19)$$

储蓄率的低下和成本加成率的减少通过作用于有效需求,提高了均衡开工率。虽然由公式(18),实现了正常开工率的均衡积累率(保证增长率) g_w 为:

$$g_w = s_p m/v \quad (20)$$

但若资本家的储蓄率 s_p 及成本加成率 m 减少,均衡积累率 g_w 将下降。从而,与均衡积累率相关的储蓄悖论将不会产生。然而,由于实际的增长路径并非 g_w ,而是以其为轴不安定地运动着,因此这一基准路径并不能保证储蓄悖论不产生。正如我们所见,若资本家的储蓄率 s_p 及成本加成率 m 降低,短期的均衡开工率 u^* 上升,从而提高下期

的积累率。这样向上的积累运动的加强,反而抑制了向下的积累运动。由此,即使在置盐的动态路径中,所谓的储蓄悖论也成立^①。

以拉沃为代表的后凯恩斯派认为,马克思派经济学虽然赞同有效需求在短期能左右生产及国民收入,但认为置于劳动市场制约下的长期中,有效需求并不发挥作用,他们批判马克思派和新古典派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然而)我们已经指出了置盐《积累论》的长期与新古典派长期均衡概念的差异。进一步地,通过我们看到的置盐的整体动态过程,因为有效需求(在长期)仍在发挥作用,所以(拉沃等后凯恩斯派)的解释是错误的。至于原因,应该在于他们没有区分长期的运动路径和均衡增长路径。

进一步地,我们也有必要注意,置盐把均衡积累路径定义为不与资本家的均衡条件和劳动市场矛盾的可持续路径。很明确的是,劳动市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长期持续性的条件之一。然而,土地、资源能源和环境的限制等也是条件之一。仅靠维持雇佣(制度)并不能保证人类的存续,土地、能源及环境的限制也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应该将它们的最小限制条件考虑进均衡积累路径。应该考虑到比起劳动市场,环境限制更可能成为可持续性的制约,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建立在劳动市场上的均衡也不应该忽视这种种限制条件吧。

4. 卡莱茨基派模型的问题点

如何评价标准卡莱茨基派的模型呢?有一个论点是重要的,即凯恩斯强调的有效需求是否不仅停留在短期,而且在长期也有持续的影响力。从凯恩斯储蓄悖论的立场看,消费需求的增大(储蓄的减少)进而总需求的增大刺激生产来看,这是当然的主张。然而,论证这一点的标准卡莱茨基派模型却存在缺陷。

• 长期模型的意义

该如何定义长期这个概念呢?论者不同,长期和短期的定义就存在不同。大体上,似乎以下的区分较为流行。

(1) 资本的生产效果:短期着眼于资本积累的需求效果,因此考虑到资本积累增大生产能力这一点的就是长期。

(2) 技术变化:短期的分析一般假定技术条件不变,而考虑了技术变化的就是长期。

(3) 期待(预期)的实现:短期中,经济主体的预期并不必然实现,而实现了预期的状态就是长期。

拉沃讨论的卡莱茨基派模型大多采用(3)作为长期的定义。凯恩斯在《就业、利

^① 此外,因为作为基轴的均衡增长路径下移,在某一时点上由于储蓄率 s_p 及成本加成率 m 的低下,向下的不平衡运动可能逆转,进入向上的不平衡积累运动。

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第12章中也论述了长期预期(Long-term Expectation)。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凯恩斯认为长期中预期会实现。《通论》第12章中,为了说明第4编“投资诱因”的资本的边界效率,指出除利息率外,企业家的长期预期也是重要的。他论述道,不是长期预期的实现,而是长期预期的状态影响当期的投资需求。凯恩斯在《通论》中触及的预期的的重要性有3个,即使用者费用(User Cost)、资本的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①。使用者费用是与企业家生产决定相关的预期,即资本设备是现在使用还是放在将来使用^②。资本的边际效率是一种预期,它通过企业家的积累需求的决定影响总需求。流动性偏好也是通过资金需求影响利息率的要因。虽然凯恩斯强调了预期的重要性,但他只是将其当作决定当期生产活动水准的要因,而没有论及预期的动态变动和预期的实现。同样,《通论》里讨论经济周期的第22章也只是指出了经济周期是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循环变动引起的,并未言及经济增长。

区别于短期,考虑长期变动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应该是(1)之资本生产能力增大的效果吧。预期有时会偏离现实,有时偶然与现实一致。然而,投资需求确实会增大未来的生产能力。(因此)卡莱茨基派模型的第一个问题在于对长期分析的理论设定不充分。

• 投资函数

另一个问题在于投资函数的假定。上述标准的卡莱茨基派模型与置盐模型的差异正如投资函数(5)和(15)的差异。如投资函数(5)那样,卡莱茨基派模型经常将资本储蓄率定义为开工率和利润率或者成本加成率的函数。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开工率调整作为满足一时安定性(凯恩斯安定条件)的条件是否妥当这一问题虽然得到了指出,即使假设它能够得到满足,也只停留在这一均衡状态,从此不再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短期均衡即为长期均衡。与此相对,投资函数(15)虽然是哈罗德不安定性的定式化,但开工率的不均衡会影响下期及以后的积累率。对这种不安定的短期变动预示了怎样的长期运动,有必要另行考察。

卡莱茨基本人并未考虑过像公式(5)那样的投资行动。他的投资行动是考虑了投资计划和实施惯性(时滞)的,如下面的定义式:

$$I_t + \theta = a_1 S_t + a_2 \dot{P}_t + a_3 \dot{O}_t + a_4$$

① 此处作者所提到的与传统的凯恩斯《通论》三大原理,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不同,并非错用或者误译。——译者注

② 使用者费用意味着伴随着资本设备的现在使用,需要牺牲的将来利益。它依存于对现在及将来的租金(工资)等要素费用的假定、库存费用、设备效率的变化和折旧年限等。因此,使用者费用影响生产决定,是联结现在与将来的要因。

在此, θ 是做出投资决定(投资决意)和投资行动发生的时滞, 投资量依存并决定于储蓄 S , 利润的变化率 $\dot{P}$, 生产的变化率 $\dot{O}$ 。在承认卡莱茨基派模型的意义, 并探讨其扩张的情况下, 有必要详细地探讨卡莱茨基自身的投资行动。

5. 对卡莱茨基派模型的评价

无疑, 经济模型是一种分析手法, 明确地回应并提示所着手的课题。同时, 经济模型也是复杂现实的断片, 其妥当性依存于它试图分析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长期的定义也好投资函数的假设也好, 完全可以因论者而异。然而, 若问题是长期经济是否保持短期经济的特征的话, 对长期的定义就一定要妥当。因此对于是否有必要对卡莱茨基派模型的妥当性及卡莱茨基自身的投资行动进行讨论, 如前所述, 答案是肯定的。

虽说如此, 卡莱茨基派模型还是有重要的贡献。例如, 它论述了分配和积累行动的现状能够影响产出水准和增长。近年来, 有不少关于工资主导型经济和利润主导型经济的研究, 它们是以以后凯恩斯派, 尤其是以卡莱茨基派模型为基础的。

由于置盐模型描述积累需求主导从而是利润主导型经济, 只要名义工资率的上升不对资本家的实际投资和开工率函数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它就不会对实际工资率产生影响, 而只是使物价上升而已。置盐模型给出的含义在于, 在通过提高工资刺激总需求并试图由此实现支撑生产和就业的内需型经济的情况下, 单靠提高名义量是有极限的。

过去, 置盐在他的《凯恩斯经济学》一书中, 指出了凯恩斯的总供给函数是生产决定中资本家的利润要求态度, 并批判凯恩斯仅仅从总需求的侧面论述了就业的增大, 而完全未触及总供给函数的移动也可以实现这一点(新野幸次郎、置盐信雄, 1957: 177)。在置盐模型中, 总供给函数的移动与开工率函数的向下移动同样, 在投资行动不变的假定下, 将实现更多的生产与就业以及更高的实际工资率。卡莱茨基派模型, 或者采纳卡莱茨基派模型各研究的贡献正在于, 他们主张联结短期的不安定性和长期的均衡增长路径的中期经济分析是必要的。

近年, 中期模型的研究甚至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注目^①。索洛如下叙述道:

如果考虑了事前被决定(但不一定是固定的)价格和工资, 以及若干具有特定目的动态理论的话, 四半期单位的短期宏观经济学会分析得更好吧。10年期的长期宏观经济学应该能较好地处理价格与数量互相调节的增长理论吧。然而, 对于5年到10年这样的中期时间幅度, 某种混合的过渡模型是必要的。在这一模

^① 例如, Blanchard, O. (1997); Solow, R. M. (2000); Beaudry, P. (2005)。

型中，价格虽然完成一定的使命，但却并非单纯的市场清算性要素，而是可以推进收入支配的经济过程吧。(Solow, 2000: 157)

如果回到宏观经济学，那么一如既往地，我相信存在时常有效的“真的”宏观动态理论。然而，由于其惊人的复杂，恐怕无论是谁也难以充分地理解它吧。我认为，在短期中，像“凯恩斯主义者”那样的考量是一个较好的近似，它要确实地强于固执于私利的“新古典派”。接下来，如果在很长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都能在新古典派的框架内得到最佳处理，这时，像凯恩斯主义那样把注意力转向侧面的做法就是不那么重要的绕远路了。然而在5年到10年的时间范围中，有必要寻找一个能够两者兼用的有效混合模型。(Solow, 2000: 158)

虽然索洛的这一观点有对短期和长期过分乐观评价之嫌，但在宣扬中期模型的必要性上，与主流经济学者们有很大的共通性。他们认为必须要在中期中考察的问题是，第一，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欧洲失业率的上升倾向，以及与此对照，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安定；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资本份额的稳步上升倾向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安定，更进一步地，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停滞等。

并非仅有后凯恩斯派认为，作为有效需求支配的短期理论和20年、30年的长期经济变动的联结，中期理论是必要的。在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上，传统的新古典派理论恐怕是不充分的，基于这种自觉，主流经济学也将其作为一个课题。

三 结语

置盐的《积累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积累过程的特征，即不均衡的产生与不均衡的积累运动。近半个世纪的现实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其主张的正确性。然而，还有许多《积累论》未论及的问题残留了下来，这也是事实。这些问题之一即在于，更具体地考察分配、积累模式的现状对经济的影响。单纯从短期或者单纯从长期的现有理论难以充分把握的现象，现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指出这一方向性方面，卡莱茨基派模型是很有意义的。然而，标准卡莱茨基派模型作为长期动态理论还存在重大缺陷，有必要将其克服。

其他《积累论》尚未充分分析，但对理解现代经济又是不可或缺的问题点（还有很多），也就是说，虽然有必要探讨置盐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完成它。此外，（在本文中）难以触及的，置盐在《积累论》之外的工作也残存了不少，希望各位谅解。

参考文献

- [1] Auerbach, P. and P. Skott, "Concentration, Competition and Distribu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 (1), 1988.
- [2] Beaudry, P. "Innis Lecture: Explorations in Medium Run Macroeconomic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8 (4), 2005.
- [3] Bernanke, Ben S. , "The Great Moderation," *The Taylor Rul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chapter 5, ed. Evan F. Koenig, Robert Leeson and G. A. Kahn,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2012.
- [4] Bhaduri, A. and S. Marglin,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4), 1990.
- [5] Blanchard, O. J. , "The Medium Run," *B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1997.
- [6] Cassetti, M. , "A Note on the Long - run Behavior of Kaleckian Models,"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 (2), 2006.
- [7] Committeri, M. , "Some Comments on Recent Contributions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Political Economy*, 2 (2), 1986.
- [8] Committeri, M. , "Capacity Utilization, Distribution and Accumulation : A Rejoinder to Amadeo," *Political Economy*, 3 (1), 1986.
- [9] Dallery, T. , "Kaleckian Models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Revisited: Evaluating Their Relevance Through Simul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Workshop of the Research Network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erlin, 2007.
- [10] Dumenil, G. and D. Levy, "Being Keynesian in the Short Term and Classical in the Long Term: The Traverse to Classical Long - term Equilibrium," *The Manchester School*, 67 (6), 1999.
- [11] Dutt, A. K. ,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Uneven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2] Kalecki, M. ,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ic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理论》, 浅田统一郎、间宫阳介译, 日本经济评论社, 1984。)
- [13] Kurz H. D. , "Normal Positions and Capital Utilization," *Political Economy*, 2 (1), 1986.
- [14] Kurz H. D. , "Technical Chang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A Steady State Approach to Unsteady Growth", H. D. Kurz, *Capital, Distribution and Effective Demand: Studies in the Classical Approach to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Policy Press, 1990.
- [15] Lavoie, M. , *Introduction to Post - Keynesian Economics*, Palgrave/Macmillan, 2006. (《后凯恩斯派经济学入门》, 宇仁宏幸、大野隆译, ナカニシヤ出版, 2008。)
- [16] Lavoie, M. , "Surveying Short - run and Long - run Stability Issues with the Keleckian Model of

- Growth,” in Mark Setterfield ed. (2010), Ch. 6.
- [17] Lucas, Robert E., “Macroeconomic Priori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1, March, 2003.
- [18] Nakatani, T. and P. Skott, “Japanese Growth and Stagnation: A Keynesian Perspective,” *Structural Changes and Economic Dynamics*, 18, 2003.
- [19] Nakatani, T., “Significance of Post – Keynesian Economics: Kalecki – Steindl Proposition and Its Extensions to Open Wage – Led Economies,” *Post Keynesian Review*, 1 (1/2), 2012.
- [20] Sato, Y., “Okishio Theory Revisited in the Light of ‘Axiomatic Externa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26, Hosei University, 2012.
- [21] Setterfield, Mark ed., *Handbook of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Edward Elgar, 2010.
- [22] Skott, P., “Investment Functions, Stability and the Reserve Army of Labo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2008.
- [23] Skott, P., “Growth, Instability and Cycles: Harroddian and Kaleckian Models of Accum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Mark Setterfield ed. (2010).
- [24] Solow, R. M., “Roward a Macroeconomics of the Medium Ru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 (1), 2000.
- [25] [日] 菊本義治:《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 岩波书店, 1981。
- [26] [日] 浅田统一郎、间宫阳介:《从卡莱茨基到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配理论谱系》, 载 M. 卡莱茨基《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理论》, 日本经济评论社, 1984。
- [27] [日] 新野幸次郎、置盐信雄:《凯恩斯经济学》, 三一书房, 1957。
- [28] [日] 置盐信雄:《现代资本主义分析的课题》, 岩波书店, 1980。
- [29] [日] 置盐信雄:《经济学与各种现代的问题》, 大月书店, 2004。
- [30] [日] 置盐信雄:《积累论》(第2版), 筑摩书房, 1967。
- [31] [日] 中谷武:《置盐信雄教授的经济学》,《国民经济杂志》1990年第162卷第3号。

日本市民社会论系谱

——从意识形态走向社会科学

渡边雅男* 张利军 译**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将日本“二战”后历史上形成的市民社会理论分为三个部分，探究其意义与特征。近代社会处于一方面市民社会占据私有领域，而国民国家占据公共领域，公私之间的分界线位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时代。“二战”后日本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系谱以丸山真男、大塚久雄、松下圭一为代表，从“近代主义”的立场进行探讨。“二战”后日本市民社会论的第二系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以平田清明为代表）中诞生的。第三系谱的市民社会论，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是由笔者曾经学习过的一桥大学（以高岛善哉为代表）的治学氛围中延伸而来。第三系谱既不是国家学说，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社会科学的市民社会论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 市民社会 日本近代主义 丸山真男 马克思主义 平田清明 社会科学 高岛善哉

一 现代化与市民社会论

社会意味着个体的集合，乃一普遍之概念。直到近代西欧社会将公共领域与私有领域分离之前，社会仍是独自的、潜藏的存在。人们尚未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且其概念亦尚未被广泛认知。社会一方面持续与家庭分离，另一方面与国家也不断游离，逐步发展成为独立概念。如果公共领域独立于家庭之外，但并不与国家分离，而是作为具有古典特征的城市国家存在的话，那么，近代社会处于一方面市民社会占据私有领域，而国民国家占据公共领域，公私之间的分界线位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时代。当然，家庭（私有家庭）依然被置于私有领域的根本位置，然而，“生产=消费单位”的状态已经发生变化，生产功能被社会夺走，只不过勉强保持了最低限度的消费单位（福利单位）而发挥功能。市民社会被夹在私有家庭和国民国家之间，是独立的中间选项

* 渡边雅男，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清华大学教授。

** 张利军，中央编译局。

(或称之为媒介)。^①

如果近代世界是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各自的分离和关联为特征而确立起来,那么可以说近代化的时代就是以旨在培育社会独立的意识为目标的时代。日本也不例外,这一点从“二战”前日本接受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二战”后其不断扩展而固定下来,就可以看出。只不过日本是假借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而意识到近代化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将日本历史上形成的市民社会理论分为三个部分,探究其意义与特征。

二 近代主义之系谱——丸山真男、大塚久雄、松下圭一

日本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阶段以丸山真男、大塚久雄、松下圭一为代表,即从“近代主义”的立场进行探讨。^②然而,将他们称为市民社会理论学者是否合适,笔者一直持有疑问。他们之所以没有自称为市民社会论者,是因为市民社会的现代意义尚未得到人们的积极关注。其实,石田雄已经指出,对于丸山真男而言,与其说现代社会是“市民社会”,倒不如说是“大众社会”。^③对于大塚久雄来说,现实社会也不过是被称为“群集”的“个体的总和”。^④如果这样考虑的话,这是一种典型的大众社会意识,而不是市民社会。松下圭一则明确将现实社会断定为“大众社会”(后面详述)。

在此附带进行些许解释,将他们作为市民社会论学者最初提出疑问的是石田雄,他在编辑《丸山真男全集》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⑤石田雄曾在一次报告中提起,“丸山真男几乎从未使用过‘市民社会’这一名词”,进一步地进行了解释,即使鲜有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也是在认为“日本并不存在典型的市民社会”的否定意义上。丸山真男认为“日本不存在市民社会的余地”。根据石田雄的解释,丸山真男认为“确立市民社会并不是日本战后的任务”。石田雄的发言对于许多人将丸山真男作为“二战”后日本市民社会论学者的代表的认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在会场的住谷一彦立即回应道,“我以前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进而指出“大塚久雄也没有使用过‘市民社会’这一词”。虽然,在“二战”时的论文中,曾有“资本主义与市民社会”相关的出现,而且在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曾使用过几次,但后来再也没有用过。与此不同的

① 关于近代的意义,参照 Rosenberg, J,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 Verso, 1994。(《市民社会的帝国主义》,渡边雅男、渡边景子译,樱井书店,2008。)

② 参照《丸山真男全集》(全16卷),岩波书店,1995~1997;《大塚久雄著作全集》(全10卷),岩波书店,1969~1970。

③ 石田雄、姜尚中:《丸山真男与市民社会》,世织书房,1997(除讨论部分外,也收录在石田雄:《与丸山真男的对话》,三焉书房,2005),第6~37页。

④ 大塚久雄:《社会科学的方法》,岩波书店,1966,第17页。

⑤ 以下引用,均出自石田雄、姜尚中:《丸山真男与市民社会》,世织书房,1997。

是，丸山真男经常被使用的是“国民国家”，大塚久雄则是“国民经济”。^①

如果上述观点正确的话，倒可以称丸山真男为国民国家论者、大塚久雄为国民经济论者，无依无据，或者作为分析基础将他们没有用过的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作为纽带而将他们作为市民社会论的代表学者，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将丸山真男和大塚久雄作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市民社会论学者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可，成为共识。如果追寻这种共识的来源的话，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将二者称为“市民社会青年”的内田义彦和将二者归为“近代主义者”的日高六郎二人的讨论。^②

内田义彦所指的“市民社会青年”，是指在“二战”前“受到讲座派思想的强烈影响，在政治窒息的时代，在各自的领域开展学术活动的人”。^③对此，日高六郎所提到的“日本近代主义者”是指“二者对日本的近代化均抱有强烈的关心”，同时将“市民社会的建立”和“市民社会的日常行为”作为列车的终点，而不是过站来认识。^④的确，将二者称为“市民社会青年”和“近代主义者”可谓用心良苦。如此一来，听者将丸山真男和大塚久雄作为“市民社会派”，乃或“市民社会论者”，则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呢？因为，与他们的认识不同，仍有许多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是以“市民社会”替换通俗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人拘泥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假象，并坚持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打倒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获得真正的解放。

同样，这也有助于理解松下圭一的观点，他不赞同“阶级斗争”，主张市民运动的观点。^⑤尽管市民已经登上现代社会的舞台，但是就社会而言，仍是“大众社会”（或者称之为城市社会），而非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归根结底还是18世纪英国的社会，20世纪的今天是“大众社会”（城市社会）。就社会的构成成员而言，松下圭一致力于“讨论让市民恢复古典原型的现代条件”，^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努力探求“市民”这一分析框架的可行性，就社会本身而言，强调其与过去的断裂性而非连续性，而绝非谋求社会古典原型的现代化。

因而，无论是丸山真男、大塚久雄，还是松下圭一，都没有把市民社会作为分析现代社会的“概念工具”（内田义彦）。倒不如说，他们内心深藏的分析概念是大众社

① 石田雄、姜尚中：《丸山真男与市民社会》，世织书房，1997，第95页。

② 内田义彦：《日本资本主义思想的全貌》，岩波书店，1967，第153页。日高六郎编《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4）·近代主义》，筑摩书房，1964。

③ 内田义彦：《日本资本主义思想的全貌》，岩波书店，1967，第39～40页。

④ 日高六郎编《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4）·近代主义》，筑摩书房，1964，第8～12页、第28页。

⑤ 松下圭一这方面的著作，以《“市民”现代人类的可能性》和《日本大众社会论的意义》为代表，均收录于松下圭一《现代政治的条件》（增订版），中央公论社，1959。

⑥ 松下圭一：《现代政治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59，第228页。

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他们称为大众社会论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关于大众社会论背景的讨论时至今日仍被作为市民社会论而接受。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市民社会是被人们理解为最接近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而非被理解为社会学上的概念和理论。其实，内田义彦和日高六郎二人主张的目的也是如此。这对于看不到市民社会的日常行为重要性和历史意义，而且丝毫不进行反省的马克思主义教条者来说，以党派和意识形态划分你我，市民社会这个名称恰恰是非常重要的。

三 马克思主义者的系谱——从林直道到平田清明

马克思主义者否定市民社会论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之广，而且具有压倒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二战”后日本市民社会论的第二系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诞生的。

首先，看看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直道的观点。^①他解释道：“‘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18世纪以来开始使用的工商业者的惯用语，而且具有许多微妙的含义。马克思开始也经常使用，通过这个词来批判分析客观的现实。……而且，随着马克思理论的深化和扩展，这个原本是一般意义上的词，开始成为专门指‘社会经济结构’和‘物质生产关系’，‘市民社会’这一用语几乎就是专门指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就不再是当初表示‘物质生活关系’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在提到‘市民社会’的时候，意思是工商业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②

这是非常典型的“市民社会”否定论。从战前至战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这种否定的观点来理解市民社会。^③不承认市民社会，而是认为工商业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他们而言，市民社会论无非是倡导阶级社会是可以超越的虚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当进入20世纪70年代，同属于马克思主义者阵营的平田清明主张恢复“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时，^④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具有冲击力的反响。^⑤

① 林直道的观点包括在《西田哲学批判》，解放社，1948；《马克思·韦伯的思想体系》，青木文库，1952；《危机的基础理论》，大月书店，1976；《强夺豪取的资本主义》，新日本出版社，2007。

② 林直道：《历史唯物论与经济学》上卷，大月书店，1971，第228～230页。

③ 无论是继承了战前讲座派观点的日本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继承了劳农派的日本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如此。关于前者，参照民科（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哲学部编辑的机关杂志《理论》（1947～1950年），以及《经济》（1962年至今）的论调。关于后者，参照《评论》（1946～1950年），以及《唯物史观》（1965～1990年）的论调。

④ 平田清明：《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岩波书店，1969。

⑤ 林直道以外的批判平田清明的文章包括佐竹恒：《平田清明是如何“认识”马克思的？》，《前卫》1970年第2期，第14～15页；芦田文夫：《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一书批判》，《经济》1970年4月，第329～348页；高木郁朗：《共同幻想、市民社会、流行的国家论》，《唯物史观》（第10期）1970年6月，第85～92页；汤村武人：《关于平田清明的封建社会理论》，《唯物史观》（第13期）1974年2月，第72～83页。

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平田清明的观点与上述林直道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前者而言，“市民社会”是一个横跨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的普遍意义的原理，当然可以作为社会分析的框架。尽管，这是在欧洲确立形成的社会概念，但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忽视掉的“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范畴，将其用来分析日本也是完全可行的。“通过对蕴藏于西欧式理性中的市民社会历史的理解，以及市民社会本身的内在批判，在人类史上实现真正的开花结果”，这才是马克思独特的观点。^①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平田清明意欲通过恢复失去的概念，以还原马克思对固有社会，即其历史认识的原貌。^②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恢复市民社会概念这一点上努力。

他对市民社会的认识最大的意义不是复归市民社会这一历史上存在的概念，而是将其作为具有理论意义的理论方法论概念去理解。这与近代主义者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具有根本性区别，具有超越他们的意义。

总之，他并非只是认识到国外的这一古典概念的历史意义，或者说谈这个问题只是作为意识形态旗帜来表示一种政治姿态，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这个狭隘的平台之上，作为分析现代社会的方法概念去阐释市民社会。对此，从下文中关于他的发言就可以看出，“在资本家社会确立之前相当一段时间内，市民社会尚未登上历史的舞台，作为有别于资本家社会的市民社会尚未发展成为历史的某一阶段，市民社会本身并不存在。市民社会从第一次社会向第二次资本家时代的社会不断转变，发展成为现代的社会”。^③

不过，他的市民社会论也有难以理解的地方，支撑其市民社会论的是他提出的“个体所有”概念。他将个体所有（个人所有）理解为与私有相对立的公有，在此，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作为立论的基础，即“否定之否定，不是说是劳动者的私人所有，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所得，包括共同劳动和土地在内，基于全部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④根据平田清明的理解，只有重建个体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意义和目标。

然而，此处有较大的误解，而导致了一些问题。私有是指私有领域（与公有领域对立）确立起来的“所有”（所有名义或者所有权），所有的本意不外乎是法律上对土地、人身和物体的占有之意。所有者的主体即便是一种间接组织（家庭、企业、社区或NPO等），即使是行会、团体、法人，乃或机构都无关紧要。即使是私人所有，其

① 平田清明：《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岩波书店，1969，第50页。

② 平田清明：《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岩波书店，1969，第51页。

③ 平田清明：《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岩波书店，1969，第53页。

④ 平田清明：《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岩波书店，1969，第105～106页。

所有主体（名义人）也不仅是个人本身。同样，对于私人所有而言，不妨看看历史上已经出现的共同所有，如果出现从日耳曼共同体衍生出个人所有，那么“代表亚细亚和埃及共同体的个人”也有可能成为“土地所有者”，^①这一点马克思已经指出。看看平田清明所假设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方式，如果仅仅是他所认为的所有主体是个人的话，那么“资本家时代包括共同劳动和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方式共同所有”这一“法定假设”^②将很难实现。因为，个体的存在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都必须得到保证，所以，无论在何种所有制形态下个体所有作为其中一部分，其存在是客观的。仔细研读刚才引用的马克思的一句话，并非只是“个体所有的重建”，而是基于“包括共同劳动和土地全部生产手段共同占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论断，因此个体所有得以成立的社会条件已经得到了暗示（平田清明忽视了这一点，在其著作刊印第二年，在邀请其参加的关东学院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在围绕《平民社会与社会主义》一书的讨论中，宫崎犀一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以个人所见，马克思之所以提出上述论断的原因，恐怕马克思认为“个人（个体）所有”无论在任何历史所有制形态下都是存在的。例如，共同所有之下的个人所有、私有制下的个人所有、社会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等，在各种社会条件下所有的主体均为个人。因而，忽视过去历史上各种所有制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只注重社会主义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形态，而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云云，难免有失偏颇。若没有使个人本性得到完全还原而加以理解，失掉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将个人所有作为市民社会的独特特征的方法论概念而加以考虑则是十分勉强的。在平田清明的研究中，在提出失去的概念“个体所有”的瞬间，市民社会的丰富内涵在这一概念的细微诠释中瓦解。

然而，时至今日，回顾当初，平田的“个体所有论”不也正反映出他潜意识中的认识吗？通过个体所有，他所要表达的不正是他所怀抱的个人主义之梦吗？不妨将平田清明的研究与加拿大的政治学者麦克弗森的“所有制的个人主义”进行比较。

C. B. 麦克弗森（Macpherson）在《所有制个人主义的政治思想》一书中提出了这一引人注目的问题。他认为17世纪英国人的思想中已经隐含着“所有制的个人主义”这一认识，即与市场社会的各种关系对应的所有制个人主义的认识，这给予自由主义理论重要的影响。进入19世纪，市场的发展导致从所有制个人主义发展成为自由主义理论的社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但另一方面，与上述认识密切相关的社会不断发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章），载德国社会社会主义统一党附属马克思列宁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25卷，大内兵卫、细川嘉六监译，大月书店，第818～819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章），载德国社会社会主义统一党附属马克思列宁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25卷，大内兵卫、细川嘉六监译，大月书店，第819页。

展，导致这一认识又不能被放弃，因而这便被认为是19世纪上述理论认识衰落的根本原因。^①在此，他所讲的所有制的个人主义是指以下之意。“个人如果不是作为单个的道德体，抑或不是作为更广意义上的社会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至少是自身个体的所有者。所有关系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是决定其未来的现实自由和现实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因而可以从追溯人的本性中加以理解。个人是对自身和其能力的所有者，因而被认为是自由的。人类发展的本质是从以他人意志为依存逐步走向自由，自由是指所有的函数。社会是由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无数自由个体组成，这些个体是作为以其自身能力获得物品的所有者。社会由个体之间的所有交换关系构成。政治社会是为了保护这种所有关系，维护有秩序的交换关系而被有计划地确立起来的组织机构。”^②

根据麦克弗森的研究，市民所享受到的自由、权利、义务，乃或市民社会的形成原理本身，都是建立在个人所有这一假设基础上，即确立在“所有的个人主义”的根本假定上。^③在此，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种所有的个人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假设。而且，这在“与市场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相适应”的基础上，随着市场社会的历史发展，这个“所有的个人主义”假设当初得以确立的历史条件处于缺失的状态，假设本身其实并不完备。抑或认为，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发言权强化”，^④“所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性质愈加显现。处在20世纪的困境的确可以看到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化的，这反映了“基于劳动的所有”（即个人所有）的意识形态假设体现出来的历史和理论的局限性。麦克弗森研究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揭示了这一隐藏在“所有的个人主义”中的重点。

不过，平田清明将个人所有置于重建的目标，这就与麦克弗森的观点大为不同。如前所述，只有试图将一切都归结为个人本性的意识形态立场（个人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个人所有是市民社会才有的独特方法概念。例如，平田在展开讨论“个人所有的重建”的时候，将个体形容为“不依附”，而对社会主义进行整体的展望，因而他的观点就陷入了摆脱共同的个体自由派论。刚才提到的会议上，宫崎犀一对平田清明的批判可谓有的放矢。^⑤对此，平田清明仅仅回答“社会所有这一概念并没有被污染”。在这种心情下，如果将所有视为社会所属而非个人所属的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要恢复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个人主义。如果说，市民社会论的第一系谱大众社会论就

① Macpherson, C. B.,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Macpherson, C. B.,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3.

③ Macpherson, C. B.,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3.

④ Macpherson, C. B.,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304.

⑤ 平田清明教授著作研讨会文集，第74页。

隐藏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第二系谱的代表观点,即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论则将个人主义隐匿在这种心情下。

四 社会科学的系谱——大塚金之助、高岛善哉

的确,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论是近代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政治判断,在“冷战”后期的知识环境中,被赋予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意义,在初次被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来解读时,无论是对于冠以近代主义的第一系谱,还是第二系谱的源流,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都具有超越二者的意义。然而,被平田清明偶尔作为社会科学提起的市民社会论,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在其曾学习过的一桥大学,可以找到相似的治学氛围。这对于在一桥大学学习过社会学的人来说,是一种常识。因而,与平田清明同门的水田洋曾在平田清明提出自己的观点时,有如下记述:“对于高岛(善哉)的课所讲的一些问题而言,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对一些观点进行了论证,但绝不是什么冲击性的印象。”^①平田清明提出有关观点时让人们觉得耳目一新,或者说有冲击力的话,是因为平田清明的论证很有技巧。

如此一来,我们终于对日本的市民社会论的源流,即作为社会科学的市民社会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回溯。其“二战”前由大塚金之助^②从欧洲引入,“二战”后经过高岛善哉^③的发展而成为人们的问题意识。另外,从广义上看,一桥大学的《研究教育章程》中倡导“作为市民社会学的社会科学”这一基础定位,这反映了当代日本学术的社会意识。

高岛善哉指出,在日本第一次提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是大塚先生^④,这里所说的大塚先生,当然是指大塚金之助。

在此,不妨回顾一下校史。一桥大学还在被称为高等商业学校之际,就被戏称为“围裙学校”“算盘学校”,与其相应的是学风注重实际、实用主义。入学时,学生需习字、学算盘和商务英语、做账簿,这些是校方实施的实务教育。不过,当时在老师和学生中确实有抛弃这些陈旧的东西,树立新学风的气氛。历经曲折,终于于1920年升格为东京商科大学。既然升格为大家祈愿的大学,那么就应该摆脱旧学风,建立真正大学的新学风,这种席卷新入学学生的热情高涨。1921年入学的高岛善哉有如下回忆,“到底要建设成什么样的大学呢?难道不是包括文化各学科在内的综合型大学吗?

① 水田洋:《萨摩藩大臣的后裔——平田清明》,《情况》1995年5月,第130页。

② 参照《大塚金之助著作集》全10卷,岩波书店,1980;仓田稔:《大塚金之助论》,成文社,1998。

③ 参照《高岛善哉著作集》全9卷,こぶし书房,1997~1998。

④ 高岛善哉:《大塚金之助先生与一桥的学问》,《桥问丛书》第52号,一桥学问思考会,1986,非卖品。

每天热烈地讨论、辩论，可以用‘喧喧闹闹’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学校气氛”。

时代的潮流是幸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急需经济人士，而且是能够活跃于国际舞台的经济人士。这对于自商业学校以来就强调培育民族的、世界的一桥学风刮起了一股强劲之风。这其中问题的关键就是综合大学，这既是问题，也是理念。

大塚金之助（以下简称大塚）结束在欧洲的留学归国正在此时，^①同年，高岛善哉（以下简称高岛）大学预科毕业，升入本科。当时，大塚讲师非常受欢迎，人气高涨。置身于思想激变的旋涡中，大塚先生授课时，教室盛况空前，迷倒了大量学生。年轻的高岛成为其信众，成为福田德三的学生后，后又成为大塚研讨班的一员。^②

高岛从大塚那里继承下来的课题有三个，第一是经济学的社会学化。高岛曾谈起在参加大塚研讨班时大塚的话，“大塚老师曾经这样说，经济理论必须社会学化，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局限于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学，特别是主观经济学派的边际效用说、边际效用的均等法则、消费的专门结构这些人们的普通认识。而是社会整体上，可以考虑使用社会学，必须立足于这样的立场。他提出了经济学理论的社会学化，这使我恍然大悟。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学习了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这样的经历，使高岛将其定位为一生的研究主题。经济理论社会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反复扪心自问，结果是追到了生产力理论上，因此，他的第二个研究主题就成为市民社会论的重要支柱。

高岛从大塚那里继承下来的第二个课题是市民社会。并不是马克思的，而是 civil society 的市民社会。日本最早提出市民社会的是大塚……大塚首先研究了英国的情况，大塚的考虑是英国是基础，而且曾留学德国，对德国的歌德、海涅、贝多芬都很喜欢，我们语言中也有很多德语外来语，但市民社会是如何首次出现在日本的呢？如何让日本接受这是一个问题。高岛晚年提出的“市民制社会”概念就是为此而提出的学术集大成。

大塚遗留给高岛的第三个课题，也是教训，总体来说是思想，并不是这样那样的意识形态，而是如何看待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高岛从大塚那里学到了社会科学中隐含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思想中藏匿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如同人生的接力赛，高岛将这种思想的、世界观的、人生观的、价值观的精神贯穿其人生。

① 大塚 1919 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到伦敦学院学习经济，1920 年到 1923 年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

② 多年后高岛接受采访，有如下回忆，“进入福田的研讨班后，第一年可以说是专业的讨论，后两年为读书会，第一年专业讨论结束后，福田先生收到苏联邀请赴莫斯科，其后一年休课，大家都到了大塚的研讨班。此前，大塚先生刚从欧洲归国。山田雄三就与我一起去了，不过高岛先生回来后，山田回去了，我就留在了大塚先生那里”。[高岛善哉述，本间要一郎、清水嘉治记录，《谈谈我的经济学》，《エコノミスト》（经济学家）1980 年 4 月 1 日，第 82～83 页，载于高岛善哉《人間、風土と社会科学》，秋山书房，1985。]

真正将大塚先生提出的问题继承下来的高岛，之后时而研究斯密和李斯特的学说史，时而从价值观、技术论、生产力论、风土文化论和国家论入手，将市民社会理论的构筑不断向前推进。因而，高岛先生无比看重的是市民社会论的本土化。为此，他在晚年使用了“市民制社会”这一新创造的词来替代“市民社会”。这个人们不太习惯的词在1981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的重建——重新审视人和社会的眼睛》（评论社，1981）一书中首次被提出，他最后的著作《挑战时代的社会学》（岩波书店，1986）一书第三部分的标题就是“市民制社会与意识形态”，概括了生产力体系的近代意义。^①高岛想通过这个词寄予何种思想呢？

“我是立足于西欧市民社会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各自特点基础上，并非抛弃了个性而只是重视共同点，考虑到从西欧市民社会到日本市民社会的情况，才提出了市民制社会这一概念。”

这里所提到的市民制社会包含了高岛的两个期待。第一，具有启发意义。他以现行宪法为例，主张这是市民制社会的某种模式。“其实，日本的宪法，众所周知是我提出的市民制社会的一种模式，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宪法。其基本理念和框架，我说的市民制社会扬弃了西欧市民社会的国民个性，由此而提出一个较难理解的概念，是一种理念式的概念吗？又与马克思·韦伯的理念式的不同，可以看作一种理想型的概念。其实，这并没有什么，日本的宪法与它并不完全一致，当然也有日本独特的地方，比如象征天皇制并不适应市民制社会，可是宪法还是与这种理想接近。这不是从别的国家引进的，而是日本自身具有的。也可以认为这是麦克阿瑟带来的礼物，如今这已经成为某种事实。对于日本人而言，市民制社会这个词所表现的不是毫无关联的东西，而是我们十分熟悉的现实。就是这样的启发意义，这是第一个期待。”

“二战”前播下的市民社会的种子终于在“二战”后发芽生长。这种认识可以从高岛的著作中找到证据。

第二个期待是从西欧各国历史发展中的市民社会的特例中提取出“生产力的体系”这一普遍的要素。由此，挖掘出隐藏在各国各自特殊历史背后的共同的基础，这应该是探讨日本风土环境下的市民社会的重要切入点。高岛认为，“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分别有其不同的阶段。如同一座大楼，要建12层，从地基开始3层、4层、5层，不断往上建，边建楼梯，边建成大楼。这可以看作生产力体系，所谓生产力体系就是各种生产能力的体系，这就是市民制社会。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例，研究其本质的

^① 《高岛善哉著作集》，こぶし书房，第9卷，1998。

普遍性。生产力体系，我想将其置于个人研究的中心位置”。

与感性地理解历史发展中的市民社会背后根本的生产力体系相比，高岛的市民社会论具有独特性。“到目前为止，社会学者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者从第三世界这种两分法或者三分法方面进行研究。我觉得应该从资本的角度、企业的角度、资本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并活用市民制社会这一概念，从更高的高度去把握。”

这是对社会体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论断。如高岛所言，如何去理解生产力体系，并运用它，这是断定体制优劣的关键。高岛指出，“至少从18世纪到19世纪，带来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是资本的力量”。这是资本的文明一面，不过，如今资本主义也走到了死胡同（市场横行、破坏环境、破坏自然、破坏人类本身，这导致了社会的乏力和全球深刻的危机，不胜枚举，适度性疲劳显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退出历史舞台（至少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选择项的意义已经失去）。我们从什么立场去理解前辈被嘱托下来的“生产力体系”呢？21世纪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要原封不动地对市民制社会进行重新认识。高岛先生的市民制社会就是这样对未来社会科学的问题进行展望的。

当然，高岛先生欲发扬光大的社会科学的市民制社会论与经济学就有了一些乖离。就是作为政治、文化和社会而论市民社会论倾向于从这些角度进行探讨。他的方法论认为市民的立场和阶级的立场二者的矛盾性可以从市民社会论中发现。这对于克服近代主义的第一系谱、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系谱都具有的片面性是重要的切入点。市民社会的社会学研究突破经济学领域，着眼于更广的领域，这是从经济学的市民社会到市民社会的社会科学所跨出的重要一步。这无论对于第一系谱，还是第二系谱都无法做到的，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种意义上，第三系谱既不是国家学说，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社会科学不断扩大。

五 市民社会的意义和问题

市民社会被过度地赋予意识形态的意义，是因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人们急需社会从国家和家庭中独立。第一系谱将大众社会论隐藏于其背后，此外人们对市民社会论充满了期待，是因为社会独立这个近代主义的问题作为国民的普遍问题而被人们所接受。可是，现实历史中，也有对国家和家庭偏激批判的原因。在国家仍然囊括了社会、家庭就是社会支撑的状况下，社会要独立自然与国家和家庭的对决将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市民社会论是与变革现状的思想密不可分的。第二系谱对于市民社会中中国狭隘意义的寄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然而，对于现实的认识、对于现实的

批判，是以对现实的正确理解为基础的信仰宣言，绝不是一句空话。社会如果不对国家和家庭进行批判，那么就不可能成为主角。正因为要说明上述问题，市民社会论作为一种意识和批判，其必然性就显而易见了。不仅仅要将市民社会论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且要将其当作社会科学予以发展，其原因就在于此。立足于这样的社会意识，第三系谱的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

政治经济学和数理方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结构增长模型及其在 Sraffa 体系上的应用^{*}

李 武^{**}

摘 要 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古典增长框架的离散时间的结构增长模型，该模型可以描述包含 m 个经济主体、 n 种商品的经济的非均衡动态。本文还提出了一个描述经济主体间非均衡交易过程的交易函数，该交易函数构成了结构增长模型的交易环节。建立模型之后，本文利用该模型对 Sraffa (1960) 给出的一个两部门经济做了仿真研究。仿真研究表明，两部门经济中可能出现价格和产量持续变动但始终无法同时达到均衡值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经济周期。本文提出的结构增长模型将非均衡的交易过程与生产过程、消费过程结合起来，为建立非均衡动态模型开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 经济增长 交易过程 经济周期 非均衡

一 引言

Kurz 和 Salvadori (2000, 2001) 指出，里昂惕夫 (Leontief, 1936, 1941) 的投入产出模型和 von Neumann (1945) 的增长模型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古典经济学，这些模型可以被视为古典增长理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增长框架还包括 Quesnay (1972) 的经济表、Marx (1956) 的再生产模型、Sraffa (1960) 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等。

古典增长框架有两个主要特征，即动态特征和结构特征。也就是说，这一框架把经济视为由相互依赖的经济部门或经济主体构成的一种循环流 (Circular Flow)，从而对于经济各组成部分的结构和相互影响提供了深入的见解。具体来说，构成古典增长框架的模型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i) 模型包含多个经济部门 (或经济主体, Agent)、多种商品，每个经济部门 (或经济主体) 的生产过程或消费过程中需要使用其他经济部门 (或经济主体) 供给的商品；

(ii) 模型中通常假定规模收益不变 (可参见 Samuelson 和 Etula, 2006)；

^{*} 本文的一个较早版本于 2010 年 4 月获得国际投入产出协会 (IIOA) 颁发的里昂惕夫奖 (Leontief Memorial Prize)。

^{**} 李武，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

(iii) 均衡路径通常是平衡增长路径, 其中各部门的供给具有相同的增长率, 各生产部门具有相同的利润率 (可参见 Solow 和 Samuelson, 1953);

(iv) 均衡增长率、均衡价格结构和均衡产出结构由各经济部门 (或经济主体) 的技术、偏好和禀赋决定;

(v) 固定资本通常使用联合生产的方式处理, 因此联合生产在这一框架中具有重要地位 (参见 Salvadori 和 Steedman, 1990);

(vi) 矩阵和 Perron - Frobenius 定理作为数学工具得到广泛使用 (参见 Bidard, 2004);

(vii) 动态模型通常为离散时间系统。

迄今为止, 古典增长框架下与均衡相关的问题已经得到相当全面、透彻的研究, 这些问题包括均衡的存在性 (例如, Kemeny, Morgenstern 和 Thompson, 1956)、交易均衡 (例如, Gale, 1960)、均衡的最优性 (例如, Dorfman, Samuelson 和 Solow, 1958; McKenzie, 1963, 1976)、均衡的扰动 (例如, Dietzenbacher, 1988)、均衡的稳定性 (例如, Morishima, 1964)、Marx 的均衡模型 (例如, Morishima, 1973)。然而与非均衡相关的问题, 例如, 价格波动、经济周期等, 似乎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古典增长框架下对这些非均衡问题的分析方法做一些尝试性的探索。

本文的主要思想是开发一个描述经济主体 (或经济部门) 间非均衡交易过程的交易函数, 并将这一交易函数与生产过程、消费过程结合起来, 从而得到一个描述包含 m 个经济主体、 n 种商品的经济的动态运行过程的增长模型。然后利用该模型和仿真方法来对以上提到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组织如下。第2部分介绍有关技术和生产的基本概念及 Sraffa (1960) 的一个经济系统。第3部分讨论交易函数。第4部分介绍仅包含生产过程的纯生产的结构增长模型。第5部分介绍既包含生产过程又包含消费过程的结构增长模型, 并利用该模型分析一个小麦 - 劳动两部门经济中的经济周期。最后一部分为结束语。

下文将使用如下的记法和术语。 1 代表向量 $(1, 1, \dots, 1)^T$ 。 0 表示零向量。 I 表示单位矩阵。若向量 x 的所有向量为正 (或非负) 则称其为正向量 (或非负向量), 并记为 $x \gg 0$ (或 $x \geq 0$)。若 $x \geq 0$ 且 $x \neq 0$ 则称 x 为半正向量, 并记为 $x > 0$ 。对于向量 x 和 y , $x \gg y$ 、 $x > y$ 和 $x \geq y$ 的含义类似。这些记法也适用于矩阵。对于一个半正列 (或行) 向量 x , 若 $1^T x = 1$ (或 $x 1 = 1$) 成立则称其是归一化的。 $\hat{x}$ 代表 $\text{diag}(x)$, 即以向量 x 为主对角线的方阵。对于列向量 x 和 y , $(x; y)$ 表示这两个列向量拼接成的列向

量 $\begin{pmatrix} x \\ y \end{pmatrix}$ 。

二 技术和生产

(一) 投入系数矩阵和产出系数矩阵

首先考虑只包含生产者、不包含消费者的纯生产经济。假设经济中有 m 个厂商和 n 种商品，分别编号为 $1, 2, \dots, m$ 和 $1, 2, \dots, n$ 。当每个厂商只拥有一项技术、经济中允许联合生产时，所有的技术可以用一个 $(n \times m)$ 的投入系数矩阵 A 和一个 $(n \times m)$ 的产出系数矩阵 B 表示，每个矩阵第 i 行和第 i 列分别对应商品 i 和厂商 i 。

下面是投入和产出系数矩阵的例子。

$$A = \begin{bmatrix} 0.28 & 0.50 & 0.53 & 0 & 0 & 0 \\ 0.84 & 0 & 0 & 0 & 0 & 0.77 \\ 0 & 0.49 & 0.45 & 0.50 & 0.48 & 0 \\ 0 & 0 & 0 & 0.51 & 0.57 & 0.29 \end{bmatrix}, B = \begin{bmatrix} 1 & 0 & 0 & 0 & 0 & 0 \\ 0 & 1 & 0 & 0 & 1 & 0 \\ 0 & 0.25 & 1 & 1 & 0.25 & 0 \\ 0 & 0 & 0 & 0 & 0 & 1 \end{bmatrix} \quad (1)$$

令 $a^{(i)}$ 和 $b^{(i)}$ 分别代表 A 和 B 的 i 列，假设均为半正向量。向量对 $(a^{(i)}, b^{(i)})$ 代表了厂商 i 的技术，称 $a^{(i)}$ 为厂商 i 的单位需求束。假设每个厂商具有不变的规模收益，于是厂商 i 的可行的生产过程可以表示为 $(\xi a^{(i)}, \xi b^{(i)})$ ，其中 ξ 为一个非负实数， $\xi a^{(i)}$ 为投入束， $\xi b^{(i)}$ 为产出束；称 ξ 为该生产过程的生产水平（或活动水平）。在 $B = I$ 的特殊情况下，一个厂商的生产水平即为其产品的产量。

当一个厂商具有多种技术、会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动调整其所使用的技术以最大化其利润时，投入和产出系数矩阵可以被视为价格的函数或对应（或称多值函数）。

(二) Sraffa 体系的例子

Sraffa (1960: § 5) 给出了一个包含两个生产部门（即小麦生产者和铁生产者）、两种商品（即小麦和铁）的数例，这一两部门经济不包含消费者，也就是说是一个纯生产经济。在初期该经济运行如下。

$$280 \text{ 单位小麦} + 12 \text{ 单位铁} \rightarrow 575 \text{ 单位小麦} \quad (2a)$$

$$120 \text{ 单位小麦} + 8 \text{ 单位铁} \rightarrow 20 \text{ 单位铁} \quad (2b)$$

式 (2a) 代表小麦生产者在初期的生产过程，式 (2b) 代表铁生产者在初期的生产过程。每期生产出的产品将构成下一期的供给。以上的生产过程也可以用表 1 的形式来表示。

表1 小麦-铁两部门经济的初期配置

	小麦生产者	铁生产者	总需求量
小麦需求量	280	120	400
铁需求量	12	8	20
下一期的供给量	575	20	

这一经济中的投入系数矩阵为

$$A = \begin{bmatrix} \frac{56}{115} & 6 \\ \frac{12}{575} & \frac{2}{5} \end{bmatrix} \quad (3)$$

产出系数矩阵为 $B = I$ 。A 的第一列，即 $\left(\frac{56}{115}, \frac{12}{575}\right)^T$ ，为小麦生产者的单位需求束，即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投入；而第二列，即 $\left(6, \frac{2}{5}\right)^T$ ，为铁生产者的单位需求束。

众所周知，这一经济中的均衡价格向量和均衡产出向量分别为 A 的左、右 $P-F$ （即 Perron - Frobenius）特征向量。在此 A 的一个左、右 $P-F$ 特征向量分别为 $p^* = \left(\frac{1}{15}, 1\right)^T$ 和 $z^* = (575, 30)^T$ 。可见，以铁计价时，小麦的均衡价格为 $\frac{1}{15} \approx 0.0667$ ；当小麦的产量为 575 单位时，铁的均衡产量为 30 单位，相应的均衡配置如表 2 所示。

表2 小麦-铁两部门经济的一个均衡配置

	小麦生产者	铁生产者	总需求量
小麦需求量	280	180	460
铁需求量	12	12	24
下一期的供给量	575	30	

A 的 $P-F$ 特征值为 $\lambda = 0.8$ ，这意味着这一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为 $1/\lambda - 1 = 0.25$ 。

初期中两个部门的产出可以用一个如下的产出矩阵表示。

$$Y = \begin{bmatrix} 575 & 0 \\ 0 & 20 \end{bmatrix} \quad (4)$$

三 经济主体间的固定价格交易过程

古典增长框架下的各种动态模型的一个常见缺点是没有考虑到市场机制（Los, 2001）。也就是说这些模型往往忽略了交易过程、价格波动及其经济后果。本文试图通

过在增长模型中嵌入一个交易过程把市场机制整合到增长模型之中。这种显式地而非隐含地包含交易环节（或者说市场型资源配置过程）的增长模型即为结构增长模型。

本节提出一个交易函数来描述 m 个经济主体间的非均衡的交易过程。为了简单起见将假设交易过程中市场价格保持不变、各交易者的需求结构保持不变。

（一）交易函数

考虑 m 个经济主体在给定的价格向量 p 下的交易过程。令 S 代表 $(n \times m)$ 的供给矩阵，其第 (i, j) 个元素代表主体 j 供给的商品 i 的数量。令 $s := S1$ 代表供给向量，假设其为正向量。

例如，在 Sraffa 的例子中，当两个部门将其初期的产品投入市场中时供给矩阵为

$$S = \begin{bmatrix} 575 & 0 \\ 0 & 20 \end{bmatrix} \quad (5)$$

供给向量为 $s = (575, 20)^T$ 。

交易者的需求结构可以用一个标准需求矩阵 A 来表示，其中第 i 列称为交易者 i 的标准需求束。对于纯生产经济而言，投入系数矩阵即可以作为标准需求矩阵。在交易过程中交易者 i 购买的商品束为 $\xi a^{(i)}$ ，其中 ξ 为非负实数， $a^{(i)}$ 代表 A 的第 i 列。称 ξ 为交易者 i 的购买量或交易量。令 z 代表 m 个交易者的交易量构成的向量，称 z 为交易向量或购买向量，称向量 Az 为商品的销售向量，其第 i 个分量反映了交易过程中商品 i 的销售数量（亦即购买数量）。

在 Sraffa 的例子中两个部门购买的商品束分别为 $\left(\frac{56}{115}\alpha, \frac{12}{575}\alpha\right)^T$ 和 $\left(6\beta, \frac{2}{5}\beta\right)^T$ ，其中 α 和 β 为非负实数。交易向量即为 $(\alpha, \beta)^T$ ，该向量反映了标准需求束的购买量，相应的商品销售向量为

$$Az = \left(\frac{56}{115}\alpha + 6\beta, \frac{12}{575}\alpha + \frac{2}{5}\beta\right)^T \quad (6)$$

令 $\hat{x}$ 表示以向量 x 为主对角线的方阵。例如，对于供给向量 $s = (575, 20)^T$ 有

$$\hat{s} = \begin{bmatrix} 575 & 0 \\ 0 & 20 \end{bmatrix} \quad (7)$$

每种商品的销售量与供给量之比即为其销售率。假设对于每种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其所有供给者具有相同的销售率。令 q 代表 n 维销售率向量，该向量反映了交易过程中 n 种商品的销售率，即有

$$q := \hat{s}^{-1}Az \quad (8)$$

例如, 对于供给向量 $s = (575, 20)^T$ 和交易向量 $z = \left(\frac{2875}{6}, 25\right)^T$, 销售率向量为

$$q \equiv \hat{s}^{-1} A z = \begin{bmatrix} 575 & 0 \\ 0 & 20 \end{bmatrix}^{-1} \begin{bmatrix} \frac{56}{115} & 6 \\ \frac{12}{575} & \frac{2}{5} \end{bmatrix} \left(\frac{2875}{6}, 25\right)^T = \begin{bmatrix} 575 & 0 \\ 0 & 20 \end{bmatrix}^{-1} \left(\frac{1150}{3}, 20\right)^T = \left(\frac{2}{3}, 1\right)^T \quad (9)$$

显然, 矩阵 $A \hat{z}$ 和 $\hat{q} S$ 分别表明了每个交易者购买和出售的各种商品的数量。对于以上的例子有

$$A \hat{z} = \begin{bmatrix} \frac{700}{3} & 150 \\ 10 & 10 \end{bmatrix}, \quad \hat{q} S = \begin{bmatrix} \frac{1150}{3} & 0 \\ 0 & 20 \end{bmatrix} \quad (10)$$

在给定的价格向量 p 下, m 个交易者的用于购买商品的支出和销售商品得到的收入分别为 $p^T A \hat{z}$ 和 $p^T \hat{q} S$ 。假设交易过程中每个交易者的支出等于收入, 即有

$$p^T A \hat{z} = p^T \hat{q} S \equiv p^T \widehat{\hat{s}^{-1} A z S} \quad (11)$$

式 (11) 为等价交易条件。当式 (11) 成立且 $S^T A$ 不可分解时, 以下命题表明有且只有一个归一化的交易向量。 $S^T A$ 不可分解意味着所有交易者不能划分成两组, 使得第一组中的任意一交易者对第二组中的每个交易者供给的商品都没有需求。

命题 1. 令 A 和 S 为 $(n \times m)$ 半正矩阵, 且假定 $s_i = S_{1i}$ 为正、 $S^T A$ 不可分解。令 p 为 n 维正向量, z 为 m 维半正向量。则有:

- (i) $Z: = \widehat{A^T p^{-1} S^T \hat{s}^{-1} p A}$ 为不可分解的非负矩阵, 并且具有 $P-F$ 特征值 1;
- (ii) 当且仅当 z 为 Z 的右 $P-F$ 特征向量 (即 $Zz = z$ 成立) 时, z 满足 $p^T A \hat{z} = p^T \widehat{\hat{s}^{-1} A z S}$; 并且, 当 z 满足 $p^T A \hat{z} = p^T \widehat{\hat{s}^{-1} A z S}$ 时 z 为正向量。

证明: (i) 因为 $S^T A$ 不可分解, 所以 A 的每一列必然是半正向量。于是 $A^T p$ 是正向量, $\widehat{A^T p^{-1}}$ 、 $\hat{s}^{-1}$ 和 $\hat{p}$ 的主对角线上的元素均为正。于是当矩阵 $S^T A$ 的第 (i, j) 个元素为正时, 矩阵 Z 的第 (i, j) 个元素也为正。因此 Z 是不可分解的。

容易验证 $p^T A z = p^T A$ 成立。根据 Perron - Frobenius 定理, 矩阵 Z 的 $P-F$ 特征值等于 1, $p^T A$ 为矩阵 Z 的一个左 $P-F$ 特征向量。

(ii) 有下式成立:

$$p^T A \hat{z} = p^T \widehat{\hat{s}^{-1} A z S} \Leftrightarrow p^T A \hat{z} = p^T \widehat{A z s^{-1} S} \Leftrightarrow A^T p z = S^T \hat{s}^{-1} \hat{p} A z$$

$$\Leftrightarrow \widehat{A^T p}^{-1} S^T \widehat{s}^{-1} \widehat{p} A z = z \Leftrightarrow Z z = z$$

因此根据 Perron - Frobenius 定理可知命题成立。

令 x 代表矩阵 Z 的归一化的右 $P - F$ 特征向量。由命题 1 (ii) 可知有 $z = \xi x$ 成立, 其中 ξ 是非负实数。由于每种商品的销售量不大于其供给量, 于是有 $Az \leq s$ 成立, 亦即有 $\xi Ax \leq s$ 。因此 ξ 不大于 $\widehat{Ax}^{-1}s$ 的最小分量。假设所有交易者试图获得最大的交易量。唯一的最大交易向量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求得, 该交易向量代表了交易过程的交易结果:

步骤 1. 计算矩阵 $Z \equiv \widehat{A^T p}^{-1} S^T \widehat{s}^{-1} \widehat{p} A$;

步骤 2. 计算矩阵 Z 的归一化的右 $P - F$ 特征向量, 记为 x ;

步骤 3. 计算 $\widehat{Ax}^{-1}s$ 的最小分量, 记为 ξ ;

步骤 4. 计算交易向量 $z: = \xi x$ 。

于是固定价格交易过程可以用如下的 (固定价格) 交易函数表示:

$$(q, z) = Z(A, p, S) \quad (12)$$

其中 A 、 S 和 p 满足命题 1 中的假设, z 通过以上步骤计算, q 等于 $\widehat{s}^{-1}Az$ 。

当交易者的需求结构随价格发生变动时, 交易函数可写为

$$(q, z) = Z(A(p), p, S) \quad (13)$$

(二) Sraffa 例子中的交易过程

接下来用 Sraffa 给出的例子对经济主体间的固定价格交易过程做一说明, 这一例子可以看作一个离散时间的纯生产经济, 每期中发生一次交易过程和生产过程。式 (2a) 和 (2b) 可以视作初期的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结束后经济进入新的一期, 在这一期中两个部门将首先在市场上交易其产品, 此时的供给矩阵如式 (5) 所示。假设当前的市场价格向量为一个均衡价格向量 $\left(\frac{1}{15}, 1\right)^T$, 于是可算得交易向量为 $z = \left(\frac{2875}{6}, 25\right)^T \approx (479.2, 25)^T$, 商品的销售向量为 $Az = \left(\frac{1150}{3}, 20\right)^T \approx (383.3, 20)^T$, 可见交易过程中铁售罄了而小麦没有售罄。销售率向量为 $q = \left(\frac{2}{3}, 1\right)^T$ 。相应地, 小麦的存货量 (即未能出售的数量) 约为 191.7 单位, 而铁没有存货。

当交易结束后市场价格根据交易结果反映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动时, 由于小麦供大于求, 因此其价格将相对下降, 而铁的价格将相对上升。

交易过程结束后经济主体将把购买到的商品投入生产或消费。在 Sraffa 的这一纯生产经济的例子中只有生产者而没有消费者, 两个生产部门将把购买到的产品投入生产。

由于在这一经济中标准需求矩阵等同于投入系数矩阵, 因此交易向量 z 也反映了接下来的生产过程的产量 (亦即生产水平)。在交易过程中小麦生产者购买了 479.2 个单位需求束 (亦即标准需求束), 由于其每个单位需求束对应一单位小麦产出, 因此小麦生产者在接来下的生产过程中将生产出 479.2 单位小麦。铁生产者购买了 25 个单位需求束 (亦即标准需求束), 在接来下的生产过程中将生产出 25 单位的铁。可见, 与上一期相比本期小麦的产量将下降, 而铁的产量将上升。在本期的生产过程结束后, 又将开始下一期的交易过程。

在第一次交易过程中市场未能出清, 销售率向量为 $q = \left(\frac{2}{3}, 1\right)^T$, 因此存货率向量为 $1 - q = \left(\frac{1}{3}, 0\right)^T$ 。而存货矩阵即为 $\widehat{1 - qS}$, 其第 (i, j) 个元素反映了交易者 j 持有的商品 i 的存货数量。第一次交易过程结束后, 存货矩阵为

$$\widehat{1 - qS} = \left(\frac{1}{3}, 0\right) \begin{bmatrix} 575 & 0 \\ 0 & 20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frac{1}{3} & 0 \\ 0 & 0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575 & 0 \\ 0 & 20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frac{575}{3} & 0 \\ 0 & 0 \end{bmatrix} \approx \begin{bmatrix} 191.7 & 0 \\ 0 & 0 \end{bmatrix} \quad (14)$$

第一次交易过程结束后小麦生产者的存货约为 191.7 单位, 在下一交易过程开始前这些存货可能会经历折旧, 比如说其折旧率为 0.2。这样当下一交易过程开始时这些存货还剩余 153.3 单位。于是下一交易过程中小麦的供给量约为 632.5 ($= 153.3 + 479.2$) 单位。而铁的供给量将为 25 单位。

四 纯生产的结构增长模型

(一) 模型

在此首先考虑纯生产的结构增长模型。在纯生产模型或经济中只有厂商和生产过程, 而没有消费者和消费过程。此时所有的商品均为厂商的产品, 其供给量为内生变量。

假设经济是一个离散时间动态系统, 每期中依次进行价格调整、交易、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 第 t 期的经济状态可以由以下变量来描述。

$p^{(t)}$ 价格向量, 为由第 t 期的 n 种商品的价格构成的正向量;

$S^{(t)}$ 供给矩阵, 其第 (i, j) 个元素代表第 t 期中经济主体 j 供给的商品 i 的数量;

$q^{(t)}$ 销售率向量, 由第 t 期的 n 种商品的销售率构成;

$z^{(t)}$ 交易向量和生产水平向量, 反映了第 t 期中各经济主体购买的标准需求束的数量。当 $B = I$ 时, $z^{(t)}$ 即为产出向量, 反映了各生产者的产量;

$Y^{(t)}$ 产出矩阵, 其第 (i, j) 个元素代表第 t 期中生产者 j 生产的商品 i 的数量。

假设第 $t+1$ 期中经济按照如下方式运行：

首先是价格调整过程，在第 t 期的价格向量和销售率的基础上形成第 $t+1$ 期的价格向量，该价格向量反映了 n 种商品在第 $t+1$ 期中的市场价格。

其次是供给的形成过程，第 t 期的产出和经过折旧的第 t 期的存货构成第 $t+1$ 期的产品供给。

再次是固定价格下的交易过程，经济主体（在此即为厂商）在第 $t+1$ 期的市场价格下交易供给矩阵中的商品，得到第 $t+1$ 期的交易向量和销售率向量。未售出的商品构成第 $t+1$ 期的存货，存货将经历折旧并成为下一期供给的一部分。

最后，每个厂商将其在市场中购买的商品投入生产，得到第 $t+1$ 期的产出。

纯生产的结构增长模型如下：

$$p^{(t+1)} = P(p^{(t)}, q^{(t)}) \quad (15a)$$

$$S^{(t+1)} = Y^{(t)} + Q(1 - q^{(t)})S^{(t)} \quad (15b)$$

$$(q^{(t+1)}, z^{(t+1)}) = Z(A, p^{(t+1)}, S^{(t+1)}) \quad (15c)$$

$$Y^{(t+1)} = Bz^{(t+1)} \quad (15d)$$

下面来解释以上各式。

式 (15a) 代表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 P 为价格调整函数。本文假设市场价格基于销售率所反映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动。

式 (15b) 代表供给的形成过程。当上一期 [即第 t 期] 有商品未售罄（即 $q^{(t)} \neq 1$ ）时，各厂商上一期的存货构成存货矩阵 $1 - q^{(t)} S^{(t)}$ 。 Q 为存货折旧函数。产出矩阵 $Y^{(t)}$ 反映了第 t 期的产出。产出矩阵加上经过折旧的第 t 期的存货矩阵 $Q(1 - q^{(t)})S^{(t)}$ 即为第 $t+1$ 期的供给矩阵 $S^{(t+1)}$ 。

式 (15c) 代表交易过程，其中 Z 为固定价格交易函数。

式 (15d) 代表生产过程。由于 $z_i^{(t+1)}$ 反映了厂商 i 在第 $t+1$ 期购买的单位需求束的数量，而每个单位需求束对应一单位的生产水平，因此 $z_i^{(t+1)}$ 也反映了厂商 i 在第 $t+1$ 期的生产水平。

如果把式 (15b) 写为如下形式，则式 (15d) 可略去：

$$S^{(t+1)} = Bz^{(t+1)} + Q(1 - q^{(t)})S^{(t)} \quad (15b')$$

（二）小麦—铁两部门经济中的经济周期

下面是纯生产结构增长模型的一种可计算的具体形式，利用以下模型可以对纯生

产经济进行仿真分析。

$$p_i^{(t+1)} = \begin{cases} p_i^{(t)} & q_i^{(t)} > 0.99 \\ 0.98p_i^{(t)} & q_i^{(t)} \leq 0.99 \end{cases}, i=1, 2, \dots, n \quad (16a)$$

$$S^{(t+1)} = B \widehat{z^{(t)}} + 0.8 \widehat{1 - q^{(t)}} S^{(t)} \quad (16b)$$

$$(q^{(t+1)}, z^{(t+1)}) = Z(A, p^{(t+1)}, S^{(t+1)}) \quad (16c)$$

式(16a)为一个固定幅度的价格调整过程。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当商品接近售罄时其价格保持不变,否则其价格将下降2%。于是可知当且仅当所有商品接近售罄时价格向量保持不变。如果有些商品远未售罄,则接近售罄的商品的价格将相对上升。

式(16b)表示供给的形成过程。这里的存货折旧函数为 $Q(M) = 0.8M$ 。仿真中将假设 $z^{(0)} \gg 0$ 、 $B^T A$ 不可分解,这种情况下对于 $t=1, 2, \dots, \infty$, $S^{(t)T} A$ 不可分解。

式(16c)表示交易过程。

下文的仿真中将设置 $u^{(0)} = 1$, 这种情况下 $S^{(1)}$ 等于 $B \widehat{z^{(0)}}$ [亦即初期的产出矩阵 $Y^{(0)}$]。

对于模型(16a) ~ (16c)的一条路径,若有 $q^{(t)} = 1, t=0, 1, 2, \dots, \infty$ 成立(即所有商品始终售罄),则称其为一条均衡路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16a)式可知价格向量始终保持不变,称该价格向量为均衡价格向量。不难验证,当 $B=I, q^{(0)}=1, p^{(0)}$ 和 $z^{(0)}$ 分别为 A 的左、右 $P-F$ 特征向量时,该经济将运行在均衡路径中。这种情况下 $z^{(t)}$ 即为第 t 期的产出向量,该向量为 A 的右 $P-F$ 特征向量。

下面利用模型(16a) ~ (16c)来分析 Sraffa 给出的纯生产经济(2a) ~ (2b)中的经济周期。在 Sraffa 的这一例子中投入系数矩阵 A , 如式(3)所示,产出系数矩阵 B 为单位阵 I 。如前所述,这一经济中的均衡价格向量为 $\left(\frac{1}{15}, 1\right)^T$, 初期的产出向量为 $(575, 20)^T$, 将这两个向量分别设置为模型(16a) ~ (16c)中的 $p^{(0)}$ 和 $z^{(0)}$, 并令 $q^{(0)}=1$ 。第1~100期的仿真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见这一经济中的价格比、产出比、产出增长率及以均衡价格计量的总产值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换句话说,这一经济中存在经济周期。动态经济中的市场价格常常围绕均衡价格波动(Kurz, Salvadori, 1995)。这一经济中的小麦和铁的均衡价格比(亦即以铁计价的小麦均衡价格)为 $\frac{1}{15} \approx 0.0667$, 小麦和铁的

均衡产出比为 $\frac{575}{30} \approx 19.17$, 均衡增长率和利润率为0.25。从图1可见这一经济中的

价格比、产出比确实在围绕均衡值波动。不过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这一经济中的平均增长率比 0.25 小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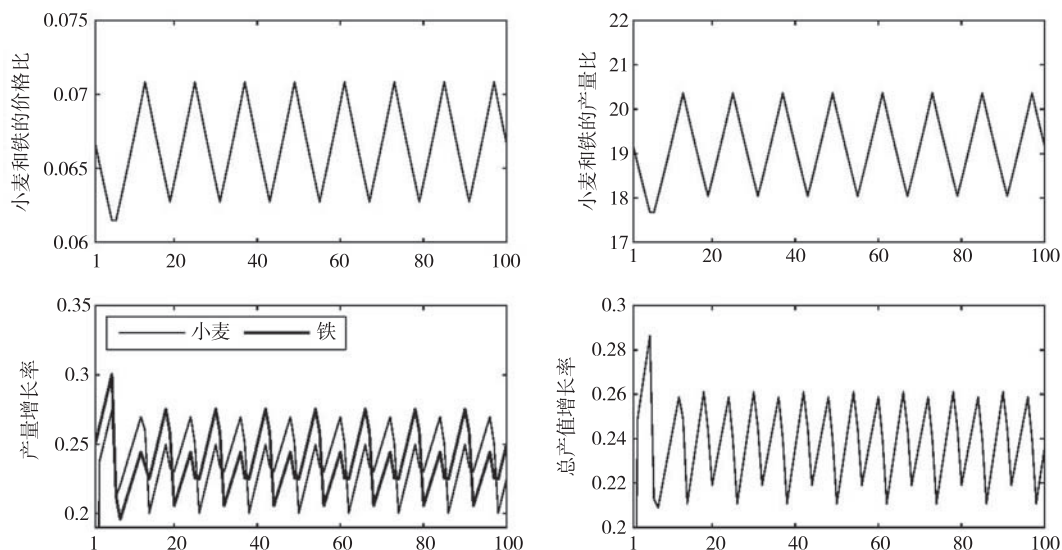


图 1 小麦 - 铁两部门经济中第 1 到 100 期的仿真结果

图 2 以另一种形式显示了从第 1 期到第 1000 期的价格比和供给比，从图 2 中可以看到这一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可以视为离散时间的极限环。图 2 的左图对应的初始值为 $p^{(0)} = \left(\frac{1}{15}, 1\right)^T$ 和 $z^{(0)} = (575, 20)^T$ ，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经济周期（第 86 期到第 97 期）中的产出增长率和销售率如图 3 所示。图 2 的右图对应的初始价格向量为 $p^{(0)} = (0.0660, 1)^T$ ，这一初始价格向量略微偏离均衡价格向量；对应的初始产出向量为 $z^{(0)} = (575, 30)^T$ ，即均衡产出向量。位于 $(19.17, 0.0667)$ 处的星号代表均衡路径，亦即不动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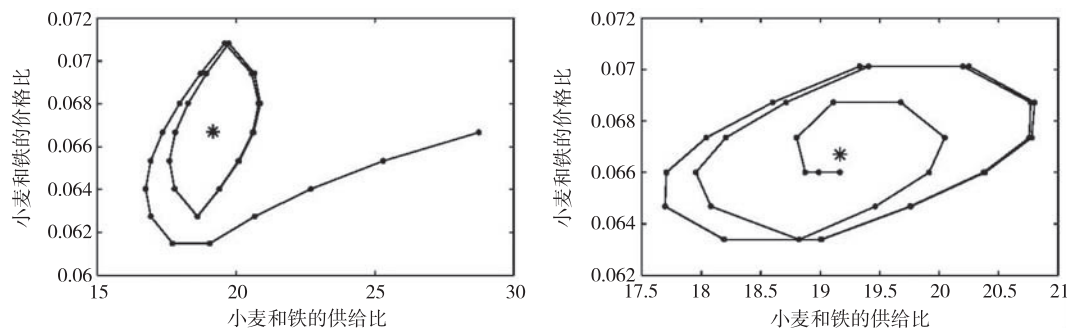


图 2 小麦 - 铁两部门经济中的均衡与经济周期

图2显示,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这一经济均很快地趋于极限环,而极限环对应着经济周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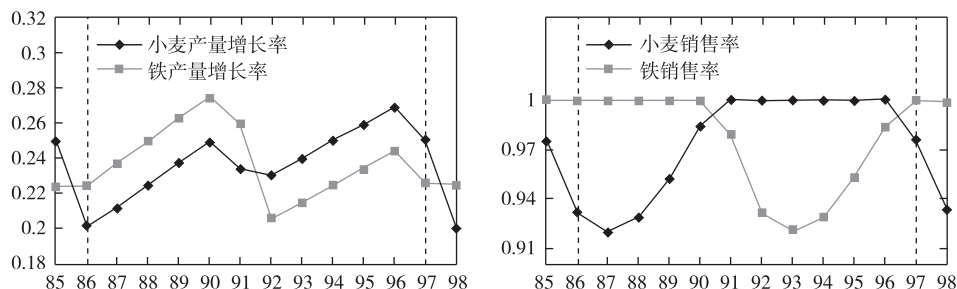


图3 一个经济周期中的产出增长率和销售率

五 有消费的结构增长模型

(一) 模型

现在来考虑既包含厂商和生产过程、又包含消费者和消费过程的结构增长模型。此时经济中的商品可以分为两类,即厂商生产出的产品和消费者拥有的劳动、土地等初级要素。产品的供给量为内生变量,而初级要素的供给量为外生变量。

相应地,第 t 期的销售率向量 $q^{(t)}$ 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由产品的销售率 $q'^{(t)}$ 构成的向量和由初级要素的销售率构成的向量 $q''^{(t)}$,即有 $q^{(t)} \equiv [q'^{(t)}; q''^{(t)}]$ 。

而第 t 期的供给矩阵 $S^{(t)}$ 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由厂商的供给量构成的矩阵 $S'^{(t)}$ 和由消费者的供给量构成的矩阵 $S''^{(t)}$,即有 $S^{(t)} \equiv [S'^{(t)} \quad S''^{(t)}]$ 。其中 $S'^{(t)}$ 反映了第 t 期各种产品的供给量,为内生变量,而 $S''^{(t)}$ 反映了第 t 期各种初级要素的供给量,为外生变量。当不存在技术进步、初级要素供给矩阵 $S''^{(t)}$ 以速度 $\gamma \geq 0$ 增长时,经济中的均衡增长率即为 γ 。

标准需求矩阵 A 也可分为两部分,即厂商的标准需求矩阵和消费者的标准需求矩阵。厂商的标准需求矩阵亦即厂商的投入系数矩阵。消费者的标准需求矩阵由各类消费者在给定价格向量下的需求束构成。

第 t 期的交易向量 $z^{(t)}$ 也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由厂商的交易量构成的向量 $z'^{(t)}$ 和由消费者的交易量构成的向量 $z''^{(t)}$,即有 $z^{(t)} \equiv (z'^{(t)}; z''^{(t)})$ 。

有消费的结构增长模型如下。

$$p^{(t+1)} = P(p^{(t)}, q^{(t)}) \quad (17a)$$

$$S'^{(t+1)} = B' \widehat{z'^{(t)}} + Q(1 - q'^{(t)}) S'^{(t)} \quad (17b)$$

$$(q^{(i+1)}, z^{(i+1)}) = Z(A, p^{(i+1)}, S^{(i+1)}) \quad (17c)$$

其中 $S^{(i)} \equiv [S'^{(i)} \quad S''^{(i)}]$ 。

以上模型的一种具体形式为

$$p^{(i+1)} = (1 - \theta) p^{(i)} + \theta \widehat{q^{(i)}} p^{(i)} \quad (18a)$$

$$S'^{(i+1)} = B' \widehat{z^{(i)}} + 0.8 \widehat{1 - q^{(i)}} S'^{(i)} \quad (18b)$$

$$(q^{(i+1)}, z^{(i+1)}) = Z(A, p^{(i+1)}, S^{(i+1)}) \quad (18c)$$

式 (18a) 反映了价格调整过程, 其中使用了一种可变幅度调价函数。此时销售率的高低影响价格的调整幅度。当一种商品的销售率较高、销售情况较好时, 价格下降幅度较小; 当销售率较低、销售情况较差时, 价格下降幅度较大。 θ ($0 < \theta < 1$) 为调价速度系数, 当它的值较大时, 价格调整幅度也较大。

(二) 小麦 - 劳动两部门经济中的经济周期

在此把 Sraffa 给出的例子 (2a) ~ (2b) 中的供给量内生的铁换为供给量外生的劳动、铁生产者换为劳动者, 这样就将原先的纯生产的两部门经济修改为一个包含消费的两部门经济。假设劳动者每期供给 190 单位的劳动。由于劳动的供给量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这一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为 0。

假设劳动者具有 Leontief 型的效用函数 $\min\left\{\frac{x_1}{6}, \frac{x_2}{0.4}\right\}$, 换句话说, 消费者的需求结构是固定不变的, 其消费束可写为 $(6u, 0.4u)^T$ 的形式, 其中 u 为一个非负实数, 反映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 (或者说效用水平)。

以劳动为计价商品。可算得小麦的均衡价格为 $\frac{12}{295} \approx 0.0407$, 小麦的均衡产量为 3450 单位。均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 (亦即均衡配置) 如表 3 所示, 从中可见, 均衡中劳动者供给 190 单位劳动, 消费 1770 单位小麦和 118 单位劳动。

表 3 小麦 - 劳动两部门经济的均衡配置

	小麦生产者	铁生产者	总需求量
小麦需求量	1680	1770	3450
劳动需求量	72	118	190
供给量	3450	190	

将均衡价格设置为初始价格, 设置小麦的初始产量为 3400 单位。使用可变幅度调价函数, 并设置调价速度系数为 0.2。仿真结果如图 4 所示。而当调价速度系数较小 (如为 0.1) 时这一经济将收敛到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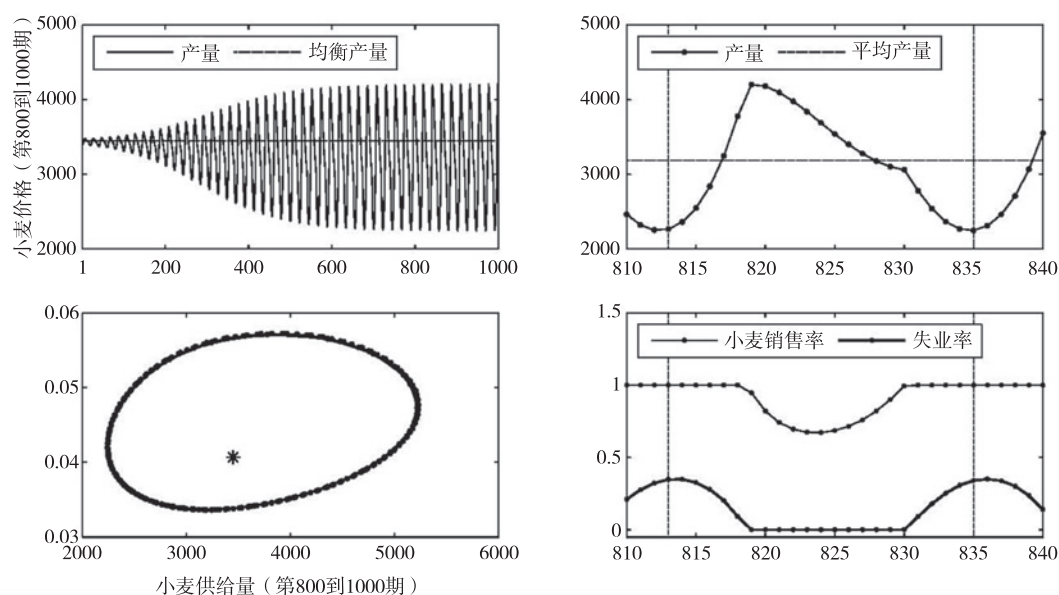


图4 小麦-劳动两部门经济中的经济周期

从图4中的左上图可以看到这一经济中的小麦产量大约在第600期之后呈现出规律性的周期波动。从图4中的右上图可以看到,在第812期产量达到一个谷底,而在第835期产量达到下一个谷底。将第813期到第835期视为一个经济周期,则这一经济周期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i) 从第813期到第816期为复苏阶段,这一阶段对应图4的左下图中环形路径的左上部;在这一环形路径中经济沿顺时针方向运行。这一阶段中小麦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其价格上升。小麦价格的上升又导致小麦生产者利润率的增加,进而导致产量和供给量的增加,但这一阶段产量仍低于长期平均产量。这里的长期平均产量指第600期到第1000期的平均产量,约为3277单位;由于经济周期导致的效率损失,该值低于小麦的均衡产量(即3450单位)。

(ii) 从第817期到第819期为繁荣阶段,这一阶段对应于环形路径的右上部。这一阶段中由于上一阶段小麦供给的持续上升而出现小麦供大于求的情况,因此这一阶段中小麦价格在下降,但此时小麦价格仍然相对较高、高于生产成本,厂商仍有利润,产量仍在增加且高于长期的平均产量。复苏阶段和繁荣阶段构成了这一周期中的扩张阶段。

(iii) 从第820期到第827期为危机阶段,这一阶段对应环形路径的右下部。由于小麦价格的持续下降、供给的持续上升及积压产品的上升最终厂商出现亏损,于是小麦的价格和产量均在下降。尽管这一阶段中产量在下降,但产量仍然相对较高,高于长期的平均产量。

(iv) 从第 828 期到第 835 期为萧条阶段, 这一阶段对应于环形路径的左下部。上一阶段中小麦供给量的持续下降最终导致这一阶段中小麦供不应求。于是在这一阶段中小麦的价格在上升, 但此时小麦价格仍然相对较低, 低于生产成本, 厂商仍然在亏损, 产量仍在降低且低于长期的平均产量。危机阶段和萧条阶段构成了这一周期中的收缩阶段或称衰退阶段。当小麦价格上升到使得厂商可以赢利的水平时, 经济又进入复苏阶段。表 4 总结了各阶段中小麦的价格与供给量的变动情况。

表 4 小麦 - 劳动两部门经济中经济周期的 4 个阶段

	小麦供不应求的阶段	小麦供大于求的阶段
厂商赢利、供给扩张的阶段	复苏阶段 价格上升, 供给增加	繁荣阶段 价格下降, 供给增加
厂商亏损、供给收缩的阶段	萧条阶段 价格上升, 供给减少	危机阶段 价格下降, 供给减少

由此可见, 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与数量同时变动时, 两者未必能够同时达到均衡值。

另外, 从图 4 中的右上图可以看到, 这一经济中相邻的两个周期之间有少许差异; 在这一周期的复苏阶段的最后一期 (第 816 期) 产量距离平均产量较远, 而在下一周期的复苏阶段的最后一期 (第 839 期) 产量则很接近平均产量。

图 4 中的右下图显示了小麦销售率和失业率的变动情况, 失业率等于 1 减去劳动的销售率。在这一以物易物的经济中, 每期中小麦和劳动这两种商品中至少有一种会售罄。

经济中的投资率和以劳动计价的小麦价格如图 5 所示。这一经济中小麦用于投资的数量与小麦供给量之比即为投资率。每期中小麦的投资量可分为有效投资与无效投资 (即未能出售的积压产品) 两部分。有效投资量与小麦供给量之比即为有效投资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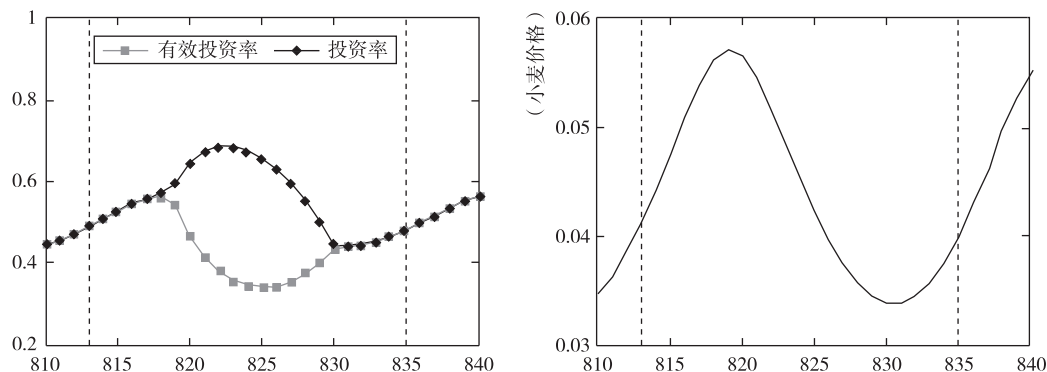


图 5 小麦 - 劳动两部门经济中的投资率和小麦价格

六 结束语

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的经济总是运行在非均衡路径之中,因此非均衡经济分析的重要性不亚于均衡经济分析。尽管学者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动态非均衡模型(例如, Benetti, Bidard, Klimovsky, Rebeyrol, 2012; Song, 2003),但这些动态非均衡模型均没有包含交易过程,从而未能很好地反映市场机制在动态经济中的作用。而本文提出的结构增长模型则克服了这一缺点,包含了一个非均衡的交易过程,从而为建立非均衡动态模型开创了一种新的思路。

在不同的初始条件和参数下,本文提出的结构增长模型可能收敛于均衡,也可能出现周期性波动。这意味着通过选择适当的初始条件和参数,这一模型既可以被用于计算某些经济中的均衡价格和均衡配置,也可以被用于分析某些经济中的经济波动。

本文利用结构增长模型对于 Sraffa (1960) 给出的算例进行了仿真分析。从本文的分析可见,即使在没有货币和固定资产的经济中也可能出现价格和产量持续变动但始终无法同时达到均衡值的情况,也就是说当价格达到均衡价格或其附近时经济中的产量却远离均衡产量,当产量达到均衡产量或其附近时市场价格却远离均衡价格。这种情况下经济将陷入持续的波动之中,并且有可能呈现有规律的周期波动。

参考文献

- [1] Benetti, C., Bidard, C., Klimovsky, E., Rebeyrol, A., "Reproduction and Temporary Disequilibrium: A Classical Approach," *Metroeconomica*, 63, 2012.
- [2] Bidard, C. *Prices, Reproduction, Scar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 Dietzenbacher, E., "Perturbations of Matrices: A Theorem on the Perron Vector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Input - output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ics*, 48 (4), 1988.
- [4] Dorfman, R., P. A. Samuelson and R. M. Solow, *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58.
- [5] Gale, D., *The Theory of Linear Economic Models*,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60.
- [6] Kemeny, J. G., O. Morgenstern and G. L. Thompson,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von Neumann Model of an Expanding Economy," *Econometrica*, 24, 1956.
- [7] Kurz, H., and N. Salvadori, *Theory of Production: A Long - Period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8] Kurz, H. and N. Salvadori, "'Classical' Roots of Input - Output Analysis: A Short Account of its Long Prehistory,"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12 (2), 2000.
- [9] Kurz, H. and N. Salvadori, "Sraffa and von Neuman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3 (2), 2001.
- [10] Leontief, W., "Quantitative Input - 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8, 1936.
- [11] Leontief, W,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919 – 1929,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 [12] Los, B, “Endogenous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a Dynamic Input – Output Model,”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13 (1), 2001.
- [13] Marx, K, *Capital*, Vol. I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6.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as Kapital*, Vol. II, edited by F. Engels, Hamburg, Meissner, 1885.
- [14] McKenzie, L. W, “Turnpike Theorems for a Generalized Leontief Model,” *Econometrica*, 31, 1963.
- [15] McKenzie, L. W, “Turnpike Theory,” *Econometrica*, 44, 1976.
- [16] Morishima, M, *Equilibrium, Stability and Growth: A Multi – sectoral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17] Morishima, M, *Marx’s Economics: 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18] Quesnay, F, *Quesnay’s Tableau Economique [1759]*. Edited by M. Kuczynski and R. L. Meek. London: Macmillan, 1972.
- [19] Salvadori, N. and I. Steedman, *Joint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0.
- [20] Samuelson, P. and E. Etula, “Testing to Confirm that Leontief – Sraffa Matrix Equations for Input/Output Must Obey Constancy of Returns to Scale,” *Economics Letters*, 90, 2006.
- [21] Solow, R and P. Samuelson, “Balanced Growth under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Econometrica*, 21, 1953.
- [22] Song, X, “A Two – sector Adaptive Economizing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52, 2003.
- [23] Sraffa, P,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24] vonNeumann, J. “A Model of 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3, 1945.

两大部类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充要条件及其应用

陶为群*

摘 要 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问题是由当年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问题与下一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问题连接所构成。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存在着必要条件。可以将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结构状态转移方程,作为把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连接起来的纽带,从而通过逆推导获得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并进而证明这个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这个充分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自动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应用这个充分必要条件,能够寻求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借助《资本论》中的一个举例,对于寻求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做了计算验证。

关键词 两大部类 平衡增长 充分必要条件 积累率 状态转移方程

一 寻求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的机理

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对于研究国民经济如何实现平衡、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已经有研究提出,虽然第Ⅰ部类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先行地位,但从长期趋势看,它的生产是与第Ⅱ部类的生产以同一程度增加的。^①也就是说,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平衡增长是一种长期趋势。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讨论两大部类的平衡增长,都把平衡增长当作一种当然可以实现的状态,并没有说明需要怎样的条件。^②在缺少必要条件的情形下研究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平衡增长,无疑明显削弱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譬如,无法研究最高平衡增长率问题。

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问题是由当年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问题与下一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问题连接所构成。已经有研究分别证明了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和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③④}所以能够断定,社会再生产平

* 陶为群,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巡视员,研究员,安徽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量经济。

① 裴小草:《马克思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速度问题探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5期。

② 程恩富等:《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2版,第204~210页。

③ 陶为群:《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求解》,《经济数学》2014年第3期。

④ 陶为群、陶川:《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特征值及其理论蕴涵》,《经济评论》2011年第3期。

衡增长存在着必要条件。

当年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与下一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前后衔接,可能需要比单个年份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单个年份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更为严格的条件。由于在社会再生产中,资本积累会使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发生变化或者不发生变化,因而两个相邻年份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后衔接是由扩大再生产的结构状态转移方程所形成。结构状态转移方程能够成为把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连接起来的纽带。

遵循经典的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公式,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就是两大部类实现资本积累。所以,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与在某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是等价性问题。冯金华(2011)将积累率概念细分成三个不同的积累率:保证社会总产品完全实现的平衡交换积累率、保证两大部类同比例增长的平衡增长积累率、同时保证平衡交换和平衡增长的平衡积累率。^①笔者认为,首先,两大部类实现平衡交换就是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当且仅当两大部类实现平衡交换时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能够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因而对于扩大再生产的情形,两大部类实现平衡交换与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是等价的。所以,用积累率概念可以替代平衡交换积累率概念;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其次,平衡增长积累率是积累率当中的一种特别情形,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是以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作为前提条件,也就是以两大部类实现平衡交换作为前提条件。所以,不需要再提出平衡积累率概念。而把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与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连接起来,就可以通过逆推导获得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寻求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的机理是:如果在某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那么当年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取值就必须限定在一个限定的区间之内;而根据社会再生产的状态转移方程,当年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是前1年第I部类积累率自变量的函数,因而作为函数的结构状态限定的值域使作为自变量的前1年第I部类积累率的定义域也受到限定;因为必须在前1年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并且第I部类积累率的定义域也受到限定,必然又对前1年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取值形成限制条件,这个限制条件就是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基于这样的机理,可以通过逆推导,获得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二 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结构状态转移方程及其意义

按照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生产部门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生产消费资料

^① 冯金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增长的性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的两个部类,分别记为第Ⅰ、第Ⅱ部类。第 j 部类($j = \text{I}, \text{II}$,下同)在 t 年初时点的总资本分解成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两个部分,分别记为 $C_j^{(t)}$, $V_j^{(t)}$, $C_j^{(t)}$ 和 $V_j^{(t)}$ 都是每年周转一次; $V_j^{(t)}$ 带来剩余价值 $M_j^{(t)}$ 。第 j 部类产品生产消耗的不变资本对于可变资本的固定不变倍数 h_j 表示该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 $M_j^{(t)}$ 与可变资本 $V_j^{(t)}$ 之间保持固定不变的比率,以 e_j 表示,是第 j 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以 $Y_j^{(t)}$ 表示第 j 部类的新创造价值,在确定了含义的字母前面加符号 Δ 表示在当年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增量,以 $M_{xj}^{(t)}$ 表示第 j 部类企业所有者把本部类的剩余价值中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由于剩余价值 $M_j^{(t)}$ 是形成本部类的新增资本和企业所有者的剩余价值消费的唯一来源,所以有剩余价值使用的行为方程:

$$\Delta C_j^{(t)} + \Delta V_j^{(t)} + M_{xj}^{(t)} = M_j^{(t)} \quad j = \text{I}, \text{II} \quad (1)$$

已经有研究结果根据式(1)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明的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①将社会再生产公式简化成一个方程:^②

$$\Delta C_{\text{I}}^{(t)} + \Delta C_{\text{II}}^{(t)} = Y_{\text{I}}^{(t)} - C_{\text{II}}^{(t)} \quad (2)$$

式(2)是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不变资本积累均衡条件,而不变资本积累均衡条件对应着全部资本积累均衡条件。因而,可以把式(2)称为资本积累均衡方程。

扩大再生产是有剩余价值用作资本积累,成为新增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 $\mu_j^{(t)}$ 表示第 j 部类的剩余价值积累率,那么:

$$\Delta C_j^{(t)} + \Delta V_j^{(t)} = \mu_j^{(t)} M_j^{(t)} \quad j = \text{I}, \text{II} \quad (3)$$

用两大部类新创造价值之间的比例 $\varphi^{(t)} = Y_{\text{II}}^{(t)} / Y_{\text{I}}^{(t)}$ 表示两大部类总产品之间的结构状态。由于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公式里,每个部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比例是固定不变的,年初社会总资本的结构状态完全决定了当年社会总产品的结构状态。所以,实质上 $\varphi^{(t)}$ 体现了第 t 年的两大部类资本结构状态,是社会再生产系统中的状态变量。 $\varphi^{(t)}$ 与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参数 h_j , e_j 共同体现了两大部类再生产系统的完整结构。根据式(1),有:

$$\Delta V_j^{(t)} = \Delta C_j^{(t)} / h_j \quad j = \text{I}, \text{II} \quad (4)$$

将式(4)代入式(3),得到:

$$\Delta C_j^{(t)} = \frac{h_j}{1 + h_j} \mu_j^{(t)} M_j^{(t)} \quad j = \text{I}, \text{II} \quad (5)$$

① 程恩富等:《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2版,第206页。

② 陶为群:《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求解》,《经济数学》2014年第3期。

将式 (5) 和 $\varphi^{(i)}$ 的表达式代入资本积累均衡方程式 (2), 得到:

$$\frac{h_1 e_1}{(1+h_1)(1+e_1)} \mu_1^{(i)} + \frac{h_{11} + e_{11}}{(1+h_{11})(1+e_{11})} \varphi^{(i)} \mu_{11}^{(i)} = 1 - \frac{h_{11}}{1+e_{11}} \varphi^{(i)} \quad (6)$$

式 (6) 是以两个部类积累率为待定决策变量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均衡方程。

扩大再生产是指在至少每个部类的资本都不减少的前提下, 社会总资本扩大。因而作为决策变量的积累率 $\mu_j^{(i)}$ 存在如下约束条件:

$$0 \leq \mu_j^{(i)} \leq 1 \quad j = \text{I}, \text{II} \quad (7)$$

和

$$\mu_1^{(i)} + \mu_{11}^{(i)} > 0 \quad (8)$$

约束条件式 (8) 表示至少有一个部类的积累率大于零。式 (6) 表示再生产中的两个部类积累率 $\mu_1^{(i)}$, $\mu_{11}^{(i)}$ 之间的相互匹配关系。贾凤和 (1990) 在第 I 部类的有机构成高于第 II 部类并且两个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同 (从而第 I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低于第 II 部类) 的假定下, 推导给出了在形成每个部类积累率时对两个部类剩余价值之间比例的限制条件:^①

$$\frac{M_1^{(i)}}{M_{11}^{(i)}} < \frac{h_{11} e_1}{e_{11}} \left[\frac{1+e_{11}/(1+h_{11})}{1+e_1/(1+h_1)} \right] \quad (9)$$

根据每个部类的内部结构关系, 式 (9) 当中的 $e_j/(1+h_j)$ 是第 j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如果将假定条件放宽为第 I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 II 部类, 那么就可以在式 (9) 中添加一个等号, 改成:

$$\frac{M_1^{(i)}}{M_{11}^{(i)}} \leq \frac{h_{11} e_1}{e_{11}} \left[\frac{1+e_{11}/(1+h_{11})}{1+e_1/(1+h_1)} \right] \quad (10)$$

陶为群 (2014) 放宽了对于两个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之间高低关系的条件, 根据式 (6) 给出了两个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式:^②

$$\mu_{11}^{(i)} = f_{11}(\mu_1^{(i)}) = \frac{1+h_{11}}{e_{11}} \left\{ \frac{1+e_{11}}{h_{11} \varphi^{(i)}} \left[1 - \frac{h_1 e_1}{(1+h_1)(1+e_1)} \mu_1^{(i)} \right] - 1 \right\} \quad (11)$$

和式 (11) 中自变量 $\mu_1^{(i)}$ 的定义域:

① 贾凤和:《两部类结构比与第 I 部类优先增长等之间关系的数理证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0 年第 2 期。

② 陶为群:《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求解》,《经济数学》2014 年第 3 期。

$$\max \left\{ 0, \frac{(1+h_I)(1+e_I)}{h_I e_I} \left[1 - \frac{\varphi^{(t)}}{\varphi^{\max}} \left(1 + \frac{e_{II}}{1+h_{II}} \right) \right] \right\} \leq \mu_I^{(t)} \leq \min \left\{ 1, \frac{(1+h_I)(1+e_I)}{h_I e_I} \left(1 - \frac{\varphi^{(t)}}{\varphi^{\max}} \right) \right\} \quad (12)$$

以及形成每个部类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

$$\varphi^{\min} \leq \varphi^{(t)} < \varphi^{\max}, \text{ 式中 } \varphi^{\min} = \frac{1}{1+e_I} \left(\frac{1+e_{II}}{h_{II}} \right) \frac{1+e_I / (1+h_I)}{1+e_{II} / (1+h_{II})}; \quad \varphi^{\max} = \frac{1+e_{II}}{h_{II}} \quad (13)$$

并指出式(11)与式(12)是扩大再生产的解函数。根据每个部类剩余价值与新创造价值之间的确定关系以及状态变量 $\varphi^{(t)}$ 的定义式, 不等式(10)与不等式(13)当中的前一个不等式完全一致, 所以形成每个部类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式(13)是对于必要条件式(10)的拓展。

资本积累会导致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变化。白暴力(2000)对于分析两大部类比例变化做了探索。^① 这里, 以状态变量 $\varphi^{(t)}$ 的变化来表示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变化。按照 $\varphi^{(t)}$ 的定义式,

$$\varphi^{(t+1)} = \frac{Y_{II}^{(t)} + \Delta Y_{II}^{(t)}}{Y_I^{(t)} + \Delta Y_I^{(t)}} \quad (14)$$

由于每个部类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比例是固定不变的, 于是根据式(1)和式(4), 有:

$$\Delta Y_j^{(t)} = (1+e_j) \Delta V_j^{(t)} = \frac{1+e_j}{h_j} \Delta C_j^{(t)} \quad j = I, II \quad (15)$$

将式(5)和式(1)代入式(15), 得到:

$$\Delta Y_j^{(t)} = \frac{e_j}{1+h_j} \mu_j^{(t)} Y_j^{(t)} \quad j = I, II \quad (16)$$

因而

$$\frac{\Delta Y_j^{(t)}}{Y_j^{(t)}} = \frac{e_j}{1+h_j} \mu_j^{(t)} \quad j = I, II \quad (17)$$

式(17)表明, 每个部类下一年的新创造价值增长率是本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与当年积累率的乘积。将式(17)和 $\varphi^{(t)}$ 的表达式代入式(14), 得到:

$$\varphi^{(t+1)} = \varphi^{(t)} \frac{1 + \mu_{II}^{(t)} e_{II} / (1+h_{II})}{1 + \mu_I^{(t)} e_I / (1+h_I)} \quad (18)$$

^① 白暴力:《两大部类比例变化的理论分析》,《经济评论》2000年第2期。

将式 (11) 代入式 (18), 得到扩大再生产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转移方程:

$$\varphi^{(t+1)} = \frac{1+e_{\parallel}}{h_{\parallel}(1+e_{\parallel})} \left[\frac{1+h_{\perp}+e_{\perp}}{1+\mu_{\perp}^{(t)}e_{\perp}/(1+h_{\perp})} - h_{\perp} \right] \quad (19)$$

式 (19) 表明: 下一年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只是当年的作为决策变量的第 I 部类积累率变量的函数。

三 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现在借助两大部类结构状态转移方程式 (19), 通过逆推导, 获得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吴栋 (1990) 给出了在第 t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条件:^①

$$\frac{\Delta Y_{\parallel}^{(t)}}{Y_{\parallel}^{(t)}} = \frac{e_{\perp}}{1+h_{\perp}} \mu_{\perp}^{(t)} \quad (20)$$

而根据式 (17), 第 II 部类新创造价值的增长率是本部类资本利润率与积累率的乘积。与式 (20) 结合, 可以确定如果在第 t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 就有:

$$\frac{e_{\perp}}{1+h_{\perp}} \mu_{\perp}^{(t)} = \frac{e_{\parallel}}{1+h_{\parallel}} \mu_{\parallel}^{(t)} \quad (21)$$

其实, 如果在第 t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 也可以只根据式 (20) 就得出式 (21)。由于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是以形成每个部类的积累率作为前提条件, 所以式 (21) 当中的第 II 部类积累率必然满足两个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11)。于是将式 (11) 代入式 (21), 可以确定所形成的平衡增长的第 I 部类积累率 $\mu_{\perp}^{(t)}$; 再代入式 (11) 或者式 (21), 又可以确定所形成的平衡增长的第 II 部类积累率 $\mu_{\parallel}^{(t)}$; 一并写出。

$$\mu_j^{(t)} = \frac{1+h_{\perp}}{e_j} g_j^{(t)}, \text{ 式中 } g_j^{(t)} = \frac{(1+e_{\parallel})(1+h_{\perp}+e_{\perp})}{h_{\parallel}(1+e_{\parallel})\varphi^{(t)}+h_{\perp}(1+e_{\parallel})} - 1; j = \perp, \parallel \quad (22)$$

由于 $\mu_{\perp}^{(t)}$, $\mu_{\parallel}^{(t)}$ 满足对积累率的约束条件式 (7) 和式 (8), 因此将式 (22) 代入式 (7) 和式 (8), 得到第 t 年结构状态变量 $\varphi^{(t)}$ 取值的限定区间:

$$\begin{cases} \varphi^* \leq \varphi^{(t)} < \varphi^{\max}, \text{ 当 } \frac{e_{\perp}}{1+h_{\perp}} \leq \frac{e_{\parallel}}{1+h_{\parallel}}; \\ \varphi^* \leq \varphi^{(t)} < \varphi^{\max}, \text{ 当 } \frac{e_{\perp}}{1+h_{\perp}} > \frac{e_{\parallel}}{1+h_{\parallel}} \end{cases} \quad (23)$$

① 吴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及其数学论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

式 (23) 中,

$$\varphi^* = \frac{1}{1+e_I} \varphi^{\max}; \varphi^{**} = \varphi^{\max} \frac{1}{1+e_{II}/(1+h_{II})} \left[1 - \frac{h_I}{1+e_I} \left(\frac{e_{II}}{1+h_{II}} \right) \right] \quad (24)$$

式 (23) 就是已经有研究给出的在 t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①

根据状态转移方程式 (19), 第 t 年结构状态 $\varphi^{(t)}$ 是前 1 年第 I 部类积累率自变量 $\mu_I^{(t-1)}$ 的函数, 式 (23) 确定了此函数的值域, 进而此函数的值域也限定了自变量 $\mu_I^{(t-1)}$ 的定义域。将状态转移方程式 (19) 逆推 1 年代入式 (23), 就解出了自变量 $\mu_I^{(t-1)}$ 的定义域。

$$\begin{cases} 0 < \mu_I^{(t-1)} \leq 1, \text{ 当 } \frac{e_I}{1+h_I} \leq \frac{e_{II}}{1+h_{II}}; \\ 0 < \mu_I^{(t-1)} \leq \mu_I^*, \text{ 当 } \frac{e_I}{1+h_I} > \frac{e_{II}}{1+h_{II}} \end{cases} \quad \text{式中 } \mu_I^* = \frac{e_{II} (1+h_I)}{e_I (1+h_{II})} \quad (25)$$

所以, 如果在 t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 那么在 $t-1$ 年形成第 I 部类积累率 $\mu_I^{(t-1)}$ 必然受到式 (25) 的限定。而由于在 t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是以在 $t-1$ 年实现扩大再生产作为前提, 所以 $\mu_I^{(t-1)}$ 取值也受到在 $t-1$ 年形成的每个部类积累率取值的限定。从而确定, 即必须同时满足定义域式 (12) 和式 (25)。那么将式 (12) 逆推 1 年并且和式 (25) 结合到一起, 就完全确定了积累率自变量 $\mu_I^{(t-1)}$ 的定义域。

在第 I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 II 部类即 $e_I / (1+h_I) \leq e_{II} / (1+h_{II})$ 的条件下, $\mu_I^{(t-1)}$ 的定义域是:

$$\max \left\{ 0, \frac{(1+h_I) (1+e_I)}{h_I e_I} \left[1 - \frac{\varphi^{(t-1)}}{\varphi^{\max}} \left(1 + \frac{e_{II}}{1+h_{II}} \right) \right] \right\} \leq \mu_I^{(t-1)} \leq \min \left\{ \frac{(1+h_I) (1+e_I)}{h_I e_I} \left(1 - \frac{\varphi^{(t-1)}}{\varphi^{\max}} \right), 1 \right\} \quad (26)$$

在第 I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高于第 II 部类即 $e_I / (1+h_I) > e_{II} / (1+h_{II})$ 的条件下, $\mu_I^{(t-1)}$ 的定义域是:

$$\max \left\{ 0, \frac{(1+h_I) (1+e_I)}{h_I e_I} \left[1 - \frac{\varphi^{(t-1)}}{\varphi^{\max}} \left(1 + \frac{e_{II}}{1+h_{II}} \right) \right] \right\} \leq \mu_I^{(t-1)} \leq \min \left\{ \frac{(1+h_I) (1+e_I)}{h_I e_I} \left(1 - \frac{\varphi^{(t-1)}}{\varphi^{\max}} \right), \mu_I^* \right\} \quad (27)$$

并且不管第 I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或者高于第 II 部类, 都还必须满足:

$$\mu_I^{(t-1)} > 0 \quad (28)$$

① 陶为群、陶川:《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特征值及其理论蕴涵》,《经济评论》2011 年第 3 期。

$\mu_1^{(t-1)}$ 的定义域式 (26)、式 (27) 和式 (28) 确立了三个不等式, 这些不等式对于 $t-1$ 年的两大部类结构状态 $\varphi^{(t-1)}$ 的取值又形成了限制条件。根据 $\mu_1^{(t-1)}$ 的定义域所推导的这些对于 $\varphi^{(t-1)}$ 取值的限制条件, 可以进一步解出 $t-1$ 年的结构状态参数 $\varphi^{(t-1)}$ 取值的限定区间。

$$\begin{cases} \varphi^{\min} \leq \varphi^{(t-1)} < \varphi^{\max}, \text{ 当 } \frac{e_I}{1+h_I} \leq \frac{e_{II}}{1+h_{II}}; \\ \varphi^* \leq \varphi^{(t-1)} < \varphi^{\max}, \text{ 当 } \frac{e_I}{1+h_I} > \frac{e_{II}}{1+h_{II}} \end{cases} \quad (29)$$

式 (29) 就是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至此, 通过逆推导, 获得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四 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的充分性证明

下面证明: 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29) 也是充分条件。只需证明它们是在 t 年形成两个部类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条件。

首先证明在第 I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 II 部类即 $e_I / (1+h_I) \leq e_{II} / (1+h_{II})$ 的条件下, 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29) 也是在 t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条件。当状态变量 $\varphi^{(t-1)}$ 取值满足必要条件式 (29), 就是满足形成每个部类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式 (13), 于是可以在式 (12) 标明的定义域中为第 I 部类积累率取一个值 $\mu_1^{(t-1)*}$, 那么 $\mu_1^{(t-1)*} \leq 1$ 。因为 $\mu_1^{(t-1)*}$ 是作为自变量, 自然可以取 $\mu_1^{(t-1)*} > 0$; 再按照式 (11) 相应确定 $\mu_{II}^{(t-1)*}$, 就形成了每个部类的积累率, 在 $t-1$ 年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

接着再证明由此能够使 t 年的结构状态 $\varphi^{(t)}$ 取值满足形成两个部类平衡增长的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式 (23)。将 $\mu_1^{(t-1)*}$ 代入状态转移方程式 (19), 可以相应确定第 t 年的结构状态取值 $\varphi^{(t)*}$ 。

$$\varphi^{(t)*} = \frac{1+e_{II}}{h_{II}(1+e_I)} \left[\frac{1+h_I+e_I}{1+\mu_1^{(t-1)*}e_I/(1+h_I)} - h_I \right] \quad (30)$$

将状态转移方程式 (19) 逆推 1 年。再根据式 (19), 状态变量 $\varphi^{(t)}$ 是积累率自变量 $\mu_1^{(t-1)}$ 的减函数。由于 $\mu_1^{(t-1)*} \leq 1$, 因而由式 (30) 获得的结构状态取值 $\varphi^{(t)*}$ 不小于以 1 替换式 (19) 中 $\mu_1^{(t-1)}$ 而对应得出的 $\varphi^{(t)}$ 取值; 并且小于以 0 替换式 (19) 中 $\mu_1^{(t-1)}$ 而对应得出的 $\varphi^{(t)}$ 取值。而这两个替换对应得出的 $\varphi^{(t)}$ 取值分别是 φ^* 和 $\varphi^{\max}$ 。从而得到:

$$\varphi^* \leq \varphi^{(t)} \leq \varphi^{\max} \quad (31)$$

于是根据式 (31), 结构状态取值 $\varphi^{(t)}$ 满足在 t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式 (23)。所以, 在第 I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 II 部类的条件下, 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29) 也是充分条件。

其次证明在第 I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高于第 II 部类即 $e_I / (1 + h_I) > e_{II} / (1 + h_{II})$ 的条件下, 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29) 也是在 t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条件。根据式 (24) 和式 (13), 得到:

$$\varphi^* \geq \varphi^{\max} \frac{1}{1 + e_{II} / (1 + h_{II})} \left[1 - \frac{h_I}{1 + e_I} \left(\frac{e_I}{1 + h_I} \right) \right] = \varphi^{\min} \quad (32)$$

所以, 当 $\varphi^{(t-1)}$ 取值满足必要条件式 (29), 就满足了扩大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式 (13)。再根据式 (25), 在第 I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高于第 II 部类的条件下, 有:

$$\mu_I \leq 1 \quad (33)$$

于是在式 (27) 标明的 $\mu_I^{(t-1)}$ 定义域中为第 I 部类积累率取一个值 $\mu_I^{(t-1)*}$, 则 $\mu_I^{(t-1)*} \leq \mu_I \leq 1$ 。所以, 取值 $\mu_I^{(t-1)*}$ 处于式 (12) 所限定的第 I 部类积累率自变量的定义域之内, 因而可以按照式 (11) 相应确定 $\mu_{II}^{(t-1)*}$, 就形成了每个部类的积累率 $\mu_I^{(t-1)*}$ 和 $\mu_{II}^{(t-1)*}$ 。又因为 $\mu_I^{(t-1)*}$ 是自变量, 自然可以取 $\mu_I^{(t-1)*} > 0$ 。

将 $\mu_I^{(t-1)*}$ 代入状态转移方程式 (19), 相应确定第 t 年的结构状态取值 $\varphi^{(t)*}$, 仍然由式 (30) 所表示。将状态转移方程式 (19) 逆推 1 年。由于状态变量 $\varphi^{(t)}$ 是积累率自变量 $\mu_I^{(t-1)}$ 的减函数, 并且 $0 < \mu_I^{(t-1)*} \leq \mu_I$, 因而获得的 $\varphi^{(t)*}$ 取值不小于以 μ_I 替换式 (19) 中 $\mu_I^{(t-1)}$ 而对应得出的 $\varphi^{(t)}$ 取值; 并且小于以 0 替换式 (19) 中 $\mu_I^{(t-1)}$ 而对应得出的 $\varphi^{(t)}$ 取值。而这两个替换对应得出的 $\varphi^{(t)}$ 取值分别是 φ^* 和 $\varphi^{\max}$ 。从而得到:

$$\varphi^* \leq \varphi^{(t)*} \leq \varphi^{\max} \quad (34)$$

于是根据式 (34), 结构状态取值 $\varphi^{(t)*}$ 满足在 t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的充分必要条件式 (23)。所以, 在第 I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不高于第 II 部类的条件下, 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29) 也是充分条件。

一旦在 t 年形成平衡增长积累率, 那么将式 (22) 代入状态转移方程式 (19), 则得到 $\varphi^{(t+1)} = \varphi^{(t)}$; 再代入式 (22), 得到 $\mu_I^{(t+1)} = \mu_I^{(t)}$ 和 $\mu_{II}^{(t+1)} = \mu_{II}^{(t)}$ 。照此递推下去, 从 t 年起, 两大部类的结构状态变量和每个部类的积累率都固定不变, 也就是结构状态收敛到 $\varphi^{(t)}$; 从 $t+1$ 年起, 每个部类以及全社会的新创造价值增长率保持为不变的“常

数” $\bar{g}^{(t)}$ ，因而社会再生产的平衡增长又是稳定的。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可以同时导致两大部类结构状态收敛和社会再生产增长速度收敛。

从对于充分必要条件式 (29) 的证明过程可以看出，所说的 $t-1$ 年是指只要有某一年就可以。

五 平衡增长的充要条件也是自动平衡增长的充要条件

马克思的社会扩大再生产可以自动平衡增长，是马克思的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公式具有的一个独特的现象。这就是：如果让生产资料部类优先积累并确定积累率，再由消费资料部类根据生产资料部类的积累率相应地确定本部类积累率，则无论生产资料部类积累率怎样，只要保持积累率不变，那么消费资料部类积累率在第二年就能够自动实现与生产资料部类积累率均衡匹配，使得从第三年起两大部类以相等的、不变的速度增长。人们一直都把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作为当然的结果，而没有指出产生这一现象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因此，对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的自动平衡增长问题的认识是不完整、不够准确的。

自动平衡增长是第 t 年第 I 部类的积累率与 $t-1$ 年相等不变而形成的特别的平衡增长。相当于在刚刚所做的关于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29) 也是充分条件的证明当中，特别地取：

$$\mu_I^{(t)} = \mu_I^{(t-1)} \quad (35)$$

那么，将 $\mu_I^{(t-1)}$ 代入式 (30) 得到 $\varphi^{(t)}$ ，再将 $\varphi^{(t)}$ 和式 (35) 代入第 II 部类积累率与第 I 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关系式 (11)，得到：

$$\mu_{II}^{(t)} = \frac{e_I (1 + h_{II})}{e_{II} (1 + h_I)} \mu_I^{(t-1)} \quad (36)$$

$\mu_I^{(t)}$ 和 $\mu_{II}^{(t)}$ 就是第 t 年形成的每个部类的积累率。再把式 (35) 代入式 (36)，得到：

$$\frac{e_{II}}{1 + h_{II}} \mu_{II}^{(t)} = \frac{e_I}{1 + h_I} \mu_I^{(t)} \quad (37)$$

根据式 (37) 和式 (17)，可以确定在 t 年积累率 $\mu_I^{(t)}$ 和 $\mu_{II}^{(t)}$ 恰好形成了平衡增长积累率。于是，社会扩大再生产可以自动平衡增长。

因为社会扩大再生产自动平衡增长是一种特别的平衡增长，所以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式 (29) 也是自动平衡增长的必要条件。又因为刚刚所述，只要满足平衡增长的充分条件式 (29)，就可以先确定生产资料部类一个大于零的积累率并且在下一年保持

不变,从而达成社会扩大再生产自动平衡增长,所以平衡增长的充分条件式(29)也是自动平衡增长的充分条件。因而,社会扩大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自动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六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定理的应用: 寻求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前面已经指出: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可以同时导致两大部类结构状态收敛和社会再生产增长速度收敛。那么从理论上说,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是一种可持续状态,因而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以第 $t-1$ 年作为初始,根据式(17)、式(22)和式(23),当且仅当经过 N 年(N 是个能确定的自然数),两大部类结构状态 $\varphi^{(t-1+N)}$ 数值成为式(23)表示的限定区间的左端点 φ^* 或者 φ^{**} ,可以使从下一年起两大部类实现增长率最高的平衡增长,也就是最优平衡增长。将式(22)中的 $\varphi^{(t)}$ 分别替换成 φ^* 和 φ^{**} ,就获得最优平衡增长的增长率 $\max [g^{(t)}]$ 。

$$\max [g^{(t)}] = \begin{cases} \frac{e_I}{1+h_I}, & \text{当 } \frac{e_I}{1+h_I} \leq \frac{e_{II}}{1+h_{II}}; \\ \frac{e_{II}}{1+h_{II}}, & \text{当 } \frac{e_I}{1+h_I} > \frac{e_{II}}{1+h_{II}} \end{cases} \quad j = I, II \quad (38)$$

式(38)表明,最优平衡增长的增长率正是资本利润率较低的那个部类的资本利润率。原因是:每个部类的新创造价值增长率,是本部类的资本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积累率的乘积;而每个部类的剩余价值积累率最大值是1,因此本部类的新创造价值最高增长率就是本部类的资本利润率;最优平衡增长时两个部类的增长率相同,所以具有较低最高增长率的那个部类的最高增长率(资本利润率),必然成为最优平衡增长的增长率。

从理论上说,最优平衡增长是可持续最优增长。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的平衡增长定理,可以寻求达到可持续最优增长的路径。

根据两大部类结构状态转移方程式(19),只要第 $t-1$ 年两大部类结构状态 $\varphi^{(t-1)}$ 取值满足两大部类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式(29),就可以在适当幅度内尽量增大决策变量第I部类积累率 $\mu_I^{(t-1)}$ 的取值,从而使下一年结构状态 $\varphi^{(t)}$ 取值尽量小。而根据两个部类积累率之间的关系式(11), $\mu_I^{(t-1)}$ 取值提高会使第II部类积累率 $\mu_{II}^{(t-1)}$ 取值降低,因此尽量增大第I部类积累率的取值应当兼顾第II部类积累率的取值在适当幅度内。照此逐年做下去,就可以经过 N 年使两大部类结构状态 $\varphi^{(t-1+N)}$ 数值缩减成为式(23)表示的限定区间的左端点 φ^* 或者 φ^{**} ,进而在下一年形成最优的平衡增长。根据两个部类平衡增长积累率的表达式(22)和状态转移方程式(19),如果要在 $t-$

$1+k$ 年使下一年两大部类结构状态数值缩小 ($k=0, 1, 2, \dots, N$), 就必须且只需使第 I 部类积累率 $\mu_1^{(1+k)}$ 的取值满足下面的不等式。

$$\mu_1^{(1+k)} > \frac{1+h_1}{e_1} \left[\frac{(1+e_{II})(1+h_1+e_1)}{h_{II}(1+e_1)\varphi^{(1+k)}+h_1(1+e_{II})} - 1 \right] \quad k=0, 1, 2, 3, \dots, N \quad (39)$$

根据式 (39) 和两大部类结构状态转移方程式 (19) 逐年做下去, 就可以经过 N 年使两大部类结构状态 $\varphi^{(1+N)}$ 数值成为式 (23) 表示的限定区间的左端点 φ^* 或者 φ^{**} , 于是在 $t-1+N$ 年形成最优平衡增长积累率。

七 寻求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举例

下面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的第二例为例,^① 说明寻求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此例设定两个部类结构参数 $h_1 5, h_{II} 5.0175, e_1 = e_{II} = 1$, 马克思用此例做了连续三年的计算, 说明一般情形下两个部类的扩大再生产过程。该例是本文所论析的第 I 部类的资本利润率高于第 II 部类即 $e_1/(1+h_1) > e_{II}/(1+h_{II})$ 的情形。直接引用该例中的第 1 年 (起始年) 数据。列在表 1 中。根据式 (23), 计算出 $\varphi^{**} = 0.1998, \varphi^{\max} = 0.3986$; 于是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的结构状态变量取值区间是半开区间 $[0.1998, 0.3986)$ 。第 1 年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的结构状态变量 $\varphi^{(1)} = 0.285$, 处于上述半开区间内。按照原例的计算, 是从第 2 年起结构状态收敛保持不变; 从第 3 年起新创造价值增长率保持为 8.3% 不变; 从而社会再生产实现平衡、稳定增长。现在运用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根据式 (39) 和两大部类结构状态转移方程式 (19) 逐年计算, 寻求在某年形成最优平衡增长的积累率。假定各年提高决策变量第 I 部类积累率的适当幅度是除了在式 (27) 限定的定义域内取值之外, 不再有其他限制条件。那么, 每年都将第 I 部类积累率按照式 (27) 标明的上限取值。即取:

$$\begin{aligned} \mu_1^{(1+k)*} &= \min \left\{ \frac{(1+h_1)(1+e_1)}{h_1 e_1} \left(1 - \frac{\varphi^{(1+k)}}{\varphi^{\max}} \right), \mu_1^* \right\} \\ &= \begin{cases} \frac{(1+h_1)(1+e_1)}{h_1 e_1} \left(1 - \frac{\varphi^{(1+k)}}{\varphi^{\max}} \right), & \text{当 } \varphi^{\max} \left[1 - \frac{h_1}{1+e_1} \left(\frac{e_{II}}{1+h_{II}} \right) \right] \leq \varphi^{(1+k)} < \varphi^{\max} \\ \mu_1^*, & \text{当 } \varphi^{(1+k)} < \varphi^{\max} \left[1 - \frac{h_1}{1+e_1} \left(\frac{e_{II}}{1+h_{II}} \right) \right] \end{cases} \\ &\quad k=0, 1, 2, 3, 4 \end{aligned} \quad (40)$$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2004, 第 579~586 页。

那么, $\mu_1^{(1+k)}$ * 满足不等式 (39)。再将 $\mu_1^{(1+k)}$ * 代入两大部类结构状态转移方程式 (19), 计算出下一年两大部类结构状态的数值 $\varphi^{(1+k+1)}$ *。将 $\mu_1^{(1+k)}$ * 代入式 (11), 计算出 $\mu_{II}^{(1+k)}$ *。再根据式 (5)、式 (4) 和式 (15), 计算出 $\Delta C_j^{(1+k)}$, $\Delta V_j^{(1+k)}$ 和 $\Delta Y_j^{(1+k)}$ 。照此迭代计算 ($k=0, 1, 2, 3, 4$), 全部结果列在表 1。根据计算结果, 经过 4 年的扩大再生产, 在第 4 年形成两大部类最优平衡增长的积累率, 进而从第 5 年起两大部类以 16.6% 的增长速度实现最优平衡增长, 两大部类结构状态从第 4 年起收敛。从理论上说, 从第 5 年起社会再生产获得可持续最优增长。计算给出的 4 年扩大再生产过程, 就是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表 1 举例计算寻求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年度 $1+k$	部 类	不变 资本 $C_j^{(1+k)}$	可变 资本 $V_j^{(1+k)}$ 剩余 价值 $M_j^{(1+k)}$	新创造 价值 $Y_j^{(1+k)}$	状态 变量 $\varphi^{(1+k)}$	$\varphi^{(1+k)}$ 取值区间	剩余 价值 积累率 $\mu_j^{(1+k)}$ (%)	社会 再生产 增长 速度 $\frac{\Delta Y^{(1+k)}}{Y^{(1+k)}}$ (%)
1	全 社 会 第 I 部类 第 II 部类	6430 5000 1430	1285 1000 285	2570 2000 570	0.285	$\varphi^{\max} [1 - \frac{h_I}{1+e_I} (\frac{e_{II}}{1+h_{II}})]$ $\leq \varphi^{(1)} < \varphi^{\max}$	68.4 0	
2	全 社 会 第 I 部类 第 II 部类	7000 5570 1430	1399 1114 285	2798 2228 570	0.2558	$\varphi^{\max} [1 - \frac{h_I}{1+e_I} (\frac{e_{II}}{1+h_{II}})]$ $\leq \varphi^{(2)} < \varphi^{\max}$	86.0 0	8.9
3	全 社 会 第 I 部类 第 II 部类	7798 6368 1430	1559 1274 285	3117 2547 570	0.2238	$\varphi^* * \leq \varphi^{(3)} < \varphi^{\max} [1 - \frac{h_I}{1+e_I} (\frac{e_{II}}{1+h_{II}})]$	99.7 24.8	11.4
4	全 社 会 第 I 部类 第 I 部类	8915 7426 1489	1782 1485 297	3564 2970 594	0.1998	$\varphi^{(4)} = \varphi^* *$	99.7 100.0	14.3
5	全 社 会 第 I 部类 第 II 部类	10397 8660 1737	2078 1732 346	4156 3464 692	0.1998	$\varphi^{(5)} = \varphi^* *$	99.7 100.0	16.6

综合以上全部研究结果, 得到结论: 社会再生产平衡增长存在着充分必要条件; 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自动平衡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可以应用这个充分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寻求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调研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三大品牌公司农民工社保调研报告

“新生代” ilabour 课题组*

摘要 2014年4月，东莞裕元工人争取社会保障权利的维权活动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拉回公众视野。作为劳动者，农民工有权依法享受社保权利，我国也出台了相关法律保障其社保权益。然而，“新生代” ilabour 课题组（本文以下简称课题组）对电子、服装和食品三大行业代工厂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民工参保比例不高、参保险种不全；企业未依法足额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参保农民工从社会保险制度中获益有限，且在享受相关社会保险待遇时面临诸多障碍。课题组呼吁相关部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依法执行制度规定，监督制度落实情况，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关键词 农民工 社会保险 足额缴纳 社保转移 全国统筹

一 导语

2014年4月5日，当东莞裕元工人得知因为企业没有足额缴纳社保，工作了数十年的老工人退休之后每月只能拿到四五百元养老金之后，3万工人参与了一场持续二十余天的大罢工。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工人争取社保权利的最大规模斗争。

社保，是国家与社会对劳动者的一份承诺，在劳动者遭遇劳动风险时给予必要帮助，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为此，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来保障工人这一权利。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公布的数据，2013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亿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仅为4895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为5018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为3740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为7263万人。也就是说，不到1/5的农民工能够按照法律标准享受社会保险，农民工参保的覆盖率之低让人吃惊。

那么，占劳动人口大部分的农民工的社保状况是怎样的呢？制度的完善是否真的带来了现状的改变，并提高了劳动者的福祉？购买了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东莞裕元已经购买了社保的工人，为何还要通过罢工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 “新生代” ilabour 课题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学者发起的农民工问题研究与实践平台，课题组旨在促进大学生关注劳动阶层，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读书、讲座、调研等方式，为大学生了解社会底层现状、洞察社会现实、开展学术研究打开一个窗口。

带着上述疑问,“新生代” ilabour 课题组师生开展了此次社保调研,对电子、服装和食品三个行业的代表性品牌——苹果、优衣库和可口可乐的代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为什么要做大品牌的调研?不可否认的是,考虑到品牌查厂(品牌查厂是指品牌企业对其代工厂开展的不定期生产检查和监督活动或其他跟该品牌产品生产过程有关的活动)和工人反抗的压力,一些品牌企业大多为工人购买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覆盖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社保绝不仅仅是覆盖率的问题,我们要展现的就是:是不是这些品牌企业已经依法为工人缴纳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如果已经依法缴纳相关社保费用,工人在社保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到底会面临哪些问题?在制度性障碍、强大的资本和工人对社保的认知缺失三重因素下,工人社保的落实情况值得关注,希望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以下问题:现实中的社保制度是如何执行和落实的?现有社保制度给农民工带来了什么好处?存在什么问题?农民工对现有社保制度有何看法?我国社保制度的未来该向何处去?

二 调研说明

本次调研由“新生代” ilabour 课题组师生负责实施,实地调研工作于2014年7月25日开始,于2014年8月31日结束(注:在调查实施过程中,在广州、深圳和东莞三个城市的调研主要在7月末至8月初进行,在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调研集中在8月下旬展开。访谈补充和回访工作主要在9月份进行)。调研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电子、服装和食品三个行业进行了实地调查。考虑到品牌的社会影响力,此次调研选择了苹果、优衣库、可口可乐的生产商(注:为了语言使用的方便,以下调研结果中将给此次调研的各行业企业冠以电子行业、服装行业和食品行业的统称,但是这并不能完全代表该行业工人社保问题的实际情况),调研地点分布在深圳、广州、东莞、南京、上海等地。本次调研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考虑到三个行业的样本总量存在差异,调研过程中在各行业发放的问卷总量不同,在电子行业共发放了140份问卷,在服装行业和食品行业各发放了120份问卷,总共发放问卷380份,有效回收问卷31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约为82%。

本次调研中,除了使用问卷调查外,调研组也对一些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入访谈。此次调研实际访谈人数超过50人。在本调研报告中,我们会集中呈现问卷调查的结果,也会借助访谈材料揭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

三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执行情况

为了了解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本次调研考察了社会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的购买情况、出资方式、购买险种和购买时间，并对不同行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以及企业是否依法足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情况做了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1) 从购买的社会保险险种来看，企业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为农民工买齐五种社会保险。购买比例从高到低的社会保险险种依次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分别为96%、88.3%、82.9%、61.1%和39.7%。

(2) 从购买社会保险的时间来看，企业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超过20%的农民工的参保时间与入职时间不一致，他们进入工厂一段之间后，工厂才开始为他们购买社会保险。

(3) 从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很低。大约37.4%的农民工并没有购买住房公积金，只有不到60%的农民工购买了住房公积金，还有大约3%的农民工并不清楚所在企业是否为自己购买了住房公积金。

总体而言，各行业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别，电子行业住房公积金的实施情况相对较好，食品行业次之，服装行业最差。

为何食品行业和服装行业中大部分农民工没有购买住房公积金呢？根据访谈，我们得知：此次调查的食品企业并没有为派遣工和临时工购买住房公积金。而在此次调查的服装企业中，“主管级以上的员工才有资格买住房公积金，而且是在主管级以上的员工有要求的前提下，工厂才会给员工买住房公积金”。虽然对于购买住房公积金的人员资格有严格的限制，然而有资格购买的人员并不一定会购买。

(4) 从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时间来看，企业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此次调查发现，约13.6%的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时间与他们的入职时间不一致，有46.4%的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时间与入职时间一致，还有约40%的农民工至今没有购买住房公积金。企业为工人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整体情况和购买时间都不乐观，企业并没有依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所有在职工人购买住房公积金。

(5) 大多数企业没有依法为农民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补充：根据规定，足额缴纳是指职工个人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数作为本年度月缴费基数，其中新进本单位的人员以职工本人起薪当月的足月工资收入作为缴费基数；参保单位以本单位全部参保

职工月缴费基数之和作为单位的月缴费基数。职工的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是指,职工在上一年度的1月1日至12月31日整个日历年度内所取得的全部货币收入,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根据规定,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基数应该为职工本人上年度工资收入总额的月平均数,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企业很少为农民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此次调研结果显示,大约49.3%的农民工认为企业并没有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有32.9%的农民工认为企业已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实际上,很多农民工并不知道到底怎样才算是企业已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保,他们根本不知道法律规定的缴费基数是多少以及应该怎么确定,因此乐观地认为企业已经依法缴纳相关费用。实际而言,从我们调研的农民工提供的工资单来看,没有一家企业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为农民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四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情况

本部分主要介绍农民工使用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情况。

1. 医疗保险使用率低,保障范围有限

首先,我们对各行业农民工使用医疗保险的情况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他们使用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在样本总体中,大约33.2%的农民工使用过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每年平均使用次数为1.36次。总之,各行业的医疗保险使用率都很低,没有用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比例高于使用过医疗保险的比例。

我们将农民工购买医疗保险和使用医疗保险的情况做了交互分析,结果显示:已经购买了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中,大多数人并没有使用过医疗保险,只有大约35.6%的人使用过医疗保险。

在访谈中,有农民工承认医疗保险对他们而言是有好处的,这种好处来自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对付出与回报的经济计算。

调研中,通过与农民工进行深入访谈和查找相关资料,我们了解到不同地区的医疗报销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和最高额度都不相同。到底医疗保险能给农民工带来多少实惠呢?他们告诉我们:现行的医疗保险只能起到有限作用,不能解决农民工的实际需求。

医疗保险的好处到底有多少,对处于不同风险程度的人而言是有差异的。大部分人很难保持长时期的健康状态,因此不可避免需要看病或住院,这种情况下医疗保险的存在有一定的必要性,能够对患病者起到最基本的保障。然而,综合考虑了医疗质

量、医疗费用、时间成本和可能的损失之后，多数农民工买了医疗保险却不使用或者很少使用。当然，农民工生病之后不愿意使用医疗保险的原因不止这些。

医疗保险我买了，也用过。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他首先会问你有没有医疗保险，说有的话他们就开大量的药给你，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会开少一点给你。不过，他开药多的报销之后跟我们没有报销花的钱是一样多的，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很扯淡的。

总之，虽然大多数农民工都购买了医疗保险，然而并非所有购买者都使用过医疗保险。根据部分农民工自身的经历和理性计算，他们确实享受到了医疗保险的好处，不过这样的好处是有局限性的，并不能满足他们生病后的实际需求。而对有些农民工而言，医疗保险并没有带给他们多少好处，不论是从医疗质量，还是医疗费用方面来看，实际受益情况都不太理想。

2. 工伤申报难，工伤保险难领取

从是否发生过工伤的情况来看，此次调查中受过工伤的农民工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达7.1%。从申请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的情况来看，仅有小部分农民工申请了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约为2.3%）。从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农民工发生了工伤事故却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受过工伤的农民工中只有大约32.4%的人申请过工伤认定和赔偿，有67.6%的人受过工伤却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

为什么农民工在发生工伤事故后没有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呢？一些受访农民工是这样说的：

当时也是机台压伤的，冲压机台。受伤之后自己去医院搞了点药，休息了几天。伤也不是很重，休息几天之后就没事了。工伤能不能报还是看上面的老大，如果有他帮助你处理，还是可以报的。当时是跟线长讲过，他说要找安全处什么的，要找很多人，很麻烦。这个伤其实也对工作有影响，后来就辞职了。现在好在不怎么影响（正常生活），只是有个疤在这里。

根据访谈，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并不是自己不想申报工伤，而是对工伤保险制度不了解，对工伤申报的程序不清楚，不知道怎样才能申报工伤，只好不了了之，自己承受工伤的后果。此外，由于上级管理者的压力和阻挠等因素，一些原本可以申报工伤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我们对农民工购买工伤保险与申请工伤认定和赔偿的情况做了综合分析，发现大

多数购买了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很少用到工伤保险。购买了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中只有2.3%的人申请过工伤认定和赔偿。此外,此次调研发现,申请过工伤认定和工伤赔偿的农民工大部分(87%)已经购买了工伤保险,因此他们在发生工伤后才能经过工伤认定和相关程序领取工伤保险金。

不过,农民工发生工伤后通过相应程序拿到工伤保险金并非易事。一位受过工伤且通过工伤认定拿到工伤赔偿金的农民工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我在工厂里曾经受过工伤,在洗水部,被铁桶砸了一下,回去睡觉的时候开始很痛睡不着,去医院照X光发现搞到骨头了。当时洗水部的主管、总管、几个组长都知道。搞了好几天都不让申报工伤,起码跑了十趟。像这种事情,我威胁说要打电话报警,那些主管最后才让我申报工伤。我的伤最后被评了十级工伤,赔了六个月工资(按底薪赔的,因为工伤保险就是按底薪来买),赔了六千多块钱。还有,我这个工伤之后,谁都可以加班,就我不能加班,这个手指搞一下不影响工作,但就是不让我加班。

通过自己的争取,这位农民工申报了工伤,做了伤残评定,并拿到了工伤赔偿。与那些受过工伤却没有通过相应程序领到工伤保险金的农民工相比,他是“幸运”的,不过他的“幸运”经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遭到了公司的不公对待。

总之,农民工使用工伤保险的情况不容乐观。农民工受工伤之后无法通过相关程序领取工伤保险金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一是农民工个人对工伤保险制度相关知识的缺乏,二是企业通过相应手段阻挠农民工通过工伤保险相关流程领取工伤保险金。

3. 失业保险金难领取,失业保险“基本等于摆设”

此次调查发现,购买了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重不高,而这些人中极少有人真正享受到失业保险待遇。对农民工购买失业保险和领取失业保险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领过失业保险金的农民工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仅为3.36%,这部分人在购买了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中所占比例大约为5.5%。

根据调查,农民工购买失业保险的比例较低,而且在失业后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比例更低,主要原因在于:通过采用各种隐性的、变相的方式,企业规避了自己的责任,农民工的被动离职变成了主动的自愿行为,失去工作的他们不仅无法拿到企业的赔偿金,而且也领不到应得的失业保险金。如此一来,真正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农民工就少之又少。在农民工眼中,这一制度“完全没用”,失业后“根本拿不到保险金”,因此失业保险制度“基本等于摆设”。总之,农民工失业后很难领取失业保险金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此次调查接触到个别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农民工,然而他们都经过了异

常艰难的维权过程才拿到失业保险金。

4. 生育保险领取率低,“交了等于白交”

此次调查发现,农民工的生育保险领取率很低。高达 95.5% 的农民工没有享受过生育保险待遇,只有 4.5% 的农民工领取过生育保险金。从行业比较来看,各行业工人使用生育保险的比例都很低。在此次调查的三个行业中,食品行业中领过生育保险金的农民工比例最高,为 9.8%,而电子行业和服装行业领取过生育保险金的农民工比例都很低,分别为 1.6% 和 2.2%。

对农民工购买生育保险和使用生育保险的情况做了交互分析之后发现,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购买生育保险,因而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同时,大部分购买了生育保险的农民工也没有领取过生育保险金,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为 35%。从调查结果来看,已经购买了生育保险并且领过生育保险金的农民工比例很低,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仅为 4.5%,在购买了生育保险的农民工中所占比例大约为 11.8%。

那么,为什么大部分农民工购买了生育保险却没有享受到这一保险带来的相关利益呢?根据对农民工的访谈,可将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此次调查的大部分农民工年纪不大,多为 20~30 岁的年轻人,他们还没有结婚生子,因此即便他们购买了生育保险仍未到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其次,很多农民工不知道所在企业为自己购买了生育保险,不知道生育保险到底能提供什么保障,更不知道如何享受相应的保险待遇,因此,大多数农民工在生育孩子或满足政策规定的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相关条件时,并没有想到去社保机构领取生育保险金。

最后,生育保险制度的领取条件和相关规定限制了已经购买生育保险的农民工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待遇。各地区的生育保险条例都规定,参保人在非本市生育保险定点医院医疗机构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或者参保人在市外进行产前检查、产后访视、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生育保险基金“不予支付”。正是这一规定将很多应该且可以领取生育保险金的农民工排斥在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之外。

总之,此次调查发现,大部分农民工所在企业并没有为他们购买生育保险,大部分购买了生育保险的农民工同样很少享受到生育保险待遇,拿不到应得的生育保险金。

5. 在城市买不起房,“住房公积金没什么用”

从农民工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来看,住房公积金的使用主要包括买房/租房和提取现金两种方式,从调查结果看,不论是哪种方式,农民工都很少使用。根据调查,用过住房公积金买房或租房的农民工比例很低,大约为 11.88%。根据各行业的比较情况来看,各行业农民工用过住房公积金的比例都很低,电子行业中用过住房公积金的

比例大约为 24.1%，而服装行业和食品行业中用过住房公积金的比例都很低，分别为 1.1% 和 6.9%。

对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情况进行交互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购买了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并没有使用住房公积金买房或租房，这部分农民工在已经购买了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中所占比例大约为 79%。

那么，为什么大部分农民工购买了住房公积金却没有使用它来买房或租房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农民工无力在城市购房，因此无法使用住房公积金来买房。虽然他们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来租房，然而手续烦琐，还不如直接提取方便。因此，即便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租房，农民工也不会选择这一方式，而是愿意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来支付房租或作他用。

从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提取过住房公积金，提取过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在样本总体中所占比例大约为 22.59%。各行业农民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比例都不高，电子行业大约有 49.1% 的农民工提取过住房公积金，而食品行业只有 10.8% 的农民工提取过住房公积金，服装行业几乎没有农民工提取过住房公积金，主要原因在于服装行业中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购买住房公积金。

我们发现，并非所有农民工都购买了住房公积金，然而即便他们已经购买了住房公积金，大部分人仍然没有享受过住房公积金带来的好处，只有极少数人用过住房公积金买房或租房，也只有少部分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

五 社保转移成为重要的制度障碍

对于在外打工、四处漂泊的农民工来说，社保的转移是非常重要的。目前的政策是，若是参保的农民工跨省流动，个人账户的储存额可以全部转移，而单位缴费的统筹基金按 12% 的总和转移（单位缴纳的部分转移 60%），实际上，单位缴纳部分的 40% 留在了当地社保基金。

这不能转走的 40% 有多少呢？我们不妨算一算。以东莞市为例，仅以东莞市最低工资 1310 元为基数计算，每月单位为工人缴纳的各项保险总额为 20%，即 262 元，一年下来，就有 3144 元进入社保统筹基金。如果一个工人在东莞工作一年后到另一个省打工，就只能转走 $3144 \times 60\% = 1886.4$ 元，剩余 1257.6 元就留在了东莞市社保统筹基金。2013 年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超过 870 万，我们以最保守的数据估计，即 10% 在东莞工作的农民工，会在东莞缴满 15 年的社保，最后留在了东莞，也就是说 90% 的外来农民工最终会离开东莞，每年就会给东莞市社保统筹基金留下 98 亿元。这仅仅是大体的估算，但数据已经非常庞大了。一个东莞都能从农民工身上留下如此巨额的社保基

金,深圳、上海等大城市又扣下了外来农民工多少社保呢?

这种扣留是毫无根据的。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为企业发展与城市扩张贡献了自己的劳动与健康,企业为他们缴纳的社保金却白白地贡献给了城市地方政府,而富裕的城市却不承担劳动者的退休和养老责任,也不充分地承担他们的医疗、失业等保障,更不用说农民工在受工伤、患职业病后的生活保障了。而女性农民工甚至无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最终,种种负担都被转移到相对落后、破败甚至负债的农村,让贫穷的农村地区来为城市的繁荣埋单。这种不合理现象,是由于社保金已经成为一笔庞大的变相“人头税”,城市地方政府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由此可能会滋生腐败行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废除地方政府截留农民工部分社保金的做法,把属于农民工的社保金还给他们,使社保可随他们自身的流动而自由转移,2.6亿农民工的权益就不可能得到保障。

六 总结与建议

(一) 总结:此次调研的主要发现

(1) 从购买社会保险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的比例偏低,并非所有企业都为农民工购买了社会保险。

(2) 从购买的社会保险项目来看,企业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为农民工买齐五种社会保险。

(3) 从购买社会保险的时间来看,企业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

(4) 从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很低。

(5) 从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时间来看,企业并没有完全按照法律规定的缴费时间为农民工购买住房公积金。

(6) 从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费情况来看,企业并没有依法足额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7) 由于没有实现全国统筹,政策变化大,农民工退休后能否领到养老保险是个未知数。

(8) 医疗保险使用率低,保障范围有限。

(9) 工伤申报难,工伤保险金难领取。

(10) 失业保险金难领取,失业保险“基本等于摆设”。

(11) 生育保险金领取率低,“交了等于白交”。

(12) 在城市买不起房,“住房公积金没什么用”。

（二）政策建议

为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着力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维护他们的正当利益，基于此，“新生代”ilabour 课题组希望在此次调研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希望为社保部门提供有益的借鉴，共同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提高劳动者福祉。

1. 建立和落实全国联保的社保统筹机制，确保农民工享受劳动者基本权益

社保的统筹实行全国联保机制，确保农民工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享受同等社会保险待遇。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人一号的社保账号，就像银行系统一样可以全国流通，农民工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何地区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和使用住房公积金。农民工的社保随工作地点变动，在社保异地转移过程中，地方政府不能扣留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社保费用，社保经费必须全额落实到每个农民工身上。无论农民工走到哪里，只要履行了相应的缴费义务，都能享受到应有的保险待遇。

2. 加强社保部门对企业的监督权力和执法力度，通过增加企业违法成本督促企业依法落实社保政策

此次调研发现，企业并没有依法足额为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这是事关农民工面临风险时能否得到制度保障的大事，直接侵犯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社保部门必须加强对企业在社保执行问题上的监督，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理力度，通过增大企业的违法成本促使企业落实社保政策。

3. 公开社会保险经费的运作情况，落实农民工对社保经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了解社保经费的收入和使用情况是参保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也是对农民工实施社保权利和义务教育的重要方式，更是监督社保制度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调查中，有农民工明确表示不知道自己缴纳的社保经费到哪里去了，这说明目前社保经费的管理机制对于参保农民工来说是不透明的，这难以取得农民工对社保制度的信任，不利于调动农民工参保积极性。因此，社保部门应该定期公开社保经费的收支情况，落实参保农民工的知情权，并让他们参与监督。

4. 完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制度设计，确保农民工在面临风险时能得到制度支持

建立全国联保的养老保险统筹机制，农民工可在全国范围内任何城市参保，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何城市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情况与农民工实际缴费情况挂钩，多缴多得。

提高医疗保险的报销额度和报销比例，减轻参保农民工的医疗负担。以综合医疗

保险取代农民工医保，为农民工提供更全面的医疗保障。取消医疗保险的地区限制，农民工生病时可在全国范围内的定点医疗机构看病并报销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与其缴费情况挂钩。

落实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工伤农民工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旧伤复发的，工伤保险应继续承担治疗费用。

取消失业保险中“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规定，只要农民工缴纳失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在失业时就可以享受相应的失业保险待遇。

取消生育保险的地区限制，只要农民工购买了生育保险，在生育时或发生生育保险范围内的医疗费用时，不论其生育或医疗发生地在哪里，都可以享受当地的生育保险待遇。女工怀孕后因工伤或职业病治疗而进行流产，应纳入生育保险范畴，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5. 规范社保投诉机制，落实农民工对社保权益问题的调查权和处理权

各地社保机构对于农民工提起的与社保问题有关的投诉事项具有独立的调查权，并且应该及时将调查与处理结果反馈给农民工。对于进行投诉的农民工信息必须保密，不得向企业透露，避免投诉者被企业打击报复。社保机构还应该跟进企业的处理结果，督促企业落实社保相关事宜。

6. 普及《社会保险法》，进行社保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农民工了解社会保险制度

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知识非常有限。当前一个可行的做法是，由社保机构牵头，协调动员高校和志愿组织，编撰社会保险知识培训教材，制定系统化的学习课程，并组织农民工围绕社会保险相关知识进行集体学习、集体讨论。借助更多民间力量开展社保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力求做到深入农民工群体，深入基层组织，使农民工能够真正理解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了解社会保险的运作机制，促进社保制度的有序运转。

玛曲高寒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性考察

杨思远 宋志娇*

摘 要 玛曲县高寒草原畜牧业代际可持续的物质承担者,既有草场和独特的畜种资源,又有高寒草原生态,还有藏族牧民人口。自牲畜私有化和草场承包后,牧户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的矛盾开始产生,过度放牧造成草场沙化、退化和黑土滩化,导致草原生态恶化,高寒草原特有的畜种资源也出现退化。从化解定牧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来观照,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对维系高寒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高寒草原畜牧业 代际可持续 定牧生产方式 牧民专业合作社

玛曲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州)下辖的一个纯牧业县,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甘、青、川三省区交界处,黄河第一弯曲部。玛曲的高寒草原畜牧业,不管在甘南,即使在整个青藏高原畜牧业中均为一个典型。2015年7月31日至8月8日,我们对玛曲县高寒草原畜牧业进行了考察。在强制性推行牲畜私有化和草场承包政策初期,藏族牧民爱护草场和增加牲畜数量的积极性曾一度被调动了,玛曲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因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发生矛盾,矛盾的激化不仅造成草原退化、沙化,破坏了高寒草原生态,而且导致牲畜品种退化,藏族牧户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夹击下出现了贫富分化。草场和畜种资源、草原生态环境和藏族牧民人口,都是高寒草原畜牧业代际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若不能及时化解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的矛盾,势必威胁高寒草原畜牧业的代际可持续性。近年来,甘南州和玛曲县政府有意识地引导藏族牧民发展专业合作社,为化解这一矛盾做出了极为有益的探索。

一 玛曲县高寒草原畜牧业的自然基础与成就

玛曲县地处甘南州西南部,位于东经 $100^{\circ}45'45''\sim 102^{\circ}29'00''$,北纬 $33^{\circ}06'30''\sim 34^{\circ}30'15''$,东北以西倾山为界与甘南州碌曲县接壤,东南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阿坝县为邻,西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甘德县、玛沁县毗邻,北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全县面积10190.80平方公里,距甘

* 杨思远,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宋志娇,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肃省会兰州市 450 公里, 县城海拔 3340 米。^①

黄河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果洛州)久治县门堂乡进入玛曲县木西河乡, 流经全县七乡一镇, 流程 433 公里。入境年流量 137 亿立方米, 出境年流量 164.10 亿立方米。从县境西、南、东环绕而北流, 再折向西进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形成著名的“天下黄河第一弯”。昆仑山系之阿尼玛卿雪山(积石山), 从西向东横贯县境中部; 西秦岭山系之西倾山, 自北向南绵延进入县境北部; 形成玛曲西北高、东南低, 由西北向东南高度递减的地势。境内最低海拔 3300 米, 西、北部诸峰均在 4000 米以上, 最高峰乔木格日为 4806 米, 相对高差 1506 米, 峰巒嵯峨, 重峦峭拔, 沟壑纵横, 河流湍急。县境中部, 分布着两大山系的山前丘陵, 海拔在 3500~3800 米, 东南为黄河二级台地, 地表平坦, 水草丰茂, 是优质的天然牧场。

玛曲县属明显的高原大陆性高寒湿润区, 高寒多风雨(雪), 无四季之分, 仅有冷暖之别。冷季长达 314 天, 漫长而寒冷; 暖季 51 天, 短暂而温和。雨水集中, 日照充足, 无绝对无霜期。年平均气温 2.1℃, 7 月份气温最高, 平均 11.3℃; 1 月份最低, 平均气温 -9.5℃。因地处青藏高原东侧水气通道上, 加之海拔高, 地势高峻, 降雨较多, 年均降雨量 611.9 毫米。全年降水日为 151 天, 最多年份为 173 天, 最少年份为 113 天。其中以夏季降雨最多, 平均为 332.9 毫米, 秋季次之, 平均为 155.5 毫米。牧草生长期 190 天。年均日照 2691.2 小时, 日照率为 61%, 牧草生长期平均日照 5.5~6.8 小时。

玛曲复杂的地质地形构造和独特的气候条件, 造就了广袤的草场和优良的畜种。草场类型属川西藏东高原灌丛草甸区, 为亚洲最大最优良的牧场。有 47 科 413 种牧草, 其中优等牧草 13 种, 良等牧草 44 种, 中等牧草 68 种。玛曲县是甘肃省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自汉代就以“羌中畜牧甲天下”著称。经过漫长的牧业生产实践, 培育了驰名全国的“河曲马”“阿万仓牦牛”“欧拉羊”和性能优良的“乔科羊”等, 发展了黄河首曲草地畜牧业的优良畜种, 发挥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双重作用。玛曲境内河流纵横, 地表水和地下水丰富。黄河与境内支流达 300 条, 流经 79043 平方公里。年自产地表水 27.1 亿立方米, 地下水 9.2 亿立方米。^② 优质的牧草、充足的日照、丰沛的水源和优良的牲畜品种, 是玛曲畜牧业发展的良好条件, 也是玛曲畜牧业类型区别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畜牧业类型的物质基础。

玛曲是一个纯牧业县, 连青藏高原特有的青稞都未种植, 畜牧业是全县经济的主导和支柱产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玛曲实行了“牲畜归户, 私有私养, 自主经

①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5, 第3页。

②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5, 第3~5页。

营, 长期不变”的草场承包经营政策, 增强了牧民群众建设草原、保护草原、合理使用草原资源的自觉性。从 1990 年开始, 开展了人畜饮水工程、治虫灭鼠、草原围栏、牧民建房、牲畜棚圈、防灾保畜基地等服务体系的配套建设。到 2004 年底全县七乡一镇草场承包到户或联户, 明确了草场“责、权、利”。以草原围栏为主的“五配套”建设取得实效, 围栏留床面积达 140.56 万亩, 治虫灭鼠面积 377 万亩, 牧民建房达 9.3 万平方米, 户均达 18.6 平方米, 同时修建了 29 处人畜饮水工程和 126 处标准化暖棚。近年来, 玛曲县牲畜存栏和出栏头数、肉类产量、奶类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均有较快增长, 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2011 ~ 2014 年玛曲县牲畜增长情况

项目 年份	总增各类牲畜 [万头 (只)]	总增率 (%)	出栏各类牲畜 [万头 (只)]	出栏率 (%)	商品出栏各类牲畜 [万头 (只)]	商品率 (%)
2011	28.48	27.09	29.59	28.15	28.01	26.65
2012	30.03	28.88	31.30	30.10	29.34	28.21
2013	31.77	30.60	33.64	32.40	31.66	30.49
2014	31.53	30.42	34.75	33.52	32.77	31.61

资料来源: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玛曲县 2011 ~ 2014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2015 年 8 月 6 日。

表 2 2011 ~ 2014 年玛曲县畜产品产量

单位: 吨, %

项目 年份	肉 类						羊 毛		牛 奶	
	总产量	同比增长	牛肉产量	同比增长	羊肉产量	同比增长	总产量	同比增长	总产量	同比增长
2011	14527	8.7	11305	11.7	3222	-1.1	507.2	0.9	34869	0.3
2012	15379	5.86	11971	5.89	3408	5.77	506.4	-0.16	36058	3.41
2013	16481	7.19	12801	6.93	3680	7.98	510.4	0.79	37118	2.9
2014	17007	3.19	13168	2.87	3839	4.32	509.4	0	38550	3.9

资料来源: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玛曲县 2011 ~ 2014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2015 年 8 月 6 日。

表 3 2011 ~ 2014 年玛曲县居民收入水平

单位: 元, %

项目 年份	农村居民年 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消费性支出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 人均消费性支出	农村居民 恩格尔系数	城镇居民 恩格尔系数
2011	4283	4496	13918	9879.26	58.94	33.95
2012	4798	5134	15861	11035.09	57.62	35.19
2013	5317	3126	17066	11822	56.1	33.5
2014	5959	4806.34	18502	11795.03	50.55	33.9

资料来源: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玛曲县 2011 ~ 2014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2015 年 8 月 6 日。

玛曲县下辖七乡一镇一马场一站,七乡指欧拉乡、欧拉秀玛乡、木西合乡、阿万仓乡、曼日玛乡、采日玛乡、齐哈玛乡,一镇指尼玛镇,为县政府所在地,一马场指河曲马场,^①一站指县属阿孜畜牧实验站,现改名为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2014年,玛曲县人口5.68万,其中4.12万人为牧民。^②全县总面积10190.80平方公里,其中草场面积1288万亩,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89.54%,可利用草场面积1245.5万亩,牧民人均草场302亩,平均每7.84亩草场可饲养1个羊单位。^③全县湿地560万亩,是若尔盖大湿地的核心部分。2015年牲畜总数为106万头(只、匹),其中牦牛496860头,羊506949只,马2万余匹,其余为河曲藏獭。由于草场自然条件不同,各乡牲畜的分布结构不一样,黑牦牛主要分布在阿万仓、木西合、齐哈玛、采日玛和曼日玛五个乡,以及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欧拉羊主要分布在欧拉、欧拉秀玛、尼玛三个乡镇;乔科羊^④主要分布在曼日玛、采日玛乡境内的乔科大沼泽湿地;河曲马则集中在河曲马场。全县建立的牧民专业合作社326个,屠宰场6个,其中以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规模最大,拥有两条生产线,2014年屠宰牦牛2000多头,羊5000余只,已通过HACCP、ISO9000、ISO14000认证。^⑤玛曲县甘青川活畜交易综合大市场1个。2014年玛曲县人均纯收入6208元,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9892元,高于甘南州的4500元,属于全州最富裕的县。

二 高寒草原畜牧业代际可持续的物质承担者

可持续性概念最初是由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自然资源经济学首先提出来的。自然资源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自然资源的跨时期配置,其理论视域超越了自古典经济学以来,尤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实际以资源的代内配置为对象的研究范围。自然资源经济学承认后代人有自己独立的、不同于当代人的利益,主张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利益,从而将代际经济关系引入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现代西方经济学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运用于公共工程项目评估中。在计算工程成本和收益时采用正值贴现率,将未来发生的成本和收益贴现为现值,以评估工程的效益。正值贴现率概念凸显了当代人

① 据河曲马场场长卡召加介绍,河曲马场于1958年7月成立,1979年4月河曲马场与甘肃省河曲良种牛羊场(兰州军区军马场)合并成立甘肃省河曲种畜场,并由甘南州人民政府正式移交省农牧厅管理。1980年6月21日又根据省人民政府〔1980〕161号《关于将省河曲种畜场下放甘南州领导的通知》,于同年7月31日由州办理交接手续,并恢复甘南州河曲马场场名至今。2006年7月28日按州委、州政府实行属地化管理的精神要求,正式移交玛曲县人民政府管辖。现为财政全额拨款的副县级事业单位。

② 甘南州统计局:《玛曲县近十年人口数》,2015。

③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93页。

④ 乔科,藏语中意为湿地。

⑤ 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传画册:《雪域珍品话说牦牛》,第43页。

与后代人之间不平等的利益关系,因为即使贴现率很低,只要是正值,未来的成本和效益贴现为现值会越来越小,千秋万代后人的百万财富在今日可能不值一文。

可持续性概念今天已被广泛接受,但大多数文献在使用这个概念时,用的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概念隐含的是一个非静态的经济,针对的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意味着数量增加,在有限资源下难以持续,而经济发展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改善,并非必然意味着资源消耗量的增加,因而是可以持续的。但问题在于,发展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是质变,从辩证法来看,质变不可持续,否则就失去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只有量变在度的范围内是可持续的,因此恰恰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所以,我们不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一用语,而以“可持续性”概念来研究代与代之间的经济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政治家们,关于可持续性发表了大量意见,得到公认的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给出的规定:“可持续发展是指当代人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又不会损害后代人满足他们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本身包括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各种需要’的概念,特别是指全世界穷人的各种基本需要,这些基本需要应被置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以及关于环境能力的有限性的思想,技术和社会组织状况决定了环境满足现在和未来的各种需要的能力是有限的。”^①

为解决代际经济矛盾,自然资源经济学还提出了最低安全标准与代际公平两个概念。希里阿西·旺特卢普1952年在《资源保护:经济学与政策》一书中所赞成的“自然保护的最低安全标准”,仅指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应高于某一临界值。^②他认为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戴利等将最低安全标准具体规定为三条:“社会使用可更新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可更新资源的更新速度;社会使用不可更新资源的速度,不得超过作为其替代品的、可持续利用的可更新资源的开发速度;社会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得超过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能力。”^③代际公平概念最早由T.佩基提出,他认为如果当代人的决策影响到后代人的利益,应当根据“代际多数规则”来决策,由于繁衍不绝的子孙万代总是多数,因此,不管当代人对此持何种态度,都必须按照子孙万代的选择行事。^④但是,代际经济关系与代内经济关系的一

①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4.

② S. V. Ciriacy Watanerup, *Resource Conservation: Economic and Polic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2, p. 253.

③ D. H. Meadows, D. L. Meadows and J. Randers, *Beyond the Limits: Confronting Global Collapse, Envision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Post Mills VT: Chelsea Green, 1992, p. 209.

④ T. Page,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the Social Rate of Discount", in V. K. Smith, e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Applied Welfare Economics: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V. Krutilla*,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1988, p. 85.

个显著不同点,在于后代人在处理代际经济关系时不在场,不可能像代内经济矛盾那样可由到场双方通过各种博弈获得解决,只能由当代人说了算。因此,代际公平只能作为当代人的一种观念和行为准则自觉去贯彻。

西方自然资源经济学有关可持续性的概念和代际公平观念,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予以批判地吸收。实际上,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了代际经济矛盾的解决取决于解决代内经济矛盾。他认为,只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对后代承担起责任。“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①

马克思这段引文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沟通了代际经济矛盾与代内经济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主张通过代内经济矛盾的解决去推动代际经济矛盾的解决,更在于提出了代际经济关系的一种重要的物质承担者,即土地。除了土地,马克思还提到污染物的排放,“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因为“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②

经济关系不是物,但离不开物。正如使用价值是代内交换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一样,代际经济关系同样需要物质承担者,人口、资源与环境正是这样的承担者。马克思所说的土地作为资源是代际经济关系的一个承担者,排泄物作为生态环境因子是代际经济关系的另一个承担者。对于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性来说,代际经济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就是草场、环境、牲畜与牧民人口。

草场之于畜牧业的重要性,一如土地之于农业。对于玛曲这样的纯牧业县,经济的可持续实际是畜牧业的可持续,而草场是维系高寒草原畜牧业代际持续的基础。可持续性内涵的两个关键概念:一是“各种需要”,二是“环境能力”。从需要来说,高寒畜牧业所提供的畜产品对于玛曲藏民来说可谓最基本的需要,这种需要,从远祖时代开始就仰赖草原畜牧业来满足。祖代在满足他们对基本肉食、饮乳的需要时,没有损害后代继续利用高寒草原畜牧业来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而是将优质草场完好留传下来,在祖代与当代的代际经济关系中实现了可持续。祖代所开创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基础,是留给千秋万代的,这其中的任何一代按照代际公平观都无权破坏和毁灭这一基础。草原畜牧业是将植物能转变为动物能,以取得肉、乳、毛、绒、皮、骨、角等畜产品的生产部门,牧草的产量和质量是草原畜牧业存在的自然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7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5页。

前提,草场的破坏通过牧草产量和质量的下降,损害后代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能力,当然,草场还通过提供具有不同微量元素含量的岩石供牲畜舔舐,而影响畜牧业可持续的生产能力。

从“环境能力”来看,由于土质、气候、地形条件的差异,不同草场的牧草生产能力、抗旱抗涝抗寒能力、再生能力是不同的,同样面积的草场因产草量不同,所能容纳的牲畜数量也不一样,这就是环境能力。对于玛曲来说,按照每7.84亩草场可放养1个羊单位计算,合理载畜量即环境能力是158.90万个羊单位。其中,亚高山草甸草场6730182亩,平均6.83亩可饲养一个羊单位;灌丛草甸草场2697249亩,平均10.11亩可饲养一个羊单位;高山草甸草场1126699亩,平均21.02亩可饲养一个羊单位;草原化草甸草场947148亩,平均14.93亩可饲养一个羊单位;沼泽化草甸草场903300亩,平均6.3亩可饲养一个羊单位;沼泽类草场475602亩,平均6.2亩可饲养一个羊单位。^①山地灌丛草甸绵羊、牦牛、马放牧区,集中在西北部阿尼玛卿山南北的木西合乡、欧拉乡和欧拉秀玛乡;亚高山草甸牦牛、绵羊、马放牧区,分布于中南部丘陵的阿万仓乡和齐哈玛乡;低湿地沼泽、沼泽化草甸马、牦牛、绵羊放牧区,集中在东部河曲马场、曼日玛乡和采日玛乡。^②不同放牧区的环境能力不一样,超过“环境能力”的实际载畜量形成过度放牧(简称过牧),对草场再生能力构成损害,导致草场退化和沙化。

草场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基础,草场沙化和退化直接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草原生态具有独特性、脆弱性、难以恢复性和不可替代性,草原畜牧业又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草原生态系统的恶化,不仅对全国生态多样性构成威胁,而且直接影响草原畜牧业的代际可持续。

草原畜牧业是利用已被人类驯化的动物或野生动物的生理机能,实现植物能向动物能转化的物质生产部门。已经驯化的动物是草原畜牧业劳动的主要对象,它同样是草原畜牧业代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物质承担者。玛曲县培育的主要畜种有高原牦牛、藏系绵羊、河曲马、河曲藏獒。这些驰名畜种的品种性能和生产性能各异,取得和保持品种性能是实现其生产性能的关键,优良的品种性能和生产性能是高寒草原畜牧业可持续的基础,好家长不仅要优质草场和草原生态,而且要将优良畜种留给后代。相反,畜种退化后,即使有优良的草场,同样不能取得高生产性能的优质畜产品。问题在于,牲畜私有化和草场家庭承包后,既破坏了高寒草原及其生态环境,也造成了牲畜品种退化。

①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93页。

② 甘肃省玛曲县综合牧业区划分图,载《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三 牧户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的矛盾

千百年来,玛曲县的高寒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是游牧。草畜矛盾可以说在一切草原畜牧业中始终存在,但在不同的放牧方式中,草畜矛盾的激烈程度迥异。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中,草畜矛盾最为隐蔽,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牲畜采食对牧草的减少,通过游走而在另一草场空间获得新的补充。四季牧场的转徙和长程迁移,有效地化解了草畜矛盾。

在20世纪60年代的集体经济时期,玛曲实行的是四季轮牧制度和粗放的两季轮牧制度。两季轮牧即冬春牧场作为一个轮牧单元,夏秋牧场作为一个轮牧单元,两大轮牧单元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一般来说,滩地作为夏秋牧场,山地沟谷作为冬季牧场,在两大轮牧单元之间有严格的牲畜放牧途径和停驻时间。冬春牧场利用时间约为6个半月,夏秋牧场轮牧时间约为5个半月,采用的轮牧方式主要有:有计划的分区轮牧;大轮牧圈;逐沟转牧等放牧方式。在分区轮牧中,除季节性轮牧外,畜群在同一牧地、同一季节有“先羊、中马、后牛”的排牧习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玛曲县根据地形和各类牲畜的不同习性,采用划区轮牧、季节轮牧等方式。具体可以分为冬春—夏秋两季轮牧,冬—春秋—夏三季轮牧,冬春—夏—秋三季轮牧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全县除欧拉秀玛、曼日玛两乡外,其余各乡场和阿万仓乡的部分村都普遍采用,每年11月初进入冬春场,翌年6月初进入夏秋场;沿用第二种形式的有欧拉秀玛乡和阿万仓乡的洛尔隆、贡塞、沃特三村,每年5月底出冬季牧场进春秋牧场,短期放牧1个月,7月初转入高山沟谷夏季牧场,于9月底又转入春秋牧场放牧抓膘,11月底转入冬季牧场,冬、春秋、夏三季牧场利用时间大致为6:3:3;采用第三种形式的只有曼日玛乡,因沼泽及沼泽化草甸面积大,5月中旬牲畜进入夏季牧场,集中利用沼泽及沼泽化草甸草场,直至8月底才转入干燥的浅山地带进入秋季牧场抓膘,于11月底进入冬春牧场,冬春牧场利用时间为6个月,夏、秋牧场的利用时间各3个月。^① 集体经济时代不同的轮牧制度同样维持着较为缓和的草畜矛盾。

但是,草场实行家庭承包后,可游牧的草场被分割开来,以牧户为单位将各户草场固定下来。铁丝网封围的家庭牧场是固定草场的象征,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变为定牧。尽管在草场承包过程中,也注意区分了冬春和夏秋两季牧场,但各户牲畜只能在固定的较小的家庭草场上放牧。牲畜采食和践踏过的牧场,在不能获得充分休养和恢复的基础上,不得不接受持续的采食和践踏。另一方面,牲畜私有化后,各户增加存栏和

^①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第280~281页。

出栏的积极性提高,而政府在牧户自主经营条件下也难以干涉牧民增畜行为。草畜矛盾在定牧条件下开始发展起来,成为威胁草原畜牧业代际可持续性的主要矛盾。

玛曲县落实草场家庭承包大致分为两个过程:第一步是牲畜私有化。1981年开始实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个人承包经营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包产到户。1984年在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后,在牧区推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经营方针,从不联产到联产,从联产到承包到户,将全县614729头(只、匹)牲畜作价归户,实行私有私养,户均150头(只、匹),人均29头(只、匹);第二步是草场承包。1986年实行以草定畜为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经过是年试点,1987~1989年宣传动员,1990年全面开始实施。根据草场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使用权一次划包到户,允许牧民群众自愿联户承包草场,谁承包、谁建设、谁管护、谁受益等原则,将欧拉、欧拉秀玛、阿万仓、木西合4乡的529.6万亩草场划包到户和联户,确定了四至界限、面积、载畜量,技术部门发放草原使用证2367本,并完成了勘测、登记、丈量、划界、立卡建档等服务工作。^①1991~2004年按照乡与乡、村与村之间的草场界限不变;草场承包以1982年的牲畜基数和人口数为依据,结合各乡实际,按4:6或3:7的比例确定草场面积,并划定10%~15%的草场;考虑人口、牲畜现状,乡域的草原、草坡、草山一律承包,不留死角;草场一经固定,牲畜、人口增减时一律不予调整。到2004年底,全县不同类、组、型以及不同等、不同级的草场分步承包到户或联户。^②

牲畜私有化和草场承包到户,是家庭固定草场形成的历史过程。今天看来,如果是单纯的牲畜私有化,草畜矛盾尚不足以发展起来,1984~1990年牲畜虽然私有到户,但草场尚未承包到户,因而仍然可以采取划区轮牧的方式进行放牧。1990年以后,公共使用的牧场在“不留死角”的原则下全部承包到户,家庭固定草场形成,定牧成为必然,因为谁也不愿意别家牲畜到自己牧场放牧。

可是,牲畜放牧方式在牲畜私有化和草场承包到户后并没有改变,在家庭固定草场上放牧,牲畜采食范围大大缩小,采食导致牧草的减少,牧草再也不能通过空间变换获得补充,在草场产草量下降和牲畜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草畜矛盾必然发展起来。这个矛盾还会因为下述因素的作用而加速激化。

第一,草场承包后牧户增加出栏数量的积极性空前提。在有限的草场面积下,要增加出栏数量,必须增加基础母畜和存栏数量。早在1985年,玛曲县取消畜产品的派购制度,改为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合同收购制度,改变了单一的经营状况,使畜牧业经济由传统自给型向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根据“提高总增,控制净增,扩大出栏,加快

①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第303~304页。

②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100页。

周转”和“压缩马、发展羊、稳定牛”的牧业经营方针，通过提高畜群中适龄母畜比例等措施，牲畜存栏数量不断上升。1991年末牲畜存栏数量为61.87万头（只、匹），2004年增加到65.15万头（只、匹），2014年末增加到106万头（只、匹）。

第二，高寒草原牲畜生长较慢，每年新繁殖的仔畜当年不能出栏，一般羊需要2年，牦牛需要5~6年才能出栏，这样等于延长了放牧期限，加大了对草场的压力。

第三，由于畜牧技术、防疫水平、经营管理能力的增强，牲畜总增率提高。在1/4世纪里，提高近10个百分点。由1991年的21.61%，提高到2004年的25.37%、^①2011年的28.48%、2014年的31.53%。^②

第四，牧民商品经营意识增强。在传统自给性畜牧业生产中，出栏牲畜的自给率高，商品率低，草场承包后，商品率提高较快。1991年出栏牲畜的商品率为17.52%，1996年为20.23%，2000年22.09%，2004年为24.95%，^③2011年为26.65%，2014年为31.61%。^④在不到1/4世纪里，牲畜出栏商品率提高了14.09个百分点。“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⑤商品率的提高不仅意味着牧民商品经营意识的增强，而且是高寒草原畜牧业生产目的的改变，为市场而生产的比重在增加，其中内置了无止境增加牲畜出栏的经济动因。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草畜矛盾发展起来，其结果对矛盾双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草场退化、沙化和畜种退化相伴而行。

四 家庭固定草场放牧对草原的破坏作用

家庭固定草场放牧对草原的破坏，建立在草场超载和过度放牧基础上。不同类型和不同等级的草场，由于产草量不同，载畜能力也有很大差别。

按草场资源的类、组、型三级分类系统，玛曲县草场可分为6个草场类、11个草场组、20个草场型。冬季草场面积112.1万亩，占总面积的8.7%；冬春草场面积398.1万亩，占总面积30.9%；春秋草场面积86.5万亩，占总面积的6.7%；秋季草场面积28.4万亩，占总面积的2.2%；夏季草场面积477.8万亩，占总面积的37.1%；天然割草场面积9.9万亩；人工种植草场面积3万亩以上。退化草场面积976万亩，占

①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106页。

②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玛曲县2011~2014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2015年8月6日。

③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106页。

④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玛曲县2011~2014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2015年8月6日。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7页。

草场总面积的 75.8%；鼠虫害草场面积 386 万亩，占草场总面积的 30.0%。^①

根据草场的质量、牧草适口性、营养成分和利用程度来衡量，玛曲县草场分为五等：一等草场 467072 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3.75%；二等草场 4984595 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40.2%；三等草场 3030065 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24.33%；四等草场 2613114 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20.98%；五等草场 1360114 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 10.92%。根据草场产草量的高低，分为六级，其中一级草场 62273 亩，占可利用面积的 0.5%，亩产鲜草 800 公斤以上；二级草场 870702 亩，占 6.99%，亩产鲜草 600 ~ 800 公斤；三级草场 6046629 亩，占 48.55%，亩产鲜草 400 ~ 600 公斤；四级草场 1652406 亩，占 13.27%，亩产鲜草 300 ~ 400 公斤；五级草场 2430153 亩，占 19.51%，亩产鲜草 200 ~ 300 公斤；六级草场 1393096 亩，占 11.19%，亩产鲜草 100 ~ 200 公斤。^②

玛曲县可利用草场面积为 1245.5 万亩，按 4.12 万牧民人口计算，人均可利用草场 302 亩。按 7.84 亩草场可放养 1 个羊单位计算，人均可放养 38.52 个羊单位，全县合理载畜量是 158.90 万个羊单位。

1984 年牲畜私有化时，全县牲畜总头数 61.47 万头（只、匹），其中牦牛 27.20 万头，羊 30.61 万只，马 3.66 万匹。^③按照 1 头牦牛 = 5 只羊，1 匹马 = 6 只羊的换算标准，61.47 万头（只、匹）相当于 188.57 万个羊单位，已经超过合理载畜量 158.90 万个羊单位，超载 29.67 万个羊单位，超载率为 18.67%。情况并不十分严重。

1990 年，全县年末牲畜存栏头数 61.82 万头（只、匹），其中牦牛 28.96 万头，羊 29.18 万只，马 3.68 万匹。^④61.82 万头（只、匹）相当于 196.06 万个羊单位，超载 37.16 万个羊单位，超载率为 23.39%。超载情况有所加重。

2011 年，全县年末牲畜存栏头数 104.87 万头（只、匹），其中牦牛 51.15 万头，羊存栏 50.72 万只，马 3 万匹。^⑤104.87 万头（只、匹）相当于 324.47 万个羊单位，超载 165.57 万个羊单位，超载率为 104.20%，超载 1 倍以上。

2014 年，全县年末存栏各类牲畜 102.63 万头（只、匹），其中牦牛存栏 49.69 万头，羊存栏 50.70 万只，马存栏 2.24 万匹。^⑥102.63 万头（只、匹）相当于 312.59 万个羊单位，超载 153.69 万个羊单位，超载率为 96.72%（见表 4）。

①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 91 页。

②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 91 页。

③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第 304 页。

④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第 304 页。

⑤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玛曲县 2011~2014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2015 年 8 月 6 日。

⑥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玛曲县 2011~2014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2015 年 8 月 6 日。

表4 玛曲县草场牲畜超载情况

项目 年份	年末存栏数 [万头(只、匹)]	换算成羊单位 (万个)	超载量 (万个)	超载率 (%)
1984	61.47	188.57	29.67	18.67
1990	61.82	196.06	37.16	23.39
2011	104.87	324.47	165.57	104.20
2014	102.63	312.59	153.69	96.72

资料来源:根据《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第304页;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玛曲县2011~2014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2015年8月6日两份资料提供的数据计算。

固定草场放牧对草场的破坏是通过三个渠道实现的。一是过度采食,二是牲畜践踏,三是牧草再生产条件的改变。

由于超载放牧,且不能长程游走,牲畜在家庭固定的有限草场范围内采食,不再限于牧草的可采部分,连不可采的部分也要采食。采食量超过草场再生能力,就会造成草场退化和沙化。此外,连续不断的采食造成牧草难以获得再生产所需要的足够时间。

在固定的较小范围内采食,牲畜践踏对牧草的破坏更加严重。高寒草原牲畜都是有蹄类动物,连续践踏甚至将根浅牧草的根踢出,牧草失去了再生能力,为沙化准备了条件。据有经验的河曲马场牧民才桑加告诉我们,家庭小牧场的固定放牧,牲畜践踏对草场的破坏甚至达到过度采食的3倍。对于雨水条件较好的玛曲草甸草原来说,只要牧草的根部尚存,牧草恢复再生产较易,但需要一定的时日;而如果牧草连根踢出,就不可能恢复。

草场再生产需要经过牧草生长、开花、结籽、落地等环节,在家庭固定草场过度放牧的情况下,牧草生长往往等不到开花,开花后等不到结籽,结籽后等不到成熟落地,就被牲畜采食一空。由于不同牧草品种的抗旱、抗寒、抗涝能力即再生产能力不同,恢复再生产所需时间和条件不一样,过牧使得牲畜对所有牧草采食的选择性降低了,造成具有不同再生产能力的牧草品种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相同时间和气温、雨水条件下必须同步恢复再生产,而这根本不可能。于是造成牧草品种多样性减少,优良牧草占比下降,一些牲畜不能采食的毒草迅速生长,甚至成为一片草地的建群种,造成草场退化。我们在河曲马场德萨牧家乐周围,及到曼日玛乡黄河边沙丘地区,一路上见到许多连片的以黄帚橐吾(俗称马耳朵)为建群种的严重退化草场,这种草场的形成就是牧草品种结构退化造成的。牧草健康再生长需要远距离授粉,而授粉方式除风吹外,主要靠牲畜长程游走来实现。由于固定草场放牧,牲畜长程游走已不可能,短距离授粉和近亲繁殖,同样会造成牧草再生产条件发生改变,是导致草场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跟踪研究和监测在玛曲县尚未开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玛曲县草场“沙化的原因是自然和人为的双重作用,主要有过牧、丰富的沙源、气候干燥三个方面”。^① 这种看法将自然和人为作用并列,并举示三个主要原因,是一种模糊认识。实际上,自然的自在作用是条件,人为的过度放牧才是原因。试想,丰富的沙源自古有之,为什么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玛曲没有沙化现象,六七十年代也是轻微的沙化,难道那个时候沙源就不丰富吗?难道那个时候就没有出现过干旱吗?都不是。只是由于草场家庭承包后,过牧越来越严重,沙源才裸露出来,风吹形成沙丘,干旱只是加速因素,它和沙源丰富都不构成原因。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草原鼠害是沙化的原因之一,这同样是把沙化原因归结为自然因素。“危害草地的主要鼠种有中华鼯鼠、达乌尔鼠兔,其次是甘肃鼯鼠、西藏鼠兔和根田鼠。中华鼯鼠打洞掘土,掘食牧草根系,降低草地生产能力,在沟谷台阶地,禾草+杂草类+矮蒿草型草场,每公顷有中华鼯鼠13只。达乌尔鼠兔采食牧草,打洞掘土,减少生草面积,造成水土流失和地面凹凸不平,对草地破坏率达到50%以上,使大面积优良草地变为黑土滩。”^② 中共玛曲县县委组织部格日巴同志亦持此种观点。问题在于,鼠害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高寒草原上即已存在,已在打洞掘土,啃噬牧草,但为什么那时没有出现沙化和黑土滩呢?过牧才是原因,自然只是沙化和形成黑土滩的条件与促进因素,算不得原因,否则解释不了草场生态演化史。所谓条件,就是有它不必然导致结果,但无它必不导致结果,而原因则必然导致结果。只有草场过牧造成草场再生能力下降,鼠害才能起到作用。

玛曲沙化草场主要分布在欧拉乡、尼玛镇、河曲马场和曼日玛乡,沙化面积达80万亩,其中沙丘面积10.5万亩,其余69.5万亩为沙化草原。^③ 玛曲县沙化地属高寒草原原型沙地,沙粒较细,略显黑色。流动沙自1984年以来平均沙化速度达16.24%。沙丘分布由以前的斑点状分布的半固定、半荒漠向集中连片、全沙化和流动沙丘演变。沙丘丘高12~15米。沙化草原为平沙地,有禾本科、唇形科等草本植物生长,盖度多为50%~80%。固定沙丘地与流动沙丘地呈镶嵌分布。沙化土地基本沿黄河分布于冲洪积滩地,因黄河左岸阶地宽广,沙化土地多分布于左岸。有沙化土地分布的黄河河段长119公里,占玛曲县境内黄河总流程的27%。沙化速度每年以100~200公顷的面积增加,且年增加绝对值在不断扩大。由于气候寒冷,土壤流失,植被恢复难度大。

玛曲县退化草场面积达77.2万公顷,^④ 占全县草场面积的86.71%,其中严重退化

①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92页。

②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93页。

③ 数字为玛曲县畜牧局局长宗文杰提供。

④ 原文如此。这里草场退化总面积与不同退化程度分面积之和不一致。

面积 28.3 万公顷, 中度退化面积 38.6 万公顷, 轻度退化面积 18.6 万公顷。^① 退化草场虽有植被覆盖, 且盖度高, 但牧草多为毒草、害草, 牲畜不能采食。严重退化草场完全不能放牧。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植被覆盖率从 100% 下降到 50% ~ 90%, 过牧引起牧草种群结构的变化, 以中生禾、莎草、蒿草、苔草为主的结构被破坏, 杂草、毒草比例增大, 不少地方毒草竟占 40% ~ 50%。前述黄帚橐吾建群种的草场就是典型的退化草场。

玛曲黑土滩主要分布在曼日玛乡。全县黑土滩 200 万亩。表面上看, 黑土滩是鼠害造成的, 实际上是超载放牧在先, 破坏了牧草再生能力; 鼠害在后, 造成黑土滩成不毛之地。

草场是草原生态环境的基础, 草场沙化、退化改变了高寒草原生态的关键性因子, 使得草原生态出现恶化趋势。

五 家庭固定草场放牧造成高寒草原生态的退化

玛曲高寒草原生态是以青藏高原大陆性气候和四大地貌为地理前提, 以川西藏东高原灌丛草甸区为植被类型, 以黄河水系“天然蓄水池”为涵养功能, 以高原野生动植物和高寒草地的藏系家畜为多样性生物, 以藏民为主体构建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

玛曲平均海拔 3300 ~ 4800 米, 处青藏高原阴湿区, 属高原大陆性气候。境内地形可分为四个大区: 阿尼玛卿山、西倾山高山区, 中部山前低山丘陵, 山间盆地与冲积平原, 东部沼泽湿地。根据中国植被区划, 玛曲境内草地植被属川西藏东高原灌丛草甸区。境内植被群落以耐高寒的中生灌木和多年生草木为主。各种草甸组成的天然草地是玛曲最主要的自然资源。草原占全县总面积的 89.54%, 是亚洲最优良的牧场之一。全县森林面积 70404 公顷, 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7.3%, 其中高山阳坡分布的水源涵养林面积 49354 公顷; 黄河沿岸和部分沟谷分布的灌木林、矮生柳的面积为 21050 公顷。全县土壤可分为七类: 高山草甸土类、亚高山草甸土类、草甸土类、沼泽土类、泥炭土类、黑盖土类、浅色草甸土类。土地类型随海拔高度变化, 呈垂直分布。境内河流属黄河水系, 流域面积 10190 平方公里, 占甘肃省境内黄河流域面积的 59%。黄河年平均流量 440 立方米/秒, 年径流量 138.6 亿立方米。发源于阿尼玛卿山和西倾山南翼的黄河一级支流 28 条, 较小的二级、三级支流多达 300 余条。黄河从青海久治县流入玛曲时, 水流量为 51.37 亿立方米, 只占黄河总水量的 20%, 而流经玛曲境内再返入青海省时流量增加到 164.1 亿立方米, 占黄河总水量的 65% 左右, 补充地表水

^①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5, 第 91~92 页。

27.1 亿立方米,补充水量达45%。玛曲属于半湿润过渡地带草原区,成雨条件好,境内1288万亩草场以及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和沼泽草场,构成黄河上游完整的水源体系。境内湿地分布广,面积达562.5万亩,系若尔盖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乔科沼泽湿地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曼日玛、采日玛、齐哈玛、阿万仓四乡及河曲马场、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等地,对黄河水源具有特殊的涵养作用。因此,玛曲素有黄河“天然蓄水池”、“地球之肾”和“中华水塔”之称,具有独特的生态保护功能。境内野生动物种类多达199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黑颈鹤、丹顶鹤、雪豹、黑鹳、梅花鹿等10余种;国家三级保护动物有马鹿、白唇鹿、棕熊等10余种。境内野生药用植物分属39科、100属、151种,其中分布面积较大,数量较多,经济价值较高,可以采集利用的药用植物有独一味、红景天、冬虫夏草、贝母、羌活、秦艽、烈香杜鹃、水母雪莲花、唐古特大黄等20余种。鱼类资源丰富,黄河玛曲段的经济鱼类有5种,属于鲤科、腹鲤亚科的有4种,鳅科1种,还有从美国引进的虹鳟鱼。畜种资源均系高寒草地条件的藏系家畜,主要有牦牛、藏系绵羊(欧拉羊)和河曲马等。^①

玛曲以特定的海拔高度、地貌组合和相对丰富的降水量,使黄河首曲形成以草甸为背景的生态类型结构。玛曲高寒草原生态环境的这一独特性决定了其重要性,可集中概括为黄河“天然蓄水池”和“中华水塔”,从而具有不可替代性。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玛曲作为母亲河的母亲,具有不可替代性;草原对畜牧业具有不可替代性;草甸、灌丛和湿地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的功能及其为野生珍稀动物提供生存环境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玛曲作为甘肃省的主要畜牧业基地和主要牧场,草原作为藏族牧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这一生态系统又极具脆弱性和难以恢复性。玛曲气候寒冷,牧草生长期只有184~206天。阿尼玛卿山和西倾山发育于基岩之上的黑土层,高山、亚高山草甸土厚度约20~40厘米。一旦水土流失,基岩裸露,整个过程具有不可逆性,从而造成山地草甸生态系统极具脆弱性和破坏后难以恢复性。山间盆地和丘陵区黑土层较薄,在10~30厘米,且山间盆地和黄河谷地土壤母质多为沙质、粉沙质和沙质黏土,一经破坏,修复难度大。

然而,由家庭固定草场放牧方式的内在矛盾导致的过牧,改变了这一生态中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因子:植被和黑土层。由于过度放牧和人为滥挖虫草和药材,植被遭到破坏,失去对土壤的保护,造成水土流失,阿尼玛卿山和西倾山成为基岩裸露区。过度放牧和不当取土,导致山间盆地和丘陵草地大面积沙化,冬春季节,失去植被保护的沙丘在风力作用下不断推进,导致沙化面积不断扩大,每年以20%的速度增加。

^①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68~69页。

家庭固定草场放牧所导致的玛曲生态环境退化已成难以遏止的趋势。据县志记载,1991年以来,玛曲草原干旱现象加剧,草场沙漠化扩大,鼠虫害严重,许多泉水干涸,河水减少,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首先,草地沙化严重。沙化面积已达6132.72公顷,共有36处大型沙化点,黄河沿岸已出现320公里沙丘带,沙化草地面积达39996公顷,其中固定沙丘4060公顷,流动沙丘2072.72公顷。沙化土地面积加草地沙化面积占全县土地面积的4.53%,且平均每年以299公顷的速度递增,年增加数不断上升。草场沙化导致沙化区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很多珍稀动物的栖息环境不断恶化,许多国家级保护动物濒临灭绝。沙进人退,可利用草场逐步减少,2500多牧民(其16.8万牲畜已完全退出沙区),沦为贫困人口。其次,湿地、河流萎缩、干涸。持续干旱经常发生,地下水位下降,降水量、河流量减少,境内数千眼泉已经干涸,黄河27条主要支流中,已有11条常年干涸,另外不少河流则成为季节河,大部分山谷小溪绝流,数百个大小湖泊水位明显下降,地表径流量和土壤含水量锐减,使组成玛曲湿地的乔科沼泽大面积干涸,干涸沼泽地面积达3.5万公顷。据水文资料分析,黄河玛曲段水情1980年平均流量为每秒692立方米,1997年为每秒539立方米,2000年为每秒485立方米,2002年为每秒400立方米,到2004年,黄河首曲补给黄河的水量减少15%左右,玛曲对黄河水量的补充作用逐年被削弱,严重影响黄河首曲“天然蓄水池”的功能。再次,草场过牧,草地质量下降。严重超载过牧,致使草地植被生态趋于恶化,优良牧草种群减少或消灭,杂草得以繁衍并上升为优势种,草场质量下降,草地承载能力降低,造成生态环境失衡,诱发土地沙化。复次,草场沙化降低了固土防风功能,河岸塌方与水土流失严重。黄河干支流由于缺乏治理,水蚀、风蚀、重力侵蚀现象恶性循环。水土流失向纵深发展,出现频繁的泥石流灾害。2002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226万亩,河流、雨水冲刷冲击,使河岸疏松地段大面积塌方、滑坡,河岸塌方宽处已达1000米,破坏了草场,也增加了黄河泥沙量,年向黄河输入的泥沙量达50多万吨,并逐年抬高河床,促使黄河频繁改道,原河床河沙裸露,随风泛起,加剧草原荒漠化进程。又次,过度放牧和草场沙化、退化,造成虫害、鼠害严重,中华鼯鼠、高原鼠兔、草原毛虫大肆泛起,鼠虫害严重地区许多草原逐渐演变为沙化区,形成恶性循环。全县鼠虫重要危害面积达386万亩,占全县可利用草场面积的31%。最后,草场退化、沙化,造成生态系统多样化锐减,野生动物种群大量消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玛曲各类珍稀动物多达230多种,到2004年国家规定的保护种类仅存140多种,减少近90余种。^①

①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71~72页。

六 家庭固定草场放牧造成牲畜品种的退化

畜种资源是畜牧业的基础,是畜牧业代际可持续的重要物质承担者。玛曲高寒草原畜牧业的畜种主要有牦牛、藏系绵羊和河曲马。^①

牦牛是藏族人民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中将野牦牛饲养驯化而成的特有牛种,它对寒冷的气候、严酷的自然环境适应能力极强,善登高山,踏冰卧雪,素有“高原之舟”之称。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条件下,它是提供乳、肉、皮、毛的兼用畜种,也是高寒草原牧民骑乘和驮运的主要役畜,是珍贵的畜种资源。1949年玛曲地区牦牛只有3.45万头,到1990年发展到28.96万头,2013年为50.58万头,2014年为49.69万头,占全县牲畜总数的48.42%。在中部和南部居多,尤以阿万仓、齐哈玛牦牛最为优良。

玛曲牦牛结构紧凑,头较大,短额宽并稍突起。鼻稍长微陷,鼻孔开张,鼻小,唇薄灵活,眼圆有神,耳小灵活。母牛角较细,公牛角粗长,角间距宽,角基部向外向后弯曲成弧形,角尖向后对称,颈短而薄,无垂皮,脊椎的棘突较高,背低稍凹,前驱发育良好,胸椎较黄牛多一节,肋骨多一对(14节),肋骨长而开张良好,胸及中驱发育良好,气管特别大,肺活量大,腹大,尻斜,后驱发育欠佳。四肢较短而粗壮有力,关节明显。蹄小质坚,蹄裂较深。母牦牛乳房小,乳头短;公牦牛睾丸小而不下垂。毛色以全身黑色为主,约占80%。成年公牦牛体高129.88厘米,体长139.5厘米,胸围190.33厘米,管围20.82厘米,体重353.7公斤。成年母牦牛体高110.43厘米,体长122.11厘米,胸围157.01厘米,管围16.66厘米,体重210.72公斤。阉牦牛体重411.31公斤。牦牛是高原特有牛种,长期处于空气稀薄、枯草期长的环境中,具有耐高寒、喜凉爽而畏炎热的习性。唇薄而灵活,便于采食低矮而细嫩的青草或枯黄而柔软的牧草。皮下结缔组织发达,易于在夏秋囤积脂肪,四肢较粗短、蹄质坚硬,能攀登陡峭的山坡,穿越沼泽。牦牛性情温和,合群性强。公牦牛性较粗野,能与凶猛野兽搏斗,保护牛群。母牦牛较温驯,母性很强。

牦牛生产性能高。除产乳、肉、毛外,还能役用。玛曲牦牛4月开始产犊,5月中旬开始挤奶,10月下旬结束,泌乳期160天,产奶量与牧草质量成正比,6~8月牧草旺盛,产奶量最高;母牦牛当年产犊后未怀孕者,次年可继续挤奶,其奶量为当年产犊的1/2。由于犊牛自然哺乳兼挤奶,产奶量很难确切测定,一般为315.08~334.8公斤/头,产乳量虽低,但乳浓稠,含乳蛋白、乳脂肪丰富,脂肪颗粒大,易加工成黄油。乳比重为1.034,酥油率为8.47%,干酪素为3.0%~3.5%。秋季,牦牛奶脂肪

^① 有关玛曲县畜种材料均来自《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第287~289、第291~292页。

含量高达9%，比普通奶牛高出两倍以上。青草季节，牦牛有“见青即上膘”的牧谚。膘情恢复很快，膘情良好时，肩、背、臀部均被一层黄色脂肪所覆盖。肉嫩味美，呈红色而较暗，纹理清晰，含脂肪、胆固醇较少，蛋白质与灰分含量高，是受人青睐的优质肉品。成年阉牦牛平均活重261公斤，屠宰率47.34%，平均胴体重123.55公斤，净肉率33.95%，骨肉比为1:2.53，平均产净肉88.55公斤。同时，牦牛血营养丰富，平均每立方毫米血中含650万~900万个带氧红细胞，为一般黄牛的4倍。牦牛每年6月中旬抓绒剪毛，毛长约19~21厘米，每年剪毛1次，母牦牛全身都剪，尾巴只留一小束，种公牛不剪毛，驮牛只剪腹部毛及裙毛，驮牛平均剪毛量为1.0公斤，母牛为0.7~0.9公斤，抓绒量在0.5公斤以下。阉牦牛主要用于驮运和骑乘，成年驮牛每头可驮50~80公斤物品，日行20~30公里。有时长途连续一月余，不显疲乏，行走有力。牦牛是晚熟品种，公牦牛1周岁时有性反射，3周岁开始配种，利用年限为4~10岁。母牦牛3岁初配，一般为两年一胎或三年二胎，一胎一犊，连年产犊的很少，母牦牛一生可产4~6胎，配种产犊至14岁左右。母牦牛发情期为6~11月，7~9月为旺季，发情周期为22天，发情持续期为1~2天，妊娠期为270天。玛曲牦牛繁殖成活率为56.44%。

藏系绵羊，古称蛮羊，是古老的粗毛羊品种之一，产于青藏高原。玛曲藏羊属草地型藏羊。由于长期自然和人工选择的综合影响，玛曲藏羊形成了欧拉类型和乔科类型两个地方品种。1949年玛曲地区绵羊总数为19.14万只，2014年底玛曲县绵羊存栏总数达到50.69万只，占全县牲畜总数的49.39%。欧拉羊主要分布于欧拉、欧拉秀玛两乡及尼玛、木西合、阿万仓乡的部分地区；乔科羊主要分布在曼日玛、齐哈玛、采日玛、河曲马场、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及阿万仓的部分地区。

欧拉羊体格高大粗壮，头稍狭长，多数具有肉髯，被毛较短，绒毛多，而覆盖度差，产毛量少，死毛含量很高，几无正常粗毛。头颈、四肢和腹下着生刺毛，多为黄褐色，白色极少。公羊胸前着生黄褐色“胸毛”，而母羊不明显。乔科羊体格较大，被毛粗长，覆盖度中等，毛辫较长，具有波形浅弯，死毛含量高。头颈、四肢杂色，以黄褐色较多，黑花亦属常见。欧拉公羊体高为 77.21 ± 2.66 厘米，体长为 84.25 ± 4.14 厘米，胸围为 103.58 ± 3.86 厘米，十字部高为 79.04 ± 2.05 厘米；母羊体高为 72.44 ± 2.09 厘米，体长为 77.83 ± 3.69 厘米，胸围为 98.10 ± 3.36 厘米，十字部高为 74.04 ± 2.08 厘米。平均体重成年公羊为75.85公斤，成年母羊为58.51公斤。出生公羔重4.28公斤，母羔重4.27公斤。乔科公羊体高平均为75.41厘米，体长平均为81.11厘米，胸围平均为99.30厘米，母羊体高平均为71.20厘米，平均体重成年公羊为64公斤，成年母羊为52公斤。

在生产性能方面，欧拉羊个体产毛量成年公羊为1.08公斤，成年母羊为0.77公

斤,平均毛长公羊为16.63厘米,母羊为15.13厘米,净毛率公羊为73.67%,母羊为75.54%。无髓毛、两型毛、死毛含量公羊分别为62.8%、6.28%、32.84%;母羊分别为70.09%、6.11%、24.21%。乔科羊个体产毛量,成年公羊为1.34公斤,母羊为0.95公斤;毛辫长公羊为24.00厘米,母羊为23.44厘米;净毛率公羊为76.28%,母羊为76.09%。无髓毛、两型毛、死毛含量公羊分别为49.25%、19.64%、24.30%;母羊分别为50.53%、23.34%、17.97%。在产肉性能方面,欧拉羊胴体重平均为35.18公斤,占活重的45.96%,内脏脂肪重平均为3.38公斤,占活重的4.42%,屠宰率为50.38%;乔科羊胴体重平均为25.30公斤,占活重的47.90%,内脏脂肪重平均为1.60公斤,占活重的2.81%,屠宰率为47.90%。在繁育性能方面,1.5岁母羊开始交配受胎并能正常产羔,但多不认羔,繁殖成活率低,一般2.5岁母羊配种产羔,公母混群放牧,自然本交。每年6~9月配种,11月至次年3月产羔,分别为冬、春羔,怀孕期150天左右,每年产羔一次,多产单羔,双羔极少。母羊母性好,育羔性极强。母羊利用年限为5~6年。

河曲马是全国优良的马种之一,俗称“南番马”。河曲马体型以粗糙结实为主,属兼用型略偏挽用。毛色以黑、青、骠、栗居多,其中24.17%有白章特征。体型结构匀称,头略长,约占体高1/3,耳长敏捷,鼻孔开放,唇厚灵活,脑深广,腭较低,背长,腰短平直,尻宽短,腹部充实,四肢关节筋腱发达,蹄广平,质疏松,有龟裂。成年公马平均体高为137.22厘米,体重为346.27公斤;母马平均体高为132.47厘米,体重为330.95公斤。河曲马幼驹发育较快,公马4岁,母马5岁达到体成熟。繁殖性能较强,营养良好的母马2周岁性成熟,3周岁即可配种,4周岁产驹。繁殖期公马为13年左右,母马为16年左右。最长寿公马为33岁,母马为28岁。母马一生可产驹12~13匹,6~12岁为产驹盛期,受胎率一般为67%,最高可达83.16%。繁殖成活率平均为80%。河曲马性情温顺,气质稳静,挽力强,速度中等,能持久,疲劳恢复快。最大挽力可达370公斤,骑乘速度最快每分钟可达800米左右。^①河曲马对高寒多变的气候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在终年放牧的条件下,体内贮存脂肪能力强,夏秋上膘快,冬春降膘慢。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乘骑行走自如,特别具有善走沼泽草地的能力。剧烈运动后,20~40分钟即可恢复正常呼吸和脉搏。河曲马强壮的四肢,结实发达的筋腱、韧带,特别擅长负重远行。由于解放军骑兵兵种的取消,^②以及摩托车在青

① 关于河曲马的品种特征与性能,参见《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1991~2004)》,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第103页。

② 据河曲马场场长卡召加介绍,秦始皇兵马俑之马为河曲马,唐代宫廷盛行的马球运动之马亦为河曲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百万大裁军”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兵种被取消,为保持历史记忆和庆典礼仪场合使用,仍留有一营一连编制,一营编制在内蒙古自治区,一连编制就在玛曲县。

藏高原的普及,河曲马的数量较前大为减少。1949年玛曲县河曲马数量为1.49万匹,1955年达到3.78万匹历史最高峰,1962年为0.75万匹,1968年为1.45万匹,1978年为3.06万匹,1988年为3.72万匹,1990年为3.68万匹,2014年为2万余匹,主要饲养地在河曲马场。

适应高寒草原生态环境的玛曲优良畜种,在家庭固定草场过牧中出现退化。主要表现为:同种牲畜个体之间特性差异增大,毛色不统一,发育不健全,畸形个体出现,体格变小;生产性能减弱,个体体重和胴体重量减轻,产奶量和产肉量下降,肉质退化;繁殖能力下降,繁殖期缩短,繁殖成活率有所下降;各种畜疫发病率提高。畜种退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固定草场放牧方式。

首先,牲畜私有化和草场承包到户后,畜群的放牧由各户完成,牲畜配种也由各户独立完成,牲畜近亲交配繁殖频率非常高,造成牲畜品种退化。此种情况在草场承包初期并不严重,但随着畜群再生产的反复进行,情形就严重起来。

其次,随着人口增加和藏族牧民商品观念的增强,不断提高草场载畜量势所难免,过牧造成草场退化,牧草供应量不能满足牲畜采食需要,造成牲畜营养不足,体格减弱,胴体重量减轻和生产性能下降。

再次,家庭牧场的有限性,使牲畜采食的牧草种类单一,营养失衡。此外,牲畜除了采食外,还会舔舐各种岩石以补充微量元素,但在游牧方式转为定牧后,各户牧场所能提供的岩石种类并不全面。各种营养物质摄取不平衡,对畜种退化直接产生作用。

复次,牧户商品意识的提高,使得哺乳期牦牛挤奶过多,而牦牛乳兼具牛犊自然哺乳与挤奶双重作用,在产奶量一定的条件下,挤奶过多势必影响牛犊哺乳需要,造成牛犊发育不良和牦牛畜种退化。

最后,牧民单家独户经营,由于经营管理能力差,一些不善经营牧户的牲畜,难以抵御各种自然风险。选种不良,交配不当,喂饲不精,管护不到位,造成受胎率、繁殖成活率下降。畜群疫病发现晚、诊治不及时,造成畜种退化。例如,生活在沼泽地区的乔科羊,因沼泽滩蚊虫多,易患肝包虫病、肺包虫病,人吃了带病羊肉也会得病。由于缺乏专业兽医,牧户不懂得及时治疗,不仅畜种退化,而且威胁到牧民健康。曼日玛乡可谓包虫病重灾区,而采日玛、齐哈玛两乡也较为严重。人得病一是因为与牲畜接触,二是因为吃带病羊肉。

牲畜既是牧民的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而畜种是畜牧业再生产的基础性资源。畜种退化表明,畜牧业将在萎缩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优良品种难以传给下一代,造成畜牧业的代际不可持续。

七 玛曲县牧民人口的增加与牧户贫富分化

人口本身是代际可持续的物质承担者之一。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人口质量,或是人口结构,前代人口都决定着本代人口,本代人口决定着后代人口。但这种代际关系指的是人口的代际联系。当我们关注高寒草原畜牧业的代际可持续性时,人口因素是通过生产方式来发挥作用。

在玛曲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的矛盾中,家庭固定草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放牧牲畜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这是定牧生产方式内在固有的矛盾,或者可以干脆说,这对矛盾界定了定牧。在这对矛盾中,放牧牲畜数量的增加,是矛盾发展的内在动力,而放牧牲畜增加的背后是牧民人口的增加和牧民财富观念的增强。牲畜本来就是牧民的财富,牧民人口增加要求财富增加,人口不增加但牧民的财富观念发生改变,也会要求财富增加。何况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牧民人口增加和财富观念的改变相并行。因此,在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的主要矛盾之外,牧民人口与牲畜财富的矛盾是一个次要矛盾,牧民人口数量的变化和财富观念的改变会促进主要矛盾的发展。

2005~2014年,玛曲总人口增加了12000人,其中牧民增加了6800人(见表5),增长19.8%。牧民在总人口中约占70%。这样一种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要维持牧民既有生活水平不变或提高,注定要增加牲畜存栏数和出栏数。尽管在存栏数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母畜比例也可以增加出栏数,但这种做法很有限,最终只有增加存栏数才能突破这个限制。

表5 2005~2014年玛曲县总人口数与牧民人口数

单位:万人,%

年 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总人口数	4.48	4.51	4.60	4.73	4.78	5.49	5.52	5.57	5.64	5.68
牧民人数	3.44	3.53	3.61	3.65	3.73	3.87	3.84	3.89	3.99	4.12
牧民占比	76.8	78.1	78.5	77.2	78.0	70.5	69.6	69.8	70.7	72.5

资料来源:甘南州统计局:《玛曲县近十年人口数》,2015。

牲畜户有和草场家庭承包,使得牲畜财富的社会形式从以集体财富为主完成了向以家庭财富为主的转变,市场化又使牲畜财富与货币财富并存。问题在于,尽管传统的财富观念依然留存,但正在发生变化,只要他们追求财富,那么现实存在的经济矛盾制约着最终的结果。对于玛曲县的牧民来说,这种结果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追求家庭财富中出现贫富分化,二是集体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解体,代之以个体分散的生产方式和孤寂的个体生活方式。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私有化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改革受这种经济学影响极深。如果所有的外在条件均一样,且每个人都忠实地仰赖劳动致富,或许这种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会成为推动生产进步的力量。问题在于,劳动的现实进行离不开生产资料,问题在于,劳动总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的,问题还在于,有什么力量来保证每个人只是以自己的劳动来获取财富呢?一个牧民,为了发挥积极性,自然增加牲畜,在草场面积一定时,势必造成草场退化沙化,沙进人退,面对一片沙漠,人再有积极性亦是枉然。尽管他可以从事别的劳动,但畜牧业是不可持续了。如果他要继续从事畜牧业,只能受雇于人,这样别人就靠雇工发财,不必忠实地依靠自身的劳动维生。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积极性概念,模糊了是什么东西的积极性,绝不是劳动积极性,绝不是生产积极性,而是雇佣和剥削人的积极性。

玛曲家庭草场承包后所走出的正是这样的道路,由于人们拥有的草场数量、质量不同,由于各户的经营成本不同,由于每户牧民在畜种选择、防疫、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不同,尽管都有同样强烈的致富积极性,结果是牧户中出现贫富分化。玛曲县畜牧局宗文杰局长告诉我们,每年出栏牲畜穷户只有3~4头(只),富户可达20头(只)以上。

家庭经营体制的重建,造成个体分散的生产方式和孤寂的个体生活方式。牧民居住异常分散,牧户之间距离较远,且交通不便。夏秋放牧季节,家庭主要劳动力一般留在草场放牧,老人孩子在定居点生活,无人照顾,条件艰苦。

牧民居住分散,导致适龄儿童上学成为一个大难题,主要劳动力长时间不在家中,老人行动不便,无法接送孩子上下学。有的适龄儿童跟随父母到草场放牧,教育问题因此搁置,不利于藏族孩子的成长,也不利于牧民后代整体素质的提高,制约了牧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受气候、水质、饮食习惯及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牧民基础性的体检、保健等无从谈起,一些高原心脏病、胆结石等常发病难以防治,牧民平均寿命仅为67岁,低于全国74岁的平均期望寿命。牧区交通不便,通信滞后,牧民基本处于原始的生活状态,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

由于草场面积有限,且“不留死角”全部承包到户,各户只留出部分牧道供牲畜通行,但未留出牧民出行道路。占用承包草地为牧道和道路,国家并无相关的补贴举措,许多牧户不愿让出越来越珍贵的草场作为道路,原来留出的牧道亦越来越窄,导致牧民和牲畜出行困难。

草场承包后,冬季牧民一般在定居点附近所划分的草场放牧,夏季便到偏远地方划分的草场放牧。全年基本都在草场,住牦牛毡房,饮用河水或井水,使用光伏电,

无法看电影、电视,利用图书馆等,无法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

生产队时集体经营草场,分组轮流外出放牧,个体长期孤独在外放牧的现象并不严重,但草场承包到户后,这个问题逐渐凸显。与世隔绝的生活冲击了牧民的精神世界。人是社会动物,社会交往的缺位和文化生活的匮乏,阻碍了牧民健康的精神生活。

八 牧户专业合作社兴起对畜牧业可持续性的意义

高寒草原畜牧业盲目照搬农区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所造成的危害远超农区。不仅对草场、畜种资源造成不可恢复性的破坏,而且加剧了黄河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更造成了牧民生活水准的下降,可谓这一经营体制的全面溃败。由于高寒草原资源和黄河天然蓄水池的生态环境,是青藏高原畜牧业代际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承担者,资源和生态破坏严重威胁着子孙后代的生产能力,因此,这种溃败又可谓彻底。

高寒草原家庭经营体制的全面和彻底溃败,源于其内在矛盾,即家庭固定草场和放牧方式的冲突,因此,必须进行高寒草原家庭经营体制的创新,必须找到有效化解这一矛盾的途径。近年来,玛曲县兴起的牧民专业合作社,对维系高寒草原畜牧业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牧民专业合作社是牧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将牲畜和草场入股共同经营,按照一定的股份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的新型牧业合作经济组织。

玛曲县认真贯彻落实甘肃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意见》(甘政发〔2014〕75号)精神,大力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大力培育发展农牧民合作社。到2015年,全县建立牧民专业合作社326个,占牧民总户数的60%。^①玛曲的牧民专业合作社有三种形式:一是原来各户基础较差,直接以草场、牲畜和资金入股组建的合作社;二是以某一户为主体,吸收部分牧户草场或牲畜或资金组建的合作社;三是以各户草场、牲畜、宅基地等所有权证反担保抵押获得的贷款进行经营而组建的合作社。第一种形式是所有社员户的主要生产资料均加入合作社,后两种合作社则保留或部分保留社员户原有的家庭经营草场和牲畜。这种新型经济组织在畜种改良、草场保护和建设、提高市场应变力以及增加牧民收入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青藏高原藏族牧民所欢迎,因而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新型合作社由于打破了各户分散的草场、分散的牲畜育养、分散的劳动力使用、分散的基础设施建设状态,不仅经济实力增强了,而且在划区轮牧基础上,有效化解了家庭固定草场经营与放牧方式的矛盾,实现了牧户经营体制的创新。

^① 数字由玛曲县畜牧局宗文杰局长提供。

首先,新型的牧户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划区轮牧、分工放牧、集中围栏、提高草场利用率、人工半人工草场封育,减轻超载放牧,从根本上解决草场退化、沙化、黑土滩化等问题。广大牧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草地放牧与草场合理利用经验,如划分季节草地,实行季节轮牧;在季节草场根据各类牲畜的不同放牧习性,因地制宜划分放牧地段,确定驻牧期限。如繁殖母羊放牧干燥阳山,母牛放牧沼泽草地,马、阉牛放牧高山草地等。不同季节采用“夏放高山、秋放半山、冬放沟湾,春放河滩”的放牧方法。草场承包后单家独户草场有限,制约了上述经验的推行,成立合作社则有利于科学合理集中经营,扩大牧场载畜量,提高草地利用率;有利于加强饲草料基地建设,夯实畜牧业发展基础,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有利于统一集中灭鼠、补播草种,保护草场。

合作社的组建还为开展草场沙化、退化,黑土滩化治理创造有利条件。严重沙化、退化和黑土滩化的草场原本也已承包到户,一旦治理,需要牧户配合,实行禁牧,并签订禁牧合同。有了合作社,大大减轻了禁牧户人口与牲畜放牧的安置问题,有利于稳定禁牧户的生产和生活,不至于出现禁而不止现象。

例如,优良欧拉羊繁育基地——玛曲县畜合隆欧拉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5月,位于欧拉乡安茂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注册资金316万元,占地总面积3.354万亩。合作社现有14户,社员58人,其中,管理人员8人,专职兽医2人,专职放牧人员37人,从事销售和信总收集人员5人,从事饲草料加工种植人员6人。合作社的饲养管理实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改变传统的放牧制度,建立了放牧+舍饲制度,轮牧草场为冷季草场和暖季草场。冷季牧场实行小区轮牧,区内草地利用率控制在60%之内。每年1月份,产羔前母羊开始补饲,从4月底或5月初实行全舍饲至6月底。暖季牧场即原来的夏季草场,实行地带型划区轮牧,每年从7月上旬开始到10月底结束,利用时间80~90天,草地利用率不能超过60%。种公羊、繁殖母羊和后备羊进入冷季草场,其他羊淘汰出栏。这种放牧制度扩大了冷季草场的面积,进行划区轮牧有更大的周旋余地,并且避开了牧草生长的春秋两个危机期。扬夏季青草期之长,避冬春枯草期之短,改单纯依赖天然草场全年放牧,为夏秋放牧加冬春舍饲、半舍饲,从根本上改变了产出期短、消耗期长、掉膘损失严重,以及母畜比例、繁成率、成活率低和个体产量低,群体周转慢的状况。

其次,牧户专业合作社有利于畜种改良,提升牲畜生产性能。按照《甘南州牦牛藏羊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规划》,玛曲县以组建种公畜专业合作社和种公畜基地为抓手,加大良种选育力度,组建核心群,积极扶持牧户规模经营种公畜,加快牲畜本品种选育和提纯复壮步伐,实现畜种改良的低成本、高效化,防止种质退化,不断提高全县

良种繁育水平。通过引进半血野牦牛、野盘羊等优质种公畜,提高牲畜的生产性能,不断增加养殖效益,增加牧民群众的收入。从1979年开始,玛曲在畜种结构的调整中坚持“提高总增、控制净增、加快周转、提高商品率”的方针,提倡“压缩马、控制羊、发展牛”和“提高畜群中适龄母畜比例”,使总体结构趋于合理。^①

牧民合作社对于改良牲畜品种、抑制畜种退化从两个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合作社建立后,各户牲畜统一组群放养,彻底改变了近亲繁殖的格局,从源头上堵死了畜种退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合作社的经济实力远较单家独户为强,在品种选育、疫病防治、平衡牲畜营养结构以及牲畜管理方面,均能有效抑制畜种退化。此外,还可以组建专门的畜种改良合作社,利用少数牧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育优良种畜,为其他牧户提供种畜服务,力争将优良畜种留给子孙后代。

玛曲欧拉乡欧强村扎西塘合作社为专门的藏羊合作社,覆盖50多户牧民。2014年培育7000只母羊,适龄母畜比例提高到80%,而全州平均数仅为40%左右。该合作社年底选育品质好的种公羊,并筛选品质好的母羊留作基础母羊,其余全部出售,经济效益好,提高了牧民收入,并将自给型畜牧业转化成商品型畜牧业。

玛曲县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成立了“玛曲牦牛良种繁育协会”,选择原牧工与周边有经验、有条件的10户牧户为会员,养牛5000余头,由此组成了10个基础选育群,良种率45%左右。协会注册设立了“玛曲县阿孜牦牛养殖牧民专业合作社”,阿孜村28户牦牛养殖专业户为合作社社员,在政策、资金等扶持下引导会员与社员提高良种质量、扩大良种数量。根据州县安排,合作社加大种公牦牛配送工作,向阿万仓乡、木西合、采日玛、曼日玛、齐哈玛五个乡和河曲马场,共配送种公牦牛1546头,在改良畜种方面,家庭经营体制难以望其项背。

最后,通过合作社的引领,农牧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商品经济意识大为增强,入社牧户人均纯收入明显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同时有效抑制了牧户之间的贫富分化。牧户专业合作社发展还解放了一部分劳动力,这些牧户可以外出打工,拓宽了牧民的收入渠道,增加了牧民的收入。合作社充分发挥牧民的特长,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分配中既体现按股份分配,又体现按劳分配,调动了不同牧户的积极性,使畜多草少、畜少草多,有管理能力无草畜、有草畜无能力管理的牧户,都能获得收益,贫富分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当然,在合作社发展初期,存在权利不明确、责任不清晰、运行不规范、分配不

^①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南藏族自治州志》,民族出版社,1999,第390页。

公平,甚至以组建合作社为名套取政府项目资金的情况势所难免。已经组建的牧民合作社,在规范管理和高效运行上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有:合作社入户社员少、服务范围窄、合作环节少、产业链条短、发展资金缺、造血功能弱、带动能力不足、人才紧缺、内部管理和运行不规范等。政府应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总体要求,从产、加、销、服务等各个环节,继续引导扶持农牧民发展合作社,全面开展科技服务,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各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的服务能力,支持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和科研教学单位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加快推广优质饲草生产、舍饲半舍饲、品种改良、疫病防控等先进适用技术,有效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和生产效益。

牧户专业合作社并不否定草场承包政策。一方面,牧民除了共同经营合作社生产经营项目外,可保留单家独户的独立经营,有自己的牲畜和草场。另一方面,牧户专业合作社入股的草场使用权、牲畜及筹集的资金均为合作社成员所有,以牲畜户有和草场使用权包到户为历史前提。因此,牧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没有否定家庭承包关系,相反是以后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一种新的实现形式。然而,牧户专业合作社又不等同于家庭经营体制。第一,合作社将草场承包后的定牧改为划区轮牧,有利于化解草畜矛盾,遏制以至消除草场退化、沙化和黑土滩化等现象。第二,合作社划区放牧有利于平衡牲畜营养结构,改良畜种,避免多年来的近亲繁殖。第三,合作社经营规模扩大,经济实力远超牧户家庭,能够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技能化。第四,合作社重新将分散的牧民联合起来,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情感关系,冲破了个体牧民孤独、封闭的零社会生活。因此,合作社是牧户经营体制的创新。

合作社是当前高寒草原畜牧业走可持续之路的主要抓手,但需要配套工作跟上。这主要有:为大规模圈养创造条件,安置好牧区转移人口就业,发挥政府在合作社建设、草场沙化退化治理和畜种改良等方面的作用。

随着牧民人口增加和牧民对收入提高的要求,牲畜存栏数量和出栏数量必然随之增加,长期高于合理载畜量1倍的超载过牧问题,即使在大力发展合作社条件下亦难完全解决,出路在于圈养和转移牧区人口。

圈养就是利用牲畜棚圈通过喂饲营养牲畜的一种生产方式。圈养不排斥一定时间的放养。圈养对于保护草场有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可以突破放养条件下所确定的草场合理载畜规模,二是消除了牲畜践踏对草场的破坏。玛曲受高寒草原自然条件所限,实施圈养所需饲料只能为天然牧草,也可以通过县际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从农区获得部分饲草料。圈养突破了玛曲牧民传统的放牧习惯,因此,需要试点以总结

经验。圈养需要以饲料产业培育为基础,对防疫工作要求更高,对牲畜管理尤其防止畜种退化提出了新课题。圈养在单家独户的条件下很难开展,合作社则开辟了这种可能性。部分牧民可以专门从事打草工作,将优质草场作为打草场来培育,既可以保护草原,又能够提供优质天然牧草。合作社也为疫病防治提供了可能,大规模集中圈养的防治费用会下降,较大规模合作社还可以培养自己专业化的兽医,并向单家独户经营的牧户提供兽医服务。圈养需要棚圈建设,合作社依靠经济实力的积累并配以政府支持,能够承担相应的投资。圈养通过棚圈改变了牲畜生存的小环境,对畜种的要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棚圈设施的改善,未必不可以发展对耐寒要求不高的畜种。同时,牲畜结构也会发生相应改变,随着市场饮乳量的迅速增加,可以适当提高奶牦牛的比例。

在既有生产方式不变的条件下,安置畜牧业转移人口似乎很困难,但如果改变生产方式,则提供了新的就业空间。合作社的发展要逐步走上专业化道路,这就为牧区的饲料产业、兽医、运输业、畜牧培训、畜产品加工和销售、沙化草原治理创造了条件。玛曲牧区转移人口数量并不大,在国家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规划下,围绕发展专业化、商品化畜牧业,安置转移人口的就业并不困难。

现代政府是代内关系的产物,由本代人选举产生。由于代际经济矛盾最终只有通过代内经济关系的调整来解决,本代人的可持续理念和代际公平需要化为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对于维护玛曲高寒草原畜牧业可持续性来说,政府的作用无可替代。在合作社建设方面,甘肃省人民政府2014年75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意见》,确定了大力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大力培育发展农牧民合作社的发展方向。这就为玛曲县政府在实施示范社创建、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联合社、提升牧民合作社加工销售能力、加强牧民合作社人才队伍建设,出台财政扶持、实施合作社参与项目建设、落实税收优惠、规范工商登记、加强金融支持、保障用地、保障用电和畜产品运输等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而这些政策对于牧民合作社建设是不可缺少的,尤其在合作社发展的初期。

草场沙化退化治理的投入大,技术要求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收益,且治理效果不够稳定,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以政府为主体,吸纳牧户参与草场沙化、退化和黑土滩治理项目,才可能取得成功。

在畜种改良方面,政府在保护畜种遗传资源多样性、打造和维护驰名畜种品牌、开展畜种研究和培育、支持牧户与牧民合作社畜种改良、推广优良畜种等方面,都需要制定政策并认真落实。好的政府,不仅要代表最广大牧民的利益,而且要代表玛曲子孙后代的利益。

参考文献

- [1] D. H. Meadows, D. L. Meadows and J. Randers, *Beyond the Limits: Confronting Global Collapse, Envision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Post Mills VT: Chelsea Green, 1992) .
- [2] S. V. Ciriacy Wanterup, *Resource Conservation: Economic and Polic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2) .
- [3] T. Page,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the Social Rate of Discount”, in V. K. Smith, ed. ,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Applied Welfare Economics: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V. Krutilla*,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1988, p. 85.
- [4]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5]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南藏族自治州志》, 民族出版社, 1999。
- [6] 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玛曲县 2011 ~ 2014 年畜牧业和人民生活统计材料》, 2015 年 8 月 6 日。
- [7] 甘南州统计局:《玛曲县近十年人口数》, 2015。
- [8] 甘肃天玛生态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传画册:《雪域珍品话说牦牛》。
-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2004。
-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2004。
- [11]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 (1991 ~ 2004)》,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5。
- [12] 《玛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玛曲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书 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行动的力量和一个人的影响^{*}

——评弗雷德里克·李的《非正统经济学史》

张 林^{**}

摘 要 弗雷德里克·李的《非正统经济学史》从“学界史”的角度讲述了英美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在 20 世纪的发展历程，本文概述了弗雷德里克·李对非正统经济学的贡献、《非正统经济学史》的基本内容以及《非正统经济学史》的价值。

关键词 《非正统经济学史》 弗雷德里克·李 非正统经济学

2014 年 10 月，年仅 63 岁的美国非正统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S. 李（Frederic S. Lee）辞世，惊闻噩耗之时，由笔者翻译的弗雷德里克·李的名著《非正统经济学史：挑战 20 世纪的主流经济学》^①（以下简称《非正统经济学史》）刚好完稿。转眼一年过去了，在本书中译本即将出版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弗雷德里克·李的悼念。

一 弗雷德里克·李与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

弗雷德里克·李于 1949 年生于纽约，1972 年在马里兰的霜堡州立学院（Frostburg State College）取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77 年，李与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艾克纳（Alfred Eichner）相识，1978 年在艾克纳的指导下，在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的罗格斯大学汇聚了艾克纳、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简·克雷格尔（Jan Kregel）、妮娜·夏皮罗（Nina Shapiro）、亚历山德罗·龙卡利亚（Alessandro Roncaglia）等一批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他们的指导下，李成为一名后凯恩斯主义者，并于 1983 年取得博士学位。李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罗斯福大学、英国斯坦福德郡理工学院、英国德蒙福特大学，2000 年起任教于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University of Missouri – Kansas City），直至

^{*} 本文标题模仿了弗雷德里克·李在他的老师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阿尔弗雷德·艾克纳去世后写的一篇纪念文章的标题：The Power of Ideas and the Impact of One Man（Alfred Eichner, 1937 – 1988）。

^{**} 张林，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① Frederic S. Lee. *A History of Heterodox Economics: Challenging the mainstrea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9. 该书中译本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14 年去世。(Jo, 2014)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李致力于后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的研究。他发现,以卡莱茨基理论为主体的后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缺乏经验支持。通过引入加德纳·米恩斯(Gaidiner Means)、P. W. S. 安德鲁斯(P. W. S. Andrews)等制度主义者和其他非正统经济学家的理论,李发展出一个以后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基于经验事实的非正统价格理论。这个理论是对新古典价格理论的替代,新古典价格机制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因为在真实世界中,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是不可分割的,李所阐述的价格机制并不是通过市场来协调经济活动。他认为,价格是受到企业的管理的,企业管理价格的目的是让其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偏好进入和控制社会供应过程。李在这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1998年出版的《后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Post Keynesian Price Theory*)一书中。(Lee, 1998)

如果不存在新古典价格理论那样的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价格机制,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组织、如何运行的呢?这是李穷其一生所探讨的问题。如果说1998年的李还是一名后凯恩斯主义者,那么此后他已经成为一名致力于综合各学派的方法和理论,构建对资本主义社会供应过程的理论解释的一名非正统经济学家。李坚持批判现实主义方法论,以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为经验研究方法,以斯拉夫的社会剩余方法为基础,坚持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货币和不确定性观念,综合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制度主义的社会构造矩阵(Social Fabric Matrix)方法、社会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行动的人(Acting Person)的观念等非正统经济学各流派的方法和理论元素,构建了一个由结构、组织和能动性(行为)三个层次构成的分析社会供应过程的模型(Lee, 2011a)。这是近年来非正统经济学家致力于构建统一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代表性成果。与此同时,李对这个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细化工作,努力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构建非正统理论体系^①(Lee, 2011b, 2011c, 2012; Lee and Jo, 2011)。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成了他未竟的事业。

除了理论上的贡献,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团结非正统经济学阵营,推动非正统经济学家群体的发展,用行动为非正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9年,李发起成立了非正统经济学会(Association for Heterodox Economics, AHE),并在英国召开了第一届大会。AHE的每次大会都按主题设立专场讨论,各流派的非正统经济学家可以就同一个主题充分交换意见。AHE成立之后,流派林立的非正统经济学阵营有了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正如李所言:“多年前,我认为非正统经

^① 李反对新古典的宏观-微观二分法,但认为一个统一的非正统经济学理论,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建立一致的理论。

济学……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非正统经济学家没有生存的愿望，没有挑战主流的愿望。AHE 及其积极分子和参与者的出现一扫阴霾，因为它的经历和活动明确地挑战了主流的霸权。可以肯定，面对主流压倒性的优势，非正统经济学……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但重要的是，现在，AHE 体现了一种生存的愿望，一种挑战主流的愿望——现在有了可为之奋斗的未来。”（Lee, 2002: 43）

为了加强非正统经济学家之间的日常联系，李于 2004 年建立了一个网络平台“非正统经济学通讯”（Heterodox Economics Newsletter），不定期通过电子邮件向用户发送各方面的非正统经济学消息。截至 2015 年 9 月 14 日，该平台已向全球非正统经济学家发送了 185 期通讯。

李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努力推动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他与英国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合作，主编了一套“非正统经济学前沿”丛书，出版了大量著作，为非正统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出版渠道，丰富了非正统经济学的文献库。2011 年担任《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主编后，他在该刊先后组织了“非正统经济学的未来”“非正统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学术评价与非正统经济学”等一系列专题讨论，扩大了非正统经济学的影响。此外，李非常注重对年轻一代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培养。AHE 一成立，他就以 AHE 的名义组织了“研究生方法论研究工坊”，鼓励年轻人参加 AHE 的年会，让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成为培养年轻非正统经济学家的镇地。在得知自己已处于肺癌晚期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建立一个基金，资助非正统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完成学业（Jo, 2014）。经他的精心培养，他的学生宋泰熙（Jo Tae - Hee）等人已经崭露头角，继续着他未竟的事业。

李对非正统经济学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他耗时十余年完成的《非正统经济学史》这一著作。这是本文接下来的主题。

二 《非正统经济学史》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与一般的思想史著作不同，李的《非正统经济学史》讲述的不是非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演变，而是记载了英美两个非正统经济学家群体的发展史。他把这种类型的思想史称为“学界史”（Community History），指的是“对那些促进和支撑经济思想和理论的社会相互行为的社会结构的研究”（Lee, 2009: 1）。李的研究集中于两个群体：英美后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 - 激进经济学家，讲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两个群体在主流经济学界的排挤、压制甚至迫害之下，如何顽强、艰难地成长壮大。李的目的不仅仅是记述，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为整个非正统经济学界未来的发展壮

大指明方向。相应的,本书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讲述这两个群体在美国和英国的发展史,第三部分对非正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既然研究非正统经济学界的历史,就必须明确什么是非正统经济学。“非正统经济学”这个词,由制度主义者克莱伦斯·艾尔斯(Clarence Ayres)在1936年首次使用,但含义不明。20世纪90年代以前,文献中多用非传统(Non-traditional)、非新古典(Non-neoclassical)和非主流(Non-mainstream)这些词来指称非正统经济学。在李的大力倡导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普遍接受了“非正统”(Heterodox)这个用法,比如,1999年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就收录了“Heterodox Economics”这个词条。那么,非正统经济学指的是什么呢?“非正统经济学指的是以各种方式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特定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家群体。”(Lee, 2009: 6)具体而言,“这是一个多层次的术语,指的是一个经济理论群体——尤其是后凯恩斯主义-斯拉法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制度-演化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它们对待主流经济学有不同程度的褒贬性立场;它也指的是一个非正统经济学家群体,他们采用一种或者多种非正统方法,将其紧密结合在一起,对这些方法持多元的态度,不反对理论之间的竞争和不同衡量标准;最后,它还指一种逻辑一致的非正统经济理论的发展,这种理论来自各种褒贬性地反对主流理论的非正统方法的不同理论贡献,从这种理论中能够得到非正统经济政策建议”(Lee, 2009: 7)。虽然非正统经济学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不是所有非正统经济学家都彻底拒绝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但“无论它们有什么样的缺点、矛盾和疏漏,非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发展方向都完全脱离新古典经济学”。(Lee 2009: 6 note 1)

因为反对在英美经济学界处于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所以英美的非正统经济学在一种严酷的“竞争局面”(Contested Landscape)下求得生存和发展。本书的第一、第二部分通过一系列思想史事件,讲述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在美国和英国走过的艰难历程。在第一部分,李考察了新古典经济学是如何在美国经济学界确立其支配地位的。他回顾了1870~1900年新古典(古典)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分析了1900~1970年新古典经济学在组织上和学术机构上的支配地位的提升,最后重点阐述了1970~2000年新古典经济学如何将经济系和经济学期刊的排名用作社会控制机制来保持其支配地位。通过这些分析,李明确了非正统经济学在美国面临的竞争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李在“战后美国的激进经济学,1945~1970年”一章中,详细记述了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家在“麦卡锡主义”横行年代的遭遇和抗

争,梳理了“麦卡锡主义”退潮之后,在“新左派运动”哺育之下激进经济学的兴起以及“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早期历史。同样在竞争局面之下,在“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史,1971~1995年”一章中,李以一名经历者的视角记载了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的历史,以及英美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的相互帮助,共同推动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发展。

第二部分记述的是竞争局面下英国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在“英国经济学的竞争局面,1900~1970年”和“非正统经济学在英国,1970~1996”这两章中,李分时间阶段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以剑桥大学为主体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英国的发展。除了记述历史,这一部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详细分析英国1989年开始开展的“科研评估活动”(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对非正统经济学的影响,李用了两章的篇幅来阐述这一内容。就像美国的经济系和经济学期刊排名一样,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把持的“科研评估活动”,通过贬低和排斥非正统经济学期刊和非正统经济学研究成果,成功地促使英国各高校的经济系在短时期内迅速完成了新古典化,与此同时英国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处境迅速恶化。

正是在美国经济系和经济学期刊排名以及英国“科研评估活动”的触动下,李深感到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套非正统经济系和经济学期刊排名体系。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李在记述了1990~2006年非正统经济学在英美两国的发展史之后,详细阐述了他和同事提出并完善的一套非正统经济系和经济学期刊的排名体系。这套体系与新古典排名体系的重大区别在于,不是通过排名去比较各经济系和期刊的水平高低,而是通过排名去促进经济系和期刊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非正统经济学的发展。如李所言:“通过提高研究依存度来形成专门的经济学知识和整体性的非正统理论,正是非正统经济学期刊评价和排名的基础。”(Lee, 2009: 209)因此,这个排名体系特别注重由期刊间的相互引用率来体现的研究依存度。显然,这套排名体系是竞争局面下非正统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竞争的有力武器,它“表明非正统经济学家并非无足轻重的或者不引人注目的经济学家,而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家平等的但截然不同的经济学家。在这样的世界里,非正统经济学家不能无动于衷”(Lee 2009: 226)。李再次用行动拓展了非正统经济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三 《非正统经济史》的贡献

首先,《非正统经济史》是对英美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最详尽的记录。李在书中为这两个思想流派展现了鲜活的群体形象。与注重理论和人物研究的传统思想史著作相比,聚焦于“学界史”的《非

正统经济学史》就像一部历史大片，让读者亲临历史现场，与作者一起去揭开一件件尘封的往事。这样的研究既扩大了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又填补了空白。笔者曾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它最大的优点是能把经济思想史的传统元素——方法、理论和人物研究——串联起来，把“学说史”拓展为“学科史”。当然，这种研究方法并非李首创，但以这种方法去研究英美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非正统经济学史》则是开创性的。

这种研究难度极大，因为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素材来支撑。而“非正统经济学史的组成元素是零散的、孤立的、未公开的，从而非正统经济学家一般来说是不知道的”（Lee, 2009: 20），所以本书中的每一项研究都花了作者至少两年的时间，有的甚至四年。而且，李在进行这些研究的同时，还要用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发展非正统经济学理论，去巩固和强化非正统经济学家群体，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竞争局面”下完成的。李的学生曾问他，为什么要耗费大量时间去写这部历史，他的回答是：“总得有人去做。”（Jo, 2014）

其次，《非正统经济学史》是对经济思想史中的“辉格史观”（Whig History of Economics）和“连续性—多元化命题”（Continuity - pluralism Thesis）的有力回击。简单地说，“辉格史观”就是认为历史是进步战胜反动的必然结果。经济思想史中的辉格史观，自然就是把新古典经济学视为“进步”，把非正统经济学视为“反动”。与之相联系的“连续性—多元化命题”，是想要“表明整个20世纪都不存在替代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只有少数异端观点丰富了经济学话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而那些没有做出贡献的观点理所当然要消失”。（Lee, 2009: 1）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不仅没有非正统经济学的位置，而且连非正统经济学的历史都被否定。《非正统经济学史》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找回了非正统经济学这个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它表明，非正统经济学在“竞争局面”下尽管处境艰难，但它的的确确是一种存在，而且经过李这样的一批非正统经济学斗士的努力，它的处境正在改变，正在努力替代理论上逻辑混乱、实践中毫无价值的新古典经济学。

在这方面，《非正统经济学史》同样并非首创。早在1998年，尤沃·约纳伊（Yuval Yonay）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制度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的著作《触及经济学灵魂的争论》（*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出版以来，思想史家寻找非正统经济学这个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除了约纳伊之外，这方面的研究以马尔科姆·卢瑟福（Malcolm Rutherford）和李为代表。卢瑟福的研究集中于制度主义（Rutherford, 2011），李的研究集中于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进经济学。他们的研究成果涵盖了非正统经济学三个主体流派的丰富历史。在这些成果

面前,“连续性-多元化命题”不攻自破。

最后,《非正统经济学史》是对今天所有非正统经济学家的激励。在新古典经济学处于支配地位的英美经济学界,在本书叙述的21世纪前的每一个时间阶段,非正统经济学以及非正统经济学家都在被排斥、贬低甚至迫害的环境中艰难求生。就算是在学术环境相对宽松的非极端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仍然“对社会经济问题保持缄默,在学术上封闭了经济学的不同路径,通过贬低非正统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博士生)而拒绝多元化,嘲弄非正统经济学家不严谨、弱智,从而反对其理论;他们培养的未来经济学家对他们的学科不做(或至少是偏向于不做)历史的理解,不知道非正统经济学方法;强化一种压制性的课堂环境,不欢迎批评性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反应是意欲威吓学生,使其唯命是从、闭口不谈;拒绝那些包含非正统观点的博士论文和论题”(Lee, 2009: 49)。即便如此,非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家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

与20世纪的环境相比,今天非正统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根基,世界范围要求经济学多元化的呼声此起彼伏,非正统经济学理论本身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李用“涌现”(Emergence)这个词来描述1990~2006年非正统经济学取得的进展,认为非正统经济学已经掀起了一场“社会运动”:“也就是将不同的非正统经济学家联系在一起,交换思想,共同研究,以产生一个非正统经济学家的团体,进而努力发展一种非正统经济学理论。”(Lee, 2009: 189)这场运动的产生当然得益于老一辈非正统经济学的努力。与艰难处境中仍然坚持信念、不懈抗争的老一辈相比,今天的非正统经济学家没有任何懈怠的理由,都应“努力对非正统科学知识的生产以及非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家群体的发展做出贡献”(Lee, 2009: 226),这是对弗雷德里克·李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参考文献

- [1] Jo, Tae - Hee. 2014. "Obituary: Frederic S. Lee (1949 - 2014)". <http://heterodoxnews.com/leefs/fsl-obituary>.
- [2] Jo, Tae - Hee and Todorova, Zdravka (eds.) 2015.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Heterodox Economics: Essays in Honor of Frederic S. Lee*. London: Routledge.
- [3] Lee, Frederic S. 1998. *Post Keynesian Price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 Lee, Frederic S. 2002. "The Association for Heterodox Econom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 50: 29 - 43.
- [5] Lee, Frederic S. 2011a. "Modeling the economy as a whole: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70 (5): 1282 - 1314.
- [6] Lee, Frederic S. 2011b. "Heterodox microeconomics and the foundation of heterodox macroeconomics",

Working Paper.

- [7] Lee, Frederic S. 2011c. “The making of heterodox microeconomics”, Working Paper.
- [8] Lee, Frederic S. 2012. “Critical realism, grounded theory,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in heterodox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 [9] Lee, Frederic S. and Jo, Tae – Hee. 2011. “Social surplus approach and heterodox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45 (4): 857 – 875.
- [10] Rutherford, Malcolm. 2011. *The Institutional Movement in American Economics, 1918 – 1947 : Science and Social Contr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1] Yonay, Yuval P. 1998. *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 Institutional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in America between the W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政治经济学报》投稿格式与注释规范

(一) 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请作者将自己的姓名、署名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所受资助、感谢语等信息全部列于与正文内容无关的首页。在正文中，则应去除自己的姓名。

所投文章，无论本刊是否采用，恕不退稿。请作者做好稿件备份工作。

(二) 文章正文，小四宋体，1.5 倍行间距；所有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全部采用“Times New Roman”格式。

(三) 文章一般包括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注释。

1. 摘要。摘要是对文章主要观点的概括，200—300 字左右。本刊欢迎有条件的作者，提供英文摘要和关键词。

2. 关键词。作为文章核心范畴的关键词，3 至 5 个。

3. 正文。正文的一级标题使用“一、XXX；二、XXX”格式，前后各空一行，并居中、加粗。二级标题使用“（一）YYY；（二）YYY”格式，左起空两格、加粗。

4. 参考文献。西文在前，中文在后。中文或日文按作者姓氏的汉语拼音顺序排列，西文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具体样式为：

(1) 专著。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论文。例如，罗斯多尔斯基：《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教学与研究》2014 年第 4 期。

(3) 报纸。例如，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学习时报》2015 年 9 月 7 日。

(4) 网站资料引用。例如，周艾琳：《央行盛松成：人民币贬值是短期现象》，《第一财经日报》2015 年 9 月 28，<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0928/011823362920.shtml>。

(5) 正文行文中，需要标明出处的引文或提示。例如，“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2004：10）

5. 注释。凡是需要对读者进行特别指明并强调的文献引用，亦包括进一步的说明性文字，需要使用“当前页下脚注”，以“①、②、③”小五号宋体，每页重新编排。

《政治经济学报》编辑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经济学报. 第5卷 / 孟捷, 龚刚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097 - 8111 - 1

I. ①政… II. ①孟… ②龚… III. ①政治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2376 号

政治经济学报 第5卷

主 编 / 孟 捷 龚 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陈凤玲

责任编辑 / 陈凤玲 陈 欣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88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111 - 1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政治经济学报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报》（原《清华政治经济学报》）创办于2013年，旨在推进国内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并鼓励以多学科视角进行经济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国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学派化、数理化、跨学科多样态势，研究水平和研究实力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本专辑旨在系统地展示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是了解国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上架建议：政治经济学

ISBN 978-7-5097-8111-1



ISBN 978-7-5097-8111-1

定价：58.00 元